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序：命运播种

第一章 世界体系的破裂

一、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中心与边缘

1. 议会式政党
2. 从施特劳斯学派衍生的诡辩
3. “自由-殖民主义”的同构
4. 大英帝国的课业
5. 降虏社会的本质
6. 大英帝国转向日本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的革命外交

1. 军事动员与战争形态的变化
2. 贵族式外交的没落
3. 德国释放“革命外交”

三、协约国和日本维护远东体系的布局

1. 英日同盟
2. 日本的外交性格
3. 东亚大陆的小邦竞逐时代
4. 国民共同体的塑造
5. 远东病室与拉美摇篮

四、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策源地

1. 德国和列宁的交易
2. 列宁主义以俄罗斯为宿主
3. 布尔什维克大洪水
4. 列宁主义进入远东宿主

第二章 远东体系的破裂

一、列强的绥靖主义和民国的机会主义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远东
2. 日本受恶名而不得恶行之利
3. 民国突破外交底线
4. 列宁送来特洛伊木马
5. 俄对满洲的渗透和日本对满洲的建设
6. 北京拆除藩篱

二、法统的崩溃与边界的崩溃

1. 段政府的善后会议
2. 孙文投靠苏联
3. 从泛亚主义者到列宁主义者

三、“远东共和国”与远东革命布局

1. 远东革命的指挥权
2. 作为白手套的远东共和国
3. 远东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外交
4. 共产国际对中国支部的拨款

四、短兵相接的时代

1. 加拉罕扶植冯玉祥
2. 鲍罗廷经营国民党
3. 共产国际在广州、华北、满蒙的网络

第三章 三种革命外交的竞技场

一、苏联的路线斗争与远东革命政权的反复

1. 世界革命派失败
2. 远东局经营上海
3. 莫斯科调整远东政策
4. 夺取上海的革命高潮
5. 远东局过河拆桥
6. 清党与中华苏维埃的建立
7. 斯大林大权独揽

二、日本国际协调主义和泛亚主义

1. 日本民主势力上升
2. 大众民主与绥靖主义
3. 残破的藩篱
4. 莫斯科编织蛛网
5. 沉睡的看门狗
6. 日本的激进化
7. 泛亚主义及其盟友

三、国民政府的历史——国族建构和区域霸权主义

1. 蒋介石的赌注
2. 国民政府的蓝图
3. 条约维护者的后退
4. 国民政府的巅峰时刻

四、瓜分旧秩序残余资源的斗争

1. 围绕上海的斗争
2. 共产国际的内陆攻略

3. 竭泽而渔的苏维埃宪制
4. 列宁党的组织资源
5. 南京国民政府的野望
6. 次级帝国主义的深入

第四章 从二战到冷战

一、国共抗日与国际统一战线

1. 日、苏、蒋三角变局
2. 西安事变无关大局
3. 蒋介石挑起战争
4. 莫斯科和南京的交易
5. 毛泽东改变生态位
6. 国民党准备总体战
7. 斯大林和毛泽东斗法
8. 毛泽东拯救共产党
9. 共产国际通过西方经营远东

二、“满洲堡垒”和泛亚各国的民族构建

1. 日本激进派的满洲梦
2. 新天地的开辟
3. 满洲国的宪制
4. 汪兆铭推动东亚联盟
5. 日本经营南洋
6. 东南亚的国家构建

三、华北、南京和重庆的法统复辟与革命投机

1. “抗战建国”的虚构
2. 南京的党统与北京的法统
3. 孙文主义的最高峰

四、毛泽东的色拉米香肠战术与梁山路线

1. 斯大林改变远东政策
2. 毛泽东建立根据地
3. 统一战线与渗透策略
4. 发展是硬道理
5. 渗透-劫持-重组-汲取
6. 统战与革命一体两面
7. 毛泽东贰心日涨
8. 美国调停失败

第五章 冷战与反殖民主义

一、从满洲到朝鲜，格局选择宪制

1. 苏联占据满洲
2. 蒋介石自取灭亡
3. 满洲-朝鲜无国界
4. 不平衡的内战
5. 毛泽东和蒋介石隔海建国
6. 土改、镇反与朝鲜战争
7. 新中国的宪制
8. 东亚冷战结构的凝固

二、1954年体制的巩固和演变，宪制适应格局

1. 美国保护台湾
2. 毛泽东挑战赫鲁晓夫
3. 流沙社会与赌徒策略
4. 一九六〇年代的逆袭
5. 世界革命的失败与文革
6. 大中华主义在台湾失败

三、反殖真空地带的颠覆与反颠覆

1. 胡志明的崛起
2. 毛泽东干涉越南
3. 南洋穆斯林社会的抵制
4. 莫斯科和北京在河内的竞争

四、梁山的逆袭，1972年外交革命

1. 尼克松和毛泽东的宫廷外交
2. 东亚格局再次改变

第六章 世界革命的失败

一、列宁主义的复辟与冷战末期的机会主义联盟

1. 列宁党在中国的复辟
2. 台湾战略地位的下降
3. 台北流亡政权的本土化

二、全球化的重临：冷战真空和远东孑遗

1. 中国劫后社会的重建
2. 最大的秩序真空俄罗斯
3. 远东的秩序孑遗
4. 中国走向市场列宁主义

三、罗马世界的挑战者和投机者

1. 罗马秩序的形成
2. 威尔逊主义的约束与挑战
3. 日本地位上升

4. 台湾认同转移
5. 国民党的未来就是没有未来
6. 北京追求霸权
7. 台湾面向海洋

四、远东冷战体制的最后崩溃

1. 中国告别韬光养晦
2. 中国扭曲的认知结构
3. 中国的车臣化或朝鲜化
4. 日本的角色

跋：决断时刻

附录

附录1：关于山东善后交涉问题的政府方针（山東善後交渉問題に關する政府方針）

附录2：《关于与远东共和国的军事协定》（《極東共和國との軍事協定案に關する件》）

附录3：1923年日俄谈判记录《关于日苏两国间非正式预备交涉的交换文书》（《日ソ非公式豫備交渉ニ關スル交換文書》）

附录四：关于解除进出口的禁止及限制的国际条约（輸入及輸出の禁止及制限の撤廢の爲の國際條約）

附录五：关于山东派兵的政府声明（山東派兵に關する政府声明）

線索

西方秩序的輸入與中國的演變

遠東

遠東的
線索

西方秩序的輸入
與中國的演變

中國向外推行擴張政策是歷史的必然嗎？

中國一貫用神話代替歷史，
誤解自己在世界上的真實地位，
東亞近代史的主軸並非掙脫西方宰制的民族復興，
力圖重建國際秩序只會造成自身的崩潰。

劉仲敬

顛覆傳統歷史認知框架的最新力作
一部西方秩序輸入與輸出的遠東近代史

劉仲敬

的

八旗文化

序：命运播种

今天所谓现代世界的产生，通常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所指，以不同比例混合，补充和吸纳若干本身本无意义的细节和现象。第一种所指其实就是英格兰的历史路径，经过若干变形和妥协，辐射和改造了欧洲和世界的面貌。俗人和下士¹为了回避欧洲中心论的嫌疑，改用太监一样中性的词汇“现代世界”。如果说学问的本义就是尽可能增加公众的理解力，像苏格拉底一样毫不忌惮暴君和暴民的感情，政治正确的意义就是学术无产阶级将判决苏格拉底的法庭内化到自己心中，用貌似知识的政治信念、而非彰明昭著的无知作为降低公众理解力的工具。第二种所指蕴涵了人类文明和命运的深刻变化和巨大威胁，意思是我们所知的文明从此开始自觉和武断地干涉人类和世界的命运。历史上存在过的大多数已知文明都是越过这个阈值以后，给文明内部的自发秩序生产力增加了太多负担，最终将世界留给了轻装上阵的蛮族²秩序生产者。第二种所指给第一种所指提出了尖刻的警告，因为英格兰相对于欧洲、欧洲相对于世界的最鲜明特征就是：它在蛮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两者在下士眼中都是愚昧和野蛮）的保护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自觉和武断，从而积累了比以前和同时其他文明更为丰厚的元气（秩序生产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所谓的西方和现代文明点燃火炬以来，给观众造成了光明的永恒天经地义、黑暗和灰烬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在西方文明以前，其他文明的观众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他们非常清楚文明的烟花性质，对灰烬的冷却并不感到惊讶。

知识是文明所仰赖的甜蜜和光明，但知识也有两类。第一类知识是园丁的知识，默默保护和积累秩序生产力，借助无数西西弗斯的质朴和虔诚，将每天都想露出地面的野蛮推回到地下。这种知识虽然并不全部依靠默会来传承，但默会的部分终究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二类知识是烟花匠的知识，将蛮族时代和文明时代积累的秩序资源点燃，照亮了历史、世界和未来。他们的技艺同样配得上人类永远的称羨和感激，但他们的成就主要不是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园丁积累和生产的厚薄快慢。如果烟花消费的速度超过了积累和生产所能支持的程度，仿佛繁花似锦的文明就会从内部枯萎。文明的维护者对第一种知识只能保护和培育，对第二类知识既要保护又要限制，因为后者的失控是文明衰亡的重要原因，不逊于后者的产生是文明成熟的主要标志。现代世界的成熟，以民族国家的整合为标志。民族国家和成文法取代封建自发秩序和习惯法，让历代园丁积累的薪柴大放广袤，但还不至于让整个森林付之一

炬。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标志着毁灭罗马和其他众多文明的危险技艺再度发现，将美丽和温暖的火炬变成了毁灭世界的火灾。无数骄妄的生灵嘲笑先人的愚昧，自以为掌握了永享光明的不二法门，却突然发现自己黑暗中摇尾乞怜，摸索最后一点点迅速冷却的余烬。正如奥威尔所说，混淆黑白的话语体系就是颠覆者的先锋³。二十世纪的远东革命史经过他们的割裂和歪曲，已经沦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奥吉阿斯牛圈⁴，急需清理和复原。颠覆者从来不乏冒充理性客观中立的高级匪谍史学，他们的危害比明火执仗的《联共（布）党史》大得多，即使三十年前的费正清学派⁵也不过如此。

高级匪谍⁶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完全清楚一旦材料回到比例恰当的格局当中，形成前后连贯的整体，历史现场的脉络和情境就会自动呈现出来。他们的技巧不在于彻底的抹杀和直接的伪造，而在于巧妙地割裂和扭曲：隔断材料和环境的联系，切断前因和后果的关系，将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排除在人为制造的格局之外，用楚门世界的框架和大锯活人的布景联缀起来，用蒙太奇技术制造虚假的相关性和因果性，用假线索掩盖真材料的意义，这样外行读者就看不清材料在格局当中的意义了。谁能写好一部以朝鲜为中心，仅限于朝鲜范围的朝鲜战争史？既然战争的主角、前因和后果都在半岛之外，仅仅是错误的框架就足以妨碍读者形成适当的比例感了。整体比例感的破坏和相关性的错置对公众的理解力危害最大，远远超过具体材料或考订的谬误。任何版本或倾向的《中国现代史》或《中国革命史》都会造成同样、甚至更大的问题，因为“中国”本身就是现代史或革命史造成的结果，在现代史或革命史开始的时候并不存在，自身不能构成远东历史的主要驱动因素和全部现场，这些都是《远东的线索》必须存在的原因。基本格局和线索恢复以后，材料的搜索和考订就不是多么困难的任务。

伪问题和稻草人只要置于比例恰当和线索清晰的格局当中，无需辨证就会自动沦为笑柄。抗战由谁领导？这种问题有任何意义吗？既然事后争夺领导权的觊觎者根本没有独立的决策权？⁷斯大林和蒋介石的交易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项人肉盾牌计划才是蒋介石开战的真正理由和红军长征的真正原因，尤其也是汪兆铭坚信蒋介石会害死国民党的真正理由。敌后抗战是不是中流砥柱？这种问题有任何意义吗？既然东亚大陆在二十世纪国际板块的运动中，从来都不是主要动力？觊觎者在敌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消灭了大部分友军，包括河北、山东、江苏三大省政府，发展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海路贸易，用粮食换取日本武器⁸，依靠津浦路协定⁹从上海和汪兆铭控制区输送物资而已。这条路线比美国飞行

员用生命换取的驼峰线更大更可靠。上海四五十年代和香港八九十年代商人以此起家者比比皆是，东南局¹⁰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抗战最初几年，沈鸿烈和韩德勤的部队¹¹集中力量破坏津浦路。八路军消灭了前者，新四军消灭了后者。此后，津浦路就不再危险了。潘汉年是这场交易的代表，饶漱石是他的直接上级，刘少奇又是饶漱石的上级。饶漱石在五十年代的风暴中落马，本来不会开除党籍，因为潘案的牵连只能老死狱中。饶案即使在文革后都无法平反，因为饶的复出会把刘少奇变成汉奸。毛泽东说饶对党不老实，就是看穿他在认罪材料里玩弄手段，企图留下日后翻案的活门。邓小平和他的朋友们也是因此下定决心，让他永远没有机会开口。¹²

诸如此类的闹剧布满了二十世纪的远东历史，然而真正的悲剧在于甚至直接受害者都不知道牺牲的原因。无知的大军继续在黑暗中相互残杀，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仍然生活在烈焰留下的灰烬当中。这场大火虽然尚未也并不必然彻底毁灭我们所在的文明，但无疑已经造成了最大破坏，可能预示类似、甚至更大的危险。文明的朋友理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复原火场的草蛇灰线，将牺牲者应得的公义还给他们。

是为序，录旧作志之。

山河

北顾难存卫，东途耻帝秦。
客星横上党，木叶断江阴。
弩马嘶碣塞，离人望华亭。
伤心寒潭客，犹自雒城吟。

第一章：世界体系的破裂

一、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中心与边缘

本节引言：

十九世纪在欧洲体现为自由主义的世纪，在欧洲以外体现为殖民主义的世纪。其实，两者是同一种秩序在世界中心和边缘的不同表现。纳税人选举产生的议会主导政治事务，以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为己任。中心和边缘的主要差异在于：欧洲的纳税人和无产者没有种族差异，通过民族构建而逐步转型为大众民主；殖民地的欧裔纳税人和土著无产阶级难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整合，殖民主义变成了文明秩序的仅有保障。

1. 议会式政党

“漫长的十九世纪”始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终于1914年德国入侵永久中立国比利时。在此期间，国际体系空前稳定。欧洲大陆实现势力均衡，皇家海军统治海外世界。正统原则保证了欧洲各国相互承认、相互信任，一切交涉留给国际主义性格明显的贵族外交官俱乐部处理。¹³流亡者和失败者受到外国政府的公开庇护，后者并不会因此得罪友邦。国内反对党和国外敌对势力存在明确区别，合法政府的敌对行动受到战争规范的严格限制。只有在这种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国际环境支持下，国内的政治斗争才能高度形式化。形式主义者的政治通常称为自由主义政治，其实就是列宁和施米特(Carl Schmitt)鄙视的市井小人的浅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假定法治高于政治，一切政治问题最终都可以化约为法律问题。法治基于普遍性原则，没有不能覆盖的领域。程序保障权利，保护个人免除权力斗争的危险。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权力主义者都认为，没有抽象和普遍的法治，具体和有限的法治如果存在，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临时产物。政治学如果撇开造就这些临时产物的决断，就是把政治学庸俗化。正义规则产生于决断之后，而决断本身是超乎正义或非正义之上的。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党派居于统治地位，或成文宪法体现了明确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是说政治问题已经可以化约为法理和法律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机构的各种可逆性程序讨论和解决，使得书写元规则的不可逆决断退居幕后，甚至从大多数体面人士（资产阶级）的想象中消失。这就是葛兰西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化霸权¹⁴，在他的体系中比马克思重视的经济霸权更加关键。

保守派、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的政党跟自由主义政党同样深陷体面人士（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中，已经丧失了以其他方式理解、表达和行动的能力。议会式最初就是自由主义政党，其他政治势力不以政党的形式存在。保守派在英格兰以国教会为依托，在欧洲大陆以天主教会和正统君主制为依托。民主派在英格兰表现为普莱斯¹⁵和科贝特¹⁶式的独立教派，以及没有选区的市镇群众运动；在欧洲大陆表现为山岳党¹⁷和激进党，以密谋团体和军事政变著称。社会党人在马克思时代仍然是公认的反社会势力和候补的刑事犯罪分子，其纲领和活动本身就是违法的，其名誉和手段跟黑社会组织区别不大。福尔摩斯小说当中的《恐怖谷》，就代表了当时体面社会对工会的看法。工会首脑“身主麦金蒂”依靠暗杀和勒索维持团体，终于败在平克顿侦探社手下。中国教科书把平克顿侦探社描绘成资本家破坏早期工人运动的打手，原因尽在不言中。美国工人运动的早期英雄，例如纳入中学教科书的乔·希尔¹⁸等人，都是因为刑事犯罪，被陪审团判处死刑。简单粗暴地说，不用违法手段是不可能阻止工贼的。而所谓工贼无非就是不肯缴纳工会费的独立劳动者，例如华人劳工。加利福尼亚的社会主义和排华运动是一回事，奥秘就在这里。普通法将工会从密谋犯罪团体名单上删除，还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情。谢普雷法(Loi Le Chapelier)明确禁止工会，因为工会只有在强制反对派工人和独立劳动者的基础上才能存在。

这三种政治势力在中世纪的宪法理论中，都不属于而且不应该属于国会政治。国会就是市民阶级—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代表，负责财政税收的。贵族是武士团体，有自己的上议院。教士负责社会福利和教育，有平行于国会的教务会议。无产者不在政治共同体内，本来就没有选举权。三者没有议会政党，是符合传统的。他们组织政党，最初只是为了模仿资产阶级。国会逐渐吞并了其他各等级的机构和权力，迫使他们的团体组织类似资产阶级的政党。民主派按照马克思及其朋友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组织。也就是说他们的财产达不到中世纪的市民或有产者标准，但仍然不是无产者或体力劳动者。最初的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经常混淆，莫里斯¹⁹和拉萨尔²⁰之流领袖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最初一致追求普选制，实现以后就分道扬镳了。由于政党组织越来越重要，最后发挥了反客为主的作用，例如社会民主党最后出现了议会党团压倒工会的现象，天主教社会党团也日益独立于原先的母体——教会²¹。

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政党才是纯正原始意义上的政党，没有诸如此类的非议会后台组织。资产阶级人士经常觉得，后台组织操纵前台政党

是不大符合议会政治精神的。如果现代读者难以理解，不妨参考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²²的情况。恐怖组织的政治代理人参加议会选举，那些没有幕后打手的良民代表会怎么看待他们呢？非议会准政党的议会化和政党化，是各等级共治体系转型的关键步骤。欧洲人不大重视，因为那是不用解释的。而汉语世界迄今为止，还没有正确的理解。因此当列宁和希特勒发动超越元规则和颠覆体面社会本身的超限战时，资产阶级势力（包含从保守派到社会民主党的所有体面政党）竟然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本来非常强大的力量。

2. 从施特劳斯学派衍生的诡辩

施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门徒²³怀着难民的心态，托庇于礼失求诸野的美国桃花源，试图教育自己的东道主吸取历史教训，在面对不惮于超限战的敌人时，果断抛弃适用于体面对手的形式主义，行使剿匪先于主义的战争权利，将争夺政党利益的日常斗争，转化为保卫文明价值生死斗争。²⁴美国乡民由于自身的优越处境，不能切身理解社会性超限战²⁵的恐怖，对施派的弘论似懂非懂。刘小枫及其弟子倒是理解了美国人理解不了的东西，却把施特劳斯的教导用到了相反的地方，试图利用施派“非常决断在非常状态下必不可少”的论证，来证明共同体可以、甚至应该建立在永久性的非常状态之上。这种理论连施米特²⁶都不会接受，但确实符合列宁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原旨。施特劳斯的政治学是客卿的政治学，反映了欧洲知识分子对纳粹和苏联的恐惧，委婉地要求民主社会具备自卫的权利和能力。任何人只要熟悉魏玛共和国的衰亡史，就不会不理解他的意思。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吸收他的思想，大抵引向在国际范围输出民主秩序的方向，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本土社会遭到内部颠覆的可能性。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解释韦伯的思想，也存在同样的问题。²⁷

德国思想家的魔性成分源于自身环境，他们在英语世界的继承者总是要阳光得多。刘小枫的弟子恰好相反，故意把紧急状态的决断引向相反的方向，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为斯特劳斯学派准备防范的颠覆势力寻找借口。斯特劳斯学派要求民主社会面临强大的颠覆威胁时，要有行使紧急状态的理论准备，翻译成日常语言，就是要行使白卫军的剿匪权力，用临时的独裁权保卫资产阶级社会。决断的意思就是为了保卫民主，不得不暂时牺牲民主。刘小枫的意思恰好相反，就是用资产阶级临时专政的正当性，论证列宁主义的永久性专政同样是正当的²⁸。紧急状态的本义就包含了临时的意思，决断的本义就是日常的反面。二者的正当性都有

赖于临时和非常的特征，而刘小枫却把这种正当性解释为二者可以具备正常性和日常性。决断的合法性有赖于决断者保卫社会的性质，刘小枫却将决断权交给了社会的颠覆者。简单粗暴地说，他其实是要求盗匪享有警察的权利。他借用警察必须享有临时和有限杀人权的论据，反过来论证盗匪必须享有永久和无限的杀人权。如果有人反对杀人，他就会借此要求警察解除武装。无论如何，他的基本点就是维护社会颠覆者。这种诡辩的技术并不是从他开始的，马克思本人借用和反用资产阶级激进共和派论据的技术与此非常相似。施特劳斯和施米特在汉语世界衍生的数百万字著作和成千论文，翻译成市井小人的语言都没有超出上述范围。这些作者之所以采用他们实际上所用的语言，主要是因为如果肯说人话，就不用指望任何支持者了。

3. “自由-殖民主义”的同构

“自由主义世纪”或“英国统治的和平”貌似金瓯无缺，其实留下了体面人士忽略的两个缺口。Fair Play游戏规则的内化在欧洲和世界都是动态的过程，将原材料塑造为艺术品的过程肯定会留下边角料，也就是文明意义上的内部和外部无产者。前者从不能适应秩序的社会参与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规则的局外人。局外人对排斥自己的新社会，逐渐产生敌我认同，有些沦为丧失社会关系的游民和游士，自然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有些投靠所在社会的他者，例如李大钊之流。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拒绝承认文明的资源可能穷尽，坚持塑造产生的边角料和塑造之前的原材料没有本质区别，发明对内和对外的两种规训或同化技术：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

自由主义的原则是：纳税人决定公共开支，财政决定宪制。由此产生了有产阶级选举团和他们的国会政治。善意假定无产者获得财产和体面的过程，就是培养必需政治德性的可靠甄别程序。十九世纪末叶，普选制的危险理论开始侵入议会改革的进程。也就是说，人民的武断权力开始侵犯财产的权利。这是二十世纪混合宪制崩溃的先兆，但资产阶级政党宁愿选择妥协和让步。殖民主义的原则是：大英帝国是严厉的女教师，有义务而且有能力训练缺乏自治能力的学生活出文明价值，但在学生的政治德性通过甄别以前（如果能够的话），仍然必须为学生抵挡危险的诱惑者和颠覆者。十九世纪末叶，“大英帝国的课业”变成了“白人的负担”²⁹。也就是说，欧洲大陆列强开始染指海外世界。这种变化并不符合维也纳体系³⁰的精神，但大英帝国宁愿选择分享和协调。

“英国统治的和平”在欧洲体现为自由主义，在海外体现为殖民主义。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在文明价值的意义上基本同构，其表面差异只是世界体系中心和边缘的自然落差。内部无产者（缺乏德性的欧洲普罗大众）和外部无产者（没有自治能力的亚非美澳蛮夷）构成虚拟公学(Public school)的“未成年人”，他们的美好行为离不开欧洲（尤其是英国）有产阶级（“成年人”）的课业。绅士的德性既体现于阶级团体内部的自治能力，又体现于导师、代理人和托管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代议制的原则和殖民主义的原则内在地统一，结晶为被萧伯纳和粉红色知识分子嘲笑的品质³¹。殖民不是一种固定的制度，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东方人习以为常的征服和征敛，而是秩序之流在德性落差的瀑布上浮现。英格兰是天然的殖民者，也是以后一切殖民者的楷模，因为只有盎格鲁社会完整地保存了封建自由的古老形式和特殊主义，能够汇集全世界的习惯法，而不致于伤害母体的形式。然而，1848年原则造就的国民（民族）共同体对同质性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丧失了习惯法固有的灵活性和包容性，有利于边界封闭的实体。最初的民族发明注定会刺激下一轮民族发明的链式反应，首先从欧洲到近东，然后从近东到远东。东亚的变化是欧洲的延伸或后续，不是内生的机制。

4. 大英帝国的课业

查理·义律（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将殖民秩序输入远东，或者说将大清和粤东习惯法纳入了凯尔特和威尔士习惯法的序列，两者其实是同一过程。义律本着因俗而治的传统，建立了香港殖民地。香港习惯法的司法解释最终属于枢密院和上议院，曼岛、威尔士和凯尔特高地的习惯法同样如此。这些体系彼此平行而互不统属，但都以上议院—最高法院为终点。首个《安民告示》（Proclamation of 2 February, 1841）向香港原居民保证：“至尔居民向来所有田亩房舍产业家私，概必如旧，断不轻动。凡有礼仪所关乡约律例，率准仍旧，亦无丝毫更改之谊。且未奉国主另降谕旨之先，拟应照《大清律例》规矩主治居民，除不得拷讯研鞫外，其余稍无所改。凡有长老治理乡里者，仍听如旧。”³²为数众多的香港居民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少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在最初的数十年间也很少让统治者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为数不多的英国人没过几年太平日子，就重演了他们祖先在英格兰上演的剧目，举起“纳税人与代表权”的旗号拒绝交税，迫使总督府为他们开放了“非官守议员”（unofficial members）。³³这次改革播下的种子，最终成长为今天的香港“功能界

别”选举制³⁴。法团主义（corporatist）本属封建自由的成例，在英格兰庇护所逃过了绝对主义的洪水，又在殖民主义庇护所逃过了民主主义的洪水，最后却依靠列宁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选民的恐惧而幸存，令人不得不叹服世界之奇妙。³⁵

大清朝廷和士大夫对香港的宪制演变视若无睹，因为理解能力永远不会超出认知结构确定的天花板。上海英租界为殖民秩序的播散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因为永租制恰好适合充当普通法和东亚习惯法的中继站，同时又阴差阳错地符合清英双方的外交需要。清国保存了统治权仍然在我的面子，英国避免了清国肢解影响东亚市场支付能力的风险。英格兰的永租制源于封建领主-附庸的契约，允许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预先为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开了方便之门。英格兰的承租人向地主缴纳契约保证金，契约双方每年在秋收季节分享土地的果实。即使在大多数契约已经不再涉及农业的时代，封建的古老形式仍然一丝不苟地流传下来。苏松等地的地主虽然不能理解保证金和封建契约的关系，却不难理解年租的实际用途。大清虽然不能理解领主权利的意义，却非常害怕洋人佃客赖着不走，暗自庆幸愚蠢的英国人没有索取自己无力拒绝的所有权。³⁶

小刀会之乱（1853-1855）和李秀成的进攻（1860-1861）增加了上海绅商对殖民主义秩序的依赖，削弱了朝廷讨价还价的能力，结果产生了工部局-上海市议会（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³⁷。上海租界和所有租界最初都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区域，因为官绅都不想让这些不服王化的夷人在自己眼前出现。尽管条约允许外人入城定居和生活，两广总督和士绅却一再煽动民众骚扰外人。后者为了落实皇帝授予他们的权利，一再去北京上访。咸丰皇帝一再踢皮球，打发他们回广州等候处理。其实，这些小动作就是皇帝的意思。历届总督都因为成功地排斥了洋人，向皇帝报喜并获得嘉奖。结果，外人不得不在起居不便的荒滩定居。太平天国战争将大批难民赶进了租界，才改变了租界的人口结构。苏州一带的绅士逃离太平军占领的家园，只有请求外国军舰保卫租界。人口的增加刺激了贸易，也使公共治理的问题变得迫切起来。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精要就在于有产阶级选民团及其代议制，在远东的《工部局章程》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暴露了殖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内在同构性。

1854年7月11日，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³⁸主持承租人会议。他依据1854年《土地章程》第十条，论证自治市政府的合法性。依据封建的、英格兰的、民族国家声索绝对主权以前的欧洲成例，自治市镇就是一个拥有部分主权的实体。部分主权实体不仅有权跟它的领主和君主交涉，

而且有权跟其他自治市镇和其他君侯交涉。（光荣革命时代的联省共和国仍然允许阿姆斯特丹行使这种权利，但法兰西国民公会就不再允许斯特拉茨堡继续保留其条约权利。1848年的日耳曼邦联仍然承认帝国城市的独立外交权利和其他历史特权，但魏玛共和国就不再允许。）阿礼国为他的自由市争取了两种特权：为保护纳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邀请皇家海军巡防；为整合卫生、警察和征税事务，成立市政委员会。他的做法侵犯了大清主权，正如耶律楚材背叛了大宋皇帝³⁹，因为主权在欧洲还是一个有待普遍承认的新概念，在海外根本不存在。严谨的叙事应该是：大清和列强的交涉，在以后的几十年内逐渐引进了欧洲正在发明的主权。承租人会议选举凯威廉、麦都思、金大卫、费龙、斯金纳、白朗、金能亨七人为委员会董事，同时决定成立东亚第一支警察部队。尽管外交大臣克拉林敦伯爵⁴⁰拒绝以女王陛下的名义为自由市担保，承租人会议还是继续推进自己的工作，直到《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

（1869）成立了纳税人会议，继承了最初有承租人会议最初的权力。⁴¹

工部局和纳税人会议是东亚第一个代议制政治体，而且不同于它的晚辈谘议局和旧国会，能够有条不紊地履行其财政责任和其他责任，管理水准长期维持了欧洲标准，直到遭到国民政府的侵犯。《土地章程》修正案规定：选举团由每年缴纳房、地各捐超过五百两的承租人，以及年租超过一千二百两的纳税人组成。董事候选人每年一月提名，二月选出。候选人只要获得两名或两名以上纳税人的支持，就能列入选举名单。当选董事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⁴²。《董事会章程》（1865）⁴³规定：董事选出后，应该在第一次会议选出总董和副总董。董事会每月必须召开两次会议，总董必须主持会议。在三位董事提议的情况下，董事会应该召开特别会议。原始提案和修正案都应由动议人签字后提交总董，然后由董事会表决。董事会管理各项日常行政事务，制定和修改《土地章程》附律，管理财政收支，设置和废除机关，任用和罢免工作人员，跟大清和各国交涉，组织万国商团自卫队。虽然《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也成立了会审公廨 (Mixed Court)，但工部局在涉及自身的案件中没有司法权，审判是领事法庭的条约权利，经常判决工部局败诉。各国领事是董事会的天敌，一再阻挠纳税人会议将自治体改造为“独立共和国”的努力。条约体系对大清及其继承者的约束和保护，是后者得以幸存和构建的主要原因。

香港是孤立和特殊的政治体，工部局却是东亚所有自治体的源头和模板。此后的上海法租界、汉口德租界和其他城市的各国租界纷纷效仿，成立自己的工部局。有产阶级选举团的公正和开明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纳税人会议的成员基本上是欧洲人，保护华人财产和习俗的可靠程度却高于大清的任何衙门。1893年《土地章程》中提到，“倘工部局欲筑公路穿过华人产业，则须于动工之前，预先商议购地，及搬迁房屋或坟墓之在路线上者”；“华人坟墓，若非其家属，自行允准，不得动迁。”《皇朝经世新编》赞美会审公廨的司法程序：“案无大小，胥由人证明其曲直，律师辩其是非，审官研鞠而公断之，故无黑白之弊。”⁴⁴汉口和其他城市的“中外会审制度”是上海会审公廨的嫡系子孙。在没有欧洲人主持的法庭上，华人的生命财产很难得到保障。⁴⁵英格兰的乡绅和商人保卫了英格兰的“财产和自由”，在英格兰之外，殖民主义保卫了东亚绅商“财产和自由”。他们一旦脱离了殖民秩序，就迅速地回到了他们从未远离的黑暗当中。

5. 降虏社会的本质

殖民主义体现了自由秩序的扩张，但文明的余烬只有依靠外源的热能才能回暖。末期文明只尊重赤裸暴力，内心深信一切文明价值不外乎文人的谄媚，失败时狡诈地希望借助敌人的原则捆住敌人，自己却暗中鄙视敌人的天真和轻信，一旦直接暴力的威胁解除，他们就会原形毕露。在“畏威而不怀德”已成公理的社会中，如果不够残暴，就会收获暴君的污名，反之亦然。明末士大夫看到李自成杀人像洪武一样肆无忌惮，不像崇祯那样有气无力，就放心地相信大顺的锦绣前程，像抛弃旧衣服一样忘记了东林复社时代的豪言壮语。大清在扬州展示的果断和坚定，赢得了苏松士绅的恐惧和信赖，正如弘光政权⁴⁶的犹疑和软弱招致颠覆和毁谤，无异于蜜糖吸引苍蝇。伊里布的情书外交⁴⁷和僧格林沁的黑牢外交⁴⁸看似相反，其实相成。查理·义律废除酷刑，只能依靠皇家海军的霸权。他如果效法扬州十日，给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定将获得救民水火的颂扬，但他如此渴望解放者和改革者的定位，在诡诈的降虏面前暴露了自己过高的底线，结果在长期反对鸦片和腐败的努力之后，反倒 在东方留下了鸦片保护人的污名。降虏的精英只能通过文字的报复释放挫败的怨毒，窥测心理弱点的诡诈是他们最后的智慧，他们留下的历史纪录必须结合他们扭曲的心理结构，才能正确地翻译和理解。如果说征服者没有赶尽杀绝，仅仅出于利益的考虑，那就是说征服者为了迁就自己社会较高的原则和底线，无法以降虏习惯的掠夺方式彻底利用自己的胜利。如果说征服者仁慈公正、深得民心，那就是说征服者的残暴卑鄙超出了他们的报复能力和想象能力，配得上他们发自内心的钦佩和走投无路的依附。

6. 大英帝国转向日本

庚申和甲午之间（1840-1894），英国在远东的课业处于最佳状态，但和谐建立在误解和欺诈的基础上，注定不能持久，更不用说成功。英国人以为自己在李鸿章身上发现了“可以教育好的学生”和“有能力履行承诺的交涉对手”，以为自己能够借助李鸿章和越来越多的小李鸿章，通过海关、邮电、北洋舰队的实习，将大清调教成可以信任的文明国家、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在远东的保护人、阻止俄国南下和维持内亚稳定的大英代理人，把其间发生的种种冲突解释成差等生学习优等生过程中的必要磨合。他们既高估了李鸿章在朝廷内部的地位，又错估了李鸿章自己的意向。无论满蒙亲贵、江东士大夫还是顺民，都希望通过扭曲认知结构，否认自己的软弱。聪明的弱者将教鞭的规训解释成敌人的残暴，就能证明自己并不是错误的一方；将无法抗拒的残暴解释成民心所向的拥戴，就能证明自己并不是怯懦的一方。聪明是文明留给余烬的最后遗产，适足以毁灭死灰复燃的最后机会。蛮族在类似的情况下，无法领会和运用上述的聪明，失去了在自己的世界内永远胜利的机会，反而容易通过殖民者的课业，最终像苏格兰高地人和库尔德山民一样，变成文明比较可靠的预备队⁴⁹。

殖民者英格兰和被殖民者大清，在庚申因误会而结合，在甲午因了解而分离。庚申开始了大英帝国的课业或李鸿章的清英蜜月期，然而这样的合作建立在“一个大清、两种表述”之上。恭亲王和江东士大夫都把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当作学习先进技术的工具，绝不允许因此动摇大清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大清的恶劣表现，英国人将视为初学者的笨拙，愿意多给它一些时间，但规训期不可能无限延长，失败的劣等生最终将会遭到文明人俱乐部的驱逐，尤其是在自学成才的日本不断主动趋奉的情况下，英国人早晚会抛弃扶不起的阿斗。如果说英国人在李泰国事件⁵⁰中还能耐心等待，在琅威利事件后就开始丧失信心了。甲午战争对日本是一场表演性的战争或毕业考试，以欧洲列强和舆论为观众和裁判。日本人竭力向白人证明自己的军队像欧洲人一样文明，清兵却像太平天国时期一样肆无忌惮地残杀俘虏。）北洋舰队覆灭前，大英帝国的远东政策明显偏袒大清。琅威利⁵¹不断告诉欧洲读者，日本人不是北洋舰队的对手。英国人排斥美国人维护朝鲜独立的尝试，鼓励大清强化在朝鲜的统治地位，因为只有负责的强国才能将俄国挤出朝鲜和远东⁵²。日本和朝鲜都不像是远东壁垒的适当候选人，正如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不像

是近东壁垒的适当候选人。土耳其和大清无论负不负责任，至少看上去像是值得扶植的大国和强国，但如果自己暴露了扶不起的阿斗本色，就不能继续指望建立在幻觉之上的友谊。日本武士争取英国友谊的热忱比李鸿章高得多，一直为表面上的弱小和偏僻所累，直到他们通过甲午、庚子、日俄战争三场大考，证明了自学成才的同等学力，才算赢得了李鸿章推三阻四的奖品，缔结了第二次英日同盟。第一次英日同盟（1902）只能保证自学者参加考试的同等资格，第二次英日同盟（1905）承认了优等生奖品竞赛的王车易位，第三次英日同盟（1911）正式将远东分公司的经理职位交给了久经考验的代理人。

大清在甲午折断教鞭，在庚子亲吻皮鞭。琅威利没有得到的尊重，全部奉献在瓦德西(A. von Waldersee)脚下。联军在北京收获了无数万民伞和德政颂⁵³，证明他们终于找到了余烬所能理解的语言。拳匪之乱给晚清和北洋时代的精英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构成了此后二十多年宪法性约束的基础，保证了东亚近代史最自由、最文明的时代，直到世界秩序在其发源地遭到削弱，远东的免疫保护期相应地结束，诅咒教鞭、赞美皮鞭的游戏卷土重来。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的革命外交

本节引言：

大众民主和民族国家相互支持，缩小了欧洲外交体系的回旋余地。国家的主权从少数人手中，转移到全民手中。战争也就相应地从少数专业人员的战争，变成更加残酷的全民战争。英国是旧国际体系的主要维护者，德国是主要挑战者。大多数国家支持英国，孤立的德国试图以革命外交弥补劣势。德国的革命外交针对协约国的薄弱环节：在俄罗斯帝国支持列宁的失败主义，破坏保皇派和自由派的护国主义；在中华民国支持孙文的中立主义，破坏北京政府的参战政策。

1. 军事动员与战争形态的变化

一战前的三十年间，大众民主缓慢地侵蚀各等级共治的古老残余。绅士军队和绅士外交原本构成相互依赖的整体，在军国主义和群众政治的挤压下损失最大。混合政体的外交体现其“法的精神”，由多层次的可逆博弈组成。而单一政体的外交不再构成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为“汉贼不两立”的精神笼罩。人民主权对应的群众大军和绝对专制对应的职业军团都是“快枪手的第一颗和最后一颗子弹”，要么不做要么做绝。先发制人的赢家胜者通吃，导致战争的可逆性消失。一战前夜的军事动员体系已经充分民主化，外交协调体系却仍然浸淫维也纳会议时代的贵族精神。代议制政体自身处在蜕变之中，没有能力弥缝二者落差产生的巨大张力，构成全面战争的根本原因，犹如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前的道路容量和现在的车辆数量不相适应，因此代价公正地落在所有当事者头上。具体哪一方最严重地破坏了规则，相形之下犹属次要。

德俄两国皇帝都发现他们的军事机器处在要么坐以待毙，要么全面动员的零和状态。然而只要全面动员无法中止，任何外交斡旋都无法提供足够的可信度。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参谋总部计划人员对外交政策的绑架，根本原因则是战争的民主化。谁能先于对手动员更多的预备役士兵，就能以普法战争的方式消除对方召集后备役的机会。任何军事计划如果不以迅速全面动员为前提，就会在军官当中丧失竞争力。一战前夜，欧洲列强的备战计划全都以此为准。替代方案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决策者没有选择余地。对于全民动员的战争来说，国界没有任何意义，“越过边界才算进攻”的老规矩失灵了。任何一方只要抢先在自己境

内完成了全民动员，没有完成动员的一方无论在边界哪一侧都是死路一条。这时对军方而言，动员本身就是侵略行为。然而公众和外交界仍然没有摆脱十九世纪的习惯，以侵犯边界为判断标准。结果决策者跟军方商量以后，外交官和舆论领袖的意见就完全变成了不着边际的废话。巴黎离比利时边界如此之近，柏林离俄罗斯边界如此之近，各国国民的军训和动员机构如此完善，中欧铁路网和法国北部铁路网又是如此发达。局部动员只要几天时间，就能变成总动员。任何动员只要几小时，大军就能越过边界。

如果德国动员而法国和比利时不动员，德国军队在两星期内就到巴黎了。如果俄罗斯动员而德国不动员，俄国军队在两星期内就到柏林了。欧洲列强从未如此富裕和强大，却又从未如此脆弱和危险。他们随便派出两艘军舰，就能在海外夷人社稷，然而因为冒不起信任邻邦的风险，只能将全国的青少年投入战场。奥地利人为塞尔维亚而动员，但动员必然会造成他们随时可以越过加利西亚(Galicia)边界的形势。沙皇为了保证乌克兰的安全，除了局部动员以外别无他法。俄罗斯即使局部动员，也意味着百万大军整装待发。谁能保证加利西亚前线部队不能在刹那间掉头开进西里西亚(Silesia)? 除非德国人在边界另一方动员。德国人一旦动员，全世界都会心惊胆战。东普鲁士的后备军在普法战争时期，用八天时间就横跨了大半个欧洲。即使洛林前线看不到一个普鲁士人，法兰西也已经亡了一半了。法国人一旦开始动员，德国人就冒不起鲁尔区在三天之内沦陷的危险。解除西线危险的捷径，莫过于抢在法兰西的动员机器运转以前，通过布鲁塞尔到巴黎的最短路线，将尖刀刺入法兰西的心脏。战争开始时的交涉都是一面要求对方复员，一面自己赶紧动员。冲突的原因已经不再重要，关键在于冒不起单方面不动员的危险。如果错误地相信了对方的无恶意保证，就会迅速亡国。如果错误地不相信对方的无恶意保证，结果不外乎三种：和平，我方零成本胜利，同时动员开战和公平战斗。这三种结局都比错误信任更好。所有各方都选择无论是不是错误的的不信任，结果就是同时动员开战。

2. 贵族式外交的没落

威廉和尼基最后的交涉⁵⁴（威廉二世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通信）适合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1848年以前，欧洲贵族仍然是一家人。国王或女王本来是有血有肉的活人，适合扮演有机共同体的代表或象征。臣民对君主的爱和忠诚，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君主个人的性格和德性，跟父亲

和丈夫在家庭当中享有的爱和忠诚，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爱和忠诚是分不开的，是具体和有机的。谁都不会以为既然家庭法或婚姻法的条文是一视同仁的，性格和品行不同的男人就会收获一模一样的感情。只有公务员办事，才会根据抽象的原则和机械的规范。外交不属于公务员，属于贵族俱乐部。各国君主都是或近或远的亲戚，个人性格和现实利益都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实力和资源可以精确计算，但并不能保证其拥有者占上风。利奥波德一世善于做人，使布鲁塞尔宫廷一度凌驾于巴黎和马德里之上。他去世以后，比利时王国的外交地位就回到与其资源相匹配的层次。

民族和民主都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发明，为上流社会和势利眼所不齿。王室和贵族应该像吃薪水的公务员一样，服从他们统治的民众。民众通过神秘而混乱的抽象，构成拟人化的“国家”或“民族”。老派的体面人听到诸如此类的理论，免不了联想起巴黎街头的煽动家和无套裤汉⁵⁵。威廉虽然以任性著称，毕竟不能完全摆脱阶级的底色。他诉诸欧洲贵族共同的记忆，言外之意的信息量比信中的文字丰富到不可比拟。霍亨索伦家族再蛮横无状，也不会像希特勒和斯大林这种下等人一样，喋喋不休地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正义性，唯恐客套的外交辞令体现不了作者赤裸裸的力量和决心。

体面人的尊重不是勉强的形式，而是自然而然的含蓄。亲戚彼此了解对方的弱点和痛点，不大会制造不体面的二次伤害。绅士不应该谄媚上帝以外的任何对象，只能用间接的方式唤醒往日功业的记忆。如果今天的高材生负责替威廉执笔，同样的内涵就要翻译成下面这些浮夸和俗丽的语言：

“萨拉热窝的暴徒不仅代表他们那个丧心病狂的恐怖组织！他们不仅撕裂了我们共同历史的最大创口，还蓄意毒害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深思熟虑的观察家不可能看不出，我们所知的文明又一次面临挑战。多亏了亚历山大沙皇的慷慨恢弘，欧洲各君主国才没有因路易国王的鲜血而沉沦。自维也纳会议以来，东方三君主国一直是国际秩序的中流砥柱。历任沙皇无不珍惜中欧两强的友谊，绝不允许任何乱臣贼子威胁柏林和维也纳的正统君主。这就是失败的恐怖分子怀着刻骨仇恨，称俄罗斯为“欧洲宪兵”的原因。俄罗斯现在的大臣们蔑视几代沙皇的睿智和东正教徒的忠勇，甘愿让俄罗斯的政策为法兰西的共和政体服务。近来欧洲局势的恶化，莫不肇因于此。塞尔维亚这样的恐怖主义国家能够在欧洲心脏恣意践踏文明底线，无非是盲目指望沙皇陛下的保护。吾人有一切

正当理由对沙皇陛下的圣明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期待东方三帝在保卫文明价值的前线再次携手。万一天有不测风云，吾人亦将不顾成败利钝。”

贵族俱乐部的交涉诉诸荣誉感和相互信任，这些因素在全民战争中的分量已经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他们没有理解自己习惯的规则和自己所在的环境已经脱节，一味将双方都无能为力的局势推给对方。如果他们的军队仍然由几千名贵族统率，宣战以后需要半年时间准备必不可少的辎重，然后才能向边界开拔，这些交涉就可能生效。

那时，皇室和大臣没有专业的安全保卫人员。他们像普通市民一样在大街上散步，任何一个疯子拔出匕首就能刺杀他们⁵⁶。贵族军官自备战马为王前驱，他们的敌人就是自己的表亲。战役的胜利意义不大，因为国际会议肯定会强迫胜利者吐出大部分战利品。骑士的风度、战术的高妙更加重要，然而对战争的胜负影响不大。君主应该通过战争证明自己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但不必过分担心突袭和欺诈造成不可逆的损失。他们的总参谋部却深信零和博弈、赢家通吃的未来，胜利或毁灭取决于能不能抢先二十四小时动员全国丁男。姻亲的道义和君侯的信誓漂浮在无名群众的汪洋大海上，没能在第一个浪头中留下丝毫痕迹。古老的王室用古老的语言责备脱节的现实，仿佛堂吉诃德挥舞长矛冲向风车。

3. 德国释放“革命外交”

在二十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⁵⁷者看来，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1914年8月3日的演讲体现了一种难以理解的认知框架。大英帝国已经占有了全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随时可以将自己的欲望变成法则，居然像乡村板球运动员一样天真迂腐，一本正经地为了所谓“体育精神”而参加比赛。傻瓜才把手续看得这么重要，“聪明人”都知道手续是为目标服务的。如果德国人就是要打比利时，办不办手续真有很大的关系么？格雷爵士是不是以为，如果德国人放过中立国，根据正常的程序，直接向英国宣战，即使英国牺牲更多的人，他都会认为很值，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对德国人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说英国人用虚伪掩饰利益，只是不愿放弃自己的霸权，为什么不向德国人索取高价，瓜分比利时呢？德国人得到通向巴黎的道路，英国人得到保护海峡的壁垒。俄国人多次通过瓜分波兰，加强了柏林和维也纳的实力，因此在以后的外交或战争当中，面临更难对付的敌人，然而很少有人论证，俄国人如果

为了保卫波兰，立刻向德国人开战，付出的牺牲本来会更小。这样的战争胜利以后，必然会使整个波兰完全依附俄罗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讲，比分到半个波兰更强。

阿斯奎斯(H. H. Asquith)内阁无法接受这种有失体面的计算方式，在野的保守党比他们更加坚定。英国绅士阶级的精华身先士卒，葬身于罂粟花盛开的法兰德斯原野。⁵⁸“昨日的世界”如此尊重形式主义，甘愿为此付出如此重大的实质牺牲，无论称为虚伪、迂腐还是高尚，都显得陌生、甚至怪异。二十世纪人习惯了超限战、不宣而战和人肉盾牌，觉得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的“条约即废纸”⁵⁹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习惯了真理部、大清洗和种族灭绝，觉得侵犯个把中立小国实在是鸡毛蒜皮。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解放了思想，鄙视形式主义的虚伪。他们只会惊讶德国人为什么如此诚实或愚蠢，竟然会承认自己负有毁约责任，然后费力不讨好地论证种种事非得已的理由；为什么没有抢先论证一切责任都在受害者身上，或是通过斩草除根证明根本不存在受害者，或是至少深刻分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十九世纪形式主义的短暂高峰，实为基督教千年熏陶和封建自由数百年积累所致。底线一旦突破，礼崩乐坏的速度就要远远超出文明当初的蕴育。威廉皇帝的政府首先解构了“条约神圣”的思想枷锁，此后就不难进一步展开三方面的“革命外交”：通过社会主义极端派工作瓦解俄罗斯帝国⁶⁰，通过伊斯兰工作瓦解大英帝国⁶¹，通过孙文工作瓦解北洋政府及其参战努力⁶²。德国自己垮台，释放出颠覆团体仍然继续工作。种子在母体毁灭以前落地，完成了母体的遗愿。

摩洛哥苏丹在阿加迪尔危机⁶³中，曾经指望德国支持他反对法国。张之洞责备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软弱，幻想普鲁士会支持他反对法兰西⁶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希望开始成为现实。政治德性不足的欧洲内部无产者和殖民地外部无产者咬断了给自己喂食的手，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文明秩序解构者的人肉盾牌角色。他们像歌德诗中的魔法师学徒⁶⁵一样，嫉妒作威作福的师傅，拒绝承认缀学和毕业的区别，以沐猴而冠的方式模仿师傅运水的法术，结果为自己召来了大洪水。“短暂的二十世纪”释放了基督教欧洲文明存在以来闻所未闻的大屠杀，在隐秘的世界法庭上恢复了德性收支表的平衡。

三、协约国和日本维护远东体系的布局

本节引言：

日本是远东唯一真正进入欧洲国际体系的国家，通过甲午战争、庚子战争和英日同盟，在国际上充当大英帝国的远东代理人。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主导的列强为了维护远东体系的稳定，尽力推迟大清遗产的解体，导致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成立。日本泛亚主义者、同盟会和各省都希望大清解体，但日本主政的亲英派有能力压制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将远东托付给日本。日本主流政治家出于对条约体系的忠诚，继续维护中华民国的名义统一。

1. 英日同盟

1911年英日条约奠定了远东条约体系的基石，完成了山县有朋-桂太郎政策的胜利。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的日俄协调论⁶⁶寿终正寝，头山满和犬养毅的亚洲提携论⁶⁷退入民间。这次路径选择斩断了日本效法俄罗斯，孕育欧亚主义认同的可能前景；重创了日本效法西魏北周隋唐，以华夏文明边界守卫者资格复古维新的隐秘期望。日本通向“亚细亚孤儿”的路径从此更难回头，但尚未形成天命共识。条约已经将东亚英格兰的使命交付给日本，但日本自身仍然缺乏与其使命相匹配的认知图景。它徘徊于“追随列强”和“武断诸夏”之间⁶⁸，两者都是缺乏良好现场感觉和深厚决断信念的表现。它此刻在前一条路线上浪费了比任何利益都更宝贵的时间和机会，从而酝酿和积累了日后戏剧性路径跃迁所需的格局扭曲。十九世纪的英国如果同样缺乏辨识节点的洞见和当机立断的坚定，就很难阻止启蒙主义士大夫主持的法语吏治国家统一欧洲大陆了。

1911年《英日同盟协约》授予日本人的行动自由，比1904年《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⁶⁹授予法国人的行动自由大得多。地缘形势和机会窗口授予日本人的行动自由，同样比一战前的法国人大得多。明治末年目光短浅的不作为政策对远东秩序的瓦解负有重大责任，仅次于昭和初年逆时而动的补偿性冒险政策；正如法兰西一战前的透支性复仇主义对欧洲秩序的瓦解负有重大责任，仅次于一战后逆时而动的补偿性绥靖政策。

《英法协约》只是英法两国之间的谅解，并不包括法俄同盟式的军事义

务。英法两国在原先立场相左的问题上达成谅解，使双方都有可能腾出精力，应付其他各方面的事务，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英法谅解，英法根本不可能有反对德国的余力，然而即使存在英法联盟，仍然不能保证英法会联合起来反对德国。英国同样向德国人和俄国人提出建立类似的谅解协约，俄国人接受了，近东、内亚和远东的紧张局势随之结束²⁰，否则日本和俄罗斯是不可能站在同一方的。德国人不仅拒绝英德谅解，而且以威胁手段强迫英法解除协约，结果帮助法国人做到了后者本来想做，但是没有多少可能做到的事情。协约针对具体问题，例如埃及、摩洛哥、黑海海峡、南满铁路。德国人拒绝协约，意味着它没有具体和有限的目标，斗争必须以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结局，换句话说就是要推翻大英帝国的和平。

英国人的理想是光荣孤立，不肯直接介入欧洲大陆的纠纷。它宁愿看到德奥同盟和法俄同盟势均力敌，英国处在离岸平衡的最佳位置。参战取胜只是英国人的次优选择，实力均衡才是它的最优选择。法国人巧妙地利用德国人的愚蠢，成功地报复了滑铁卢和色当的一箭之仇。史学界通常称法俄同盟为“致命同盟”²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始作俑者的责任，因为同盟义务是刚性和确定的，协约谅解是柔性和不确定的。然而，法国的胜利比法国的失败更悲惨。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仍然是强国。一战胜利后，法国人口已经遭到长平式²²的毁灭。名义战败国德国面对老龄化、青壮凋零的法国和支离破碎的东欧，地缘形势比法俄联盟包围的战前更加有利。

英日联盟不是协约，而是联盟。大英帝国保护日本的条约义务，比保护法兰西共和国的协约义务要强得多，然而日本人利用英国条约义务的能力，明显不如法国人利用英国协约义务的能力。英法协约主要是发挥了保护法国的作用，德奥同盟对法俄同盟的相对优势正在扩大。英日同盟主要是由日本人出力，维护英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世界霸主抽象的保护对新兴国家非常重要，但并不需要英国人付出多少实际上的成本。弱者在不平衡的同盟当中能够获得的最大利益，其实不在同盟条约规定的具体项目中。如果比尔·盖茨喜欢一家餐馆，愿意出十倍价格天天在那儿吃饭，老板的最大利益显然不在这位客户付给的十倍价钱，而在闻风慕名而来的无限多新客户。如果老板居然满足于比尔·盖茨按照合同付出的十倍价钱，把精力集中在只有极少数老客户才能品鉴的烹饪技术上，不用极少的烹饪成本和比尔·盖茨的名气吸引大批不懂品鉴的新客户，那他的做法就非常接近于日本的外交风格了。

2. 日本的外交性格

日本人履行条约义务，极端拘谨、诚实、守信，倾向于牺牲条约文字不会写明的政治目标，维护每一个白纸黑字的细节。他们习惯于用同样或类似的标准对待其他各方，因此在坚持文本细枝末节的成本相当高，却并无明显利益的时候，不知道变通和豁免，二十一条交涉就属于这种情况，在条约政治影响的潜在利益明显大于文本界定利益的时候，不知道因利乘便、借力借势，英日同盟就属于这种情况。机会主义的邻居看待日本，大概会觉得他们就是俗语“活人不会让尿憋死”的反面教材，很难克制玩弄和利用的冲动。颠沛流离的流氓无产者看待珍惜信用的匠人，就是这样的感觉，造成的后果也差不多。高度成熟的政治民族善于运用条约背后流动的格局和趋势，仅以条约文本明示的义务和利益为帆索。成绩优秀而经验薄弱的新手不能及时摆脱优等生时代不负决断责任的积习，对明文规定的义务和利益斤斤计较，对载舟覆舟的暗流迟钝盲目，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无产者没有审慎的智慧，却有破坏的本能，没有确定的利益，却有敏锐的感觉，犹如尘沙和碎屑的布朗运动，追随风向变化的速度高于任何有形态组织。霞关（外务省）的领导模式始终属于第二类，以吃力不讨好的奋斗和付出，谋求长期稳定的优等生地位，一旦付出和回报之间的直接反馈遭到破坏，就会立刻丧失照本宣科、按部就班的领导能力，像笑话中的医生，觉得病人不按久经考验的教科书生病，严重侵犯了优等生应得的权利。

袁世凯和唐绍仪领导的大清外务部明白日本人有机会做什么，清楚的程度虽然不及黑龙会及其保护的同盟会⁷³，但已经远在桂（太郎）圆（西园寺）内阁之上。袁世凯根据他在朝鲜的经验，觉得庚子后的大清已经像李鸿章时代的朝鲜一样岌岌可危，只有美国人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才能延缓清算。他的锦囊妙计构成了北京职业外交官团体的秘传心法：不惜一切代价将美国人拖进远东体系，制造远东属于拉丁美洲一部分的幻觉，利用弄假成真的疑阵打击优等生谨小慎微的心理弱点。袁世凯老谋深算，不可能不清楚“专使外交”的纯粹礼仪性质和“清德美联盟”的纯粹泡沫性质⁷⁴；但正因为他老谋深算，才清楚空城计对自己的重要性不逊于裱糊匠对李鸿章的重要性。唐绍仪和顾维钧的成功无法在短期内回馈袁世凯的庙算，却在长期后拯救了袁世凯的敌人⁷⁵，天命的可畏和人谋的渺小，没有比这更彰明昭著的证据。

日本在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放弃了促成亚洲大陆势力均衡体系的最佳

机会，也就葬送了自己在一战以后推行离岸平衡的前景，而且正是因为它不能胜任东亚英格兰的使命，才使英国人丧失了继续维持英日联盟的动机。如果头山满、肃亲王、孙文和联省的沙文主义者在适当的机会窗口破坏了袁世凯的拖延政策，日本就会一战以后面临如下的格局：英日同盟的本质是日本负责执行英国的游戏规则，维护远东秩序。相对于条约的政治目标，条约的技术细节只是次要问题。日本人只要实现了英国人的目标，英国人不难事后追认既成事实。德国人和俄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多次制造这样的既成事实，只要没有直接违背条约文本，英国人大都没有反对。日本人在战前的外交风格偏于拘谨，在英国人奉行“条约没有明确禁止就不反对”的黄金时代，采取了“条约没有明确准许就不行动”的政策，没有充分开发英日同盟保护伞造成的机会²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机会就消失了。日本人如果在辛亥前后分割满蒙，造成的后果不会比德国在青岛和英国在新界的类似行动更严重，甚至在凡尔赛会议以后，英国人最初仍然愿意追认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主要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才放弃，其中透露的信息耐人寻味。

3. 东亚大陆的小邦竞逐时代

辛亥前后，东亚大陆的大多数政治势力同样不愿意维护大清的遗产。孙文和大多数革命党人长期坚持要把满蒙赶出长城，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日亲满疏”。武昌和昆明的中间派同样厌恶“朔方虏骑”，要求建立十八省的联盟。张作霖和肃王主张皇室退回关外，要求日本人提供保护，然而日本人在最有利的时机不肯同意，采取了消极等待列强达成一致的政策。只有袁世凯和庆亲王愿意调和南北，向北京的公使团索取援助。公使团愿意维持东亚现状的主要原因，跟联合国和北约愿意维持阿富汗现状的理由相去无几。这样脆弱和遥远的支持不足以抵抗某一个强邻坚定的破坏，辛亥以后几十年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东亚大陆在旧国会垮台以后，无法维持中华民国的门面，分裂为滇黔蜀联盟、滇桂联盟、粤桂联盟、粤闽联盟、（孙传芳）五省联盟、（吴佩孚）十四省联盟、两湖联盟、湘粤联盟、直鲁联盟、满洲等小邦和邦联。几个联省共和国和一系列小邦竞相追求日本的友谊，模仿日本的范例发明自己的民族国家。毛泽东受谭延闿和章士钊委托，为湖湘民族主义做舆论准备，就是在这个时代。

张作霖和谭延闿的目标如果实现，东亚大陆势必出现大批朝鲜式的小邦。苏联必然渗透颠覆这些根基不稳的小邦，激起其他各邦的恐惧，会

促使冷战格局首先在远东成型。而残余的中国必然像李鸿章时代的大清，不肯停止对旧日属地的干涉。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夜援助朝鲜，反抗袁世凯（李鸿章北洋系驻朝鲜代表）的跋扈和俄罗斯威胁，获得美国人同情的历史很容易重演。美国的同情心转向遭到苏联和联省威胁的小邦，势必回到福久(George Clayton Foulk)和金玉均时代的组合，倾向于联合日本保护弱者的生存权。在这一系列可能的前景下，英国越想从远东脱身，就越需要强化日本的挡箭牌地位。

日本不可能胜任小庇特和威灵顿的任务²⁷，因为它新造的共同体不可能具备长期共生演化赋予罗马人和英国人的结构性契合。国际秩序是各行为主体宪法秩序的外溢，又反过来影响各行为主体的宪制。先来者以自己的宪制塑造国际秩序，后来者依靠国际秩序塑造自己的宪制。二者从来就不平等，而且不可能平等。罗马和古典世界的国际体系一起产生和成长，最终继承了体系。英格兰和封建世界的国际体系产生和成长，将其改造为近代国际体系。内部宪制和世界体系产生于同一个生态场，共同基因和共同演化自然形成的契合不是外来者能够学到的。老练的外交传统是契合的自然流溢，跟外交家的聪明才智关系不大。戴季陶后来一厢情愿地宣称：桂太郎其实是隐秘的泛亚主义者和孙文的知己，并不乐见英日同盟产生阻碍中日提携的障碍²⁸。桂太郎素以柔韧著称，不肯轻易出言忤逆客人。弱者容易混淆希望和现实，将客套视为承诺，故而单方面的记录不足凭信。关键在于泛亚主义的理想并不取决于圆滑社交家桂氏，甚至孙文挚友内田良平个人的态度。新一代泛亚主义者久房信之助²⁹、小矶国昭³⁰和后藤隆之助³¹正在成长，决心实现孙文和宫崎滔天未竟的梦想。

4. 国民共同体的塑造

从长期历史的角度看，国族共同体想象乃是边缘文明加入欧洲国际体系的必由之路。泛亚主义在远东兴起，有其演化合理性。东欧的泛斯拉夫主义、近东的泛突厥主义和拿破仑三世的跨大西洋泛拉丁主义在各自的生态位上，扮演了泛亚主义在远东的类似历史角色。只有在奥斯曼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失败以后，小土耳其国族构建才能成功。梁启超发明的中华民族理念占据了奥斯曼主义的生态位，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和最轻的扰动实现东亚的欧洲化。远东各地的绅商改良派、立宪派偏袒奥斯曼主义，因为这种演化路径对他们的既得利益影响最小。列强外交官、日本外务省和大清外务部偏袒奥斯曼主义，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收拾条约体系

瓦解造成的残局。泛亚主义者和众小民族发明家暂时只能停留在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在野党的生态位，直到欧洲体系的内溃和列宁主义的挑战给他们创造了绝地反攻的机会。

国民共同体或民族民主国家一方面沿着时间轴成长，取代了国内一国际没有明确边界的封建主义体系或各等级一多实体共治体系，这是世界秩序的动力源；另一方面沿着空间轴扩展，深化了欧洲对世界的征服，这是世界秩序的实现。国民共同体从莱茵河以西的狭义西方开始，第一波到达包括东欧和拉美在内的广义西方，第二波到达俄罗斯和近东，第三波到达印度次大陆，第四波到达远东，第五波到达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边缘地区产生国民共同体的塑造运动，标志着西方化冲动的产生和长期革命的开端。国民共同体塑造的成功就是西方俱乐部的成员资格证书，标志着西方化或近代化的完成或长期革命的结束。尽管各边缘地区相互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它们和狭义西方的差异，但它们事实上能够选择的共同体建构都非常相似，强烈暗示这些路径在数量上本来就是有限的，大体上没有超出泛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三种基本模式。

泛民族主义希望以共同文化或语系为基础，打破现有的各邦国边界，建立更大的共同体，例如拉丁民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泛图兰主义、泛蒙古主义、泛亚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国民党在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对南洋和全世界汉语系社区推行的泛华夏主义。大民族主义希望以现有的多元一体帝国为基础，将不同文化或语系的帝国各邦臣民整合为国民，同时放弃帝国边界外的共同文化或语系居民，例如哈布斯堡爱国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奥斯曼主义和梁启超为他希望的大清继承者——中华帝国设计的中华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希望以方言或地方民俗文化为基础，建立接近欧洲规模的国族，解散转型成本过高的帝国，升级转型成本不高的部落或小邦，例如哈布斯堡的捷克民族主义、俄罗斯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奥斯曼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大清帝国的满蒙藏民族主义和粤吴湘桂地方主义、日本帝国的韩国台湾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比泛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更接近亚稳态，也就是说前者不容易演化成后两者，而后两者很容易演化成前者。多元一君的大清帝国转型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暂时实现了奥斯曼主义的模型，但泛亚主义、泛蒙古主义、泛图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各种小民族主义的挑战并不因此终结。

5. 远东病室与拉美摇篮

大英帝国审慎而冷静地评估了十九世纪落日余晖下的世界格局，断定法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的觊觎目标都是具体和有限的，可以在现存体系内达成谅解。只有德国的野心不在具体利益，而在改变国际体系本身。英国人在1904年解决了上尼罗河和摩洛哥的悬案⁸²，1907年解决了内亚-印度的大竞技⁸³，1911年交割了远东的代理权。战争尚未爆发，德国已成釜底游鱼。民国尚未成立，条约体系已经为它制定了太上宪法。条约体系尊重所有各方的历史权利，实际上就是说任何一方都不会完全满意。大清既然是多元体系，民国就必须以维持现状为起点。国际社会本着相互尊重和自我克制的原则，耐心等待大清遗留体系的自然演变产生符合欧洲国际体系需要的政治共同体。各省依靠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税收，不断发动兼并邻省和抵抗邻省兼并的战争，只有它们才具备履行协议、偿还贷款的责任能力。袁世凯、段祺瑞和吴佩孚企图逆转解体的趋势，结果适得其反。

他们的失败并不比伊图尔维德和玻利瓦尔的同类失败更不正常，毋宁说反映了共同体构建难度阈值的固有规律。拉丁美洲最初的精英同样以西班牙帝国主义者和泛拉丁主义者为主，企图继承波旁副王行政区域，甚至扩大到界外拉丁亲邦，然而过高的成本和自然纽带的缺乏瓦解了墨西哥帝国和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产生了土豪和民兵维持的一系列小邦。两者的差异不仅在领土大小，而在宪法秩序的根本不同。墨西哥和新格林纳达副王辖区的继承者不得不负担凡尔赛式的宫廷政治和塞维利亚式的官僚制度，为此必须像它们的法兰西和西班牙原型一样牺牲财产与自由的原则。解体发挥了自然甄别和降低阈值的作用，土豪共和国除了独立战争退伍军人抚恤金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开支。门罗主义设置了免疫隔离线，斩断了欧洲列强利用泛拉丁主义引进高烈度战争的企图，保护了这些幼弱的共同体度过最敏感的发育期，通过自然演化产生符合民情民德的宪制。

西班牙波旁王朝以总督制或副王制管辖美洲核心地区，副王领地在宪法制度上是一个完整的吏治国家。副王服从西班牙国王，但并不接受其他副王或领地的节制。副王领地的绅士习惯于将领地视为一个准邦国，将其他领地视为外邦。斯图亚特君主治下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大清皇帝治下的朝鲜人和蒙古人也是这样相互看待的。拿破仑推翻西班牙的正统王室，用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原则打击西班牙的天主教会，强迫西班牙人接受波拿巴家族的约瑟夫做他们的君主，导致了半岛战争和英国人的干涉。皇家海军切断了欧洲和西班牙美洲的交通线，西班牙美洲的绅士

拒绝接受法国人支持的政府，导致了美洲各领地的独立。最初的独立政权直接继承了各领地的版图和制度，由教会、军队和绅士组成联合政府。墨西哥帝国继承了墨西哥领地，包括今天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各国。大哥伦比亚继承了新格拉纳达领地，包括今天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墨西哥各阶级推举伊图尔维德为墨西哥皇帝，新格拉纳达各议会推举玻利瓦尔为护国公，都含有尽可能保存旧秩序，避免共和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意义。然而失去了西班牙的秩序输出以后，遗留的官僚机构超出了新帝国的负担能力。

这些国家最初像袁世凯一样，依靠欧洲贷款维持中央政府的门面和文武百官的开支，很快就在一系列军事政变当中瓦解。玻利瓦尔幸而主动引退，得以保全令誉，在计划前往欧洲的途中，得到了继承人苏克雷遇刺的消息。伊图尔维德不肯体面引退，死于军事政变。他们的国家落入地方军阀手中。军阀依靠土豪和英国人维持廉价统治，地方治安由庄园主和教会免费维持，国家开支由英国商人的关税维持，国家安全由皇家海军负责。英国人的仲裁保障了各军阀相互承认，维护了和平和自由贸易的利益。美国人的门罗主义保障了欧洲列强不能利用军阀战争为自己谋取利益，严厉制裁了拿破仑三世和马卡西米利安对美洲保护区的挑战⁸⁴。否则胡亚雷斯⁸⁵或卡列斯⁸⁶在法国人或英国人面前的地位，比张作霖或陈炯明在日本人或俄国人面前的地位脆弱得多。哥斯达黎加或乌拉圭这样的分离主义政权需要几代人的安全环境，才能培养出新的民族认同和建国神话。割据政权建立初期，居民的认同比爱沙尼亚和波兰更加薄弱。

远东条约体系最初在理论上也存在同样的未成年人保护责任。在张作霖宣布满洲独立，毛泽东热爱湖南独立的时代，一度颇有可能产生谭延闿和陈炯明的土豪共和国，经过几代人的自发演化形成一系列类似韩国、新加坡、槟榔屿和缅甸的小邦。然而，远东的免疫隔离线只维持了二十年。土豪共同体尚未成熟到足以自卫的阶段，就遭到外来颠覆势力的扭曲和铲除。列强共同保护体系的政治道德和责任能力一开始就不及合众国在美洲行使的单边仲裁权，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尤其不可同日而语。美洲摇篮预示了未来威尔逊体系的东升旭日，远东病室只能仰仗十九世纪势力均衡体系的残余燭火。美国单边主义的政治逻辑蕴涵了罗马及其天命，欧洲国际体系的历史命运从属于混合宪制的“新陈代谢”⁸⁷。

四、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策源地

本节引言：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本来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当中的极少数，但德国情报机构的支援使他们获得了发动政变必须的资源。俄罗斯的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推翻了沙皇，企图建立议会民主制，但议会多数派的选民既缺乏组织的联系，又缺乏斗争的决心。十月政变证明组织力量比人数多少更加重要，组织严密、行动坚定的少数人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盘散沙、心慈手软的多数人。列宁主义革新的组织模式迅速向全世界扩展，在组织力量比较坚强的欧洲受挫后，自然转向组织力量更加薄弱的远东。

1. 德国和列宁的交易

德国情报部门早在战前就掌握了俄国流亡者各派的政治倾向，知道布尔什维克比德国更希望沙皇失败。他们的线人帕尔乌斯不仅给列宁提供了金钱资助，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向列宁主义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思想催化剂的作用⁸⁸。例如是他首先告诉列宁：尽管目前无产阶级渴望利用国家机器对抗资产阶级，但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旦夺取国家机器，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工人和国家对抗的局面，结果现实的无产阶级政权注定要建立在永久专政的基础上。十九世纪的积习最初还不允许德国人利用他们的信息优势颠覆兄弟王朝，但战争的痛苦使Fair Play变得更像奢侈品。1915年以后，战争陷入僵局。德国人的情报活动渐渐从传统的搜集军事资料转向颠覆皇室和瓦解军心的政治活动，很难说他们和布尔什维克到底是谁在利用谁⁸⁹。列宁激烈好斗的失败主义态度在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内并不得人心，但他的同侪最初没有怀疑他和德国人有关系。甚至在二月革命爆发以后，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还说：“他的纲领当时遭遇的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嘲笑。大家觉得（他的）纲领竟然会如此荒诞不经和凭空臆造。”⁹⁰克伦斯基⁹¹声称这种脱离现实的老流亡者毫无威胁，很高兴向他的朋友表演宽容：“要知道他生活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他什么都不了解，他通过自己狂热的眼睛观察一切，在他身边没有一个能多少帮他认清既成形势的人。”⁹²德国外交部档案在二战末落入英军之手，列宁和德国参谋总部的交易内容⁹³才渐渐泄露。

俄罗斯自由派和社会党主流派没有认真对待布尔什维克和德国人的交

易，因为他们习惯通过法国大革命的认知框架理解自己的地位。他们盲目地相信革命护国主义具备最大的动员效果，只有社会边缘人才敢肆无忌惮地鼓吹失败主义。他们相信革命的危险只会来自拿破仑，只有担任总司令的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才有资格蒙受嫌疑。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团体以嗜好争辩和不负责任著称。论行动能力，切尔诺夫的社会革命党领先⁹⁴。论社会影响，利沃夫的地方自治派领先⁹⁵。列宁的两大纲领——单方面停火和工兵苏维埃执政——看上去纯属“拆烂污”（苟且拆台），符合毫无希望的空谈家需要。今人视为列宁主义核心的特征，即超级国家和统制经济，在当时根本不在任何社会主义者的能力范围内。在鲁登道夫的时代，谁都不会相信任何类似巴黎公社的组织能够维持二十四小时以上。德国军方和大企业家携手，建立了严密高效的战争计划经济。俄国自由派和实业界合作，建立了比沙皇政府规模还要大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社会党人照例嘲笑反动资产阶级和反动政权的亲和力，自己却照例提不出替代性方案。列宁毫无原则地剽窃了阶级敌人的技术和组织创新，用无产阶级的恐怖主义取代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畸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是说空话的懒人，大多数列宁主义者是不知疲倦的恶棍。克伦斯基把列宁当成了前一种人，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才是这种人。

2. 列宁主义以俄罗斯为宿主

全世界都没有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只有英国人能够依靠全球金融和海运体系，部分抵制战时社会主义的威胁。只有美国仍然生活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当中，能够自然而然地维护立宪政体。总动员、劳动力分配、粮食管制、护照制度、军事工业物资统筹付诸实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走了一半。整个国家变成军事后勤部门。协约国只是在程度上落后于德国、而非性质上不同于德国。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军火工人工会和拥军协会比政府强大得多，已经处在随时可以对政府发号施令的位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要掌握在十月党人（右翼或体制内自由主义者）和体制内企业家手中。工会主要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拥军协会主要掌握在地方自治派手中。他们如果停止供应物资，政府和军队立刻就会垮台。沙皇倒台后成立的第一届临时政府就是这三派和左翼（体制外）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的联合，地方自治派的李科夫任总理。沙皇没有意识到，他在1916年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战争一旦结束，复员军人就会等于大多数劳动力。军人抚恤制度自动转

化为全民福利和就业保险，公民战士权利自动转化为普选制。混合宪制土崩瓦解，鼎之轻重可问。王冠落地，有产阶级元气大伤。希腊城邦的全民民主和全民战争在近代技术的支持下，以民族国家的放大版本卷土重来。英国式混合政体一度隔绝的群众政治、僭主政治和凯撒主义以世界规模上演，将希腊和春秋转化为罗马和战国。多党体系虽然形式上仍然存在，但政策主导权已经转入社会民主党手中。

战前的保守派、民主派和社会党人都在政策倾向和意识形态上追随自由派，尽管后者在议会内经常是少数党。战后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在政策倾向和意识形态上追随社会民主党，尽管后者在议会内经常是少数派。如果说社会民主主义仍然不同于列宁主义，原因在于混合政体遗留的司法独立和群众政治加强的多党制。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竞争取代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斗争，战后的自由主义日益沦为民主主义的附庸和助手。民主主义时代的文明创造力不及自由主义时代，但仍然强于纯粹寄生性和消耗性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制度和技术都以德国战时体制为蓝本，只有先锋队政党对全社会和全世界的战争权力（包括抢劫权力）是它的独创和力量。文明没落最后阶段的流寇主义，借助文明盛期累积的资源，以列宁主义的外貌出现，犹如病毒依靠宿主的蛋白质和生产机制。

列宁主义是基督教西方文明第一种只能依靠宿主生存的DNA，与以前的各种只是创造机制、方式和成效有异的模式都不同。猛兽吃掉猎物，会产生同样或更加复杂的有机体。病毒吃掉宿主，就只能在毁灭和传染之间做出选择。俄国社会党人一开始就明白列宁主义的自杀性，却没有看出自杀性正是它的力量所在。他们不自觉地浸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为布尔什维克必然会挤干俄罗斯的橘子而自我毁灭，无怪乎遭到列宁的蔑视和嘲笑。牛羊的资源主要用于消化和生产，猛兽的资源主要用于消化、捕食和生产，病毒的资源主要用于分解和传染。列宁主义本来就视俄罗斯为外国和宿主，世界革命的导火索本来就应该为火焰的蔓延而烧光自己。列宁主义如果不是世界革命，就什么都不是。它的使命就是汲取和毁灭所有不能抵抗侵袭的物种，这正是大自然交给病毒的使命。

3. 布尔什维克大洪水

俄罗斯社会的崩溃给所有组织提供了廉价争取群众的巨大机会，原本只

有数千名小报读者的政治俱乐部可以在几星期内突然拥有数百万党员。如果仅仅计算选票，切尔诺夫派社会革命党似乎已经拥有俄罗斯半数以上的人口。然而，廉价的数据只能反映廉价的支持。如果从组织力量（干部队伍、资金流和行动网络）看，切尔诺夫派的真正实力仅仅是稍微超过“崩得”（犹太社会民主党）派。他们的政纲能够讨好占俄罗斯人口八成的农民，造成了威震天下的幻觉，但这些分散的选民缺乏足够的技术手段，将支持的意向转变为实际的资助。他们的领袖是自称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没有长期经营宗教组织、军事组织和地下组织的经验和能力，仅仅因为自己能够在安全的辩论中战胜和羞辱实干家，就以为自己在不择手段的暴力和颠覆活动中同样能够胜出。

立宪民主党的真正实力跟社会革命党相伯仲，但缺乏民粹主义的纲领，因此表面上似乎突然变得弱小了。保守派的真实力量比他们更强，但由于民主的形式不能浮现在水面上。大多数选民是分散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信服的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普选会产生他们喜欢的政党多数派，但他们最缺乏组织能力，他们支持的代表能动嘴不能动手。顿河哥萨克、士官生和人民联盟（大俄罗斯主义者⁹⁶）有组织能战斗，但不可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他们后来构成白军或志愿军的骨干，但他们跟布尔什维克一样讨厌民主选举。自由派、民主派、温和社会主义派的代表在选举中占尽上风，但在内战中斗不过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或保守派组织。民族分裂派的力量虽小而集中，在其局部地区已经超过了任何其他力量。布尔什维克的真实力量只比他们稍稍软弱一点，由于同样的理由无法体现在立宪议会选举中，一旦得到德国人的支持，就比他们强大得多。民主派各党、自由派各党和保守派实力如果能够认清真实的力量对比，迅速实现有效的整合，他们跟德国-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力量对比，就会大致相当于俄罗斯帝国和中欧同盟国的力量对比——俄罗斯一方处于弱势地位，但不是一败涂地的绝对弱势。

然而，俄罗斯共和国的宪制与社会是脱节的：俄罗斯共和国的立宪会议采取单一民主普选制，只能反映人数，不能反映组织力量。议会多数派没有组织力量和战斗力，强组织在议会中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少数派自然不要民主要斗争。多数派被单纯的数人头游戏误导，意识不到自己和自己的选民多么不堪一击。从宪法学的角度看，俄罗斯帝国不应采取极端民主制。如果议会根据各等级和社会团体选举，强组织就能在议会当中获得足够的代表，以致于不值得走暴力斗争路线。一盘散沙的多数人不会掌握几乎所有议席，但仍然足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得简单多数。此种情况下，俄罗斯主流政党不能根据正式程序认知真实力

量，忽视了体制外的所有因素，把全部精力用于相互斗争，全都陷入了孤立和脆弱的绝对劣势。

只有列宁、米留科夫⁹⁷、科尔尼洛夫⁹⁸和邓尼金⁹⁹在七月以后就认清了形势，民主而统一的俄罗斯纯属梦呓。听之任之，就无法阻止俄罗斯的自然解体；“拧紧螺丝钉”，就不可能不采取不民主的手段。列宁和邓尼金都相信，问题只在于哪一方先下手为强。克伦斯基、唐恩和切尔诺夫却摆脱不了文人积习，以为口头说理胜利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把宝贵的机会窗口用在各种代表会议上，徒然拥有当时最高的民意支持率，反而表现得不堪一击¹⁰⁰。里加陷落¹⁰¹和大顿河军独立¹⁰²，预示了大俄罗斯帝国遗留版图的崩溃。科尔尼洛夫兵变和十月政变，预示了志愿军和红旗军的血战。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的空谈误国和畏首畏尾，预示了立宪会议的下场。布尔什维克水兵驱散立宪议会，标志着民主俄罗斯的法统胎死腹中。失败者请求协约国援助，因为列宁主义不仅仅是他们的敌人，而且是毁灭文明基础的洪水，然而徒劳无益。

布尔什维克确实顺应了历史潮流，因为洪水就是未来的潮流。协约国和德国为战争胜利而牺牲自由社会基本原则的种种措施、协约国的绥靖主义和德国的机会主义都是这洪水的一部分，捷尔任斯基和托洛茨基的红色恐怖只是洪水首先淹没的下游沼地而已。俄罗斯只比德国先灭顶片刻，法国人的鼻孔也仅仅刚露出水面。大洪水发挥了有效的甄别作用。国家的格式化越彻底，社会的瓦解就越惨烈。反之，土豪的小共同体越强大，产生新秩序的功能就越有效。德国的计划专家粉碎了太多的自组织资源，以致于南方的天主教小邦都未能发挥防波堤和水密舱的作用。保守落后的波兰地主和波罗的海贵族正因为甚少经历进步的解构，才保留了封建自由一脉相承的自组织力量，不仅在俄罗斯轧路机面前保卫了自己的独立，而且在布尔什维克洪水面前保卫了欧洲文明。

4. 列宁主义进入远东宿主

华沙战役前，共产国际的工作语言是德语。列宁的班底中，外国人比俄国人更多。他们都没有打算在挤干的橘子和烧尽的导火索俄罗斯度过余生，社会主义计划的最完美原型德国才是世界革命的预定和天然中心。如果列宁得到中欧的资源，世界的命运将是难以想象的。波兰在1920年代阻止了布尔什维克赤化全欧的计划，在1980年代打破了铁板一块的苏联集团，在这两个关键时刻，都以天主教为民族凝聚力量，扭转了历史

路径。（而德国法国俄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社会科学，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培养基。）布尔什维克在1923年以前损失的机会窗口，以后再也无法弥补了，甚至在二战的窗口期都无法弥补，因为预定的宿主已经有足够时间产生抗体。充满了休·盖茨凯尔（Hugh Todd Naylor Gaitskell）和志愿军老兵的新一代社会党人，不再像克伦斯基时代的前辈那样盲目和缺乏免疫力。布尔什维克二十年代在中欧和北欧的盲目和自信像一面镜子，反衬出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的空疏和软弱，因为共产国际渗透和劫持瑞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就是布尔什维克对待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所用策略的经验总结。

达尔文系统不会浪费资源，猎物和捕食者的组织复杂度和适应能力大体在同一数量级上。边缘地区的历史发展比较慢，社会生态环境的压力比较低。因此中心地区的失败者，在边缘地区往往就是征服者。欧洲的猎狗，对澳洲的动物来说比老虎还可怕。这就是“礼失求诸野”的真实涵义：达尔文系统的秩序生产和输出从来不是均衡的，时间箭头和空间箭头都是不可逆的。列宁“突破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理论、德国总参资助“人民委员会”的硬通货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同样反映了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的捕食者输出。共产国际对欧洲的逆向输出遭到失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失败者转向远东和外围殖民地，同样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远东的斗争不是发生在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而是西方文明失败者、变异品种和颠覆者逃离主战场的长征。从秩序中心看，避强就弱只是逃亡者从失败到灭亡的中间环节。庞培党人在罗马和希腊失败后，只能掀起埃及和西班牙的内战。埃及降虏“龙战于野”的幻想，其实只是《叛舰喋血记》（*Mutiny on the Bounty*）的一段插曲。皇家海军的逃兵和逃犯征服东方土著的大君和英雄，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其实只是在世界秩序追上他们以前，在即将消失的化外之地享受一段借来的时光而已。

东向转进最初甚至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刻意策划，而是达尔文系统对布尔什维克四处播种的无声裁决。西伯利亚局、远东共和国、浩罕苏维埃政权、塔什干图尔克斯坦共和国、外高加索共和国、瑞典和芬兰赤卫队、巴伐利亚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本身都是兄弟单位，成败利钝全看各人的造化。结果欧洲各分队全军覆没，中亚各分队没能越过俄罗斯帝国的旧疆。只有远东分队不仅越过了俄罗斯帝国的理论边界，而且在其实地边界之外招兵买马，激起的抵抗明显低于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只有非洲孤儿（或者说反殖民主义的唯一胜利者）阿比尼西亚才能相比。列宁作为敏锐的机会主义者，已经依靠廉价出卖大多数社会主义

者、甚至同党最珍视的原则，战胜、吞并和抹黑了这些教条主义者，不出所料地迅速得出结论：“中国处在鼎沸状态，我们要让它继续沸腾。”¹⁰³从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角度看，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中华民国一直在竭力驱逐自己的教师和牧羊犬。他们维护这个三心二意的外人，远不如维护嫡系殖民地积极。如果黑社会和狼群比教师和牧羊犬更善于锁定对象，工作更加积极和主动，一点都不会令人惊讶：法外人为自己的生命奋斗，警察只是为自己的薪水工作，这完全符合世界的法则。

#第一章 完#

1 《老子》：“下士闻道大笑，不笑不足以为道。”

2 这里所谓的蛮族是文字和文明产生以前，通过尝试一错误一甄别积累形成部落行为模式和规则库。

3 参见奥威尔的文章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4 希腊神话，赫拉克勒斯十二伟业。Augeas是Elis的国王，他的牛圈the Augeanstable三十年不曾打扫。赫拉克勒斯说如果他答应将牲口的十分之一作为回报给他，他将在一天之内打扫完牛圈。奥吉亚斯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就答应他了。赫拉克勒斯拆掉牛圈两边的围墙，引来阿尔甫斯河和泊涅俄斯河的河水，将牛圈积累的污垢一扫而空。

5 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曾为共产国际外围组织太平洋学会成员，对“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正面评价贯穿于他的著作。

6 指伪装成普通人，但实际上承担着中共组织安排的任务的人。刘仲敬认为中国历史学者杨奎松、沈志华等的著作看似中立客观，实则利用对史料的巧妙剪裁和引导性的诠释将史事往有利于官方的方向解释。

7 中共官方喜欢声称自己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实际上他们在当时高度依赖苏联，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详见本书正文。

8 “内敛、谨慎、大度、敏锐且足智多谋的罗荣桓成为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兼政委，在1943年6-7月，罗荣桓果断地抓住时机，巧妙地

利用了国军驻鲁的于学忠部与驻皖的李仙洲部对调之机，采取了欢送前者、阻击后者的策略，兵不血刃地接管了前者的防地，打通了从滨海区(日照至汪柘一线)至津浦线的商路。与此同时，山东分局财经委在薛暮桥的鼓励下，展开第二次“排(斥)法(币)”运动，把滨海区盛产的海盐运到内地销售，以吸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屏护自己的“北海币(或称北票)”，还把行政手段与经验杠杆结合起来，建立“北票区”，再以北海币及北海银行的信贷控制了辖区内棉花、花生油和盐生产与销售过程。

这三样产品不仅是中国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也是日本占领军所亟须的，还是日本工业生产中的关键性原料。此时日本政府正倾全国之力于太平洋战场，无暇顾及山东，日本占领军当局派日本商社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商部门接洽，商讨这些产品的交易问题。由于日本是处于被动的一方，掌握主动权的中共不仅能够获得包括武器在内的禁运品，而且还可以调节北海币与法币、伪币之间的汇率，克服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剪刀差”，把对外贸易(指与根据地以外地区的贸易)变成自己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同时解决根据地的就业问题，让根据地内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高于国民政府控制区。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故而出现经济繁荣、愈战愈强的局面，其储备了充足的物资，准备在日本投降后进军东北并迎接新四军北上入鲁。”赖小刚：《抗战期间中共在山东的崛起》

9 “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

潘汉年说：新四军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要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线。”尹骐：《潘汉年的特工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第162页

10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最初是长江局的分支，1938年改称东南局。皖南事变后，东南局和中原局合并为华中局。上海的地下工作，属于以上机构的工作范围。

11 沈鸿烈是国民党任命的山东省主席，韩德勤是国民党任命的江苏省主席。

12 《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后的饶漱石》，《党史博览》2004年第11期。

1986年8月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第436条注释中：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刘少奇主持中原局和华中局，是上海地下党在抗战后期的直接领导。

[13](#) 参看基辛格《大外交》第四章《欧洲协调：英国、奥地利与俄罗斯》，海南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第65页

[14](#)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并非主要依赖政治社会及其代理机构进行维持，而主要依赖于其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占有，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控制从而使大众接受着一定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和价值体系。他把政治社会比作外围的堑壕，而市民社会如同其背后牢固的防御工事，国家机器容易被摧毁，稳固、复杂的市民社会则难以突破。如果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和背景，没有获得一种自觉的和历史的意识，就无法成功地进行革命。因此，为了建立一种新社会，就必须首先建立一种新文化，从而塑造一种“新人”。

[15](#) 普莱斯（Francis Place, 1771-1854）英国激进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起初是一名普通工匠，后来成为一名裁缝店主。在对法战争期间，他坚持领导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坚持议会选举运动。该委员会的成员主要为商人和小业主，而非劳工阶层。在1830年代初期的议会改革运动中，普莱斯成立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也包括了大量工人阶级会员的全国政治协会，对第一次议会改革的实现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6](#)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 1762-1835），英国记者、政治活动家、政论家，他的激进思想以传统主义和宪政主义为核心，主张通过温和政治改良变革“腐败的旧制度”，引导劳工大众放弃地下密谋支持激进主义，从而推动民众激进运动的发展和1832年议会改革的实现。

[17](#) “山岳党”（Montagnards）是法国大革命中在国民公会上坐在左边最上方的极端民主派，一度掌握了首都的全部力量，他们利用雅各宾俱乐部掌握了群众的思想，通过无套裤党掌握了各市区和郊区，又依靠市政府掌握了起义组织。

[18](#) 乔·希尔（Joe Hill, 1879-1915），瑞典籍流浪者，美国劳工联合会下

属的一个激进派（世界产业工会）的成员，罢工歌曲作者。1914年1月10日晚上10点，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发生一起凶杀案，案发当晚，希尔彻夜未归（他借宿在朋友家），衬衣上沾满了血，去找医生寻求治疗，医生通报了警察局，于是他被逮捕、指控。1915年6月27日，陪审团决定希尔的谋杀罪名成立。11月19日，希尔被执行了死刑。在后来的左派宣传中，他被塑造为殉难者。

[19](#)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装饰艺术设计师、文学家、社会主义者、拉斐尔前派的成员，有人认为他是第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他通过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学批判传统的继承，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罗斯金和卡莱尔的社会批判的逻辑发展而接受下来。著有《艺术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理纲要》等。

[20](#)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德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立者，主张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所谓“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应当依靠国家帮助发展工人合作社，使工人获得全部劳动所得，而这只有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才能实现。马克思说他是“机会主义者”。

[21](#) 休·盖茨凯尔在50年代末提出工党现代化。工党的“现代化”核心是把工党从一个以工会运动为主的政党改造成以选举运动为主的政党。可参见工党领袖休·盖茨凯尔（Hugh Gaitskell, 1906-1963）的自传The Challenge of Coexistence。

Confessional Catholic Party（比利时基督教社会党的母体）参见Gerard, Emmanuel (2001). The Emergence of a People's Party: The Catholic Party in Belgium, 1918–1945. Christian Democracy in 20th Century Europe. Böhlau Verlag.

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党的独立，参见Ford, G. Constructing a regional identity: the Christian Social Union and Bavaria's common heritage, 1949-1962

[22](#) 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是北爱尔兰独立运动中一体两翼组织，新芬党是争取北爱尔兰并入爱尔兰的天主教人口为基础的政党，爱尔兰共和军则是相应的暴力组织，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案件。

23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美籍德裔犹太人，政治哲学家，致力于通过解读古典政治哲学批判“现代性”（虚无主义、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施特劳斯生前在学界处于边缘地位，而其众多门人在里根、老布什时期进入美国政府重要部门。评论认为，他们推动了美国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进行军事打击。本世纪初以来，在刘小枫及甘阳等人的极力引介之下，中国知识界里出现了“施特劳斯热潮”，不少学人通过对施派的扭曲诠释，发展出一套拒斥普世价值、间接为中共统治进行辩护的理论。

24 这一派的公式就是：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离不开美国的霸权，在美国以外可以暴力推行民主。新保守主义从他这里吸收了美国传统缺乏的现实政治观，体现为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

25 指打破一切规则下限的“革命”行为，如列宁通过抢劫运钞车、绑架勒索筹集革命资金，通过逼迫农民交出“余粮”解决粮食问题，通过派水兵驱散立宪会议解决布尔什维克竞选失利问题。

26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1888-1985），德国亲纳粹的法学家、政治思想家。他将政治的标准界定为敌人与朋友的区分，主权就是在紧急状态下，做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决断，做出在不同信仰之间的决断。主权者有“法外之权”，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例外状态/非常时期）。2010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出现了“施米特热潮”。

27 帕森斯对韦伯进行了去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将韦伯对现代文明的悲观诊断简化成一种文化决定论下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乐观肯定，代表了韦伯诠释的一种典范转移。参见顾忠华：《韦伯诠释的范式转移与韦伯学研究》，载《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8页。

帕森斯忽视了韦伯的黑暗面，强调权力意志和现实政治的一面，体现于《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实际上暗示除非国家干预和种族清洗，无法保全日耳曼人在东欧的遗产，同时明示如果没有贵族和等级制度，孱弱的自由主义很快就会失败。他坚定地否认空间狭窄的德国可以适用美国经验，更不用说将美国经验推广到全世界。帕森斯将韦伯解释成如何在传统社会推行现代化的社会学家，而且试图发现普遍适用的现代化理论，实际内容是要将美国特殊性变成普世规律。

28 “中国最大的问题首先是没有遇到那个时候的强有力政治人物，这使得我们后来跟毛泽东进行对比的时候发现，的确毛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领袖。……我们可以说中国首先解决的是政治领袖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哪一种宪政。……所以中国重新成立政治共同体，所谓的宪政就出来，所以《宪法》就是由这样的党来治理的。”刘小枫在2013年4月19日“凤凰网读书会”第133期讲座“中国——讲故事或以梦为马”上的发言，

http://book.ifeng.com/dushuhui/wendang/detail_2013_05/10/25169513_5.shtml

29 “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 出自诗人吉普林，针对的目标是美国占领菲律宾，意思是帝国主义非但不是牟利，反而是针对落后地区的利他主义行动，为了给后者提供起码的文明和秩序，帝国主义者需要牺牲本国宝贵的生命和财产。戈登将军和利文斯顿博士为了拯救黑奴，都死在非洲，是他所说的帝国主义英雄的典范。他们如果仅仅为了牟利，为什么不跟奴隶贩子分红呢？葡萄牙人和巴西帝国就是这么做的。英国政治家也普遍认为，占领贸易口岸以外的内地，经济上得不偿失，但戈登将军壮烈牺牲造成的民意，迫使他们不得不占领内地，肃清奴隶贩卖者的政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说，黑人是我兄弟，但我是兄长，也是这种利他主义的含义。

30 维也纳体系由维也纳会议（1814年9月18日至1815年6月9日召开）建立。此次会议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的主导下，按照正统原则恢复被拿破仑破坏的秩序，重整欧洲版图，确保欧陆国家之间的均势。这一体系保证了欧洲三十多年的和平。

31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费边社会主义者，热衷于讽刺“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和陈腐”。

32 Elliot's proclamation of 2 February 1841

33 香港于1843年设立了行政局及立法局，设有当然官守议员及委任官守议员，但没有代表居民的议席。1850年，港府首次委任两名商人加入立法局，成为非官守议员。

34 “功能界别”选举制是社会各个职业的代表在公职选举中行使投票权的制度。“功能界别”的理论基础是政治行会主义。行会是欧洲封建制下的产物，多元的行会体系反映了商业社会的阶层结构。在行会内部，对于

代表资格和发言权的界定不是按照现代民主的“一人一票”模式进行的，而是由行业领导者决定。

[35](#) Scott,Ian: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54-61,pp.106-107

[36](#)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86-87页；何勤华主编：《英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

[37](#) 1853年9月，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以后，清政府失去对外侨居留地的控制。1854年7月17日，上海租界组成自治的行政机构工部局，工部局执行部门由万国商团、警务、火政、卫生、工务、书信、教育、总办、华文、财务等机构，以及图书馆、乐队等团体组成，还设有法院、监狱等机构，进行市政建设、治安管理、征收赋税等行政管理活动。

[38](#) 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 1807-1897），，接替巴富尔继任英国驻上海领事。与美、法两国同上海道签订关于上海海关协定，由美、英、法三国领事派员组成关税管理委员会，掌管上海海关。咸丰四年，成立工部局。

[39](#) 耶律楚材（1190-1244），契丹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金朝尚书右丞耶律履之子，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后辅佐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依照中原王朝传统制定仪礼制度，加强大汗的权力与中央集权，使蒙古帝国的宪制发生了变化。

[40](#) 第四代克拉林敦伯爵（George Villiers, 4th Earl of Clarendon, 1800-1870），历任英国驻西班牙大使（1833-1839）、掌玺大臣（1839-1841）、贸易大臣（1846-1847）、爱尔兰总督（1847-1852）、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1868-1870）。

[41](#) 王立民：《上海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8-179页。

[42](#) 《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租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二篇第二章第一节

43 “1865年，工部局颁布董事会章程，规定：（1）董事会产生后在开展各项业务之前，首先要在第一次会议上选举出当年的总董和副总董；

（2）董事会定期会议应在每月第一艘英邮轮开出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二上午9时召开；（3）总董必须在规定开会的时间最迟不超过15分钟时主持会议，进行议程；（4）如总董在规定开会时间15分钟后尚未到场，即由出席会议的副总董主持会议，如副总董也未到场，由出席会议的董事推举一名会议主席主持会议；（5）董事会每次开会时应考核董事出勤情况；（6）总董有权在任何时间召开董事会特别会议。如有3名董事向总董提出申请，亦可召开特别会议；（7）董事会每次开会时，每项动议不论是原始议案还是修正案，一经有人附议，即应写成书面动议，由动议人签字后，交给总董；（8）董事会会议对于修正案的议事规程如下：董事可提出任何数目的修正案，在所有修正案提出后，会议主席即将修正案提付表决。表决的程序是后提出的先表决，一直到某项修正案被通过，或所有修正案被否决为止。任何修正案被否决并不意味着其所修正的动议案自行通过。这些提案，不管是原始提案还是修正案，都应提交董事会会议予以通过或否决。”《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租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二篇第二章第一节。

44 秦元章，《废除刑讯议》，转引自徐家力编《中华民国律师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45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41页

46 南明弘光政权在清军南下的紧要关头不知所措，忙于内讧，自掘坟墓。

47 耆英致璞鼎查函，璞鼎查信函，1843年第142号，外交部档案17/70。转引自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1985年2月第一版，第237页

48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6章12、13节“九月十八日，僧格林沁在张家湾设置埋伏；巴夏礼和其他人员成为俘虏；盘问和虐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7月第1版，第654-656页

49 麦考莱描绘苏格兰高地人的性格：“高地人作为一个民族，只要继续维持其特殊政体，在军事方面跟欧洲其他民族相比，就自有其特殊的优

势和劣势。他们个人无论在道德上还是身体上，都非常适应战争，尤其是家乡不毛之地的战争。他勇敢、强壮、会水、耐饥、耐寒、耐劳。他攀登陡峭的山崖，穿越险恶的沼地，犹如法兰西王家部队踏上凡尔赛到马里的大路。他用惯武器，见惯鲜血。他刀剑娴熟，枪法如神，参军以前，就不止是半个军人。盖尔部落容易训练成步兵团，正如个人容易训练成士兵。只是军事组织必须符合族长制。上校必须由酋长担任，少校必须由酋长的叔伯昆弟担任。承租人堪称小共同体的长老，必须占据上尉的位置。上尉的团队由他的佃户组成，他熟悉每一个士兵的面孔、姓名、亲戚、性格。中尉必须出自，他们为鹰羽而骄傲。侍从军容严整。世袭风笛手及其子弟组成乐队。人人都能立刻各就各位，军令畅通无阻。无论军阶高低，人人胜任愉快。他们一旦接触到文明秩序，就能迅速将丰富的组织资源变现。库尔德山民在埃及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帝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他们的武士团体产生了富有骑士精神的领袖萨拉丁。库尔德人和亚述人很容易接受帝国主义的课业，埃及 / 伊拉克和叙利亚虚荣而软弱的文明人却做不到”。麦考莱：《詹姆斯二世以后的英格兰史》

50 李泰国以客卿身份，为清廷购买军舰，但因为喜欢揽权，引起了恭亲王和军机处的疑心。清廷决定退回他买的军舰，以防兵权落入西人之手。

51 琅威理（Lang William M, 1843-1906），英国海军军官，接受李鸿章的聘请负责北洋海军的训练，后因与刘步蟾、李鸿章发生矛盾而辞职回国。1886年，琅威理随北洋海军出国访问，8月海军停靠日本长崎时，一些水兵和日本警民发生冲突。琅威理认为此时北洋海军实力远胜对手，力请对日本开战，被拒绝。

52 天津条约以后，袁世凯在朝鲜采取积极政策。朝鲜保守派开始向俄罗斯求援，维新派则向日本求援。大清正在讨论是否应该将朝鲜改为行省，日本只能鼓吹朝鲜脱离大清独立。美国出于同情弱者的一贯立场，站在日本一方。俄罗斯开始在巨文试探，企图在朝鲜半岛建立军事基地。英国不在乎弱者的独立，但忌惮俄罗斯的扩张，知道朝鲜无力保护自己，宁愿让北洋控制朝鲜，以免落入俄罗斯手中。李鸿章用北洋的贷款挽救了朝鲜的危机，用外交手段将俄罗斯赶出了朝鲜。英国人对此相当满意，直到甲午战争证明他无力保护朝鲜。这场战争证明只有日本才能在远东阻止俄国南下，打开了通向英日同盟的道路。——参见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文海出版社，1980；王芸生：《六

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79；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张晓刚、国宇：《围绕朝鲜半岛的日清、日俄矛盾和甲午战争》，《武汉大学学报》，2014，67（6）：66-74；张丽：《甲午战争与俄国远东政策之选择》，《深圳大学学报》，2015（2）：151-159；崔志海：《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研究》，2011（02）：63-85

53 《庚子大事记》记载了美占区绅民自发向美军送“万民伞”：“美界绅民以归美国暂管以来，地方安谧，刁斗不闻。于是制造万名旗伞、匾额等，用鼓吹送至美提督暨兵官等四份，以志感铭。”同样的感谢，德军在威胁德占区居民照办时被拒绝：“广源执事（一家大银铺的经理）答言，德界百姓因劫掠骚扰，均迁徙出境，街巷竟不见一人，万名伞等一家一名，今家家逃避，何从得其名乎？”

54 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亲戚。乔治五世的父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尼古拉二世的母亲与乔治五世的母亲是亲姐妹，威廉二世的母亲则是女王的大女儿。三人在家庭内部的昵称是乔吉、尼基和威利。

55 “san-sculottes”，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平民支持者及其代表的下层阶级，因为着直筒长裤不着套裤（丝绸及膝马裤）而得名，主张激进平等。

56 1853年2月18日，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维也纳沿城墙散步时，被一名[匈牙利](#)缝纫工匠用刀刺中颈部，皇帝受伤。

1881年3月13日，正准备签署法令、启动君主立宪改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出行时遭到人民意志党人袭击，刺客投掷的第一枚炸弹炸伤了卫兵和车夫，亚历山大二世不顾左右劝阻，下车查看卫兵伤势，被第二枚炸弹炸断双腿，当日医治无效逝世。

1898年9月10日，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皇后（即著名的茜茜公主）在日内瓦度假时，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用锥子刺死。

1891年5月11日，俄国皇储，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在日本访问时，于天津街头被一名仇俄的日本警察用刀砍伤。

57 马基雅维利本人抱有共和主义情感，但他的基本原则是现实主义的：由于人类邪恶的事实，美好的道德品德不是现实的选项，为了君主国和共同体的维系和持存，在必要的时候君主应该能做到在违背道德准则为恶时心无歉疚。在邪恶的世界中，结果可以辩白手段。

58 “在法兰德斯战场”(In Flanders Fields)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诗作之一，由加拿大军医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于1915年所写，因为诗中以染红战场的罂粟花（虞美人花）象征战事的惨烈，使该花成为英、加两国纪念一战阵亡将士的配花。

59 1914年8月4日（德国对法国宣战第二日），德国破坏1839年保证比利时永久中立的条约，4路德军侵入比利时。到四日下午三时，英国外交部命令戈森爵士向德国政府要求保障比利时中立，但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对英国驻德大使声称：“国际条约不过是一张废纸。”八月四日午夜，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借口对德国宣战。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回答说：“仅仅为了一束废纸，大不列颠竟愿意与同一种族的国家交战。”

60 列宁对德国人保证：“我签字确认：已向我宣布由普拉滕与德国大使馆商定的条件；我服从于旅行的领导者普拉滕；我已被告知来自.....的消息，据此俄国临时政府警告说将对那些经过德国返回俄国的俄国国民以叛国罪进行起诉；我为我的旅行承担全部政治责任；普拉滕给予保证的旅行到圣迭戈牧人为止，1917.3.27（4.9）”姚海《俄国革命》第212页，《苏联史》第一卷。

1937年10月，鲁登道夫承认，他在1917年让列宁经德国回国时，根本不知道（大概也没有去注意）列宁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凯撒对此也茫然无知。《列宁的一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所谓“西松文件”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派往俄国搜集情报的私人代表、新闻记者埃德加·西松提供的一组文件，这组文件共68份，证明了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经费之间的关系。文件显示，布尔什维克政权企图“毁尸灭迹”，彻底消除德国经费的痕迹。比如从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叛国案卷宗中取出了德国帝国银行1917年3月2日关于转交资金给列宁等人用于“和平宣传”的7433号付款凭证；从斯德哥尔摩尼亚银行的账本抽出了根据德国帝国银行2754号指令开立的列宁和其他人的账户等；德国总参谋部侦察部门要求布尔什维克政权让一批对德和平的人进入中央执

行委员会，通报托洛茨基未遵守关于停止在德国军队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承诺等。这批文件被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公布后引起强烈反应。当时俄国列宁政权和德国政府均予以否认。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就称“西松文件”为假文件，但《俄国革命》一书指出，近年有研究者指出，“文件基本上是真的，但显然因为追求政治轰动而被人重新编造加工过了”。

1921年，德国财政部副部长伯恩斯坦在《黑暗的历史》中提到，早在1917年12月，他就从一位权威人士那里得到了德国是否向列宁等人提供经费的肯定答复；1921年在德国国会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从德国政府得到了6000万马克”，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向他证实这是事实。这引起德国共产党人的抗议，于是他建议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结果被劝阻不再进一步调查。因为德国当局并不希望让世人知道，“德国除了对战争负有责任之外，也应对布尔什维克掌权承担责任”。

1993年公布的俄共特别档案证明了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最受信任的”间谍卡尔·穆尔的关系。卡尔·穆尔是瑞士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伯尔尼长达30年的生活中，给流亡瑞士的俄国政治侨民提供了大量帮助，与布尔什维克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他也把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的情况报告在瑞士的德国外交官，另外他也是奥地利间谍。俄国二月革命后，他参与了列宁过境德国的组织工作，还提供了经费。1917年，他被派往斯德哥尔摩，作为德国官方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中间人，多次转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外国局数以万计的经费。此人，1918年是列宁对德和谈的顾问，1919年凡尔赛谈判期间有作为“俄国问题专家”为德国外交官提供咨询。1921年，他来到莫斯科，要求归还1917年借给布尔什维克的钱。1922年，列宁和穆尔的中间人加涅茨基曾经给列宁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哥尔布诺夫告诉我，您主张把钱还给穆尔。无论如何，必须同老头子了结此事。”俄共特别档案保存一份1925年11月的“关于卡尔·穆尔帮助俄国革命运动的证明”，说“沃罗夫斯基同志和加涅茨基同志向穆尔要求得到借款，他们明确称之为借款，承诺将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归还给他。列宁知道此事并很感谢穆尔”。后来经历曲折和长期等待后，穆尔得到了这笔钱。

彼得格勒保安局首脑戈洛巴乔夫指出：“他们组织的资金财产有限，在接受德国资助的情况下，这一块（指合法收入）未必有什么地位。”姚海《俄国革命》第225页，《苏联史》第一卷。

近年有史学著作指出，布尔什维克建立自己的武装——赤卫队，队员津贴是用德国经费和德国印制的10卢布面值的假钞发放的。姚海《俄国革命》第226页，《苏联史》第一卷

[61](#) 德国对伊斯兰世界的革命外交，费舍尔《争雄世界》有具体记载。

[62](#) 孙文依靠德国秘密赠送的一笔款项，动员海军总长程璧光及部分议员南下，在广州另设非常国会，组建分裂民国的军政府。对于接受德款一事，孙文曾矢口否认。他在1918年3月18日回答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海因策尔曼的信中写道：“我趁此机会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从未从德国取得款项。在我目前的运动中，我仅仅是为下述愿望所激励：在中国恢复约法政府，并给我们的同胞以民主政体的福祉。”然而，他收钱的情况当时就被自己的同志冯自由记载下来，事后更被德国档案印证。

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民六（1917年）六月，总统黎元洪被督军团逼胁解散国会，国人大愤，孙（中山）总理在上海力图起兵护法，而绌于经费，会有（曹）亚伯相识之美籍某国医士，告亚伯曰：如孙公有起兵护法之决心，某国愿资助百万。亚伯以告总理，总理大悦，惟嘱亚伯坚守秘密。亚伯曰：吾乃基督教徒，当指天为誓。自是每当夕阳西下，亚伯恒偕女友吴□□乘马车游行各马路兜风，顺道至虹口某医士寓所携去大皮篋一具，其中累累皆各国钞票，外人虽侦伺甚密，无疑之者。未几遂有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及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之举。”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上册第229页

德国驻中华民国公使Paul von Hintze记载：“继续做抗议实施反德政策军阀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大部分军阀已经发表了抗议通电。为了搅乱政府的反德倾向，将继续与康有为(君主主义者)、孙中山(国民党急进派)、唐绍仪(国民党右派)等进行秘密联络。我的秘密联络人也不断地拜访张勋(四川)、倪嗣冲(安徽)将军”。

德国驻上海的前任领事Hubert Knipping记载：“德国公使辛慈阁下在离开中国之际，3月末在上海对我下达了指示：直接联络南方激进派国民党的领袖孙逸仙博士。为了推翻段祺瑞政府及其内阁，我们愿意提供孙博士2 000万美金的援助。”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翻译官Hans Schirmer记载：“曹亚伯到上海之后，

很快安排了舍默尔与孙逸仙博士的会谈。会谈就一些政治性目的达成了一致。孙逸仙有意推翻段祺瑞政府，而且也认为这是可行的。他要求德国为军队提供2000万美金的援助。”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P.S.Heintzman记载：“据广东督军陈炯明告渠，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一百五十万银元。孙以五十万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三十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 Fass, Josef: 《孙逸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东方档案》第35期(1967)第115—120页引用了德国记载此事的档案。

据台北李国祁教授的研究，德国给孙文的数目为两百万马克，但孙实际上只收到了一百万；另外的一百万，可能被经手人中饱私囊或德国另送他人了。

李国祁：《在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一文中，刊《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4期（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年）第317-342页。

一说是两百万元，一说是一百五十万元，数目到底多少，有待更多可靠的档案、史料才能确证。征诸当时的情况，很难说此事是捕风捉影。

[63](#) 20世纪以来，法国迅速向摩洛哥扩张势力。1904年4月英法签订协定，法国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则承认摩洛哥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但这侵犯了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1905年2月，法国要求摩洛哥苏丹在法国监督下进行“改革”，企图使摩成为法国的保护国。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出访摩洛哥南部重要港口丹吉尔时宣称将会保护摩洛哥的独立及其领土的完整，使其与法国关系变得紧张。1911年5月21日，摩洛哥发生反苏丹的部落起义，法国借机派兵攻占其首都非斯。德国则要求法国割让部分给非洲作为补偿，并于该年的7月1日，以保护本国商人为借口，出动炮舰“豹”号驶至摩洛哥的港口阿加迪尔，战争一触即发，这次行动被史家称为“豹的跳跃”。英国因担心德国挑战其海上霸权而支持法国，态度强硬。德国被迫退让，与法国在该年11月4日达成协议，以一部分给刚果为代价，德国承认摩洛哥为法国保护国。1912年3月30日，《非斯条约》在摩洛哥的非斯城签订，苏丹阿卜杜勒哈菲德放弃摩洛哥的主权，摩洛哥沦为法国的被保护国。

64 光绪戊申，南皮管理学部，其时尚书为荣庆，字华卿，某日在学部置酒席宴南皮，华卿逢迎之曰：“三儒从祀文庙，闻外间亦将以曾文正公请矣。”谓顾、黄、王三儒从祀文庙，出南皮所请也。不意南皮作色曰：“曾国藩亦将入文庙乎？吾以为将从祀武庙。”坐间愕然。南皮曰：“天津教案，曾国藩至戮十六人以悦法人。是时德兵已入巴黎，曾国藩尚如此，岂非须祀武庙乎？”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一四六、张南皮喜谤前辈》，中华书局2013年8月第1版，第278页。

65 一个魔法师学徒趁老巫师不在，自作聪明展现自己的魔力，但他只知道魔法开始的咒语却不知道该如何结束它，结果导致水漫金山，最后还是老巫师回来收拾了残局。见钱春绮译《歌德诗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66 日本虽然通过日清战争排除了清朝对朝鲜的支配，但另一个课题是如何阻止俄国南下。作为对策，日俄协调论与日英同盟论产生对立。日俄协调论主张日本承认俄国对满洲（中国东北地区）的支配权，作为交换，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支配权，即所谓“满韩交换论”。伊藤博文、井上馨、陆奥宗光等人执这种观点。山县有朋、小村寿太郎、桂太郎等人则执日英同盟论，主张日本与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俄国。当时英国在中东、中亚等地区与俄国对峙，而日英间基本没有利害冲突。最终日俄协调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日英则于1902年1月30日签署了日英同盟协约。国民对日本能与世界最强国结为同盟感到惊喜万分。

67 1899年5月，山县有朋首相反对泛亚主义浪漫派的“中日提携”路线：“观清国形势，欧洲列强在清国版图内到处都在扩张利益线，清国地图显然最终将被赤、橙、蓝分开。清国将像犹太人般国亡而人种存。值此之际，我国将来应当尽量扩张利益线……即便我国财、政、兵三方面都充实了，与清国提携维护东洋独立也是最为拙劣的下策。”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东京：原书房，1966年，第251-253页。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英俄大博弈最激烈的时刻，英日合作和日俄合作是此消则彼长的关系。英日合作意味着日本出兵亚洲大陆，解除大英帝国对俄罗斯南下的担忧。英日一旦合作，俄罗斯和日本就会自动进入短兵相接的位置。参见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三四〇号文书，第351页；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39页；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

1(上), 第五八三号文书, 第551页

狭间直树《初期亚细亚主义史的考察》称：日本曾有“初期亚洲主义”，也叫“处于出发点上的亚细亚主义”，其主要内容为“主张亚洲团结提携的兴亚论”，“为对抗欧洲，主张亚洲团结提携的兴亚论及所谓亚细亚主义登场，其所倡导的团结提携论，从理论与实践的意义上说，乃以亚细亚内部对等关系为前提。处于出发点上的亚细亚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泛亚主义在明治初年声势极大，早年的福泽谕吉都受其影响。他对大清在朝鲜问题上的表现不满，才提出了脱亚入欧的理论。1880年11月11日，兴亚会成立。成员包括何如璋、黎庶昌、副岛种臣、榎本武扬、宫岛诚一郎、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保利和、汉学家重野安绎。1883年1月20日，兴亚会改名为“亚细亚协会”。正副会长为长冈护美、渡边洪基。议员包括：重野安绎、宫岛诚一郎、谷干城、岸田吟香、末宏重恭、宏部精、成岛柳北等二十四名。会员包括：曾根俊虎、金子弥兵卫、草间时福、桂太郎、东次郎、榎本武扬、牧野伸显、副岛种臣、三岛毅、品川弥二郎、原敬、竹添进一郎和王韬。协会宗旨强调日中“协”好，倡导“日中提携”。与以前不同的是“将通商贸易、确立市场作为日中提携的经济基础”，强调“中日两国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合纵以及收回利商权”。东亚会成立于1898年，成员包括：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康有为和梁启超。泛亚主义的致命弱点在于：如果大清不争气，日本的鼓吹者就会在国内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从甲午到庚子，许多原先的泛亚主义者大失所望。英日同盟巩固后，只有甘作在野党和理想主义者的人士才能坚持泛亚主义立场。曾根俊虎、头山满和宫崎滔天都属于这一类，他们哺育了孙文和宋教仁的革命事业。参见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

欧洲列强对泛亚主义颇为忌憚，担心日本和大清结盟，庚子拳乱消灭了这种可能性，将日本进一步推向国际协调主义。参见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别册1(上)，第416页、第428-432页。

英国需要英日联盟的理由，主要就是需要维护国际秩序的远东代理人。参见邵永灵、王琛：《远东危机与“光荣孤立”的困境(1900-1901)》，《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 / 宪政本党创始人犬养毅主张配合列强的门户开放政策，在条约体系的框架内实现中日提携和利益共享。参见《犬养伯爵的对清善后策》，(日)《大阪朝日新闻》1900年7月1日第2版。

政友会的林包明则认为日本已经处在入主中原的有利地位，没有必要维护条约体系：“列强不如我国了解清、韩，又不若帝国能得二国民心。加之，我国航海派兵之迅疾远非他国可比，况且开拓新殖民地常须军队临之。退一步而言……经营远东，得我助者，其力增倍，失我助者，其力减半……故我国应借此有利地位，巧夺先机，方可成为名符其实的远东主人。”林包明：《远东论策》(下)，(日)《政友》第17号，1902年2月10日。

[68](#) 日本既想以黄皮肤的欧洲人自居，加入列强俱乐部；又想以东洋领袖自居，主导近水楼台的东亚大陆。这两条路线从长远看来不能兼容，从短期看来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将决断推给未来。日本在二十世纪初的暧昧，导致她在以后的节点陷入内部分裂和路线斗争。参见王美平：《日本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三种论调》，《历史档案》2013年第1期；《列国协同之必要性》，(日)《国民新闻》1900年6月13日第1版。

[69](#) 1904年英国和法国签订友好协约，标志着两国停止关于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冲突。参看基辛格：《大外交》第七章，海南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第185页

[70](#) 1900年，兰斯多恩继任外交大臣以后，设想与德国合作，但逐渐认识到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后来的外交大臣格雷也一直为缓和与德国因海军竞赛而紧张的关系做努力，并想方设法与德国采取某种合作。直至1912年英国政府还派遣陆军大臣霍尔丹前往德国商谈海军和殖民地问题。

[71](#) George F. Kennan: The fateful alliance: France, Russ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antheon Books; 1st edition (1984)

[72](#) 长平之战。意指总体战模式。

[73](#) 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东京：弘隆书林，1980，第78-80页；初濑龙平：《传统右翼内田良平之研究》，福岡：九州大学出版社，1980，第59页

[74](#)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美关系摩擦不断。1907年至1908年，为了拉拢美国，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奉天巡抚唐绍仪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

司戴德就美国投资修筑新法（新民至法库门）铁路、锦瑗铁路及东三省银行借款等问题进行谈判。与此同时，袁世凯进行了“清美德缔结联盟”的秘密外交活动。1906年，威廉二世曾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向清政府建议“缔结一个德美清条约，担保中国本土的完整”。袁在取得慈禧太后同意以后，于1908年夏奏派唐绍仪为专使，以“赴美致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为名，暗中接洽缔结清美德三国同盟。同时，唐还负有试图把两国公使互提为大使以及向美国借款的秘密任务。然而日本情报人员在唐绍仪出访前就获悉了这一计划。待唐绍仪率领的代表团于12月1日抵达美国时，日本已于11月与美国达成了新的协议，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也于11月去世。美国政府不愿对唐绍仪过分热情，“清美德同盟”因此迅速降温。

75 某种意义上，袁世凯是革命外交的先驱。曾任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的曾叔度回忆说：“他（袁世凯）说：‘我已筹画好了：（1）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2）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3）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288页

76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 338-340页；栗园健：《对满蒙政策史之一面》，东京.原书房，1966，第 142-144 页

77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首相全力推行均势外交（尤其是压制法国），为19世纪的英国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威灵顿（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在滑铁卢战役击败了拿破仑。他们都是遏制欧陆霸权的功臣。

78 “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桂太郎的话的要点，我可以记出来：‘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

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现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戴季陶：《日本论》第18节《桂太郎》，九州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79](#) 久原信之助（1869-1937），实业家、政治活动家，资助过孙文的反袁活动，支持过二二六事变，战后提出“亚细亚合众国论”，晚年曾访华，受到毛的接见。

[80](#) 小矶国昭（1880-1950），泛亚主义者，历任陆军省整備局长、军务局长、陆军次官、关东军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拓务大臣、朝鲜总督、首相等职。1944年秋对重庆展开和平工作，遭到陆、海、外三相反对，于1945年4月辞职。1950年病死于狱中。

[81](#) 后藤隆之助（1888-1984），昭和研究会创立者，大政翼賛会组织局长，近卫文麿的好友，在近卫文麿三次组阁及其制定对内对外政策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主张中日提携、脱离欧美羁绊、防苏防共的“协同主义”，希望通过充分释放善意，帮助改善中国人的生活，化解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晚年曾率民间友好团体访华。

[82](#) 1904年4月英法签订协定，法国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则承认摩洛哥是法国的势力范围。

[83](#) 1907年，在中亚长期博弈的英俄达成协定，将波斯划分成南部的英国势力范围、北部的俄国势力范围和中部的缓冲地带。

[84](#) 法皇拿破仑三世扶植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建立墨西哥帝国。

[85](#) 胡亚雷斯（Benito Pablo Juárez García, 1806-1872），四度当选墨西哥总统，先后颁布《胡亚雷斯法》、《墨西哥社会改革宣言》。1862年领导抗击拿破仑三世组织的墨西哥远征，推翻马克西米利安政权。

[86](#) 卡列斯（Plutarco Elias Calles）墨西哥独裁者，革命制度党创始人，无神论者。1924-1928年任总统，1928年至1934年在幕后垂帘听政。他执行反帝、土改政策，还严厉执行反天主教运动，激发了民间大规模捍卫宗教的反抗。1936年被自己的学生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流放。

[87](#) 新陈代谢即身体内部的新成分取代旧成分，但外形不变。欧洲各国从外形上看仍然存在，但内部的人民主权成分不断增加，压倒了君主和贵族的成分。混合宪制的新陈代谢导致民族国家取代等级国家。民族国家取代等级国家，导致国际体系的回旋余地减少。回旋余地减少，导致两次大战和欧洲衰落。

[88](#)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二部，商务印书馆，北京2014，第602页

[89](#) 安东尼拉·萨洛莫尼：《列宁与俄国革命》，三联书店，2006，第37-38页

[90](#)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部，商务印书馆，北京2014，第329-331页

[91](#) 克伦斯基（Alexander Fyodorovich Kerensky, 1881-1970），俄国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李沃夫临时政府司法和军事部长。李沃夫垮台后出任总理，拒绝让俄国退出一战（当时军心涣散，俄国士兵普遍希望逃离战场，布尔什维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被布尔什维克推翻后流亡海外。

[92](#) 同前注。

[93](#) 见本册注释60。

[94](#) 社会革命党在1902年由若干分散的旧民粹派小组和团体初步联合而成，1905年12月正式宣告成立。首领是B.M.切尔诺夫等。该党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阶级差别，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在联邦制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国，在保存资本主义的前提把土地变为全民的财产并交给农民平均使用，在策略上继承民粹派的个人恐怖手段。

[95](#) 俄国地方自治机构产生于废除农奴制不久的1864年，但一直受到重重束缚。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迅速发展，基层机构遍及全俄，一度成为临时政府的地方政权机构，原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局联合委员会主席李沃夫成为前两届临时政府总理。

[96](#) 大俄罗斯主义者留恋沙俄疆域，认为俄罗斯是不能分割的整体，拒绝容许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离。

[97](#) 米留科夫（Pavel Nikolayevich Milyukov, 1859-1943，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二月革命后短暂地担任了两个月外交部长。参与策划科尔尼洛夫事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逐渐把精力转向历史撰述。

[98](#) 科尔尼洛夫（Lavr Georgiyevich Kornilov, 1870-1918）俄国将领。一战中表现突出，一时成为英雄人物，得到快速提拔。1917年7月17日，布尔什维克操纵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上街游行，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试图夺取政权。这一次暴动被临时政府镇压下去。随后，科尔尼洛夫被任命为俄军最高统帅，要求授权他以一切手段恢复秩序。9月2日，他被克伦斯基撤职关押。9月7日，他的支持者骑兵第三军向彼得格勒推进，同时向克伦斯基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临时政府成员全体辞职。克伦斯基手下无兵可用，只得向布尔什维克求援。布尔什维克势力快速扩张。科尔尼洛夫被放出后南下顿河流域，坚持与红军作战，1918年4月战死，红军将其尸体挖出来挫骨扬灰。

[99](#) 邓尼金（Anton Ivanovich Denikin, 1872-1947，俄国将军，科尔尼洛夫的战友，十月革命后在北高加索组织志愿军对红军作战，一度几乎攻占莫斯科，但功败垂成。1920年率残部逃往克里米亚，然后流亡国外。2005年10月，邓尼金以爱国将领的身份被重新安葬在莫斯科。

[100](#) 秦晖：《孟什维克——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失败》，载《二十一世纪》2007年10月号

[101](#) 里加为拉脱维亚首都。1918年11月18日，在经历了700多年的外国统治之后，拉脱维亚成功独立。

[102](#) 顿河地区哥萨克军的新首领彼得-克拉斯诺夫组织了大规模抵抗，反对布尔什维克。他们与邓尼金联合，控制了从德占区到伏尔加河的大部分地区。

[103](#) 《亚洲的觉醒》：“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载于1913年5月7日《真理报》，《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160—161页。

第二章 远东体系的破裂

一、列强的绥靖主义和民国的机会主义

本节引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放弃了在远东重建条约体系的路线。日本尽管有机会推行东亚的门罗主义，却没有勇气背离长期奉行的国际协调路线。满洲和各省的独立倾向迅速发展，但没有得到门罗主义的保护，未能形成足以自卫的多国体系。北京政府对各省的权力化为泡沫，却通过外交途径迫使日本撤出东亚。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名义上实现了威尔逊主义要求的平等，实际上却造成了所有人都不负责任的真空状态。

1.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远东

大战爆发不过几星期，英法两国就从殖民地撤出了大部分军事力量。法兰德斯和波罗的海封锁线迅速凝固，置德国人于绝地。与此同时，地中海以东陷于空虚。德国地中海舰队虽然未能切断法国阿尔及利亚军团的勤王路线，将绞索套在巴黎的头上，却已经迅速关闭了达达尼尔海峡，促使土耳其背叛英国，用沙袋堵死了俄罗斯的呼吸道。德国太平洋舰队流窜于智利与青岛之间，随时都能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复制土耳其模式，甚至切断对协约国至关重要的硝石运输线。他们没有将大沽口和京津走廊的联军一扫而空，在北京成立亲德政府，主要因为英国人的老练和日本人的急切。香港和威海的英军已经只剩下空架子，甚至必须反过来输入北洋诸将的剩余物资。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¹深知，袁世凯政府对日本的仇恨远远超过了恩维尔政府对俄罗斯的仇恨²。德国人出现在京畿附近，固然是危险的。日本人出现在京畿附近，同样可能刺激北京政府背叛协约国。他为了稳住袁世凯，不惜以支持帝制为饵。袁世凯的中立宣言又稳住了德国人，保障了京畿的空城计。青岛总督发现日本舰队兵临城下，惊讶的程度不亚于段祺瑞，然而为时已晚。日本人打起英日联军的旗帜，一举歼灭了德国人的四艘巨舰，预示了“威尔士亲王”号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沉没³。如果法国地中海舰队能够表现出同样的效率，“戈本”号根本不会有机会抵达君士坦丁堡，凯末尔和列宁都将老死邱陇⁴。

2. 日本受恶名而不得恶行之利

1915年的日本已经是远东的主人，但它不知道怎样运用自己的机会和力量。这一年，协约国全体承诺：战争结束以后，德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权益都归日本继承。较之协约国对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的各项承诺，这些（威尔逊主义者所称的）密约根本算不上慷慨。后面几个国家非但没有实现协约国牵制德军的期望，反而在自己的战线上一败涂地，迫使协约国分散西线的兵力援助他们，但战后并不因此放弃无功受禄的声索，他们的依据同样不过是威尔逊主义者诅咒的秘密外交。日本基本上独立完成了这些小伙伴无力完成的使命，其实已经不需要协约国的事后追认，但它掌握不了“做得说不得”和“说得做不得”的区别，一再迁就零成本或低成本的搭便车艺术家和舆论操纵家，使后者得以锁定适当的捕食对象。此后几十年，日本不断陷入受恶名而不得恶行之利的窘境。由于明治维新以来的路径锁定，“优等生”的“吃暗亏”⁵相应地引起了它的国民对自由主义-殖民主义宪制的全面质疑。

如果日本具备英国式或罗马式共同演化的宪制路径，其实不难将“守序者”和“挑战者”两种路径驱动引入相互配合的布局，形成“做得说不得”和“说得做不得”同时恰到好处的节奏感。后来发生的情况恰好相反，两者产生了相互拆台和颠倒节奏的效果，证明日本缺乏竞技状态良好的宪制结构-国际体系，或者不如说证明了时间是共同演化体系趋于完美的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因素。“二十一条”交涉暴露了日本官方外交的迂腐，在应该“做得说不得”的时候偏偏“只说不做”。正如张作霖所说：“日本人从二十一条当中得到了什么？根本什么都没有啊！”他敏锐地看出，遭到体系的抛弃才是最大的损失。因此此后十年，他一直在运用“只做不说”⁶的独立外交弥补北京外交部给关东父老造成的损失。

3. 民国突破外交底线

袁世凯为晚清外务部制定的班底和政策，以联美排日为锦囊妙计。袁世凯在大总统任内，又发明了群众外交和舆论外交。各省将军⁷奉命动员社会团体和爱国群众，向北京通电请愿，谴责任何企图对日妥协的政策，希望给东交民巷（Beijing Legation Quarter，使馆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久以后，同样的民意机器就要用于洪宪劝进。“二十一条”纯属十九世

纪外交，习惯性地假设交涉各方属于同一个绅士俱乐部，只有达不成协议的问题，没有达成以后耍赖的问题，根本没有准备应付二十世纪外交的核心问题“执行与监督”。面对各省官民“自发地”毁约，“二十一条”没有产生哪怕是一小时的效力。民国的无赖手段通过巧妙的舆论导向，变成了世世代代的国耻教育材料，结果弄假成真作法自毙，把主要设计师袁世凯变成了卖国贼，为“路径决定命运”提供了极好的注脚。徐世昌政府(1918-1922)穿上袁世凯的靴子，发动北京各界群众，用“公理战胜”的搭便车逻辑向协约国示威，迅速演变成引火烧身的“五四运动”⁸。“丘九”（五四运动中丘八忌惮学生，称其为丘九）们一旦获得吴佩孚和孙文的支持⁹，就把斗争目标转向原先的操纵者。

徐世昌政府瓦解后，第二届“法统重光”政府(1922-1924)沦为诸将的交涉经纪人。旧国会恢复了，但曾经主导旧国会的党派瓦解了。新国会（安福国会）虽然解散，主导新国会的政治逻辑却胜利了：旧国会第一次解散以后，国民党和进步党这样有纲领的大党瓦解了。法统重光以后，同一批议员只有少数能结成宪法研究会、益友社这样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无论人数还是凝聚力，都远不如原先的政党。大多数议员甚至连这样的小团体都无法组成，因为他们跟外省议员没有什么值得交流的共同利益。他们大多利用本省的会馆和同乡组织，跟本省的军官、京官和在京名流来往。新国会号称安福国会，就是安徽和福建两省议员的意思，因为皖（安徽）系军官利用同乡关系拼凑国会多数派，获得了很大成功，而梁启超代表立宪派的政治纲领，却遭到惨败。派系斗争是议会政治固有的特点，即使美国也不例外，但美国仍然存在许多跨州的重大利益，足以整合形成全国性政党。民国各省没有重大的利益交融。各省自辛亥革命以来，普遍设立外交局，自行处理各省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省与蒙藏、西洋的关系，没有感到中央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反满革命形成的同仇敌忾情绪迅速消失以后，依靠或反对这些情绪的跨省政党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各省议员不再为他们在北京上海的党魁代言，退回自己家园的范围为他们家乡的强人代言，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联合的真实需要。跨省大党和路线斗争消沉，以籍贯为基础的小派系活跃。联省宪制内在的解体倾向日益浮出水面。1923年宪法¹⁰对蔡锷和杨度设想的双重爱国主义做了极大的让步，仍然不能阻止各省独立倾向的进一步升级。诸将染指外交部的禁脔，释放了最明显不过的信号。

国民外交的底线一旦突破，每况愈下的恶性竞争就无法避免。相形之下，始作俑者反而显得比后来居上者克制得多。袁世凯从来没有考虑过允许诸将自行发动群众，但他不肯触动的底线很快就让吴佩孚打破了。

张作霖对吴佩孚极为不满，最初就是因为受不了郡國小將竟敢僭越幕府大佬的特權。隨着各省分割國民外交的紅利，北京外交部反而越來越像一個依靠公使團支持的流亡政府。列強和外交部的交涉，只能產生缺乏執行力的原則性建議。各省單獨簽署協議才能左右具體事務的安排。法蘭克福帝國議會和大哥倫比亞共和國在其最後的幾年，陷入的就是同樣的境地。

4. 列寧送來特洛伊木馬

北京外交部在立憲共和國的最後幾年，享受了一種自相矛盾的自由。奉天和洛陽的“太上總統”（指張作霖和吳佩孚）忙於發展沒有名分的實質外交。內閣總理和各部總長來去匆匆，但外交部的職業官僚幾乎沒有更換過。他們生活在虛擬的世界內，為土崩瓦解的聯邦爭取充飢的畫餅。列寧通過《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部致中國外交部照會》，給他們送來了一座華麗的特洛伊木馬¹¹。“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本階級從中國殘暴地奪得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歸還中國。”¹²北京外交部在弱者的機會主義驅動下，欣然表示：“本國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機會，循此次宣言書中指示之程序，以與貴國直接開議也。”¹³他們並不知道中央政治局的秘密指示：“從1919到1920年的總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許的。”¹⁴其實，名分就是北京外交部的唯一資產。莫斯科作為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的僭主政權，渴望在外交封鎖線的最薄弱環節打開缺口。實質問題，他們同樣寄希望於各省的獨立外交體系。

1921年10月31日，外交人民委員契巧林致信中央遠東局：“我們可否同它（廣州）來往，這會不會造成無法同北京建立聯繫？……如果我們打算同時同廣州來往，同北京的聯繫會不會中斷？”¹⁵因此，莫斯科警告孫文：“將我國的援助嚴守秘密，因為遇公開場所和官方場所，即令在今天，對國民黨謀求解放的意向，我們也只能表示積極同情而已。”¹⁶哈爾濱工兵代表蘇維埃根據列寧的直接指示，宣布成立哈爾濱共和國¹⁷。

《對華宣言》稱：“蘇維埃政府已經放棄了沙皇俄國政府從中國攫取的滿洲和其他地區，讓這些地區的人民自己決定他們願意留在哪一國內，願意在自己那兒建立何種形式的政體。”¹⁸如果翻譯成現實政治的語言，意思就是：白俄控制的中東鐵路區域和張作霖控制的滿洲有權獨立，或像浩罕共和國一樣加入蘇維埃聯邦。奉軍將領張宗昌在協約國的支持下

推翻了哈尔滨的红色政权，从此跟莫斯科结下了不解之仇¹⁹。

5. 俄对满洲的渗透和日本对满洲的建设

张作霖的满洲在培养独立外交体系的道路上走得最远，获利也最大。一方面，外蒙、哈尔滨共和国和中东路政权更迭动荡。远东共和国成功地渗入了东正教和白俄的组织，正在通过中东铁路的苦力培养新的扩张渠道，甚至开始为满洲人和蒙古人发明拼音文字。中华民国和苏维埃俄罗斯为解决悬案而展开的谈判，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民国外交部并不完全相信列宁放弃在华利权的承诺，但并不是看不清苏维埃政权在国际上极度孤立的处境，试图利用自己作为合法政府的优势，弥补硬实力和反颠覆能力的不足。苏联并不在乎谈判有没有结果，或有什么结果。只要谈判正在进行，苏联外交人员和贸易人员就可以出入中华民国。苏联派出的这两种人员，大部分都是乔装打扮的特务或地下工作者。他们借助领事馆、商务办事处和文化办事处，完成了最关键的初期病毒感染工作。以后的谈判即使完全失败，苏维埃政权的目标也还是实现了。东正教会和中东铁路是白俄流亡者集中的地方，自然变成了苏联情报机关的主要渗透目标。苏联外交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牺牲沙皇的遗产，收买张作霖、杨增新等军政要人，在满洲和新疆当局的配合下，压制白俄流亡者的反苏活动，为苏维埃红军和情报组织越界镇压白俄提供方便。只要白俄仍然控制中东铁路，苏维埃政权控制的亚洲铁路就没有用处。欧亚主干道中断，满洲商务也受到损失。《奉俄协定》同时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苏维埃政权接管了中东铁路，消灭了心腹大患；满洲政府获得了一半的铁路股份，满洲商务和税收得到实利；白俄是最大的输家，失去了铁路管理权，但作为唯一有能力经营铁路的技术团队，获得了莫斯科和奉天政府的安全承诺和两大股东的铁饭碗。莫斯科很快就违反了既往不咎的承诺，构成张作霖政府和苏维埃政府反目的诱因之一²⁰。

另一方面，日满联盟大刀阔斧地推动关东基础建设。南满铁路网延长到距离齐齐哈尔只有几英里的昂昂溪。日元、正金银行券、奉天银币和纸币在南北满全境通行无阻。关东社会丰饶的生命力是谁都看得出的，从移民到土豪的历程经常在两代人之内就走完了。哈尔滨比西伯利亚大多数城市人口更多，文化创造力更强。大连比日本三岛更西洋化，教育水准更高。满铁自1906年成立以来，公司效绩和员工待遇远迈日本、朝鲜和台湾的企业，不仅有资格遴选专业最优秀的青年才俊，而且发挥了吸

引和集中理想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的特殊作用。这些人对满洲处女地怀有拉法耶特对华盛顿的寄托²¹，将母国难以实现的社会理想投射到新大陆。

1907年，满铁调查课在大连成立。此后的四十年，调查课或调查部完成了六千多项研究和五十多万项资料。《满铁资料汇编》、《经济调查资料》、《满洲农户调查》、《满洲旧习惯调查报告》、《满洲土匪研究》、《工农俄罗斯研究丛书》、《工农俄罗斯调查资料》、《俄罗斯经济丛书》、《俄文调查资料翻译》、《中华民国十一年》、《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江苏农村实态调查》的翔实可靠，即使置诸中世纪欧洲亦无愧色。亚洲大陆之所以还有历史，端赖他们的远见和辛劳。这些研究材料至今仍然是东亚研究的基石和黄金标准，比敦煌古卷在中古研究当中的地位还重要得多。超越满铁调查时空范围的项目只有参照并对满铁材料，才能多多少少区分想象和推测的不同层次²²。

满铁青年一再反对张作霖和关东父老的贪财和短视、外务省和内阁的因循和迟钝、关东军的武断和盲目，最早提出和最执着地维护南满乡民的自治权利，不惜为新天地的良治牺牲自己的利益，将铁路区域的社区建设成奉天的新英格兰乡镇²³。满铁的孵化器孕育了不止一个后藤新平²⁴，犹如罗马元老院荟萃帝王之才。满洲记忆在日本开明左派当中根深蒂固，不亚于西班牙内战之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扪心自问，毕生最纯洁的奉献莫过于此。任何人都能看出：随着满洲社会的渐次成熟，不同路径的选择早晚不可避免。决断时刻对环境的稳定性极度敏感，正如亚稳态对环境的扰动不太敏感。门罗主义保护了南美，正如凡尔赛体系辜负了东北亚。列强在远东的退缩本来给日本提供了模仿门罗主义的短暂窗口，但外务省缺乏当机立断的敏锐。最佳机会窗口消失以后，军部为了扰乱亚稳态却甘愿浪费更大的资源。

6. 北京拆除藩篱

日本身为远东和太平洋战场的主力，没有在战争结束时推出自己的门罗主义。这是第一个重大错误，直接导致了凡尔赛会议的被动局面。国际维和部队进驻远东共和国，日本同样是主力，仍然没有索取与其奉献成比例的发言权，更不用说领导权了。这是第二个错误，直接导致了《九国公约》²⁵的成立。南美如果在其幼弱时期用类似的公约取代了《门罗宣言》，肯定会在普法战争以前就沦为列强的练兵场。两次世界大战的

失败者都会在这里找到避难所，将世外桃源变成西半球的广岛和琉球。

优生文化第一次面临外部世界的负激励，即使无需伪装的内部文件（见附录1：《关于山东善后交涉问题的政府方针》）都洋溢着愤懑和惶惑之情。²⁶日本屈服了，却没有忘记。

华盛顿会议不仅葬送了日本过去的投资和未来的机会，而且向当事各方释放了危险的诱导。欧洲列强沦为无肉可吃的牧羊犬，不再看守羊群，却仍能凭籍其正式身份，妨碍日本人和美国人可能的干涉。机会主义的短暂胜利败坏了民国精英阶级的德性，毁掉了他们辨识形势的判断力，将他们变成了一群自以为是狼的羊。披着狼皮的羊首先愚蠢地企图抢劫牧羊犬，然后为了挽回自己受伤的虚荣心，开始假装相信披着羊皮的狼才是唯一的真朋友。北京政府在尼港事件²⁷中协助布尔什维克的白手套，自己拆除了满洲的藩篱²⁸；在五卅事件中协助布尔什维克的白手套，自己拆除了上海自由市的藩篱²⁹。下一条触手从海参崴伸向广州，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协助³⁰。

二、法统的崩溃与边界的崩溃

本节引言：

政治真空是最不稳定的状态，为共产国际的扩张提供了抵抗力最小的方向。自由主义体系在国际上崩溃，随即导致立宪共和国的原则在东亚崩溃。首都革命以后，北京和广州的革命政府都公开否定法统。孙文本着机会主义的精神，抛弃了国民党在辛亥时代坚持的泛亚主义和民初时期坚持的护法主义。日本泛亚主义者处在政治低谷期，无法援助孙文。共产国际急于输出革命，愿意满足孙文的期望。孙文的背叛导致中华民国门户洞开，使国民党沦为共产国际的特洛伊木马。

1. 段政府的善后会议

民国法统作为自由主义-殖民主义秩序在远东的分支，不大可能在欧洲秩序中心崩溃以后幸存多久。大清解体时刻的现状既然无法维持，二十年前搁置的共同体边界重构和共同体关系重组问题自然重新浮现。北京临时执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相继宣布废除法统，重启革命³¹，将善后问题交给超越议会政治的国民大会。他们推给国民大会的任务如此复杂和矛盾，对国民大会的定义如此空洞和矛盾，既暴露了大清遗产固有的危险性，又预示了东亚秩序未来的衰败。民国宪制一开始就是远东体系最薄弱的环节，犹如老水手伤痕累累的关节，早在年轻水手健康的器官还没有感觉的时候，就已经用疼痛释放了当下低气压和未来暴风雨的信号。

善后会议的宪法意义类似辛亥年的各省代表会议，但方向相反。两者都是未经国民授权的要人会议，预示了未来的政协会议，只有协商之责，并无创制之权。各省代表会议执行了革命各省的政治意志，为制定将来的宪法契约做准备。执政府善后会议执行了革命各方的政治意志，为废除原先的宪法契约做准备。善后会议共有会员166人，分为四类：(1)有大勋劳于国家者（只有孙中山、黎元洪两人）；(2)讨伐贿选（曹锟及其直系军阀）、制止内乱的各军最高首领；(3)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4)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由执政或派充的（但不得逾30人）。(1)-(3)项中会员不能出席时，可派全权代表参加³²。

善后会议的任务包括了第二次法统重光期间，朝野各派和舆论领袖公开

的诉求。“废督裁兵”是旧国会重新召集时，对黎元洪大总统的承诺。旧国会未能履行承诺，反而引起了新一轮军事政变。凡尔赛会议以前的舆论领袖大抵以十九世纪欧洲为师，认为政治不良必须通过宪政途径解决。如果发生政变，他们就呼吁法统重光。此后的舆论领袖深受战后欧洲的风气影响，开始质疑国会政体（资产阶级民主）自身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国会无力控制军人，他们就责备国会本身。财政危机是内阁不断倒台的关键因素，也是各邦分离主义的直接原因。因此，善后会议承担了三方面的义务。第一，筹备半苏维埃、半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大会，顺应一战以后的国际形势，安抚亲苏反对派。第二，巩固中国帝国主义各派和各邦分离主义各派的临时停战机制，强化军事互信，防止军备竞赛升级。第三，重新整理财政，划分各邦共享收入和专享收入的边界，从根源上消弭未来可能的冲突。

2. 孙文投靠苏联

孙文拒绝第二次法统重光³³，炮击广州西关商业区以后，跟南粤绅商结下了不解之仇，已经不能指望通过民主选举卷土重来³⁴。苏维埃的崛起，无论从物质资源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理论的角度，都是他仅有的出路。国民大会吸收苏维埃模式，既不再代表历史悠久的各邦，又切断了纳税人和食税人的契约纽带，沦为党组织可以轻易控制的社会团体和职业团体代表。孙文敏锐地看到，旧军官和旧资产阶级没有应对党治制的能力和准备。国民大会一旦召开，就会变成通向列宁主义国家的桥梁。他一面加紧推动国民党的列宁化改造，一面为第五纵队铺路。

梁任公见证了欧洲文明丧失自信的恶果，但没有料到衰败会如此迅速地蔓延到东亚。一旦列强丧失维护条约体系的意志，1912年的斗争各方自然会丧失委曲求全的动机。民国作为临时妥协，一开始就没有得到黑龙会和同盟会的青睐。洪宪帝制为泛亚主义联盟提供了第二次机会，但法统重光将东亚大陆重新送回条约体系的轨迹。外务省和北京政府言归于好，孙文和国民党极端派沦为孤儿。大正民主加强了政党内阁对军部和泛亚主义者的约束力，迫使饥不择食的孙文投靠苏联³⁵。

列宁和他的朋友们刚刚经历了欧洲的惨败，正在寻找另一个“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他们怀着这样的期待，自然不难在孙文身上发现远东的克伦斯基。“波兰、高加索、中亚以及外蒙古这些地区，苏联派出军队以建立共和国或卫星国的手段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³⁶孙文现

在需要的，恰好就是这样的卫星国。他现在渴望从苏联手中得到外蒙或新疆庇护所，正如一战期间渴望从日本手中得到大连或青岛庇护所。唯一的区别在于：苏联自身就是国际主义革命团体的冬虫夏草，而日本的泛亚主义者还处在边缘地位。

苏联先发制人，日本举棋不定。“在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斗争的外表之下，包含了一个高远的战略目标……其中之一是认为英国、美国和日本在西太平洋濒临条纹狗和花斑猫式的冲突。”“它甚至可能已经计划利用中国的虚弱来诱使日本转移对苏联的入侵，将其推往大陆西部和南部。”³⁷苏联一面以孙文为筹码，胁迫北京政府承认列宁主义政权，在国际社会的封锁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一面以孙文为宿主，将隐藏的特工人员安插在代表团内，通过交涉实现渗透。北京政府刚刚同意苏联驻华大使馆开张，北京情报站第一任站长阿纳托利·伊里奇·黑克尔以驻华武官身份打入越飞代表团(1922)³⁸。代表团违背北京政府的意志，向国民党提供资助，换取了在宿主体内播种的特权。

孙文并非完全不了解苏联的危险性，也无意因为共产国际的希望就断绝其他的资助渠道。“首都革命”尘埃甫定，执政府的邀请抵达广州。他首先赶往日本，请求老朋友的援助，没有得到期望的回应，才废然北上³⁹。他这次演讲（1924年11月28日）⁴⁰的内容跟辛亥和洪宪前夜大同小异，说明日本领导的泛亚共同体仍然是他乐于接受的未来。问题在于，日本当时的政局没有给泛亚主义者提供机会。等到这样的机会来临时，国民党自身已经沦为泛亚主义最危险的叛逆者和最直接的障碍物。

孙文这次演讲中的理论和期望并不新颖，毋宁说重复了东亚舆论界在辛亥前夜和洪宪前后的老生常谈，然而对孙文和国民党而言，无异于行将溺毙者向岸上发出的最后一次呼救声。没有日本泛亚主义者的慷慨援助，辛亥革命本来是不会成功的。每一个成功的革命党人背后，都有一个功成不居的日本泛亚主义者。孙文离不开宫崎滔天，正如米老鼠离不开唐老鸭。他们来自东洋各地，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⁴¹。

国民党的历史学家探讨辛亥革命，最怕提到玄洋社和头山满。玄洋社不断参加东南各省的革命，日本政府不断取缔他们。俄罗斯占领关东以后，玄洋社改名为黑龙会。顾名思义，就是要将俄罗斯赶回黑龙江对岸。革命党人桴鼓相应，在东京筹备距俄义勇军。大清和日本两国政府虽然自己就在合谋反对俄罗斯，但无意给内部的敌人提供机会，联手禁止他们活动。结果革命党人把反俄改成反清，用长城取代了黑龙江。兴

中会和华兴会的联合，依靠内田良平的牵线搭桥。孙文和黄兴都是黑龙会的老朋友，但彼此结识不过半个月时间。这次联合产生了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当中的日本人比广州革命政府当中的苏联人还要多，其中包括内田良平、宫崎滔天、平山周、末永节、宣野长知、和田三郎、清藤幸七郎、梅屋庄吉、北一辉。

辛亥军兴，日本政府照例追随英国。列强一致宣布中立，等待尘埃落定。只有黑龙会秉承国际主义精神，为“穷鸟入怀”的孙文保驾护航。犬养毅和头山满抢先赶往革命现场，为远在美国的孙文铺平道路。内田良平和宫崎滔天留在香港迎接孙文，护送他前往上海。革命最关键的窗口期，只有日本保护人为孙文和宋教仁提供资助。⁴²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命内田为外交顾问，阪谷芳郎和原口要为财政顾问，寺尾亨和副岛义一为法制顾问，犬养毅为政治顾问。南北和谈如果决裂，革命党人肯定会步武昌监国和郑成功。

3. 从泛亚主义者到列宁主义者

民国最初十几年，孙文一直依附泛亚主义者，但他这时已经寄余命于寸阴，不能继续等待老友夺取日本的政权。国民党老一代虽然日益衰微，仍然渴望保全总理的晚节。孙文这次北上的意义本来在于执行苏联的新任务，途中绕道日本只能视为首鼠两端的表现。节外生枝是李烈钧的杰作，由胡汉民和许崇智在广州策应支持，代表国民党元老派-亲日派的最后挣扎，遭到苏联顾问加伦和他的朋友极力反对⁴³。国民党元老派很清楚，如果仍然得不到旧主的资助，就无法阻止领袖投靠新主。新路线必然导致少壮派-亲苏派崛起，将东京流亡者-革命者世代打入冷宫。无奈人谋不如地缘，地缘不如天时。大正民主抛弃了泛亚主义者的浪漫情怀，自然也就抛弃了亚洲大陆的小兄弟。

孙文遭到这样的冷遇，更加确信苏联意味着自己短暂余生的最后一次机会，随即就在北京做出了李烈钧、胡汉民和张继最害怕的事情，完全将自己交给苏联人的朋友汪兆铭和蒋介石。失意的日本侠客活动家一面咒骂市侩（目光短浅的政党内阁）误国，一面咒骂支那小兄弟忘恩负义。他们十年以后卷土重来，没有忘记此时此刻。黑龙会的朋友最终打倒了没有情怀的现实主义者，解放了“克欧超白”“中日提携”的旗帜，看到孙文的衣钵已经落入俄国人的朋友手中，于是开启了一场无法形容的混战。汪兆铭引用他自己编撰的国父全集，指责蒋介石背叛泛亚主义和亚

洲人。蒋介石引用梁启超为大清发明的中华民族理论，指责汪兆铭背叛新三民主义和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发明者梁启超和中华民国的发明者章太炎则已经怀着对国民党和汪蒋二人的刻骨仇恨，走完了生命最后的历程。

1918-1928的十年构成远东秩序瓦解前最后的小阳春，广州的机会主义者和东京的绥靖主义者齐心协力锯断了自己坐在上面的树枝。日本人作为东亚秩序的主导者，为绥靖主义支付了最大的代价。币原式“霸权无害”的本质就是绥靖，源于既不愿放弃霸权、又不愿支付霸权成本的暧昧心理，最终不得不在更差时机、以更高成本弥补“失去的十年”。共产主义、大亚洲主义和大中华主义的觊觎路线相互交叉，只有行将消失的条约体系残余才能稍稍延缓它们的生死斗争。

三、“远东共和国”与远东革命布局

本节引言：

共产国际在征服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过程中，发现了统一战线的妙用，让资产阶级政治家和议会政体充当傀儡，由列宁党在幕后掌握实权，既能欺骗和分化潜在的敌人，又能大大减少革命的阻力。远东共和国是统一战线模式的初期实践，成功地获得了苏维埃俄罗斯自身无法获得的成果，诱使日本撤出西伯利亚，为共产国际争取到进入中华民国境内活动的合法身份。共产国际获得了立足点，随即展开培植支部和代理人的工作。

1. 远东革命的指挥权

列宁在世之日，革命/间谍机构（二者没有明显区别）分为三个系统。其一是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契卡，后来演化成克格勃。克伦斯基为了表现临时政府对民主原则的忠诚，不仅裁撤了情报机构，连治安警察都解散了，大大减轻了列宁推翻他的困难，提供了教条主义的反面教材。捷尔任斯基则恩威并施，强迫沙皇的特务首脑瓦西里耶夫及其干部加入契卡，迅速提高了契卡的专业水准。菲利克斯同志自豪地说：“收买的金额是相当高的，把一个人推下台阶那一瞬间的满足感是过去从没有过的。”⁴⁴其二是托洛茨基的“红军参谋总部第四局”，比契卡和克格勃更接近旧式情报机构，以对外间谍活动为主，不大卷入内部镇压。托洛茨基倒台后，该机构沦为重点清洗对象，几乎陷入瘫痪状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稍稍恢复元气。其三是季诺维也夫⁴⁵的共产国际，汇集了全世界的革命浪人，为他们提供资金、训练和各种白手套，将德国总参谋部对列宁的投机制度化。季诺维也夫垮台后，共产国际日益沦为克格勃的附属机构。最后，三大系统全都落入斯大林和贝利亚手中。

较之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的主要特点就是迟钝、谨慎和保守。他的导师和朋友正确地指出：他是一个缺乏远见和想象力的角色，但比其他人更愿意干脏活、累活。他是十月政变的非重要反对者，并不令人意外。他在列宁死后的岁月，负责组织和人事工作，在推动世界革命的大战略中，始终比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谨慎得多。他只有在从事内部清洗和镇压的时候，出于“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谨慎心理，才表现得貌似激进。十月政变本属赌博性质，成功主要依靠侥幸，结果却

变成了领袖的英明和必须效法的传统，效法的结果自然是败多胜少。于是越积极的负责人，造成的失败越多，嫡系班底的损失越大，反倒越有可能因为实力损害而沦为替罪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先后落到了这种下场，而他们鄙视的“庸人”斯大林却笑在了最后：演化优势往往不属于善于捕猎而成本过高的物种，反倒属于低成本低效绩的物种。

远东革命的指挥权从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手中，逐渐转入斯大林手中；革命路线相应地由充满阶级仇恨（或浪人反社会心理）的盲目破坏，演变为老奸巨猾的冬虫夏草策略（病毒感染宿主并取而代之）。这一过程用革命史的术语描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演化论的术语描绘，就是传染病和宿主在免疫微环境的共同演化。“统一战线”，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就是在没有手枪可用，又必须消灭敌人的情形下，就要制造一个拥抱敌人的机会，在拥抱中用双手扼死敌人。”⁴⁶

2. 作为白手套的远东共和国

“远东共和国”是统一战线策略的第一个实验场，宝贵的经验很快就应用到更大范围的远东区，甚至教会了跟共产主义毫无共同目标的其他势力，例如黎巴嫩的叙利亚代理人 and 也门的伊朗代理人⁴⁷。莫斯科的最初设想是：鉴于布尔什维克在东方各国和各地的硬实力不够充实，各种反动派、分裂派和列强干涉者的势力盘根错节，布尔什维克的核心组织不宜过早暴露自己，利用白手套性质的外围傀儡反而能够更好更快地完成革命任务。西伯利亚的社会党粉红势力曾经在高尔察克政权内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破坏作用，完成了红军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⁴⁸。如果临时的利用变成系统的操纵，莫斯科的收获一定还会更大。

远东共和国在形式上是一个独立国家，享有不低于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主权，政府由左翼各党派联合组成，甚至最出风头的成员都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不出风头的地下组织手中。他们是苏俄情报部门的派出机构，工作范围不限于理论上的国界，涵盖了包括当时中华民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远东共和国的格式化一旦完成，不久前风光体面的白手套就会前往古拉格报道。“远东各民族的独立国家”预示了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二十年后的命运，“自愿申请加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祖国”。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地下组织不会休息。新整合的资源和新获得的经验都要用在下一个目标身上，犹如微生物的繁殖。

从形式上讲，远东共和国的主持人是“苏维埃俄罗斯远东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拉斯诺晓科夫。1920年3月28日，他召开了“泛贝加尔湖制宪会议”。4月6日，制宪会议宣布远东共和国独立。制宪会议预演了延安的民主，半数议员由开明绅士和社会贤达组成。从实质上讲，远东共和国就是远东书记处的白手套。远东书记处的前身出自西伯利亚局，不久前统战西伯利亚孟什维克，从内部瓦解了高尔察克摄政制度。书记处现在故伎重演，操纵这些“政协委员”的表演。后者暂时逃脱了阶级兄弟的命运，也就不能说毫无收获了。远东共和国宣布，它的领土包括俄罗斯帝国的阿穆尔（黑龙江）省、滨海省、库页岛、外贝加尔省、堪察加省，以及哈尔滨和北满铁路（中东路）地区。这是苏联对远东条约体系的第一次攻击，直接侵犯了日本帝国、中华民国、张作霖政权、阿穆尔临时政府、阿塔曼（谢苗诺夫）政权和哈尔滨共和国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红军没有能力将日军逐出外贝加尔地区，只能以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的名义，欺骗这些死心眼的形式主义者。天皇的政府拒绝接受非法政府的外交代表，却同意跟远东共和国的统战政府谈判。日军撤退后，人民革命军不战而取赤塔⁴⁹。

3. 远东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外交

1920年6月28日，布尔什维克西伯利亚局成立了“东方民族部”。该部下设蒙古处、中国处、朝鲜处和日本处，由中央特派员冈察洛夫领导。1920年9月2日，东方民族部决定派维经斯基赴华⁵⁰。布尔什维克用抢劫所得的珠宝支付他的差旅费，余款用于建立上海的革命印刷厂。维经斯基除了变卖价值十万美元的钻石以外，还多次获得东方民族部的现金和汇款，其中一次为两千美元⁵¹。1921年1月15日，共产国际决定成立远东书记处。书记处又称东方局，下辖蒙藏、朝鲜、中国、日本四个支部。维利耶任中国支部联络人，接管了东方民族部的珠宝⁵²。1921年2月16日，远东书记处将东方民族部解散。1921年3月23日，书记处招募张太雷到中国支部。张支书享受科级待遇，月薪六千一百六十卢布，差旅费和制服不计入内⁵³。

1921年5月，远东共和国的模式推广到外蒙和唐努乌梁海。远东共和国军队占领了恰克图，又配合红军进攻库伦⁵⁴。中华民国外交部尽管很想远交近攻，利用赤色势力抑制盘踞关东的日本、白俄和张作霖，仍然不肯公开接受远东共和国5月30日发出的建交照会，只准优林⁵⁵代表团

以“商务洽谈”名义，假道库伦入京。事实证明，“商务谈判”纯属掩耳盗铃。优林-颜惠庆谈判由两条相向而行的轨迹组成：北京方面关心蒙古和中东路、旧俄遗留租界问题，以及布尔什维克抢劫华人商团财产的补偿问题。赤塔方面关心外交承认，以及在民国境内建立领事馆的问题⁵⁶。北京政府虽然衰弱，仍然是国际社会承认的正统政府，有资格出售其外交承认，购买其实力不能获致的利益。苏维埃政府明白自己声名狼藉，没有资格加入条约体系，只有借助资产阶级人士出头露面的远东共和国做白手套，从国际体系的最薄弱环节入手，先为自己的统战代理人争取一席之地。优林乐于假北京之手消灭盘踞旧俄租界的白俄势力，犹如毛泽东后来乐于借缅甸之手消灭李弥⁵⁷的孤军，但华人资本家的损失只能由布尔什维克士兵负责，他就只有慷慨发放空头支票了⁵⁸。无论交涉本身是否成功，使团获准入境就是列宁特洛伊木马战术的初步胜利。优林使团对中华民国的影响，大致相当于封闭列车对俄罗斯共和国的影响。优林本人跟他代表的远东共和国同样属于白手套，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未来的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手中。在远东的革命历程中，这种无间模式还将多次上演。

北京外交部并非不愿意出卖列强和条约体系，但不肯在外蒙古问题上让步。远东书记处索性撇开时机尚未成熟的名分问题，直接渗透社会组织，反而取得了更大的成绩。远东书记处负责人鲍里斯·舒米亚茨基领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预备工作⁵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⁶⁰的真正上级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人事和财政主管尼克尔斯基⁶¹来自远东共和国人民军参谋部情报部，未来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瞿秋白则是优林本人在第一次出使期间招募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⁶²远东共和国则相应地转向事实政权方面，跟黑龙江签署事务性协定。代表团本身的交涉成绩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公开的谈判为秘密的交易创造了机会。优林（或者不如说陈独秀的招募者维经斯基）⁶³和吴佩孚合作，迫使北京政府撕毁了1918年《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⁶⁴。

6月27日，吴佩孚致信红军之父托洛茨基。信中暗示，双方在张作霖问题上立场一致。维经斯基希望，“这将成为双方签署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⁶⁵他致信莫斯科：“在中国目前的内战中，学生站到了吴佩孚将军一边，也就是说，他们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想法。我们赞成这个策略。”⁶⁶1920年秋，维经斯基和孙文在上海会谈。这时的孙文已经无家可

归，冒不起放弃最后一根稻草的风险。落魄的革命家向胜利的革命家表示，希望能将“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⁶⁷鉴于中国南方已经不在他控制下，他暂时无需担心交易对自己不利。维经斯基敏锐地发现，孙文已经快要走投无路了。“在广州可以感觉到，对未来缺乏信心。”⁶⁸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认为优林代表团低估了国民党的重要性⁶⁹，但赤塔认为孙文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家⁷⁰。晚至1922年，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仍然坚持说：“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⁷¹1922年9月15日，越飞力劝孙文：联合吴佩孚，不要单独参加满洲问题的谈判⁷²。

远东共和国对日本的交涉主要集中于国际维和部队问题，苏俄称之为“帝国主义干涉”。十四国联军同床异梦，禁不住苏俄的挑拨和分化。庙街事件⁷³后，中华民国的驻军公开倒向苏俄。协约国很快丧失了兴趣，在1920年初单方面撤出了军队。1920年底，只剩下“优等生”迂腐而执着地坚持欧洲导师已经放弃的原则。日军轻易地解除了七千红军的武装，占领了桦太岛（库页岛）北部。

日本帝国政府坚定地拒绝承认无产阶级政权，因此交涉只能在外务省和名义上的资产阶级远东共和国之间展开（日本—远东共和国谈判记录《关于与远东共和国的军事协定》见附录2）。1922年10月，日军履行了撤离远东共和国的承诺。列宁一旦骗到了日本的撤军，就不再需要白手套，仅仅继续伪装了一个月（1922年11月），就直接吞并了远东共和国，将资产阶级部长和流亡者送到他们该去的地方。

4. 共产国际对中国支部的拨款

远东书记处在远东共和国的掩护下，完成了中国支部的草创工作⁷⁴。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立东方部⁷⁵。1923年1月，东方部成立远东局⁷⁶。列宁解散远东书记处和远东共和国以后，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外交科和西伯利亚局接管了他们的许多职能。在此之前，远东局以白俄侨民和东正教会为主要渗透目标。他们的成绩包括：天津大学教授、李大钊的招募者包

立威，北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出版的法语社会主义报纸《Journal de Pekin》编辑伊文，俄罗斯通讯社北京分社主任、符拉迪沃斯托克报纸《遥远的边陲》编辑霍多洛夫，汉口的俄国汉学家伊万诺夫⁷⁷。西伯利亚委员会通过全俄中央合作总社支付他们的活动经费：北京交给伊万诺夫，天津交给包立威，上海交给考夫曼⁷⁸。维经斯基在远东局期间，该机构每年拨给中国潜伏小组的经费是六万美元，计划外支付（包括地下交通线开销）两万美元，俄罗斯远东后勤支出两万美元。土著代理人每年可以得到九千六百美元差旅费和着装费，照民国初年的生活水准等于发了一笔小财⁷⁹。

中国支部在其成立的初期，渗透范围还非常有限，经费在共产国际的拨款当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每年都在稳步增加，直到争夺上海的斗争白热化，才具备独当一面的资格。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十分明确，经费主要来自“国际协款”，自募党费仅千元（月均不足百元），不足百分之六⁸⁰。

1923年4月30日，陈独秀打收条认领共产国际寄交中共的四、五月份经费1000墨西哥元。5月19日，再认领2940港币（折合3000国币）。7月10日，莫斯科汇款1840墨西哥元，专用于抚恤二七大罢工罹难者⁸¹。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中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⁸²

中共三大一结束，马林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党现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一、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二、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三、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四、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几乎没有联系。党是个早产儿.....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党早产并过多地依靠外国的资金维持。”⁸³

1924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约3000元；1925年预算月领2250元，四月起增至3650元；1927年月均收到30000元以上；1928-1932年，每月预算50000元左右。1927年以后，每年仅用于“特别费”一项，中共就得到几十万元上下。如1927年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俄款约30000

元，开办党校得50000元，七至八月为解决湖南农运得款50000元，九月准备秋收起义得款10000元，十二月为广州起义及善后得援款近100000元。1928年底，毛泽东搞秋收起义，章士钊也为他筹了20000元。这即毛泽东厚待章的出处之一⁸⁴。

1926年5月20日，联共（布）政治局决议：“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⁸⁵1926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达每月六千元。1927年再增军费预算每月一万二千元。1927年7月5日，共产国际为复兴湖南农运拨款三万九千五百元⁸⁶。

四、短兵相接的时代

本节引言：

吴佩孚坚持苏联撤出蒙古，导致双方的交易破裂。张作霖的满洲政权坚持反共，挫败了莫斯科代理人李大钊策划的颠覆活动，变成了苏联政治上和地缘上的一大威胁。共产国际通过蒙古，大力援助冯玉祥，对张作霖施加压力。孙文为了满足新的保护者，愿意不择手段，利用共产国际的人员、资金和组织，改组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他去世时，将国民党托付给苏联。

1. 加拉罕扶植冯玉祥

1922年，优林的继承者越飞发现吴佩孚越来越难以安抚或欺骗。大帅扬言要准备一支精锐部队，在1923年收复外蒙古⁸⁷，甚至专门邀请越飞的代表格克尔，参观这支部队的军事演习⁸⁸。至于中东铁路，他希望苏联无条件归还给中国⁸⁹。当年年底，越飞终于感到无法忍受。“在蒙古问题的整个喧闹中，最重要的是，吴佩孚也在俄国所有敌人的大合唱中提高了自己的嗓门，并发出一份令人极难理解的通电，其内在涵义只能解释为，吴佩孚试图证明，他在蒙古问题上决不讨好俄国”⁹⁰。12月12日，越飞向莫斯科建议：国民党才是中国最重要的力量，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最佳切入点。以前在北京举行的各项谈判都欠妥当，吴佩孚、张作霖的友谊没有那么重要⁹¹。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了越飞“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会议通过决策：“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⁹²。孙文则对自己的部下说：“借力于俄国蒙古，这是我最近的出路，因为现在俄国人看到我的苦斗，已表示许多的意见，不像日本人的小气，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反正我们革命党，于现今世界，要求一条出路，非要国际间的援助不可。”⁹³日本抛弃的代理人从此投入苏联的怀抱，开启了短兵相接的新时代。

国民党对日本的背叛不仅是孙文个人的机会主义行动，更多地反映了远东条约体系-民国宪法秩序的溃败。1923年宪法满足了好战的粤人，使他们不再需要扶植国民党，抵抗北京的帝国主义者。1923年日俄谈判（谈判记录《关于日苏两国间非正式预备交涉的交换文书》见附录3）彻底牺牲了合法性原则，打开了苏联出入亚洲大陆的门户，将张作霖的

满洲置于绝地。原敬-高桥内阁在并非迫不得已的环境下，无情地践踏了泛亚主义者的梦想⁹⁴，导致了日本宪法认同和路径共识的巨大撕裂。大正民主昙花一现，草蛇灰线伏脉于此。

英国和日本放弃的，就是苏联赢得的。192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拉狄克就已将冯玉祥和孙文列为当前工作的主要目标⁹⁵。第二次直奉战争开战时，共产国际代表加拉罕和冯玉祥开始建立工作关系⁹⁶。在此期间，李大钊扮演了主要掮客的角色。他在段祺瑞-章士钊时代积累了大量的体制内人脉，绝不甘心随着保护人一起退出政坛，急欲在有生之年将这些资源变现。1924年，库伦-张家口运输线开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再三讨论将援助增加到两千多万卢布的计划，最终于1925年10月决定只给此数的四分之一⁹⁷。国民军政权既是保护红色蒙古的外围缓冲国，又是进击白色满洲的前线桥头堡。“盖奉张之胜利即守旧派之胜利，亦即帝国主义（尤以日本为最）之胜利，深足为苏联之危害。既不将奉张破坏，亦宜削弱之。此时奉张之重要敌人即系冯玉祥。”⁹⁸

1922年9月15日，越飞写道：“俄罗斯不能听任北满像昔日蒙古一样，建成白卫分子新的进攻基地。”⁹⁹加拉罕随即策划通过张学良-郭松龄团体，建立第二个冯玉祥团体或“东北国民军”，在奉军保守派的狙击下功败垂成。加拉罕和冯玉祥留在北京的代理人李大钊由此败露，触发了张作霖在满洲的麦卡锡主义运动¹⁰⁰。冯玉祥在内蒙的贫瘠基地不足以对抗富饶的满洲，不容苏联的输液管有片刻中断。1926年初，冯玉祥得到了55857支步枪、5800000发子弹、48门大炮、18门迫击炮、12门山炮、10000多枚手榴弹、230挺机关枪¹⁰¹。1926年8月15日，冯玉祥在莫斯科留下的借据包括：10架飞机、60门大炮、58000发炮弹、227挺机关枪、31500支步枪、5100000发子弹、5000把军刀¹⁰²。冯玉祥以此为资本，才得以入侵秦、豫。北伐期间，斯大林承诺为冯玉祥“提供五万人的军事装备，但后来他又决定全力以赴，提供了比这个数量多八倍的装备。”¹⁰³

2. 鲍罗廷经营国民党

加拉罕和李大钊经营国民军的同时，越飞和鲍罗廷也在经营国民党。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表示：国民党支持苏联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立场¹⁰⁴，反对曹锟政府二十五天前呼吁举国一致保卫蒙古边界的“公电”¹⁰⁵。“中国国民党的宣言和政纲，都经过孙中

山、鲍罗廷及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会商作最后的决定。”¹⁰⁶2月6日，托洛茨基致信加米涅夫：“最好在地图上标出正在争斗的中国将军们的位置和实力，并考虑一下我们能向孙逸仙提供什么样的帮助。”3月8日，俄共（布）政治局批准了给孙文提供二百万墨西哥银元和军事顾问团的决议¹⁰⁷。10月25日，鲍罗廷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顾问。他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内，以俄共（布尔什维克）1922年的两份党章为蓝本¹⁰⁸，为新国民党制定了《组织法》、《党纲》和《党章》¹⁰⁹。1924年2月9日，加拉罕致信契巧林：“国民党如此驯服地接受了我们和共产国际的指示。”¹¹⁰

1925年3月11日，临终的孙文将国民党托付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见证人：宋子文、汪精卫、何香凝、孙科、戴恩赛、邹鲁、孔庸之”¹¹¹

孙文同意容共，但也要求苏联约束共产党。国民党提出这种一厢情愿的

要求，不是最后一次。他们不愿意承认，越飞或任何人的承诺对共产国际都没有约束力；尤其不愿意承认，自己只是远东革命布局当中的一枚小棋子，其实在共产国际的眼中，他们并不比爪哇重要¹¹²。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1923年11月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规定：“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1926年2月10日，维经斯基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¹¹³除了孙文的继承人，谁都没有对此假装惊讶。

国民党的地方性网络为共产国际提供了阑入亟需的稀缺端口，但国民党的全球性网络在苏联面前一开始就处在极为被动的地位。他们对苏联的了解，大多出于猜测和希望，自己在苏联的眼中，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苏联情报工作的细致严密，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能赶上。广州国民政府对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掌握，都没有莫斯科准确及时。1926年2月10日，苏联驻伦敦特工报告：“关于驻伦敦国民党右派人员向斯诺乌节恩氏请求，及英国工党允许维持国民党右派，反抗共产党在中国之势力一事，鄙处及米哈洛夫处与外交密探员处均无所闻。唯一注意此地国民党右派人员之行径，则知此事容或有之，盖国民党右派为便于反抗广东计，与何方联络均可，或与奉张联络，或与日本人联络，或与英国人联络，或与美国联络，全为有所获得，皆可以危害广东政府与红党也。”¹¹⁴这时，英国的大罢工刚刚结束。工党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斗争中，制定了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清党名单。西方各国社会党在一战后的清党运动，至此告一段落。不久，同样的斗争就要在东亚展开。

3. 共产国际在广州、华北、满蒙的网络

共产国际在斗争中日益成熟，驻外机构日益正规化。《1925-1926半年度在华军政预算》的支付名单包括密探薪水、差旅费、交际费、邮电费、汽车费、医疗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组开支，国民党政工人员和党部学校经费，冯玉祥国民军和内蒙部落津贴。各项经费都以美元支付，不再允许工作人员自行销赃补给¹¹⁵。大多数苏联密探的月薪在一百美元到三百美元之间，相当于数额两到三倍的大洋¹¹⁶。土著密探的待遇通常不到白人同僚的四分之一，但仍然足以傲视普通公务员，吸引了许多大学生或“新青年”¹¹⁷。当时北京的中产阶级只要每月有八块大

洋，就可以生活得非常体面了。教授和高级公务员可以得到超过一百美元的月薪，但各项杂费都不能报销。与此同时，苏联人如果不是党员干部，就要住在不足二十平米的公寓内，在五家合用的厨房内吃配给黑面包，生活质量远不及老北京的中产阶级。斯大林麾下的“土鳖”新干部只能满足于国内的等级特供，不可能不怨恨老国际主义者在资本主义世界享受的硬通货生活。后者一旦失败，就会明白嫉妒的力量。

华北不同于广州，没有国民党既存的网络可以接入。共产国际不得不替国民党建立党部，然后依托党部建立更加外围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共产国际搜集列强和军绅政权的情报，规模和效益都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情报组织¹¹⁸。李大钊主持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要班底都是共产党人。“所有工作皆守常（李大钊）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守常。”¹¹⁹1924年12月19日，维经斯基在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中提及：“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北方和满洲开展工作，两周前我们成立了党中央北方局，有7名负责同志参加该局工作，其中有张国焘、谭平山和瞿秋白同志。局址设在北京，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归来的同志几乎都担任负责工作，工作完成得很不错”¹²⁰。著名的《北方局致林森函》（中文极要第七十八卷）写到：“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在怀疑中。现在，我们解释如下。白芳渠并不是有这样一个，是北方区的代名词。自然，北方区是CY（共青团）的组织。葆亭，就是保定。支校，就是CY的特支。”¹²¹北伐前夜，国民党北京、上海执行部和热河、直隶、山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党部筹备处都已落入共产党人手中¹²²。“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中国共产党）。”¹²³国民党内的三分天下，共产党人已据其二。“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¹²⁴

满洲和蒙古更不同于华北，苏联的outlaw（法外）身份给共产国际的渗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日本发现自己如果谨守条约维护者的本分，就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坐以待毙的窘境。1926年，日本驻奉天领事开始敦促霞关重新考虑东北亚政策：

“苏联方面遂拟利用冯玉祥.....合组行驶于张家口与库伦间之汽车公司，并在蒙古经营专卖鸦片及出口货等事业。故苏联钱币在张家口、绥远、甘肃均可自由流通.....难保将来不无发现第二第三郭松龄。昔巴尔干半岛为欧战之导火线，而东方不靖之原因，或将为苏联所导也。我帝国之将来命运，目前唯有保存实力以待天命耳.....虽自郭松龄变乱后，日本得保证在满蒙特权之预约。然外务省与陆军省对此之意见分歧，难

免人民不无怀疑。愚意两省成为两党，不特与政治之规定有所抵触，于国家之前途，实呈悲观之象。故对满蒙政策应依确定轨道，改变政治方针。唯现在吾等究应实行何种政策。此则非余所敢独言也。现是所可虑者，即苏联在外蒙所施之政策及其势力。吾等殊无法以反对之故，吾国对华之根本政策，急应从速改变，并设法预防将来可能发生之战事，以保存本国之地位。”¹²⁵

#第二章 完#

附录¹²⁶

附录1：关于山东善后交涉问题的政府方针（山東善後交渉問題に關する政府方針）

[文书名]关于山东善后交涉问题的政府方针

[場所]

[年月日] 1921年10月18日

[出典]日本外交年表以及主要文书上卷 外务省 530-532页

[備考]

[全文]

大正十年十月十八日内阁会议决定

备忘录

帝国政府接受了本月5号中国政府关于山东善后交涉问题的备忘录，进行了慎重考虑。

帝国政府多年来希望不吝各种努力试图尽快解决山东问题，在去年一月针对德国的和平条约生效后，帝国政府立刻催促中国政府尽快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会谈。然而，中国在几个月后才给予回答，仅以不签署针对德国的和平条约的行为以及舆论反对作为理由，认为不便与帝国政府直接进行会谈。于是，帝国政府更尽到了应有本分，督促中国政府反省，同时表态只要将来中国政府同意会谈，不论何时都会与其进行关于该问题的会谈。此后一年多，帝国政府十分期望中国政府以及国民能够抱有冷静公正的自觉，帝国政府隐忍自重，等待时机的到来。

在此期间，帝国政府希望中国当局改变态度，在各种时机与帝国政府展开针对该事件的商谈。尤其是今年五月小幡公使归国前，颜外交总长对小幡公使表示，十分希望能给出一个公正妥当，并且能够得到世界各国广泛认可的具体方案。之后中国政府要员私下里对帝国政府给出中国方面的解决方案，并以非正式的方式表示，之后有意与帝国政府进行商谈的意愿。于是，帝国政府希望这一事件得到迅速而圆满的解决，考虑了中国方面的这一解决方案，确定了一些公正宽容的协商条件，在之前的九月七日传达给了中国政府，希望能得到中国政府的切实考虑。然而，在这次的备忘录中，中国政府辜负了帝国政府的期待，没能表现出根据

帝国政府给出的这些协商条件来解决本问题的诚意，显示出其并无意愿在此时和帝国政府进行商议。帝国政府不得不对此感到极为意外，同时，这一备忘录前面部分认为日本方面很多关于本问题的宣言是空洞无物的——这种说法不顾国际礼仪，令帝国政府感到非常遗憾，也不得不令帝国政府为中国及其国民而深深惋惜

另外，对于帝国政府解决方案的各项条款，中国政府给出了评价，这些评价完全没有领会帝国政府的用意。然而，若加以细读，可以发现许多帝国政府不得不督促中国方面进行反省之处。如胶州湾租借权随中国的对德宣战而自然消灭，因而自然应该无条件返还——这样的说法不仅有违国际法理论惯例，也违背了日中两国之间的条约关系；同时也是在破坏凡尔赛条约。今年五月二十日驻华德国代表交付给外交总长的声明中指出，德国依据凡尔赛条约而已经丧失了依据德中条约而享有的关于山东的一切权利利益，因而无法将权利返还给中国。中国政府更是对此表示了认可，所以中国政府自然也是认可了凡尔赛条约的结果。

然而，中国方面所谓的对德宣战指的是，在关于胶州湾以及其他事宜条约签订后、日德之间发生了权利转移之后两年有余时，应国联的劝告享受了众多的实惠，才在1917年8月才决定的。当时中国仅仅是将德奥两国人进行处分并派遣劳工前往法国。中国仅以这种程度的“宣战”作为租借权自然消灭的理由，蔑视既成条约以及过往实绩，实在令帝国政府不得不认为，这对于山东问题的善后交涉而言，严重违背了根本性的正义。另外，中国方面关于山东铁道的主张是完全收回山东铁道全线管理权，暂时将铁道售价的一半作为“未收回”状态。帝国政府认为，无论以何种形式，日本没有单独经营该铁道的意向，同时考虑到中国铁道的普遍情况，把现有经营委托给中国方面的做法无法令人赞同。真正重要的是不仅名义上也是实质上做到日中协力，把铁道经营的业绩做好。原来山东铁道在德国时期完全由德国单独进行经营，日本牺牲了无数的人命和巨额的财力，从德国手中获取了这项权利。然而尽管如此，帝国政府依然采取了最公平的条件，以日中合办的方式经营该铁道。另外，前述的日中合办经营是在中国对德宣战以后的1918年9月通过的日中两国间协议规定的。现在却声称“主权侵害”，以此作为理由，实在令帝国政府难以谅解。另外山东铁道和矿山在赔偿委员会的程序中决定了价格，抵消了德国的赔偿额度，因而被记载在了德国的贷方之下。中国方面要求无条件收回一半金额，该等主张可以说毫无正当性。另外，关于德国政府的所有财产，帝国政府的主张是，所谓的行政性官有财产原则上让渡给中国，其他部分并非全给日本，而是不光考虑两国，同时考虑其他外

国人的利益，来讨论出一个公平的处理方案。相反，中国的反主张是全盘没收——这种情况不得不令帝国政府感到无法认可。关于其他帝国政府的提案，中国方面认为全都不符合中国和外国签订的条约的规定的原则——这种主张究竟意义何在，帝国政府很难理解。然而，帝国政府依然希望中国政府静思熟虑，真切理解帝国政府的提案，更为日中两国国交而确实反省，再次展示出开始交涉的意向。帝国政府也将会对此进行回应，毫不犹豫地与中国开始商议，特此声明。

附录2：《关于与远东共和国的军事协定》（《極東共和國との軍事協定案に關する件》）

[文書名]关于与远东共和国的军事协定

[場所]

[年月日]1921年10月25日

[出典]日本外交年表以及主要文书上卷，外务省，532-533页

[備考]

[全文]

大正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内阁会议決定

目前在大连正在进行与远东共和国的通商以及其他事宜的条约的交涉，在这一条约签订时，目前预见到一些有必要实现的军事事项细节规定，希望能在协约中落实。

一、浦潮附近现存的各个海陆正面要塞由远东共和国政府将其废弃，之后不得进行任何维修和建设。

二、远东共和国政府将来不得采取在其领域沿岸以及朝鲜国境附近建设军港要塞等等威胁到日本国安全的军事举措。

（备考）对方如果对此有异议，则可删除“等等威胁到日本国安全的军事举措”。

三、远东共和国政府在绥芬河口、俄中国界二号界标一线以南领域内，除了一定量的民警之外不得让任何武装团体驻扎。

然而，在为扫荡不法团体等必要目的时，可以事先和日本方面进行协议，在有限期间内命令特定武装团体进行行动。

四、安装于科曼多尔群岛的无线电信所的设施在一定时期内由日本陆海军继续照常使用，允许俄国在现在协定的范围内进行使用。

五、远东共和国政府允许日本军事委员在浦潮、齐多、尼市、哈府及武市等重要城市停留，并在这些地方持续不断地保护其生命、身体、财产

不受侵犯，并保障其通信、旅游的自由。

六、日本军在远东共和国领域内的铁道上设置的一切作业设备以及架设的电线，依现状无偿交付给远东共和国政府。

远东共和国为完成前述各项作业，不向俄国方面要求其提供材料或经费。

七、保管的财物依现状交付给远东共和国政府

然而，财物中如有因其不当使用而存在对国内外人员造成危害或扰乱治安的危险，这些财物将由日本军队进行适当处理。

（备考）关于结束撤军的时期，如果对方要求则可以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告知

另外，为圆满完成本次撤军事宜，希望能将下列训令传达给浦潮派遣军司令官。

一、如关于通商等事宜的协约得以签订，则浦潮派遣军应当无需等待军事事项的协议达成，就立刻将其驻屯区域向尼市以南方向缩小。

二、应极力促进远东共和国和“马库洛夫”政权之间的妥协，然而如妥协得以达成，而有妨碍日本军行动或是保管财物交付行为的人出现，则应将其清除。

（参考）由于尚需预防日本军撤军时发生意外事件，打算在两国军事委员之间达成如下协议：

一、远东共和国军队将随日本军队的撤退而逐渐向旧日本军驻地领域前进。

二、游击队匪徒等势力的行动如对日本军队撤退造成影响，日本军队将改变撤退行动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处置。

附录3： 1923年日俄谈判记录《关于日苏两国间非正式预备交涉的交换文书》（《日ソ非公式豫備交渉ニ關スル交換文書》）

[文書名]关于日苏两国间非正式预备交涉的交换文书（关于日苏两国间非正式预备交涉的“川上——约夫”交换文书、关于交换文书日苏两国间非正式预备交涉的交换文书）

[場所]

[年月日]1923年7月26日

[出典]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外务省，36 - 57页.

[备考]原文为纵向书写

[全文]

目次

- 一、俄国代表约夫寄往帝国代表川上公使的书函
- 二、约夫来函附属日俄非正式预备交涉议事要录
- 三、帝国代表川上公使致俄国代表约夫的书函
- 四、川上公使书函附属日俄非正式预备交涉议事要录

一、俄国代表约夫寄往帝国代表川上公使的书函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约夫
俄日非正式交涉日本方面代表
川上俊彦 阁下
以书函向您问候

双方提议的审议点，按照交涉的提议者所设想的那样，也即是凭着各自的名义，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了各自政府的预期的那样，全部审议完毕了。我根据约定，在此将俄日正式代表之间进行的俄日非正式交涉的结果的概况告知给您。

关于这件事，俄国代表将完全按照前述情况进行执行，对日本代表方面没有什么要问的预备问题了，另外日本代表也已经在日俄交涉的非正式时期没有对俄国代表提出什么额外的问题。因此，远东各国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联”共和国特命全权代表今后将会继续认定前述的非正式交涉已经不再可能；并且将把六月二十八日乃至七月二十四日间举行

的非正式交涉中由正式代表所作出的决定作为基础；同时，作为两国关系的裂痕，位于长春的俄国领地“樺太”之处，除非日本方面主动做出有着立刻撤军的用意的声明，否则俄国不认为两国间将开始正式交涉。“樺太”至今依然被日本方面以不法手段进行控制（更何况，在非正式交涉中也已经能够弄明白的是，日本方面结束占领“樺太”——这一阻碍两大国之间建立真正的善邻友好关系的行为，解决“樺太”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另外，未解决的问题应当在下次会议的时候解决掉。如今，日本方面应当表现出相较于“在即将结束的非正式交涉中显示出的诚意”更大的诚意。双方已经将要开展四次有关善邻友好关系的正式条约的签订事宜，希望日方应以此“更大的诚意”来促使双方最终达成相互之间的约定。

恐怕阁下没能记得特别清楚。为了方便，我保证会把本书函中屡屡提到的非正式交涉中决定了的或是没能决定的决议全部总结起来。

现在，我向您保证，我对阁下致以完全的敬意，同时为了避免这一次俄日两国间的决裂而有着全力以赴的决心。 敬上

二、约夫来函附属日俄非正式预备交涉议事要录

由俄日正式代表举行的俄日非正式交涉的结果总结：

正式代表：

俄罗斯方面 远东各国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联共和国特命全权代表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约夫

日本方面 日本国皇帝陛下特命全权公使 川上俊彦

日本方面提议：

一、关于「樺太」问题

(1) 俄罗斯同意以相当的价格把俄国领地“樺太”卖给日本，日本认可一亿五千万元的对价。

* 1 *

(2) 或是俄国同意将北樺太的石油、石炭以及森林的长期资源开发权利提供给日本政府或日本公司

(2') 关于权利的本质和形式，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日本代表声明，对日本而言最佳选项是五十五年乃至九十九年的石油、石炭以及森林资源的开发权利；应该首先把权利交付给日本政府，之后交付给相关日本公司。

并且，日本代表多次主张俄国代表应当立刻和本国政府进行商谈。

二、关于尼港问题

(1) 俄罗斯对尼港的日本领事、领事馆成员以及居民的杀害表达遗憾。

(2) 俄罗斯承认负有对尼港事件中日本人所受到的损害进行赔偿的义务

* 2 * 日本方面把第二项开始的有关损害赔偿的第(2)项全部删除，只把第(1)项作为唯一的审议事宜，以此作为新的提议。(指向* 3 *的箭头)

* 4 * 本提案被日本代表拒绝 {指向* 5 *的箭头}

* 6 * 日本代表对此表示同意

三、俄国同意将远东领土内的森林以及矿产开发的权利提供给日本人。

四、关于国际义务问题

(1) 俄国承认旧条约

(2) 俄国承认对日本的债务

(3) 俄国同意将没收的私有财产返还给原所有者或是赔偿其损失

五、除了以上各条，双方在通商条约签订之时互相约定，保护对方人民的生命安全，尊重对方的私有财产权，在十分广泛的的范围内保障工商业的自由。

六、禁止对一方当事国的安宁秩序造成威胁的有害宣传和侵略行为

关于一的第(2')项的附录(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日本方面提议

关于一的第(2')项产生了一些误解。日本代表发现，俄国代表不认为“石油、石炭和森林资源开发的五十五年乃至九十九年的长期权利首先应当提供给日本政府，其次才开始提供给日本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可能的。

俄罗斯方面的回复

一、关于「樺太」问题

(1) 俄罗斯代表认为，将俄国领地“樺太”卖给日本是可以答应的，但是日本方面给出的方案的内容是应该修改的。
俄罗斯代表认为，考虑到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战略方面，不能接受15亿金卢布以下的卖价。

* 1 *

(2) 俄国代表声明，在本提议中，从根本上来讲，应该承诺的东西不应以赔偿作为形式。

(2') 俄国代表对此给出的回答是：本来就已经指出过，前述权利的形式是最不符合俄罗斯的期望，而且是最不可能答应的，然而俄国代表依然承诺会去咨询这个问题；并且履行了这个承诺。答复至今还未到。

二、关于尼港问题

（1）关于本问题的讨论很多，所以最初对各项分别进行审议，之后再总括地进行审议

俄罗斯方面指出了所有其观点不同于日本方面的见解的证据文件，其结果（指向* 2 *的箭头）

* 3 * 对此俄国代表表示同意；同时认为，俄国早就理解了关于本问题的煽动性意义。俄国政府指出，为了和日本之间尽快达成和平的关系，很愿意背负别人犯下的罪过。俄国方面同时补充说明道，本问题变成“威信”的问题，所以和第一项问题有关，在草案中有表述。

俄罗斯方面提出了许多方案，但都被日本方面拒绝了。俄国方面做出了许多的让步。俄罗斯方面给出了这样一个方案，应该能使日本方面给出答复。

（注意〔前两字有着“○○”的强调标记〕 俄罗斯以及日本方面应该答应的让步内容旁标有红线）

第X条

俄罗斯对于1920年3月12日至同年5月27日之间在阿穆尔河畔的尼港市发生的残忍而罪恶的事件，“向日本国”表达最深沉的遗憾。

当时不止是351名日本军人，包括领事在内的和平的日本居民384名男女老少被凶手“特里雅皮钦率领的部队”无差别地杀害。之后，除了大约八千俄国居民的受害，尼港全市也因特里雅皮钦而变成了一片焦土。特里雅皮钦及其部下被俄国正当的法院宣告了最高刑，也即是死刑。前述（1920年7月9日的）判决是立刻执行了的。

犯下了前述罪行之后，特里雅皮钦及其部队逃亡了日本军队没有驻军的地方。然而俄国正当的法院并不对此表示任何容忍。他们被宣判了最高刑也即死刑，前述（1920年7月9日的）判决被立刻执行了（前面的102个字划有横线）。

历史上，俄罗斯对前述该国进行的敌对性的封锁和干涉屡屡发生（前述

20字原文划有横线)。前述事实表明,俄罗斯对本国的犯罪者(“犯罪者”旁划有横线)进行了充分而严格的处罚。然而,与此同时,俄罗斯想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深切渴望真正的和平的同时,不管因何种厄运的处境,俄罗斯都不得不以武力(“以武力”旁划有横线)保卫本国以及革命的成果。

俄罗斯相信并且所渴望的,不光是为了依据本条(尼港事件相关的)条约来完全解决日俄关系中最重大最困难的这一问题,而且是为了弥补本事件已经造成的对两大国之间自然而然的亲近关系的损害,同时,前述的“亲近”化早晚会给两国带来友好善邻关系并且给两国国民中的数千余人带来渴望已久的亲善关系。(指向* 4 *的箭头)

* 5 * 俄国代表在此提议,本项问题应与第一(1)项作同样处理,也即把本问题以“未决”的方式进行保留,开始进行下一个问题的审议。(指向* 6 *的箭头)

三、俄国代表对此表示,俄国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不会对日本给予(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的)差别待遇。所以这种“日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四、关于国际义务的问题

(1) 根据俄国代表的申辩,旧条约不能作为国际信义的表现或是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

究其原因,旧条约不符合不断发展的局势,所以双方为了利益而作出改变的时代总是会到来的。所有的战争都会改变旧条约——单单是由这一点出发,也可以说这些旧条约已经不再能表现国际信义了。根据这些理由(俄国代表当然对这一点给出了更详尽的论述),俄国拒绝同意这一项。

(2) 劳农政府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承认过去的政府缔结的任何债务条约。究其原因,俄国的各民族在这大约十年之间一直反对这样一个缔结债务条约并对俄国国民抱有敌意的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特别是在道德上而言,俄国认为自己有充分的权利拒绝支付任何战时债务。究其原因,这些债务对俄国国民而言不能带来任何利益,而且完全是为了战争的供给,那么由于这场战争而立刻归于消灭,所以,可以说这是为了

俄国及同盟诸国的合营企业——战争——而使用的东西。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一家合营企业，显然，正如一般而言的优秀的企业中的那样，为了各合伙人的利益而事先计算好分配的比例。然而，同盟国以及联合国中，只有俄国什么都没得到。企业最主要的合约人对其共同经营者不支付一定比例的收益的时候，自然不能对前述共同经营者要求支付一定比例的损失——这点道理是谁都知道的。更进一步地说，俄国在前述时期之前忠实地支付了债务。究其原因，俄国在战争的最初四年间，为了进行战争而付出了比同盟诸国多得多的费用。前面这一点，可以从战前俄国的本位货币储备和现在日本的本位货币储备相等这一点来进行论证，十分明了。（1914年俄国的本位货币储备在20亿以上，日本为大约10亿，）现在日本的本位货币储备在20亿以上，而俄国的本位货币储备几乎为零。最后，在俄国广为人知的一点是，俄国因已经无法持续进行战争而脱离战争。这种不可抗力是任何国际法都认可的原则。综上所述，俄国没有任何理由去承担旧债务；更何况对日本所负的债务是克伦斯基时代的产物。此人利用这笔借款的时间，是此人得到了联合国方面所有的支持并掌权之后的八个月。他到底给劳农政府留下了多少——这是十分明了的。

（3）本项对日本而言不成任何问题。究其原因，在远东的主要部分中，没有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所以，在个别场合才会有这样的革命措施。然而，本项对俄国而言有着重要的“主义”上的意义。俄国不管在怎样的场合在怎样的时候都不会对本项作出让步。究其原因，这是苏维埃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在俄国革命中取得胜利的国民们是绝不会赞同“复归”的。究其原因，“复归”总是复古的开始。在“热那亚”上找不出妥协的方案。唯一的妥协方案也就是这一点了。日本单单是根据“主义”上的看法，对俄国而言一直以来不光是“主义”上也是实际层面上有重大意义的本项问题作出要求，这真的是有利于日本的明智之举吗？俄国代表毫不怀疑地认为，原本本项问题就比其他任何问题更加危险，更加可能引起两国间的决裂。不管怎么说，俄国代表认为自己有义务对日本代表预先说明：本项对革命的俄罗斯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五、当然，多多少少修订一下草案，并且大致不违背俄国的国内法的话，以此为条件俄国代表大体上对本项不表示什么反对。

六、俄国代表认为，本项应被详细解释，并且附上说明——在此情况下可以接受。

俄国方面回答

* 7 * 俄国代表认为，并且再次声明自己的这样一个想法：在本交涉中，这些条件就算因权利的情况而出现程度上差异，这些权利也都是可以交付给日本的。

三、帝国代表川上公使致俄国代表约夫的书函

以书函表达问候

上月二十六日您的来函以及根据今年六月二十八日以后和您之间进行的会谈的结果由您制作出的议事要录被寄给了我，我在上月二十七日收到了。

在前述非正式预备交涉中，两国代表在前后十二回的会议中，毫无隔阂地交换了意见，审查讨论了各个问题，结果，双方的主张和希望大体上是很明了的了。然而，有不少地方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見。特别是关于尼港问题和与之相关联的各个案件的具体的解决办法以及国际义务问题的解决办法，虽然预料到了没法继续进行充分的意见的交换，但由于您的情况导致会谈不得不中止，这令我十分遗憾。

您信中所记载的关于北樺太撤兵的问题，日本政府在尼港问题和与之相关联的问题解决时会毫不犹豫地作出关于前面这一点的声明；然而，我军在被樺太的驻扎只是针对尼港事件的保护占领。正如至今为止日本屡次表明的那样，在关于前述各项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了解之前，这（译注：撤军）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做的。况且，占领北樺太的行为除了前述目的之外不曾有任何其他意思，所以日本并不是不法且不正当地侵犯他国的领土权，这一点是日本预先就屡次声明的，我相信您也应该记忆犹新。

在您制作的议事要录中，有些和我预先了解的不同的地方，这也可以说是表明了您的立场。对于我方的主张的记载是不充分的，为了在这些问题上确保精确性，我把我这边制作的议事要录附送给您。

在此结束和您在非正式预备交涉中的会谈，我期盼着和您之间推心置腹的会谈会对将来日俄两国间的更加良好的关系作出贡献。同时，衷心希

望日俄两国间能十分迅速地树立善邻友好关系。

最后对您表达完全的敬意 敬复

大正十二年八月三日

川上俊彦

关于日俄会议的非正式预备交涉

俄国代表

约夫

四、川上公使书函附属日俄非正式预备交涉议事要录

关于日俄会议召开的非正式预备交涉

1923年6月28日至7月31日议事要领

代表

日本方 特命全权公使 川上俊彦

俄国方 远东各邦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尔共和国特命全权代表 约夫

日本方提议

一、关于「樺太」问题

（1）俄罗斯同意以相当的价格把俄国领地“樺太”卖给日本。日本认为对价应在一亿五千万元左右。

日本代表认为像樺太这样的一座岛屿被两国同时领有的话，可能会在将来造成许多纠纷，所以希望现在俄罗斯将其领土北樺太以相当的价格卖给日本。并且，根据日本学者专业人士的调查，这座岛的经济价值并没有这么大，而且想要开发这座岛的资源的话需要大量的投资，所以日本方面做出声明，认为一亿五千万元左右是正当的价格。

日本代表认为，在日本从俄国手中买下北樺太的情况下，关于樺太岛屿

的非武装化，以及鞑靼海峡和宗谷海峡的自由航行问题，根据“朴次茅斯”和约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双方不应有异议；同时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俄国有必要作出承诺，不再樺太对岸的本国领土上修建堡垒。* 8 *

（2）关于北樺太的交易不成立的情况下，俄国同意将北樺太的石油、石炭以及森林的长期资源开发权利提供给日本政府或日本公司。

日本代表指出，关于北樺太的权利只是在该岛的一定区域进行一定的资源开发的经济型权利，并不是俄国曾经租借旅顺大连时所获得的租借全岛的政治性权利。日本代表表达了关于建造港口已经铺设铁道等等权利的施设权的必要性，俄国方面提议俄国政府也加入到这项权利中，日本向俄国政府支付一定比例的权利收益（比如纯利益的5%乃至6%），那么这样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了。同时日本代表希望权利的期限为九十九年，最少也要五十五年。

二、关于尼港问题

(1)俄国对驻尼港日本领事、领事馆成员以及居民的杀害行为表达遗憾。

(2)俄国承认对尼港事件中日本人所受到的损害进行赔偿的义务

日本代表对尼港问题大致作出下述声明

「日本之所以和联盟各国一起出兵西伯利亚，是因为这是根据联合国共同的决议——当时俄国的政治局势混乱——为了救援陷入窘境的友军捷克斯洛伐克军。同时，又要确保安全的运输问题，所以驻守了西伯利亚铁道。

捷克斯洛伐克军曾被俄国政府认定为友军，和俄国军队一起奋战在对奥战线上。

日本军担负了防守黑龙铁道全线以及乌苏里铁道的一部分的责任，然而最忠实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不曾干涉俄国地方居民的内政，同时也没有占领西伯利亚。之后随着西伯利亚政治局势的恶化，日本军不得不去保卫居留的人民。

因日本军防守的乌苏里铁道有着交通断绝的危险，所以要保障与水路黑龙铁道之间的交通，并且加上要保护尼港的居留民，因而日本认为其有必要向该地派遣一支部队。前述部队之后减少到了三百五十一人。然而，因俄国方面的“挑衅”，导致该部队与特里雅皮钦率领的俄国军队进行了战斗。在1920年3月12日至5月27日之间，特里雅皮钦的军队用最残忍的方法杀害了日本军人三百五十一人，同时无差别地杀害了领事、领事馆成员以及妇女儿童，共计三百八十四名居民。这样的残忍的行为在历史上都没有类似的，因而才使得全日本国民不得不愤慨激昂。杀死和平的日本居民的行为和日本军队没有任何关系，就和杀死数千俄国人一样，完全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说这种行为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

根据俄国方面给出的各种证据（比如说1920年3月23日给内田外务大臣发的“齐采林”电报、1920年7月9日kerubi村（译注：难以找到俄文原文，该地位于阿姆贡河上游）的国民裁判所判决书等等），特里雅皮钦的军队不单单和“莫斯科”有联系，而且和“伯力”以及浦潮的赤军司令部有联系。特里雅皮钦的被赤军司令官公然认可，其军队也被承认为赤军，所以，俄国政府单单以前述虐杀是由匪徒或是游击队所为，同时特里雅皮钦已经被俄国法院判决并处刑的理由，来摆脱对尼港事件的责任是不行的。

日本代表说明道，尼港事件是日俄亲善道路上最大的难关，希望能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指向* 9 *的箭头}

* 1 0 * 针对俄国的第一案，日本代表给出了自己另一方案（第一版）。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1920年3月12日至同年5月27日之间在阿穆尔河畔的尼港市发生的残忍而罪恶的事件，也即351名日本军人，以及包括领事在内的和平的日本居民384名男女老少被凶手特里雅皮钦率领的部队无差别地杀害的事件，向日本政府表达最深沉的遗憾。

另外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声明，前述特里雅皮钦等成员于1920年7月9日在俄罗斯法院被判决死刑立刻执行。（指向* 1 1 *的箭头）

* 1 2 * 日本方面考虑到了俄罗斯方面的期望并怀着妥协的精神给出了如下的第二版方案

俄国对1920年3月12日至同年5月27日之间在阿穆尔河畔的尼港市发生的

残忍而罪恶的事件，向日本国表达最深沉的遗憾。当时不止是351名日本军人，包括领事在内的和平的日本居民384名男女老少被凶手“特里雅皮钦率领的部队”无差别地杀害。之后，除了大约八千名俄罗斯居民的受害，尼港全市也因特里雅皮钦而变成了一片焦土。特里雅皮钦及其部下被俄国正当的法院宣告了最高刑，也即是死刑。前述（1920年7月9日的）判决是立刻执行了的。

上述事实无一不令人痛心。不过，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可以骄傲地宣布，其有权利诚心诚意地确信守规矩的赤军部队中没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会发生。{指向* 1 3 *的箭头}

* 1 4 * 关于俄国第三版方案第一、第二节，双方的意见一致。然而，关于俄国第三版方案第三、第四节，日本方面没能表达同意。（指向* 1 5 *的箭头）

* 1 6 * 日本方面对此表示同意。

日本代表表示，考虑到俄国现在困难的财政状况，俄国对于北樺太问题作出有利于日本的解决方法的话，那么关于尼港事件的物质性赔偿可以努力不去要求。

三、俄国同意向日本人提供贝加尔以东的俄国领土上的森林矿山的开发权利。

* 1 7 * 日本代表对此表示同意，对本件提议作出如下的修正

「俄国代表同意向日本人提供其远东领土上森林矿山开发的权利」{指向* 1 8 *的箭头}

四、关于国际义务问题

(1)俄国承认旧条约

关于本问题日本方面的论据如下所述

「按照国际法的根本原则，以一国故有的领土和居民为基础，在这一基础存在的情况下，不管国内有怎样的政变，其国际地位不变。所以由革

命而成立的新政府将完全继承从前的政府的权利和义务。不能否定从前的政府与外国缔结的国际条约的效力而单方面地废除掉。所以劳农政府必须承认至今为止日俄之间缔结的所有条约。

考虑到一个很简单明了理由：两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所以，日俄之间的条约因战争而失去了效力，这样的论据是不能成立的。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是为了救援友军捷克斯洛伐克军以及防守救援所必要的铁道。之后继续驻军是出于保护日本居民的必要。日本军诚实地履行了上述任务，不曾干涉俄国地方民众的内政，同时没有行使战争作为当事国的权利，也即没有进行军事占领或是其他可以被称为“战争”的行为。

然而，我辈并不否认在日俄两国间的国际条约中有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存在需要改订的地方。我辈在之后的正式交涉中，认为应当这样：根据过去的条约或协定，我方获得的权利或利益，俄国方面对此表示尊重，对既成事实不做变更。新条约中，俄国的地位不劣于由从前的条约或协约规定的我方的地位——在这样的新条约缔结之后，废除旧条约。不过，涉及到包括日俄两国在内的多数当事国之间的条约的废弃或是改订的话，应当留待日后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决定。

日本代表很想知道，俄国究竟是根据怎样的法律才宣布国际条约的无效化的。

(2)俄国承认其对日本的债务。关于本问题日本方面的论据如下所述。

「根据国际法，不管哪个国家都不能以革命为理由废除其对外国所负的债务。不管债务的原因及其用途。所以，俄国必须承认日俄之间现存的国际债务。

俄国提出，其没能参与到战争的“分配”中，所以没有理由承认在战争中被用到的债务。这是因为俄国出卖了同盟国，而且违背了不单独议和的约定。俄国缔结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所以自己把自己从战胜国的“分配”中去除掉了，这是俄国自己犯的罪。

如果说俄国目前因财政状况困难而无法支付前述债务，于是想要延期支付或是免除一部分的话，日本政府不会拒绝就这一问题的解决与俄国进行交涉。然而，想要废除债务的行为，就算前述债务是战时债务也是说不通的。

(3)俄国同意将没收的私有财产返还给旧所有人或是对其损害进行赔偿。

关于本问题日本方面的论述如下所述。

「不管是怎样的国家，因其制度或是国内法的变化而对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进行不当的侵害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这是国际法所确立的一点。

所以，俄国应对日本人的权利和财产所遭受的侵害负起责任，对于已经没收的权利或财产进行返还或是赔偿。关于俄国对日本臣民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行的侵害，若日本免除了俄国的责任，那么日本政府就必须自己来负担起因免除俄国责任而必要的对这些国民的损害赔偿 responsibility。

五、除了上述问题之外，在通商条约签订之时，俄国应约定，保护日本臣民的生命安全，尊重其私有财产权，在十分广泛的的范围内保障工商业的自由。

六、双方当事国互相约定，不得进行对一方当事国的安宁秩序造成威胁的有害宣传和侵略行为。

俄罗斯方面的回答

一、关于樺太问题

(1) 俄国代表认为，把俄国领地樺太卖给日本这件事本身是可以答应的。不过要想让国民同意，那么其价格需要很高。最初基于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战略上的考量而作出声明，不接受低于十亿金卢布的价格；不过后来表示不应低于十五亿金卢布。

* 8 *

(2) 俄国代表认为本提议在根本上来说是可以答应的。不过关于权利的问题知道的很少，所以以日本代表的陈述作为基础

俄国代表约定，关于如下问题，向本国政府发电报确认意向：「日本希望得到北樺太的石油、石炭以及森林资源的长期（五十五年乃至九十九

年）开发权利。前述权利应该首先交付给日本政府，之后交付给相关日本公司。关于遵守俄国劳动法以及其他法律的问题，日本方面因不了解这些法令，所以该问题暂且保留。」

根据该代表的话，前述电报被立刻发往莫斯科。过了一周应该会有回复。然而，到最近的会议为止，该代表都没有给出与这件事相关的信息。俄国代表在7月31日的会议上面对日本代表的询问，表示前述各条件会考虑到权利的情况而有些程度上的变化，不过都是可以承诺交付给日本的权利。

关于北樺太的权利问题，在交换意见的时候时候，谈到了该岛的“辛克莱契约”。俄国代表最开始表示，想要在今后若干年内废除这一契约，不过必须得要支付毁约金。之后俄国代表补充声明，根据本国政府的报道，没有关于毁约金的规定。虽说需要支付一些活动经费以及弥补其他经费的使用上的损害，不过其数额都是极其微小的。

二、关于尼港问题

* 9 *

（1）俄国代表迫切希望和日本尽快达成和平，同意就尼港事件对日本表达遗憾之情。俄国方面在表达遗憾之外，给出了如下三个方案。

俄国方面的第一版方案

俄罗斯对1920年3月12日至同年5月27日之间在阿穆尔河畔的尼港市发生的残忍而罪恶的事件表达最深沉的遗憾。

当时，不单单是351名日本军人，也包括和平的日本居民384名男女老少被游击队无差别地杀害。之后，除了大约八千名俄罗斯居民的受害，尼港全市也因该伙匪徒而变成了一片焦土。

该地当时是日本的军事占领地带。然而，俄罗斯法官对逃亡俄罗斯领土内的匪徒没有任何容忍。该伙匪徒的首领特里雅皮钦以及多数党羽都被判处了最高刑也即死刑，这一判决被立刻执行了。

事情经过如前所述。俄罗斯赤军当时同样在和占领军进行战争，因而位

于南方。然而，劳农政府依然对于非战斗人员的妇女儿童都被卷如战争之中的这一事实表达了遗憾，并且难以抑制住更深沉的愤慨与痛心之情。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每当想起尼港事件，就想要表达这份令全俄罗斯震惊的心情。同时，在赤军的守规矩的部队里是不会发生这样事情的——令人感到骄傲的是，这一点能够得到了所有人的了解。同时，不禁令人期待：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样的事情都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一天的到来不再遥远 {指向* 1 0 *的箭头}

* 1 1 * 俄国方面对此不同意，给出了如下的第二版方案

俄国对1920年3月12日至同年5月27日之间在阿穆尔河畔的尼港市发生的残忍而罪恶的事件，对日本国表达最深沉的遗憾。

当时不止是351名日本军人，包括领事在内的和平的日本居民384名男女老少被凶手“特里雅皮钦率领的部队”无差别地杀害。之后，除了大约八千名俄罗斯居民的受害，尼港全市也因特里雅皮钦而变成了一片焦土。

犯下了前述罪行之后，特里雅皮钦及其部队逃亡了日本军队没有驻军的地方。然而俄国正当的法院并不对此表示任何容忍。他们被宣判了最高刑也即死刑，前述（1920年7月9日的）判决被立刻执行了。

事实经过如前所述。俄罗斯在任何场合都渴望和平，然而在各种地方都需要保卫自己以及革命的成果。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妇女儿童都被卷入了这样悲惨的事件之中。对此，不光是再三表达的遗憾之情，俄国更是怀有难以忍耐深沉的愤怒之情。按照一切人类文明社会的观念，妇女儿童应被保护，应该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事件才对。

上述事实无一不令人痛心。不过，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可以骄傲地宣布，自己有绝对的权利来怀着毫无疑问的诚意去保证，守规矩的赤军部队中没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发生。同时乐于期待：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这样的事情都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一天的到来不再遥远。（指向* 1 2 *的箭头）

* 1 3 * 日本方面给出的第二版自己的方案没能得到俄国方面的同意，于是俄国代表给出了第三版方案。

第X条(注意，俄罗斯方面以及日本方面应该答应的让步内容旁标有横线)

俄国对1920年3月12日至同年5月27日之间在阿穆尔河畔的尼港市发生的残忍而罪恶的事件，对日本国表达最深沉的遗憾。

当时不止是351名日本军人，包括领事在内的和平的日本居民384名男女老少被凶手“特里雅皮钦率领的部队”无差别地杀害。之后，除了大约八千名俄罗斯居民的受害，尼港全市也因特里雅皮钦而变成了一片焦土。

特里雅皮钦及其部下被俄国正当的法院宣告了最高刑，也即是死刑。前述（1920年7月9日的）判决是立刻执行了的。

犯下了前述罪行之后，特里雅皮钦及其部队逃亡了日本军队没有驻军的地方。然而俄国正当的法院并不对此表示任何容忍。他们被宣判了最高刑也即死刑，前述（1920年7月9日的）判决被立刻执行了。

历史上，俄罗斯对前述该国进行的敌对性的封锁和干涉屡屡发生（前述102字原文划有横线）。前述事实表明，俄罗斯对本国的犯罪者（“犯罪者”旁划有横线）进行了充分而严格的处罚。然而，与此同时，俄罗斯想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深切渴望真正的和平的同时，不管因何种厄运的处境，都不得不以武力（“以武力”旁划有横线）保卫本国以及革命的成果。

俄罗斯相信并且所渴望的，不光是为了依据本条（尼港事件相关的）条约来完全解决日俄关系中最重大最困难的这一问题，而且是为了弥补本事件已经造成的对两大国之间自然而然的亲近关系的损害，同时，前述的“亲近”化早晚会给两国带来友好善邻关系并且给两国国民中的数千余人带来渴望已久的亲善关系。（指向* 1 4 *的箭头）（译注：原文开头部分为“露西亞ハニ港事件ニニ {前2文字ママ}”，也即俄方方案中出现了语法错误，引用时日方附上了“原文如此”的说明）

* 1 5 * 关于俄国代表给出的表达遗憾之情的文案，日本方面的第二版方案第一节和第二节，也即俄国方面的第三版方案第一届第二节，双方意见一致，不过关于第三节第四节双方意见没能一致。提议将该问题保持“未决”的状态，开始审议其他问题。{指向* 1 6 *的箭头}

三、俄国代表对此表示，俄国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不会对日本给予（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的）差别待遇。所以这种“日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方面的提案中，希望把“‘贝加尔’以东的俄国领土”改为“其远东领土”{指向* 1 7 *的箭头}

* 1 8 * 俄国方面同意日本方面的提案

四、关于国际义务问题

(1)俄国拒绝同意本项

* 1 9 * 俄国代表回答道，虽然有宣布要公布秘密条约并废除掉，不过并没有宣布要废除一般的国际条约。

(2)俄国代表表示

劳农政府认为其不负有承认从前的政府缔结的任何债务的义务。特别是关于战时债务，其有着完全的权利不去支付债务。俄国从战争出退出是因为不可抗力。

(3)俄国代表表示

「俄国代表拒绝承认本项。特别是日本人的财产和权利主要是位于远东。该地区实施了国有制，所以说关于本项问题和日本人没有什么利害关系」

五、对此俄国代表表示，大致不违背俄国的国内法的话，以此为条件大体上本项不会引起什么大的反对。

六、俄国代表认为本项问题在经过广泛详细地完善并且附上说明之后可以接受

{ * 1 * 本问题以“未决”形式被保留 }

{ * 8 * 本问题以“未决”形式被保留 }

1 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英国驻华公使，与袁世凯是多年故交。刘禹生《世载堂杂忆》：“英使朱尔典探知德国赞成作帝，亟与袁老友莫理逊说袁，英亦极赞成帝制，不必舍近图远，袁乃转与英谋。……又以收复青岛为辞，告梁燕孙（梁士诒）转呈世凯曰：‘英日联盟，日必助英，德国所属之青岛，中国不自取，必有人起而代取之者，即日本是也。不如趁日本未动兵之前，与英立密约，英居其名，中国居其实，即日与德使商谈。一面派兵团守青岛，使日本不能藉辞联盟出兵，无所措手，此上策也。’”

2 恩维尔（Enver Passha，1881-1922），青年土耳其党领袖，奥斯曼帝国末期军政大权的实际掌握者。一战初期，恩维尔观望形势，但随后得知英国和土耳其宿敌俄国签订密约，同意俄国战后占领伊斯坦布尔，而土耳其购买的两艘军舰也被英国扣下。于是他接收了逃到君士坦丁堡的“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并默许二舰袭击俄国舰队、炮击敖得萨等港口，造成既成事实，把土耳其拖进一战。

3 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于1941年12月10日被日军击沉。

4 德国“戈本”号战列巡洋舰与“布雷斯劳”号巡洋舰从协约国海军的围追中逃脱，抵达君士坦丁堡港口，是促使原本保持中立但其实偏向德国的土耳其参加同盟国的关键事件。土耳其参加同盟国，封锁了俄国和协约国之间的主要运输线——达达尼尔海峡。

5 慈禧太后的秘传心法就是：吃不起亏的人肯定玩不起政治，但权术的高手要懂得吃明亏不吃暗亏。民国外交的秘传心法就是将暗亏转化为明亏，开发利用“弱者有权不守规则”的无赖文化，指望低成本剥削守序者高成本获得的胜利果实，忘记了重新落回丛林世界的真正危险。利令智昏和利令智锐是同一现象的两面。只有利益和欲望才能造就当事人的达尔文式现场感觉，旁观者依据抽象原则的判断总是在操作细节上不着边际。然而利益和欲望的驱动力雷达是以整体格局感的扭曲为代价的，无法避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危险。

6 1921年12月5日，来华考察教育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在奉天与张作霖进行了一次对谈，张作霖在谈话中说道：“日本人费那么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你问他在东三省得着什么了，他连一条也未实行得

了啊？不是我吹，你们可实地考察考察。”王卓然《中国教育一瞥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8月初版，第379页

7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政府改各省都督为将军。

8 “世昌素有阴谋家之名，就职后即渐与段疏。……进步党銜前次被屏之憾，密谋倒段，派汤化龙游欧，从外交上挑拨英美恶感，以制段死命。……汤之秘书长林长民利用学生爱国热诚，将各项借款，与巴黎合约，糅杂牵连，以乱学生耳目，日以徐树铮勾结曹汝霖卖国之说，聒于众耳。学生激昂万分，结队游行……殊不知此事徐世昌为幕后政战总司令，林长民为临时前敌总指挥。徐意在对段示威，林意在对段泄愤。”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4月第1版，第33、34页

9 此时身为北洋第三师师长、驻军湖南前线的吴佩孚通电声援学生，反对签约。孙文也在上海接见学生代表，表示支持运动，并致电徐世昌反对签约。

10 即1923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又名曹锟宪法、双十宪法。采取由国会选举产生总统的总统制，中央与地方事权的规定则由宪法明白列举，中央的普通法律或命令不能增减地方事权的范围，所以该宪法是一部联邦式宪法。

11 苏俄的对华宣言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中国许多团体纷纷致信苏俄政府表示感谢，要求北洋政府承认苏俄，与其建交。实际上，苏方宣言中关于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和其他租让财产并表示，在苏俄报刊正式发表时被删去了，而且这时中东铁路处在白俄的控制之下；宣言承认满洲及蒙古地区是沙皇“从中国攫取的”，却主张“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于哪一国家，愿意自己的国家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是为苏俄日后控制蒙古和支持蒙古独立埋下了伏笔。

12 李嘉谷：《十月革命后的早期中苏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列宁所指的仅为1896年及1896年后所签的各项条约，并不包括1858年至1896年之前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也就是说，割占中国领土150多万的条约（1858年《终中俄璦琿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及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并不包括在内。

[13](#) 外交部发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电》（1921年2月11日），《中俄会议参考文件》第二类，《中俄问题往来文件》，第12页

[14](#) 李嘉谷：《十月革命后的早期中苏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

[15](#) 同前注

[16](#) 李玉贞：《新发现的孙中山与苏俄政府间的往来函电》，《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307-308页

[17](#) 《列宁年谱》第五卷，莫斯科，1974，第75页

[18](#)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西伯利亚及远东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委员杨松签字。

[19](#) 张宗昌：《哈尔滨交涉报告》，1918年2月，第5-21页

[20](#) 李嘉谷《略论苏俄对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态度》、《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召开的中苏会议流产的原因》。

[21](#) 拉法耶特（Marie Joseph La Fayette, 1757-1834），法国侯爵，人称新旧两个世界的英雄。早年志愿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与美国开国元勋们结下深情厚谊。法国大革命时一度成为君主立宪派领袖，1830年革命时参与建立七月王朝。

[22](#) 例如黄宗智讨论华北农村，可靠的资料只有满铁——明清两朝的资料必须用满铁资料对照，才能判断各种资料不同的可靠性。如果比较符合满铁后来的纪录，就可以假定资料比较可靠，如果跟满铁纪录明显冲突，其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

[23](#) 日本文艺评论家林房雄指出：“在这个短命国家的背后，存在着西洋诸国对亚洲侵略二百年的漫长历史。明治维新是亚洲首次成功抵抗西方侵略的作为，满洲国则是在此抵抗精神上的延续。将满洲国定位为傀儡国家，是不见容于亚洲历史的结论。在世界史的发展历程上，满洲国仍然是个延续性的课题。”（《满洲国史·总论》，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

曾任满洲国总务厅次长、战后当上首相的岸信介也曾经回想道：“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理想十分耀眼，无论在科学上、良心上，满洲国都果敢地往理想迈进。满洲国确实是种十分独特的近代国家建设。直接参与这场建设的人，不只怀抱着满腔希望跟热情，还获得了日满两国国民强烈的支持，连印度圣人甘地都从远方声援。当时，满洲国是东亚的希望。”(《呜呼满洲》，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

曾任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确信：“满洲国的建国过程，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在历史上这个侵略及殖民地化万能的时代，试图在满洲这片土地上成立一个理想国家的尝试，是日本民族的骄傲，当时的日本青年，不计名利只为理想努力迈进的过程，更是日本青年的骄傲。”(《满洲国的梦不会消逝》，《顿挫的满洲国》)

推动满洲国建国的关东军参谋片仓衷认为，满洲国所揭橥的王道乐土及民族协和的理念是人道主义的升华，“是东亚迈向安定的基石，也是理念的开花结果。”(《回想满洲国》)

曾任总务长官的星野直树说：“不只居于指导者地位的日本人，满洲国也将广泛团结东亚诸民族的力量进行开发及发展，并将其福泽与各民族广泛地分享，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安乐天地。”(《未竟的梦—满洲国外史》)

[24](#) 后藤新平（1857-1929），医学博士，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首任总裁，对台湾的建设、满铁的发展贡献巨大。

[25](#) 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TREATY BETWEEN THE FOUR POWERS CONCERNING THEIR INSULAR POSSESSIONS AND INSULAR DOMINIONS IN THE REGION OF THE PACIFIC OCEAN)

[26](#) 这是一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处理山东德国殖民地的文件。日本人当时有能力以协约国唯一参战部队的资格，直接行使处置战利品的战争权力，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决心走国际协调路线，主动放弃了单边行动的机会。

[27](#) 1920年2月到3月发生在黑龙江出海口附近城市庙街（尼古拉耶夫斯

克)的事件。协约国干涉俄国内战期间,日本也于1918年出兵进驻庙街,1920年时该城被特里亚皮岑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包围,日军不得已开城,红军进城后开始处决俄国白军及支持者,并要求日军解除武装,日军不从,发动突击失败,特里亚皮岑进行报复,屠杀剩余日军及日本平民,并在该城实行恐怖统治。最终被屠杀的总人口超过六千人,约是该城半数的人口。

[28](#) 1920年3月至5月,居住在阿姆河出海口庙街的数百名日军及其侨民与俄国红军发生冲突,中国四艘军舰因故滞留庙街,适逢日俄冲突。舰长陈世英借重炮给白党,被红军用来轰击日方。1920年5月,日本援军收复庙街后,指责中国军人助俄攻日,遂扣留中国军舰人员,坚持双方派员调查。中国外交、海军两部被迫派员与日人交涉,几经交涉,中方在同意道歉、赔款、惩处有关人员等日方要求后,撤回军舰、官兵和侨民。张力《庙街事件中的中日交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57页

[29](#) 1925年6月11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在向公使团发出的第三份照会中,要求“先行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庶上海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11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领衔公使递交了有关五卅事件责任的照会,照会附有关于责任、惩处、赔偿、交还会审公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改组等多项提案。最后上海公共租界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免职,中国收回了上海会审公廨。孔另境:《五卅外交史》,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版,第23、24、70、71页

[30](#) “为数一万支步枪的第一批武器于1924年10月由‘沃洛夫斯基’轮船运到广州。这批武器原是为黄埔军校和组建广州政府军队第一个突击师提供的。后来苏联又连续不断地提供武器。据军事顾问卡利亚金回忆,仅在1926年10月,莫斯科就提供了24架飞机、157门野战炮、48门山炮、128门迫击炮、295挺重机枪、73993枝步枪、11万枚手榴弹、1.24亿发步枪子弹、5万发炮弹、500普特火药。根据卡利亚金的数据,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符合当时的最高标准,具备优异的技术性能,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军阀部队的同类武器。比方说,中国各军阀部队在那些年根本没有飞机,刚刚开始学会使用重机枪。同时一艘艘轮船满载汽油、煤油、重油、煤炭、木材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巴统运到广州。苏联政府还向广州政府贷款一千万元用以开办中央银行。”维克多·乌索夫:《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第184

[31](#) 1925年4月24日，段祺瑞执政府正式发布“废弃法统令”，宣布“民国法统，已成陈迹”；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不再打“护法”的旗号。

[32](#) 喻春生撰，《民国时期中央国家机构介绍》第二章第二节（四）

[33](#) 见：孙文，《覆段祺瑞阐述善后会议主张电》

[34](#) “广州总商会、商团联防总部、报界公会暨各团体、香港华商总会、东华医院各报馆、各省各埠各报馆各同乡会均鉴：孙文令粤东军队攻击商团，焚掠商场，惨杀人民，西关一带尽成焦土，伤亡遍地，尸血充途，未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未有惨剧。故乡东望，无泪可挥，今以决定以10月15日为孙文焚洗商场残杀粤民哀痛纪念日。愿我三千万同胞永志莫望。上海 粤侨商业联合会，广肇公所、潮州会馆、肇庆同乡会、大埔同乡会、香山同乡会、南海会馆 番禺会馆、顺德会馆。”宋钻友：《南北对峙与上海广东社会内的政见纷扰》

[35](#) 苏联提供大批武器与资源给广州国民政府。参见注30。

[36](#) 《亚洲共产党战略中的中国》，收于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六）》，东方出版中心，第241页

[37](#) 同前注

[38](#)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1883-1927），苏俄外交家，曾为托洛茨基的副手，1922年7月被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赴华商谈中苏建交事宜，但由于北京政府不愿在中东路和外蒙问题妥协，谈判未获进展，遂将注意力转向孙文。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1926年回国。托洛茨基失势后，他处境艰难，自杀而死。参看维克多·乌索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第90页

[39](#) 孙文在托泽村幸夫打的电报中，明确地谈到了赴津之前绕道日本，并谈此行旨在谋求中日提携合作。参见：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孙文讲演“大亚洲主义”资料集》，〔日〕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

40 孙文在神户专题讲演会的演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孙文的讲演会由神户商业会议所主办，大阪、神户的四家报社为后援单位，地点在兵库县立神户高等女学校。各报预先刊登“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氏讲演会”的广告，讲演题目为“大亚细亚问题”。所谓“大亚洲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欧美学者通常译为Pan-Asianism，即“泛亚主义”。讲演时由戴季陶译成日语，黄昌穀作中文纪录，日本多家报刊亦派人作日文纪录。

41 孙文在《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序言当中，回顾多年的革命友谊：“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勗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惟愧吾人无太宗之资，乏卫公之略，驰驱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游归国，将其所历笔之于书，以为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吾喜其用意之良，为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扬之。壬寅八月支那孙文逸仙拜序。”

42 “犬养等人促成大仓、三井等财团参与援助革命党人所急需的军火。据统计“1911年12月8日日本的云海丸载枪1万支、佩剑、短枪等约300万吨兵器运送到上海；1912年1月8日日本船巴丸将由大仓集团提供的步枪12000支，机关炮6门，山炮6门及所附弹药运送到南京，1月12日前后日本御代丸将三井物产提供广东新政府的步枪7000支、弹药4000万发运送到广东。1月25日三井物产提供给汕头革命军及商团的步枪1900支及刺刀、弹药等载米约丸在汕头登陆，2月24日荣城丸载村田枪3万支、弹丸800万发驰入广东虎门”。这些武器混杂不少日俄战争时期的废枪、废炮，但在尚无第二家外援的情况下，这些援助对于革命军仍然是十分有用的。”[《孙文的革命运动与孙中山》，(日)六兴出版，1989年，第168页]

43 《李烈钧将军自传》，三户图书社1944年版，第83页；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孙文讲演“大亚洲主义”资料集》，〔日〕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N.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44 理查德·迪肯：《克格勃间谍组织始末（中）》（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Secret Service），大众文艺出版社，北京2006，第209页

[45](#) 季诺维也夫（1883-1936），布尔什维克早期领导人之一，苏共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他与加米涅夫一道帮助斯大林扳倒托洛茨基，又在斯大林大权在握后遭到打击，与托洛茨基结盟试图抵抗，在大清洗中被以“卖身投靠法西斯间谍机关”等罪名处决。

[46](#) 王玉：《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几个争议性问题析辩》，《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3期，2001年11月，第161-180页

[47](#) 黎巴嫩曾长期被叙利亚控制，其国内的武装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实际是叙利亚的代理人，一直跟以色列保持交战状态。伊朗支持也门北方的胡塞武装叛乱，也门政府曾公开谴责伊朗为叛军提供武器。

[48](#) 高尔察克（1874-1920），北极探险家、俄国海军上将，一战期间他在波罗的海舰队屡立战功，升任黑海舰队司令。二月革命后一度被迫流亡。十月革命后回国，成为临时政府最高执政官，与红军作战。布尔什维克在高尔察克政府内部培植木马，使其基地伊尔库兹克发生政变，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主持的“政治中心”夺取了政权，高尔察克最后被同伴出卖，遭契卡杀害。参见邱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和弗兰格尔将军回忆录。

[49](#) 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佩尔西茨：《远东共和国与中国》，第31—35页；李嘉谷：《远东共和国的历史使命》，《世界历史》，1987年第5期

[50](#) 维经斯基（1893-1953），共产国际远东局主席、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代表。1915年在美国加入社会主义政党，1917年回国加入俄共，1918-1919年间参加红军情报机关，进行地下情报和兵运工作，成功策划了伊尔库茨克工兵起义，切断了高尔察克白卫军的退路，为红军最终消灭“苏维埃最凶恶的敌人”（列宁语）立下汗马功劳。1920年，维经斯基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4月，以新闻记者的公开身份前往中国，名义上的使命是在中国组建一家华俄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可行性”。他前后六次赴华，活动时间达四年之久，为中共的成立和发展提供组织和经费。此处可参看俄共（布）西伯利亚州局东方民族部会议记录第1号（1920年7月27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7，第2页，第13页

[51](#)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之考察》

[52](#) Г. М. 阿基别科夫等编《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1919—1943)》，第26页，第48页

[5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4，第2页，第28页，第43页

[54](#) 黄纪莲：《远东共和国代表团使华史略》（三）《阿辽耶夫代理时期的远东共和国代表团在华外交活动》

[55](#) 优林（1888-1925），苏俄外交家，按中方要求以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名义于1920年8月26日至1921年5月18日在华活动。他与时任外长颜惠庆进行了谈判。

[56](#) 参见：邓书杰、李梅、吴晓莉、苏继红：《风暴来临（1920-1929）》，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

[57](#) 李弥（1902—1973），国军将领，黄埔四期毕业，1948年任十三兵团司令，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李弥化装逃走。后被派往闽西、云南征兵。1949年12月中共占领云南后，云南境内的残余国军进入缅甸，1951年经整顿后，成立了云南反共救国军，李弥任总指挥。在缅甸的打击下，救国军大部分相继于1953年和1961年撤到台湾。

[58](#) 李嘉谷：《远东共和国的历史使命》，《世界历史》，1987年第5期

[59](#) 叶梦魁，赵晓春：《<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作者考》

[60](#) 马林（1883-1942），本名为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早年从事铁路工人运动，1913年到荷属东印度活动，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1920年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该委员会主席是列宁）。1921年6月到上海，主持中共成立，此后又推动了国共合作。1923年马林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第三号人物，被调离中国。

[61](#) 尼克尔斯基（1889-1938），本名为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早年曾为店员、列兵、职员。1921年至1923年先后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参谋部侦察科和第五军参谋部侦察科工作。1921年6月间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来到中国，筹备、出席中共一大，并组织中共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共产党组织一大。1938年因“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右倾托洛茨基恐怖组织的积极参加者”罪名被逮捕枪决。俄国学者А.И.卡尔图诺娃在《远东问题》2006年第4期上发表的《奈曼-尼科尔斯基--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中指出，尼科尔斯基在1921年就进入了远东共和国革命人民军参谋部情报部，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情报特工。一大代表都以为尼克尔斯基是马林的助手，但1986年在荷兰发现的“斯内夫利特档案”显示，真相恰恰相反，马林其实是尼克尔斯基的助手。尼克尔斯基掌握着共产国际驻华人员和远东苏共党员的活动经费。

[62](#) 王新生：《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

[6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6页

[64](#) 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73页

[6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6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4页

[67](#) 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第204页

[6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0页

[6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8-64页

[70](#) 王洪等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7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73-74页

[7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19-121页

[73](#) 1920年3月，远东的日本干涉军与苏俄红军在庙街发生战事，俄军以重炮轰击，日本领事馆中的日人死伤惨重，称为庙街事件。4月，日军增兵。5月2日，苏俄放弃庙街，撤走当日处决130多名被俘日军及平民和其他被抓获的白俄分子，并放火烧城。5月26日，海参崴日本《浦潮日报》报道了苏俄军人虐杀日本人的惨状，并指出：“庙街之役，华人、韩人均参战助俄，中国舰队（中国东北江防舰队且供俄炮弹），故演此惨剧。”6月8日-10日，大阪《每日新闻》和海参崴《浦潮日报》先后登出了一名被俘的日本通信兵日记。该日记由日军于6月3日进入庙街后搜寻而得。日记中记载了3月中旬日军与苏军交战情形及庙街的状况。日记中提到：日军“所以蒙巨大之损害者，实因某国炮舰对我守备队施以炮击所致。我守备队一部分虽对之突击，然因受多数机关枪之猛烈抵御，终未成功。”这里的“某国炮舰”即指滞留在庙街的中国江防舰队。

[74](#) И·Н·索特尼科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有如下记载。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组成如下：舒米亚茨基（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他的副手加蓬（后来是Я·明斯克）（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5，第34页。），执行书记吴廷康（维经斯基）和А·鲍德里茨基，情报处主任С·И·斯列帕克。М·М·阿勃拉姆松，后来是И·К·玛玛耶夫担任中国处俄籍书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3，第2页。），再后由符拉索夫斯基替代。曹培行（音）担任鼓动指导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3，第26页。）达林受命负责青年工作，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中国代表В·尼科尔斯基（В·别克、В·А·涅伊曼、瓦西里耶夫），办公室主任布卡蒂。（俄罗斯国家社

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7，第1页。）1921年3月22日，张太雷被确定为中国支部的华人书记，他充当中国支部的书记直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7，第12页；案卷122，第4-5页。）

1921年2月26日，舒米亚茨基写给共产国际科别茨基的书面汇报中说，现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已经把全部东方工作领导起来，而以前呢，“谁都能管，可是互相掣肘”。既然华员中央在远东共和国境内并没有什么威望，舒米亚茨基就将在华工作的中心移至领导中国革命、出版报刊的上海革命委员会。这项工作需要外汇金卢布，而不是珠宝钻石和罗曼诺夫时代的卢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7，第1-2页。）

1921年3月，舒米亚茨基致电莫斯科说：尼克尔斯基很快就会前往中国，领导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支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22，第4-5页）

[75](#) Г. М. 阿基别科夫等编《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1919—1943)》，第73页

[7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建立共产国际东方面事远东局的决定》，《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第4页

[7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8-49页

[7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9，第80页。

[79](#)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11，第5-8页

[80](#)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2，第48、64、147页

[81](#)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50-151页、168页

[82](#)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载中央档案局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168页

[83](#)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近代史所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第243、245页

[84](#)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209页；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第6页

[85](#) 《阿布拉莫夫给诺莫夫的电报》（1927年9月6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6页

[8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7号（特字第21号）纪录（摘录）（1926年5月20日）》，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卷，第267页

[8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8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59页

[8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09-211页

[9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60页

[91](#) 艾伦·惠廷：《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1968年英文版，第201

[92](#) 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第187页

[93](#)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0-31页

[94](#) 原敬内阁是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其外交政策包括：禁止向中国北京政府出口武器；归还山东权益；撤出进入西伯利亚的干涉军，等等。原敬遇刺身亡，藏相高桥接任首相，原内阁的全部成员全部保留，继续推行前内阁的外交方针。民初黄金时代主要依靠他们的单方面善意和永不归还的贷款。

[95](#) 于光田：《北京政变至郭冯反张时期冯玉祥与苏联的关系》，《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月

[96](#)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第378页

[97](#) 见：格里高里也夫等编，马贵凡译：《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新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3期

[98](#) 《任德江为对于冯玉祥联络情形及种种之观察致苏联革命军事会议会长福伦资函并抄送沃罗宁》，1925年5月22日

[9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21页

[100](#) 廖华：《任国桢同志传略》，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01](#) 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0页

[102](#) 谈方：《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北伐战争的援助》，《军事历史》1995年第6期

[103](#) 毛以享：《俄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第202页

[104](#) “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105](#) “合内外上下一致力争，务期早定蒙疆，固我藩篱。”

[106](#)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3页

[10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22-223页，第225-226页

[108](#) 江田宪治：《1920年代的民主主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1920年代的中国》，东京：汲古书院，2005

[109](#) 王良卿：《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领导制度的转型（1923-1924）》，《国史馆馆刊》第四十四期（2015年6月），第1-46页；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2012，第240-242页；杨奎松：《大革命前期的国共关系与共产国际》，《文史哲》，1990年第6期

[11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14页

[111](#) 石川祯浩：《孙中山致苏联政府的遗书》，日本《当代中国探索》丛刊，第1辑，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2008年11月。孙文的《致苏联遗书》英文版可参考：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vol.5, no.20, March 19, 1925. 至于原件则曝光在俄国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ф.514, оп.1, д.125, л.13-14

[112](#) “伊斯兰教联盟是爪哇最早的群众组织。它建立于1911年，具有经

济、社会和宗教混合一体的性质。它的斗争锋芒直指欧洲糖厂主对爪哇人的剥削。这个群众组织的左翼（集中在三宝瓏）接受印地社会民主同盟的宣传，这个同盟是我帮助组织并使之沿着阶级斗争路线开展宣传。这种宣传在伊斯兰教联盟内部得到了强烈的支持，特别在1914—1918年的战争年代里是如此。结果，在1918年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接受了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思想。和伊斯兰教联盟左翼的联系创造了在我们自己人领导下组织工会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工会。纯粹民族主义分子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宣传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效法正在发展中的工联主义，建立他们自己的工会。伊斯兰教联盟这一松懈组织形式，使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尼人、爪哇人、马来亚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其影响之大，甚至在军队里也建立了联合会，而这种情况还是在战时呢！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保持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是这条路线的逻辑结论。在爪哇，实现了这一点。至于中国，更有必要强调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兴起，而在爪哇则还没有。”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

[1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1998，第44、60页

[114](#) 沈云龙主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文海出版社，第156页

[115](#) 同前注，第156—159页

[116](#) 同前注，第360—362页

[117](#) “聂维桢，第一三六二号，假名王德馨，朝阳大学学生，系共产党员，通讯处武昌涌三宫马家巷一号，每月支四十元。此人与俄使馆通信，经由第一三六三号转递。谢包罗，第一三四五及一二六五号，假名张之时，年二十五岁，湖南人，省立第四种工业学校毕业，系共产党员，通讯处长沙教育会东街九号，月支四十元，在唐生智司令部供职。此人与俄使馆通信，经由第一三六三号转递。朱晓庭，第一三四六号，假名李茂森，年二十岁，湖南人，专司密探汉阳兵工厂消息。通讯处萍乡安源蕲算街一百零九号，月支四十元。此人与俄使馆通信，经由第一三六三号转递。石学曾，假名吕起凤，又名赵才伊，保定人，中法大学

学生，系共产党员，月支四十元。此人与俄使馆通信，经由一三六三号转发。”同前注，第2100-2101页

[118](#) 同前注，第971-972页、第1992-1996页

[119](#)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91—292页

[12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62页

[121](#) 沈云龙主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文海出版社，第972-973页

[122](#)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第267-289页

[123](#) 《中央扩大会议关于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1926年7月)，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编印《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上海区委文件1925—1926)》，1986年版，第306页

[124](#)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

[125](#) 沈云龙主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文海出版社，第2025-2026页

[126](#) 日-中翻译：张亦澄（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

第三章：三种革命外交的竞技场

一、苏联的路线斗争与远东革命政权的反复

本节引言：

根据列宁的设想，苏俄只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引线。引线本身不是目的，应该为世界革命烧光自己。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就将俄罗斯的资源投入欧洲、中东和远东的革命输出事业当中。前两方面受挫以后，远东革命的地位上升了。这意味着国共两党作为世界革命在东亚的代理人，得到的资源大大增加，体现为大清各继承者的垮台和广州革命政府的胜利。同时在莫斯科革命大本营内部，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派开始遭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派的侵蚀，人事斗争和路线斗争相应地传导到东亚两大列宁党内部。

1. 世界革命派失败

1924年1月，列宁的去世开启了苏联的三头政治。托洛茨基集团和总参情报局系统、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共产国际系统、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和克格勃系统像克雷洛夫寓言里的天鹅和梭子鱼一样，争夺远东革命的领导权。后两个集团联合压制托洛茨基集团，导致尼克尔斯基和越飞的事业半途而废。托洛茨基倒台后，总参情报系统遭到残酷清洗。斯大林仿佛为了实现诗意的公正，以间谍罪名枪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真正组织者。越飞见布尔什维克左派山穷水尽，在绝望中自杀身亡，从而躲过了斯大林的魔爪。

越飞的绝命书¹与其说属于一个放弃挣扎的人，不如说属于一条绝路的先驱者。他曾经信任意识形态的魔法力量，试图颠覆世界的隐秘法则，一度陶醉于人定终于胜天的愉悦中，现在却发现命运从自己最意想不到的角落伸出利爪，将自己扔回原先的轨迹。他在魔法师的学徒时代，就是为了逃避这样的命运，才走上现在的道路。他无法面对眼前的虚无，无法面对自己，无法面对身后的同路人，做出了最后一次逃避的选择。

表演艺术家托洛茨基以为列宁的十月赌博可以无限重复，跟他的世界革命计划一起自取灭亡。“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庸人联盟”继续指导远东

的革命，但行动变得更加谨慎了。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联盟拒绝了加拉罕和李大钊出兵北满的建议，只允许中东路经理伊万诺夫切断奉军的交通线，结果足以开罪张作霖，却未能挽救郭松龄：拒绝出兵北满，只是稍微推迟了吴俊升后备队南下的时间。远东军如果当真忠于世界革命，就应该像1919年的高加索方面军一样，不计后果地深入外里海地区，在胆小鬼游戏当中逼退大英帝国，置刚刚脱离俄罗斯帝国的外高加索各邦于死地。从世界革命大本营的角度看，大英帝国才是帝国主义的核心，日本人不过是英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小兄弟。如果红军在满洲害怕日本人的介入威胁，早就应该把高加索让给英国人的盟友。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革命者住进了君主国的皇宫，就想抛弃自己的阶级兄弟，谋求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躲在俄罗斯边界内享受统治者的荣华富贵。

2. 远东局经营上海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谨慎或“热月”性格²尤甚于季诺维也夫，最初更愿意将制定远东政策的责任交给比较大胆的共产国际系统，却并不放弃自己对行政资源的垄断权力。鲍罗廷最初获得了巨大的行动自由，利用廖仲恺遇刺的机会，将列宁遇刺的清洗模式引入国民党，给元老派以致命打击。国民党二大以后，共产党人占据了国民党中央党部77%的领导职位³。

上海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统治中心，地位非常特殊而重要。1926年4月2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在上海成立远东局。“远东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日本和朝鲜代表团的身份作为集体机构领导这些国家共产党的政治、工会和组织活动。”⁴远东局继承了远东共和国的全部辖区，并且将指挥中心移到了俄罗斯原有边界之外，含蓄地体现了条约体系在远东的退缩。维经斯基出任远东局主席，列戈尔、福京任委员，直接领导中国、朝鲜、日本共产党和台湾共产党（后者以日本共产党民族支部身份到上海述职）。

超级间谍佐尔格⁵在远东局度过了他的学徒时代，后来声称远东局包括“政治部”和“组织科”两个互不统属的体系：政治部像钦差大臣和神学家，负责传达共产国际的圣旨，依据远东当时的具体形势予以解释。他们的纪录有程式化的倾向，通常始于歌颂上级领导的英明正确，终于论证自己的方略为什么完全符合领导指示的精神。后来所谓的党八股和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政治部；组织部除了名字以外，工作内容跟

间谍组织没有丝毫区别。他们给远东各支部转发经费，经理和保护邮件、无线电和其他秘密通讯路线，打理情报搜集和下线发展业务，负责内部安保工作，管理会议纪录和档案文件的保存和保密工作。黄面孔的小兄弟位于等级制度的两端，不是陈独秀这样的花瓶，就是打杂的苦力。中层干部几乎全是“远方”的来客，德国人和俄国人占据了最大的比例和最重要的位置。苦力对他们的领导似乎不是很心悦诚服，发明了一系列毫无敬意可言的黑话：“党毛子”或“大毛子”（共产国际政治代表）、“小毛子”（少共国际代表）、“工毛子”（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太平洋毛子”（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代表）。远东局在内部文件当中，并不讳言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可以说，在党的政治生活和活动中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在远东局俄国同志的参与下解决的。”⁶

上海远东局主要依靠另外两个中继站：一是上海的东正教会，以安利烈·帕夫洛维奇·虞（虞洽卿）⁷为主要代理人；二是长期依靠青帮保护的上海工人，以李立三为主要代理人。

上海纳税人会议并非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活动，一开始就知道李立三和青帮头目常玉清、王汉良的密切关系是他获得共产国际重用的主要资本⁸。英国警务处的报告称：“青红帮与工运鼓吹者相联合……效忠于李立三。”他们袖手旁观，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列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政府利用群众运动排外的明显倾向。国共两党后来声称北京政府勾结帝国主义迫害他们，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没有北京方面的秘密配合，他们的初期工作是不会这么顺利的。李立三经常奔走于陈独秀、虞洽卿和李思浩之间，后者是段祺瑞的灵魂和钱袋。当然，段祺瑞跟共产国际的所有统战对象一样，过不了多久就会悔当初，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3. 莫斯科调整远东政策

国民党左派扬眉吐气，准备乘胜北伐。斯大林害怕他们削弱了吴佩孚牵制张作霖的能力，利用自己主管援助物资的权力，拖延他们的军事准备。⁹蒋介石因此猜疑苏联人有意将他出卖给汪兆铭，发动了“中山舰事变”。随着蒋汪决裂，国民党少壮派四分五裂。苏联党政系统和共产国际系统意见分歧，坐失良机，对蒋介石的任性无所作为。于是蒋介石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东西，包括北伐物资。这次侥幸，犹如十月政变之于托洛茨基，大大加强了他的赌性。北伐军抵达上海以后，同样的手段就

用到了远东局头上。

共产国际决定直接领导上海远东局，本身就反映了斯大林和本土派党政干部的犹豫或谨慎。季诺维也夫自以为比斯大林更深刻地领会了列宁渗透英国工会的冬虫夏草策略，命令拉菲斯不要像孟什维克一样软弱，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权，忘记了正是这种策略导致了英国工党长达七十年的清党体制。¹⁰

1926年10月15日，远东局书记拉菲斯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信件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最新的统战方针：不反对联邦主义理论，但反对联邦派。这意味着共产国际认为广州革命根据地已经稳固，可以将打击范围扩大了孙传芳的五省联盟头上。10月2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召开会议。维经斯基表示：“中国工人阶级越来越接近于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它必将成为领导者，而这将意味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倾向的失败。”大家应该遵循远东局领导拉菲斯的正确主张：“每当危机尖锐化的时刻，我们就应当引导无产阶级去进行独立的斗争，以便使它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只有组织无产阶级发动斗争，我们才能促使小资产阶级转到我们方面来。”最后，他总结说：“应当这样来进行准备工作，要使整个无产阶级都被吸引到行将到来的斗争中。”斗争的方式以后确定，“但是必须使整个无产阶级都作好准备。其次必须这样来做准备工作，一定要把中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斗争中来。”¹¹他这话翻译成非统战语言，就是说要让一批地下党能够操纵的国民党左派和社会贤达担任花瓶。远东共和国依靠统战打败了高尔察克和谢苗诺夫的朋友们，远东共和国的继承者始终奉这种秘传心法为法宝。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领袖，奉命参加了这次会议，但知趣地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方略。他在过去几年内已经碰了足够多的钉子，明白了共产国际的秘密等级比公开等级更重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秘密情报官尼克尔斯基是公开特派员马林的上级。现在，莫斯科派来的任何临时代表都比他这位领袖说话算话。

4. 夺取上海的革命高潮

1927年2月11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彭述之向陈独秀和罗亦农传达了第七届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决议》认为一举击破帝国主义中心的时机即将成熟，应该立刻收编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帮会、溃兵和游民，把他们武装起来，抢在北伐军入城以前夺取上海。军

事负责人周恩来后来总结说：“游民的无产阶级，落伍的军人及青红帮有几万人，他们目前的表现尚可信赖.....可以联络为工人武装暴动的助力。”共产国际慷慨拨款七千元，超出了暴动组织者最初的要求。¹²

汪寿华和杜月笙的关系相当于李立三和王汉良的关系。1927年3月的《特委会议记录》称：1927年2月28日—3月8日，杜月笙和汪寿华五次接头。2月28日，汪寿华向特委会报告：“杜月笙我今天也见到，说他愿保护工会，要我们尽管到法界开会和设机关。前次王丰里被捕后，他即与总巡去说，总巡很生气，所以即把包探捕去数人。他又说我们可备叫子，如有人来被捕，可吹叫子。就（如）捕入捕房，他可想法释出。”¹³（包探即旧时租界中捕房里查访案情的人）3月2日，杜月笙告诉他的朋友：他负责安排共产国际代表和法租界总巡会谈，以保障外人权益为条件，换取后者的友好中立，并答应帮助筹款五千元。“今天又见杜月笙，法总巡今日他去约，明天同他去见，他要我简单说明点共产问题，鸦片问题他去接洽，以后仍请帮忙，款他可筹五千。法捕总巡来联络感情，并说法界治安可共同商量，法总巡要与工会的人见面。”¹⁴

孙传芳的部下准备逮捕陈独秀、罗亦农、汪寿华，杜月笙立刻通知汪寿华。他还派出小弟保护朋友的会场，帮助安装电话。汪寿华以晚辈弟子身份（他是以国民党员资格拜在杜月笙门下的）感谢杜老板的义薄云天，杜月笙直率地回答说：“现在我帮你们的忙，将来你们应帮我的忙。”汪寿华明白师父的心意，在暴动前两天告诉向周恩来：杜月笙“请求我们予以帮助.....他要求我们不要提出鸦片问题。同时，他希望将所有青红帮重新组织起来，交由我们指挥。”¹⁵

杜月笙不是唯一热爱无产阶级的帮会领袖，他的匹敌黄金荣也是识时务者。暴动前夜，虞洽卿告诉汪寿华：“法界华捕麻皮金荣（青帮大亨黄金荣）与其他主要帮会头目之间的谈判已经完成，他们都很愿意合作。”¹⁶此后，黄金荣集团为中共提供了如下的协助：“一、筹款，资助上海总工会扩大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二、介绍共产党与租界当局建立联系，安排汪寿华与法租界官员晤谈，以协调双方的关系。三、提供情报，如把军阀要搜捕中共负责人的消息及时通知共产党。四、派人保护法租界内的中共人员，协助设立党的机关，派人帮助安装电话，为中共在租界内召开会议提供会场等。”¹⁷

租界当局同样说话算话。费成康的《中国租界史》提到：孙传芳的盟友直鲁联军派人潜入租界，企图抓捕共产党人林钧（后来的上海临时政府

秘书长)。杜月笙闻讯，就向法租界当局报信。租界当局公开表示在中国内战中保持中立，遵守保护外国政治犯的国际惯例，将直鲁联军的侦探驱逐出境。华界没有资格以中立区自居，暴动要求大批地下工作者至少暂时浮出水面。李宝章的军队原本可以逮捕他们，但没有多少人敢向杜老板公开承认的弟子下手。

5. 远东局过河拆桥

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报告说：1927年2月和3月，上海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下。汪寿华和顾顺章的“人民法庭”和“人民警察”不仅在拒绝缴纳保护费（他们称为自愿资助的革命经费）的资本家，而且当街处决真实或想象的“人民公敌”。这些公敌包含了许多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他们的罪行主要就是在共产国际来到上海以前就加入了敌对的工会或帮会。当时，“人民警察”一词仍然符合列宁的原意：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类似的环境下，曾经苦口婆心地教育思想没有搞通的同党，“人民警察”之所以有“人民”的字样，就是为了跟资产阶级的警察区别开来，前者可以实施私刑，而后者只能遵守资产阶级的法条。法条当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给资产阶级人士带来了错误的安全感。只有“人民警察”能使他们发现自己的不安全，否则无产阶级革命跟资产阶级革命还能有什么区别？杜月笙后来（配合蒋介石清党以后）声称：他之所以跟原先的弟子恩断义绝，就是因为后者践踏了江湖人的道义。青帮自古以来仁侠为先，断无滥杀无辜之理。¹⁸他这话的可信度，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1927年3月12日，远东局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代表会。罗亦农表示：“市民代表会议就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鉴于俄国人早就知道并接受孙文讨厌苏维埃这个词的态度，这话等于公开宣布了远东局过河拆桥的决心。他们成功地摘了北伐军近在咫尺的桃子，控制了中国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只要稍微打打土豪就能收回八年来的全部投资，觉得不用再给过气明星蒋介石留面子。3月22日，最新白手套宣布成立上海临时政府委员会。十九位委员包括十位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出预料地包括了非中国的共产党员虞洽卿。坊间传说，1927年的中国有两大“青帮政府”。一个是华北的褚玉璞政府，得到青帮元老袁克文的支持。另一个就是上海的临时政府委员会，包括青帮的三大干将汪寿华、王汉良、顾顺章。然而，斯大林觉得共产国际系统嚣张过度了。4月4日，他在莫斯科干部大会上公开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是这样一类革命的议会，有它的主席团即中央委员会……蒋介石比策烈铁里和克伦斯基多了一个脑袋，因为他根据

情况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布哈林附和“亲爱的科巴（斯大林）”，说国民党是“党和苏维埃的杂交体”。

6. 清党与中华苏维埃的建立

话音未落，蒋介石就发动了远东版本的清党运动。4月24日，季诺维也夫幸灾乐祸地说：“把今天的国民党同1920年基马尔的党（土耳其）相比，倒是恰当的。基马尔党当时尽力装成革命的、‘几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向工人卖俏、把农民群众抓住、答应同共产党人合作、称他们的政府为‘人民代表委员会’等等。但是在它等待到适当时刻来到时，它便把共产党人驱入地下、砍断了他们的一些领袖的脖子（谋杀了苏布基等同志）并且成立了资产阶级国民政府，实行保守的国内政策……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它既不依赖于国民党的右派也不依赖于国民党的左派。”¹⁹

斯大林虽然缺乏捷才，却从不缺乏坚韧，更不缺乏秋后算账的良好记忆力。他特别喜欢打倒敌人，剽窃敌人的方案。托洛茨基倒台后，在位时执行不了的“超工业化”计划反而以斯大林的名义实现了。季诺维也夫倒台后，他的“中国支部建设方案”同样变成了英明领袖反对“托季联盟”的伟大政绩。“托季联盟”纯属子虚乌有，存在的可能性不比“章罗联盟”或“麦卡锡-华莱士联盟”更大，但虚构的罪名能够刺激猎物徒劳的辩护冲动，比消灭效果相同的真实罪名更能满足捕食者的虐待狂心理。

斯大林举重若轻，首先将季诺维也夫扣到他头上的帽子扔在鲍罗廷和陈独秀的头上；然后面不改色，将季诺维也夫的妙计归到自己名下。季诺维也夫只得自认倒霉，将共产国际的老部下交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处置。洛米纳兹以钦差大臣身份驾临武汉三镇，主持八七会议，将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同志放在陈独秀留下的位置上，命令支部根据“不断革命论”的原则，抛弃丧失意义的国民党假面具，直接打出苏维埃政权的旗号。周恩来、毛泽东和张太雷根据新领导的新路线，发动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7月5日，共产国际同意为复兴湖南农运而拨款三万九千五百元……秋收暴动预算‘至多不可超过沪钞一万元’。”²⁰“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批准军事总顾问加伦关于组织南昌暴动，然后南下占领广东汕头，接运苏联武器，以便装备一个军的提议。为此，在已向苏联驻武汉总领事伯纳和军事顾问加伦送款三十万美元之后，会议决定‘还应为此目的拨给一万五千支

步枪、一千万发子弹（算在庫倫儲備物資帳上）、三十挺機關槍和四門山炮帶兩千發炮彈，總金額一百一十萬盧布。”“據中共中央1928年1月16日報告稱，從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總計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已經為廣州暴動用去了近十萬元。”²¹

這條路線很快導致了更大的失敗，最終獲得了“左傾盲動主義”的定性，不出所料地算在瞿秋白的帳上。共產國際滲透海外的每一次失敗，都加強了斯大林在蘇聯國內的權力；劫持國民黨的每一次失敗，都增加了中國支部在遠東經費中所占的份額。1926年8月9日，鑑於“白色恐怖”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政治局委員必須單租房居住，不可兩人同住，以免捕一帶二。共產國際代表為此撥款千元。8月國共關係徹底破裂後，共產國際撥給中共的經費增至每月兩萬元。9月6日，莫斯科電令上海國際工作人員：“請在年底前提前撥給中共17128美元。”²²根據中共歷史檔案財政統計，1927年共產國際秘密撥付中共各項款額接近一百萬銀元。這一數額相對於蘇聯這一時期援助國民黨與西北軍馮玉祥累計五千萬銀元雖微不足道，但對尚處嬰幼兒期的中國支部來說，年助百萬已是天文數字了²³。

1928年，季諾維也夫陷入絕望，用卑躬屈膝的認罪求饒和自我羞辱，換取了留在黨內和國內的機會，也就是說換來了以後作為叛徒被處決的下場（托洛茨基儘管比他更早垮台，却不依不饒地抓住這次機會，論證一切失敗全是斯大林的錯，因此在黨內國內都混不下去，也就是說換來了以後在流亡中遇刺的下場）。現在除了布哈林以外，列寧的老近衛軍已經蕩然無存。1928年2月9日，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起草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遠東各支部的班底如影隨形地換血，納入斯大林親自領導的範圍。羅明納茲首當其衝，為斯大林剛剛發明的“托季聯盟”扮演遠東代理人，他選擇的代理人斯特拉霍夫同志隨之一蹶不振。斯大林和布哈林聽信李立三和向忠發的謠言，懷疑世界革命已經淪為東方陰謀家的奶牛。1928年3月，東方書記處成立了指導土地革命的軍事委員會。別爾津任軍事委員會主席，米夫、布留赫爾（加倫）、赫梅廖夫、馬馬耶夫、蘇兆征、向忠發任委員²⁴。

新人新氣象，共產國際聯絡局長收到上級主管的嚴厲警告：“迄今為止，黨通過國際聯絡局每月收到大約二萬墨西哥元。但這項預算被認為是不完全的。（中共）中央以各種理由請求我們為這樣或那樣的事情撥給或多或少的款項，而且幾乎為每件小事都提出要求。什麼樣的要求沒有提出啊！只要建議散發傳單或宣言，需要調某人到某地去，中央派個書記到省里去，就連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會立即向我們提出撥給追加

经费的要求。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我们的钱），就开始逃避事务性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²⁵皮亚特尼茨基向斯大林报告：“我觉得对他们的预算不详作考虑，是不能给他们拨款的，因为经验表明，我们给各党的钱越多，它们就越不想深入群众，同群众建立联系。而在这个报告中所表明的倾向是：要由党来养活大量的同志，要建立庞大的机关，并且所有经费都要从这里取得。我认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意味着葬送党。”²⁶

然而即使以斯大林的刻薄，也抗拒不了革命形势的需求。1928年6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由苏联提供约十万卢布经费。联共（布）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1928年6月11日再拨九万卢布给中共应急。共产国际1928年上半年拨款十二万五千卢布。联共（布）政治局决定下半年增至三十四万卢布。折合中国货币，1928年中共来自苏联的经援月均超过六万元²⁷。当然，中国支部必须证明自己没有骗取上级经费的企图。192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团：中共经常费每月六万元绝不能减少，且应提供兵运费每月两万四千元，特别费年预算也应达到一百万美元。中央并决定今后严格按照新预算开支……所有领导人的生活费都减少二元，娘姨费停发，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²⁸。

7. 斯大林大权独揽

1930年，斯大林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支持下彻底消灭了国内新旧左派。他接下来的措施自然就是相应地消灭远东局和中国支部的新旧左派，将“左倾冒险主义”的帽子留在远东局新领导盖里斯和中国支部实际领导李立三的头上。无所不在的莫斯克斯·周同志连续为几位短命的钦差大臣服务，渐渐掌握了兵运、匪运和特科工作的网络，甚至在莫斯科眼中都变得越来越难以替代²⁹。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词：“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美元，（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国际的款都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掌握在周恩来手里……”³⁰

布尔什维克的割草机首先消灭政治家，其次消灭官僚，留下的真空不可能无人填补，结果通常有利于秘密情报机构。1930年以后，斯大林已经

不再需要任何人帮忙了。于是他再度反戈一击，把布哈林和党内右派一网打尽，将托洛茨基的集体化汲取计划付诸实施。从此以后，只有克格勃才能以党不可或缺的“剑与盾”自居。苏联的政变照例引起各支部的清洗，产生了欧洲各共产党的反社会民主党运动和米夫-王明在远东局和中国支部的统治。希特勒的胜利打断了共产国际的新一轮左倾，迫使斯大林回到统战各国社会民主党和国民党的“人民阵线”策略。1935年，蒋介石和斯大林统一战线导致了三项后果：国民党和日本的战争进入倒计时，张闻天政权倒台，蒋介石对逃亡陕甘的红军网开一面。远东在1948年和1952年的格局，大部分都已经在这场交易中注定。

二、日本国际协调主义和泛亚主义

本节引言：

大英帝国逐步撤出远东，共产国际的渗透相应地深化。日本作为条约体系的最后柱石，处境越来越孤立。英日联盟以来，日本精英推行的国际协调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质疑。日本民间本来就有巨大的泛亚主义潜势力，只是由于自由主义世纪的国际形势和明治宪法的精英倾向，无法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而已。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前者，大正民主动摇了后者。列宁党在东亚的节节胜利和欧洲列强的绥靖主义，为日本泛亚主义者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泛亚主义势力的崛起，使日本由条约维护者转型为条约破坏者。远东条约体系在共产主义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挑战者。

1. 日本民主势力上升

原敬内阁以打破元老和藩阀的共治结构为宗旨，首次将政治经纪人分肥制度引进日本。立宪政友会³¹运用精算师的原则，巧妙地调节地方派系和选区划界，不断降低选民团的门槛，用积极财政和恩荫交易购买局部和临时的忠诚，消解了明治开国以来的武士精神和使命感。政友会热衷于扩大公共事业，重要原因就是公共职位最适合充当庸酬的资源。平民宰相原敬早在护宪运动以前，就以诚实的掮客著称，从不挑剔委托人的立场和原则。“经纪人政府”的力量在于敏锐准确地掌握政治消费市场的波动，对世界战略既不能理解也不感兴趣，乐于将政策决定权交给霞关（外务省）的专业官僚。

大正时代的国际协调主义在选民当中从来没有根基，仅仅反映了政党政治家的缺乏自信，与其说是一种有宗旨的政策，不如说是职业外交官的工作习惯填补了内阁不作为造成的真空。

政友会内阁的财政扩张主义和国际协调主义激怒了中小企业和英日同盟的支持者，促成了加藤高明和民政党（宪政会）³²的崛起。民政党鼓吹财政保守主义和自主外交，谴责职业外交官盲目追随英美，损害了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利益。然而，加藤内阁的存在有赖于普选制的胜利和宪政三党（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的团结。结果，他的政府比原敬

内阁更加彻底地贯彻了分肥制原则。民主主义作为理想，最终总会落实为经纪人统治的现实。加藤内阁的产生和存在，仿佛就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提供证据。他鼓吹自主外交，却不得不将外务省分给币原³³；谴责原敬的软弱，结果扩大了不干涉政策；鼓吹财政保守主义，却促成了“官民一心”的凯恩斯主义产业政策。泛亚主义在每一次选举中都是票房春药，却在每一次政党分肥中都遭到出卖。三十年代的泛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民主绝望，转而乞灵于天皇和人民的反资本主义联盟，与其说是由于原敬的软弱，不如说是由于加藤的背叛。

高桥是清在原敬内阁出任藏相，历任藏相、首相、工商大臣和农林大臣。十五年来，计臣不是他本人就是他的朋友。无论民政党执政还是政友会执政，都只能在他搭好的舞台上举行歌舞伎表演。他的财政路线追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以积极财政造成人为的景气，弥补战争景气消退留下的空白，以牺牲帝国防务为代价增加国内福利，以牺牲预算平衡为代价改善国内就业，赢得了“日本凯恩斯”的绰号。“高桥三原则”仿佛出自凯恩斯本人的口授：“废除金本位制”，“用无需纳税人同意的国债代替纳税人同意的税收作为财政新基石”，“依靠通货膨胀制造有利于选举的经济繁荣”。财政对宪制演化的规范作用之大，没有任何其他因素能够相比。无产者赢得了阶级斗争的胜利，才能颠倒光荣革命的原则，强迫纳税人供养自己，使增加就业和收买选票变成同一件事。

2. 大众民主与绥靖主义

凯恩斯主义能够盛行，本身反映了纳税人-有产者选民团和混合宪制的末日，既是大众民主制胜利的结果，又是大众民主制进一步侵蚀宪制平衡的原因。平民政治的经纪人需要政治红利，也就是用财政扩张造成的就业扩张收买无产者的选票。优秀的经纪人善于将全国有产者的税收集集中到最敏感的几个摇摆选区，以最小的投资将最多的摇摆选区争取到自己的党派一方。整个游戏的规则就是牺牲比较有原则的阶级、地区和团体，收买比较机会主义的阶级、地区和团体。殖民帝国虽然集中了国民的精华，却不足以构成有效的摇摆选区，完全从政治精算师的收支表上消失了，构成政体退化最敏感的晴雨表。凯恩斯财政家需要无产阶级经纪人的提携，平民领袖依靠凯恩斯财政不亚于武士依赖刀剑。二者同样需要绥靖主义外交，不亚于绥靖主义外交家需要平民领袖的保护和凯恩斯财政家的支持。高桥-原敬-币原形成珠联璧合的三位一体，对国内宪制和国际秩序的侵蚀不亚于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和凯恩斯本人。

币原喜重郎在原敬内阁和华盛顿会议时代，即以驻美大使和全权委员身份执国柄，犹如十年前的西原（龟三）和十年后的石原（莞尔），反映了明治宪制的缺陷。他出任外交大臣以后，将国际协调主义总结为“币原三原则”：“英美协调主义”、“大陆不干涉主义”和“经济外交”。1924年6月，新任外相的演说给加藤外交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第一，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尊重各国正当的权益，以维持世界和平；第二，尊重外交政策的前后相承，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第三，改善对美、对苏关系；第四，在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的原则。”³⁴他的箴言是：“外交不单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谋求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同样是外交的重要任务，特别是从我国目前情况看，更应把外交的重点放在国际关系的经济方面。目前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是朝野一心，振兴对外贸易与本国人在海外的投资企业，以期改善国际信贷关系。”³⁵胡适称他主导的十年为“霸权无害”时代，其实其主要效果就是将亚洲大陆让给了苏联资助的国共两党。日本以其特有的一丝不苟，履行了1927年条约的各项义务，置依赖合法途径的北洋诸将于绝境。如果说威尔逊总统和他的朋友通过九国公约，制造了远东的政治真空；高桥-原敬-币原就通过这项条约³⁶，亲手签署了日本帝国的死刑判决书。

3. 残破的藩篱

地球的阴影一旦遮蔽太阳的光芒，月亮就会丧失它借来的光辉。英日两国一旦抛弃维护条约体系的责任，民国法统随即土崩瓦解。北京政变产生的临时执政府只有一项任务，通过废除法统和国会，取消自身存在的理由。国会政治一旦结束，绅士外交随即烟消云散。三一八事件

（1926）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周鲠生所谓的“流氓外交”取代了十九世纪的“绅士外交”。³⁷“流氓外交”的模式大同小异：策划者躲在暗处，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做人肉盾牌。敌人如果像后来的以色列人一样只挨打不还手，他们就赢得了这场不公正的战斗。敌人如果像段祺瑞大开杀戒，他们就可以躲在安全地带消费刘和珍的死亡。如果有陈西滢³⁸质问徐谦和李大钊为什么专门牺牲别人，就会有鲁迅义愤填膺地叱责“正人君子”的冷血。只要当局无法将幕后人逼出水面，就没法赢得这种不讲费厄泼赖的斗争。在1920年代的远东，“流氓外交”的主要策划者自然是苏联和国民党。“三一八”不是孤立的行动，基本模式早已在沙基惨案

（1925）中演习过了。沙基在广州革命政府的辖区内，苏联军官率领群众冲击租界。英国士兵如果不作为，租界就会遭到暴民的洗劫；如果执

行法律，他们就会遭到进步舆论的谴责。国民党政府如果尊重条约义务，就应该保护租界。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是希望革命群众替他们做到他们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如果成功，租界就归他们了；如果失败，倒霉鬼只会是广州的刘和珍。自称政府的团体如此怯懦和狡诈，不谓之“流氓外交”亦不可得。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革命群众的攻击对象随即指向汉口和九江英租界。英国人这一次不愿意流群众的血，坐视他们闯进租界就不再离开。陈友仁就这样“收回”了“全中国人民的土地”，正如四十年后的红卫兵从他留在大陆的同乡家里“收回”了“全中国人民的财产”。历史仿佛重演了大卫王的故事：他判处谋色害命的坏人死刑，然后发现这个坏人就是自己。

国际社会不再怀疑，同样的模式马上就要在上海自由市出现。各国军舰云集黄浦江上，准备保卫租界。北伐军一进南京，立刻就开始攻击外侨社区。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 J. E. Williams）遇害。美国领事馆遭到抢劫。英国领事Herbert A. Giles中弹。“绿宝石”号舰长Hugh T. England报告英国当局：“暴行无疑是由广州军事当局蓄意安排，由穿军装的武装士兵通过有计划的调动来执行的，而且公然预谋要侮辱所有的外国国旗，驱逐所有的外国侨民。”³⁹联军战舰应美国领事Davis之请，武力平息了骚乱。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森冈正平见证了共产国际的胜利：“一名目不识丁的士兵在我馆劫掠中高呼：‘中苏一家，日英是帝国主义，赶走日本人，他们的财产自然就是我们中国的啦！’”⁴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出电报：“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第二军、第六军、第四十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⁴¹

4. 莫斯科编织蛛网

从此，列强对共产国际海外代理人的政策由绥靖默许转向全球搜捕。9·11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对基地组织的态度也是这样。只有在这种背景下，张作霖才敢闯进使馆逮捕李大钊。公使团领袖欧登科同意张作霖的行动，因为苏联使馆已经滥用了他们的外交特权。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苏联大使馆内发现的文档，暴露了莫斯科通过远东打击列强侧翼的战略。“训令各密探分部（为在各使馆内雇佣侦探事），在日本、英国和美国使馆内招募中国差役及雇员时，对于以下各项最宜注意：（一）汝

所雇佣为我等工作充当侦探之人，总须有用于我。换言之，彼须与使馆内办理重要与机密事项人员（使馆、主官、武官及秘书等）接近。或充翻译员、打字员之人，或使馆各办公室内之差役。”⁴²西方外交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南京事件⁴³就是根据苏联的命令策划的。南京不是苏联代理人唯一的活动地点，他们有非常全面的部署。军事及政治两种密探系统均直接受莫斯科指挥，在华亦通过使馆互相协助。军事密探组织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系。各地共产国际机构，在国民革命军中苏俄顾问人员，均须协助军事密探工作。中共中央执委会、军委会代表，且接受苏俄训令，参加其北京军事总机关部，以从事研究及计划苏俄在中国之军事行动等项工作。

《苏联在华密探局组织法》（极要第一七九卷，原件注明特别密亲递）规定：“扬子江流域上海密探分机关部（第九号）管辖所谓联盟之五省，即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至于与上海联络之地点，则为海参崴、广州、汉口。上海内勤密探部至少须有四人，分布兵营、商埠、兵工厂、领事团。南京至少需有二人，分布督办公署及军营中。杭州至少需有一人，亦密布军营中。安庆至少需有二人，分布督办公署及军营中。南昌至少需有二人，亦分布督办公署及军营中。福州至少需有二人，亦分布督办公署及军营中。徐州与浦口至少均须有一人……南京设外勤密探分团长一人、副团长一人（驻浦口），在海州、徐州、蚌埠、芜湖各设密探员一人、又游行密探员及递信员各三人，共十二人……”汉口密探分机关部（第十一号）管辖湖南、湖北、四川、贵州、青海特别区，联络地点为上海、广东。广州密探分机关部（第六号）管辖广东、广西、云南，联络地点为上海、汉口。哈尔滨密探分机关部（第三号）管辖吉林、黑龙江，联络地点为奉天、海参崴。奉天密探分机关部（第一号）管辖奉天各地，联络地点为哈尔滨、汉城。汉城密探分机关部（第二号）管辖朝鲜各地，联络地点为奉天、海参崴。北京中央密探部（第一号）管辖直隶、山东、河南、察哈尔、山西、山西、甘肃，联络地点为莫斯科、库伦、海参崴、东京……⁴⁴这样的部署与其称为苏联在华的密探组织，不如称为共产国际在东亚的密探组织。

张作霖政权公布的《1925年半年度苏俄在华军政费预算草案》分为四项，包括普通经费（93853美金）、冯玉祥军队经费（148830美金）、国民二三军经费（141240美金）和广东经费。最后一项是开放的，“容再续报”⁴⁵。也就是说随着北伐的展开和莫斯科干预的日益深入，不断追加新的拨款和援助。前三项的币值就已经超过了二十世纪初的一亿人民币，通货膨胀因素尚未计入。最后一项的资助当中，包含了比金钱更

加重要的军械物资。武器的主人不难在东亚农业区收编过剩的人力资源，反过来就不行。8月27日，苏联大使馆通知鲍罗廷：“下列各件业在海参崴备妥：俄国子弹1300000粒。日本子弹12000粒。三寸径陆战炮弹8200枚（无证明需要之文据），过一星期尚有德国制造者7000000枚。W-L火药二百五十普特。三寸径过山炮弹8000枚。十五尊炮应用之预备零件及炮队物件。除预备零件及炮队物件不计外，总计价值564148元。此款须与该货同时交付。江西福建两省边界情形如何，及关于数部归附国民政府之谈判结果如何，希速函告为要。”⁴⁶

鲍罗廷和罗嘎乔夫出席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⁴⁷。鲍罗廷和加伦主持广东军事会议，决定向蒋介石、朱培德、陈铭枢的部队派出苏籍参谋长、政务处长、军务处长、顾问和教官⁴⁸。袁世凯或张作霖的内阁会议和军事会议，从未将如此众多的要职交给外籍顾问。党军战斗力的提升不仅应该感谢布尔什维克的金钱和组织，更应该感谢苏联军官输入的一战军事技术和共产国际独到的社会性战争技术。北洋系老将的军事技术直接（例如段祺瑞）或间接（通过日本）来自十九世纪末的普鲁士军官，在1920年代已经明显落伍了。阶级斗争理论将所有和平居民都变成了军事目标，赋予匪谍随时发动超限战的自由。资产阶级政权直到冷战结束，都未能扭转特务活动方面的绝对劣势。联省各邦泥守十九世纪的战争规则，在不按牌理出牌的新型敌人面前不知所措，不下于二十一世纪的民族国家面临反恐战争。

“现在无论如何不能稍事迟疑，且宜再加发展，更为深进，多招密探员，巩固已成之密探事业，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三月以内，首应办理之事件如下：

一、各密探分部人员应扩充至全额，上海、汉口密探分部尤宜特别扩充之，以巩固其地位。

二、应即行着手组织满洲、北韩之外勤密探机关（根据预定计划至少须有三人），以便得以研究日本及张作霖对于苏联及北京（国民军）预定作战之趋势。此外对于吴佩孚之主张，自扬子江向南或向北之事件，至少需设外勤密探分部二处。对于孙传芳、阎锡山、河南等处，需各设外勤密探分部一处。总计共需设外勤密探分部约为十处或十二处。

三、于以上所述各处，应将内勤密探机关照预定计划扩充至百分之七十五。

四、现在应设速成科三处，每科十人。征集强健之国民党人，或华籍共产党人入学，以便造成外勤分部密探长，或各密探分机关之密探员。

五、派同志五六人（以通晓东方语言情形之大学学生为宜）赴中央密探总机关部（或重要关系之地方分机关部）实习，以便造成密探干部事务人员，而免临时招募。

六、派已受训练和可靠之东方大学中文班毕业同志五六人（以熟悉军事者为宜）赴中央密探总机关部实习，以便将来可充各密探机构之翻译员。

其余各项密探机关之组织等事，应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三月以前一律实行。”⁴⁹

北伐对共产国际而言，是全球性战争的一部分；对满洲（张作霖）、十四省联军（吴佩孚）、五省联军（孙传芳）和湘军（赵恒惕）而言，只是本土父老的反侵略战争。大小、强弱相去悬殊，未战而胜负已分。何况强者在暗处，弱者在明处；强者无底线，弱者有底线。

5. 沉睡的看门狗

列强当中，只有日本有能力及时和全面地了解共产国际的渗透情况。然而币原外交的消极犹豫，跟英格兰对低地国家事务的敏感迅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森冈和币原极力为蒋介石辩护，希望列强给国民革命军的温和派一次机会⁵⁰。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支持币原政策，有效地破坏了皇家海军的干涉：“要在英美各国与蒋介石之间进行斡旋，努力寻找和平解决之方案。故而要尽全力促使英美两国持冷静态度。”⁵¹南京事件证明庚子以后的列强集体行动机制已经瓦解，打开了通向济南事件⁵²和九一八事件的道路⁵³。协调主义的支持者从来没有超出特殊利益集团和上层开明人士的圈子，随着大正时代群众地位的上升，自然越来越脆弱，现在终于到了临界点。政友会抨击币原丧权辱国，日本国内的主流舆论从此开始转向⁵⁴。币原和继任外相田中都苦劝英国人相信蒋介石⁵⁵，而蒋介石却坚信田中毫无诚意⁵⁶。

国民革命军在日本绥靖政策的鼓励下，制造了更加恶毒的济南惨案。国

民党驻日本的特派员殷汝耕报告：“我军对日侨剥皮、割耳、挖眼、去势、活埋、下用火油烧杀、妇女裸体游行当众轮奸等事，日人言之凿凿，其所转载京津、伦敦、纽约各外报亦均对日同情，归咎于我。一般空气异常激昂，认为巴黎、华府会议以来，华对日极轻蔑，从前如关税会议及不干涉主义一类软和外交不特不能见好华人，而反遭辱。”⁵⁷

由于这次暴行发生在清党以后，蒋介石无法运用“共产国际破坏”的万能借口。此后几年，国民政府在远东扮演了魏玛民国在欧洲的角色。从《白里安公约》和关税会议开始，四分五裂的协约国竞相出售更大的让步。每一次让步都提高了挑战者出售和平的要价，最终导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完全瓦解。币原在南京事件当中出卖了英国，导致协约国在上海联合行动的计划破产⁵⁸，恶果却落在田中义一头上。蒋介石像苏伊士危机时期的纳赛尔一样，不出所料地得寸进尺，将列强释放的善意转化为自己的革命资本。日本在济南事件当中遭到竞争性绥靖的报复⁵⁹，不得不孤军奋战、虎头蛇尾，预演了美国从苏伊士危机到越南战争的命运⁶⁰。列强的公正和大正民主的可靠性在日本国内面临日益升高的质疑，最终导致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逆变。

1928年以后，外务省“尊重九国公约主旨，执行对华时局共同协议”的《时局处理方针》沦为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泛亚主义在过去十五年间日益衰微，现在又获得了新的力量。明治维新时代的武士精神已成昨日黄花，但青年社会主义运动填补了老一代人留下的空缺。

6. 日本的激进化

日本自开化以来，一直深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斗争之中。从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和角度看，日本既然侥幸融入国际体系，获得了荣誉欧洲国家的地位，就应该以正常国家自居，在现有国际体系内部追求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条路线的问题在于，正常国家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西方中心的概念。日本精英有理由担心：如果接受了这种路线，日本的特殊国体还能不能保存。现实主义者既是开化政策的主要既得利益者，又是特殊国体的主要既得利益者。东食西宿，态度自然暧昧。暧昧的角色难以胜任引导国民的任务，因此提不出理直气壮的国家使命。

非既得利益者只能向振亚社和玄洋社寻找使命，曾根俊虎和副岛种臣的高见大致如下：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以物质利益为本，对包括日本

在内的落后国家具有侵略性。东方文化强调以人为本，不能因为暂时的弱势而丧失自信。日本现在迫于形势，只能接受西方游戏规则，但有朝一日发达了，绝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性老路，而是要用王道的精髓提携那些不幸的东方兄弟。与孙文同辈的日本泛亚主义希望提携革命党人，将大清赶到长城以外，将俄罗斯赶到黑龙江以外，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新东方文明圈，结束西方对远东的统治。在清日两国的泛亚主义者看来，这正是上天赋予他们的使命。只有这样的伟大事业，才配得上他们艰苦卓绝的牺牲。

大正民主为敌视资本主义的舆论提供了充裕的发展空间，奇妙地促成了新旧激进思想的合流。内田良平的继承人大川周明和石原莞尔粉墨登场，试图修改日本和世界的亚洲想象。1930年，樱花会宣布：“审视当前社会形势，我们发现高层领导人道德败坏，政党贪污腐化.....统治者为了博取外国势力的欢心，置国家的长远利益于不顾，对外扩张毫无兴趣.....人民渴望一个真正基于民众利益，以天皇为中心，强有力的廉洁政府的出现.....我们将为了改造统治机构，扩充国家实力而奋斗终生！”昭和研究会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不仅将国族构建的历史必然性赋予远东各族群，而且将国族发明的世界化解释为反殖民主义的正当性。竹内好致力于解构明治维新奠定的“优等生文化”，希望借助反帝使命恢复日本的主体性，将非西方世界从灵魂分裂的厄运中解救出来。北一辉在苏联的启示下，提出了阶级斗争国际化的高论，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手中夺走了世界革命先驱者的天命，交给有色人种的工会委员长。这些理论扬弃了旧泛亚主义的儒家色彩，剽窃了列宁的理论框架，反过来将苏联和英美一起划入国际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范畴，将日本例外论、革命性和正当性融为一体，一举解决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长期斗争。日本只要接受等待已久的亚细亚使命，就能由世界旧秩序的学徒升级为人类新纪元的导师。西方个人主义和政党政治造成的弊端就此一扫而空，犹如天皇-太阳的光芒越过阴霾温暖众生。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包括如下内容：

甲，对内

一、经济方面

- 1、每户财产以一百万元为限，逾限则收归国有。
- 2、每户土地以时价十万元为限，逾限由国家发行公债收买之。
- 3、私人企业以一千万元为限，逾限归国家经营。

二、政治方面

- 1、拥戴天皇，协同国民实行改造国家。
- 2、贵族院改为审计院；众议院改为国家改造议会，实行普选；罢免全国原有官吏；废除华族制度。

三、军事方面

仍实行征兵制，造成拿破仑式之军队，兵士和军官一律受平等待遇，并优待士兵之家族。

乙，对外

一、对亚洲

如中国、印度、澳洲、满蒙、西伯利亚、南洋诸国，应助其完全独立，脱离欧美列强羁绊，成立亚细亚民族之联盟，籍以统一全亚洲，以中国为对俄之前卫。

二、对欧美

首先打倒英国，夺取香港、澳洲，并助印度脱离英国而独立。日本海军则应与美国平等。

7. 泛亚主义及其盟友

小矶国昭、荒木贞夫、久原房之助、后藤隆之助体现了新泛亚主义的外围或基础，在日本社会的中层形成了广泛但不坚固的网络。他们与其说是先知和理论家，不如说是情怀尚在的实干家。他们看到田中内阁深陷币原外交和革命外交的夹缝，既不能重返亚洲，又不能放弃满蒙，徒劳地寻找越来越不可能存在的“稳健势力”，预感到珍贵的决断时刻即将来临，开始在体制外做第二手准备。他们没有忘记辛亥前后的国际主义精神，知道国民党元老派对依靠苏联暴发的后生晚辈并不心悦诚服，知道泛蒙古主义正在寻找自己的领袖，知道二十年代以后的穆斯林复兴运动正在深入中亚，不可能放弃瓜分条约体系遗产的大好机会。大正天皇驾崩后的几年间，明治时代遗留的元老相继去世。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爵在新君和陌生的世界之间孤立无援，仿佛预示了日本不久后的命运。

阎锡山早在清末留日时期，就非常佩服老师板垣征四郎和同学土肥原贤

二⁶¹。他秉着“实力可随主义而膨胀，主义须赖实力以保护”⁶²的原则，在三晋实践“亚洲人的亚洲主义”，“联合亚洲民族，用革命的手段，驱逐白种人的统治……消除侵略主义者，以进世界于大同”⁶³。他即使在北伐以后都不大尊重蒋介石新造的大中华思想，企图复兴辛亥传统的泛亚精神，用“亚洲解放革命党”继承和更新同盟会的理想，建立“亚洲民族大同盟”，“推日本为盟主，使亚洲各盟国各得其所”⁶⁴。唐绍仪以孙文和犬养的同侪自居，对孙文思想的原始面貌非常了解，深知蒋介石抵抗的日本理想正是孙文临终前求之不得的梦想，本身就足以构成三民主义新解释的障碍。他为人精明谨慎，并不公开鼓吹泛亚主义，但他在民国初年一直从事联日反袁的工作，路径和关系都已经根深蒂固，女儿和亲家都是公开的亲日派，自己又深得粤桂诸将的尊重，纵有匹夫无罪之名，难逃怀璧其罪之实，最终惨遭军统的毒手⁶⁵。孙总理留下的泛亚主义基因给国民党大中华主义留下了无法摆脱的负面遗产，只有马列主义给共产党大中华主义留下的类似遗产才能相提并论。

辛亥革命解放了酝酿已久的泛蒙古运动，启动了博克多格根十五年前的预言⁶⁶。俄、日、中三国对待蒙古国族构建的态度，酷似德、俄、奥对待波兰国族发明的态度：日本扮演了类似哈布斯堡的角色，在其势力范围内保留了最多的蒙古贵族特权，最愿意保护蒙古的文化独特性；俄罗斯扮演了德国的角色，自以为将欧洲因素传播到更加东方的属地，足以构成征服和同化的正当理由，这种以其自鸣得意的态度激起土著的反感，大大抵消了近代化建设唤起的赞赏；中华民国扮演了俄罗斯帝国的角色，比属国更加东方和软弱，依靠蒙古内部部落伍者恐惧欧化的感情，拖延却无法阻止日益上升的分离主义。1918年，第一届泛蒙会议在上乌丁斯克（乌兰乌德）举行。不久，第二届泛蒙会议在大乌里车站举行。布里亚特人效法毕苏斯基，提出了“三帝解体、三蒙统一”的纲领。李大钊和冯玉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党。

日本泛亚主义者深感时间紧迫，如果不能及时扶植东蒙，满鲜堡垒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他们看到币原的隔岸观火、高桥的自坏长城，越来越难以克制，甚至开始鼓吹效法北美十三州，脱离企图限制他们西进的母国，在大陆上建立共和政权⁶⁷。

泛图兰主义⁶⁸跟俄罗斯欧亚主义和日本泛亚主义关系密切，在思想上难分彼此。泛亚主义的感情内核建立在嫉妒和敌视西方的基础上，自然对半东方的欧亚主义和泛图兰主义怀有同病相怜的阶级觉悟。克里米亚战争刺激了俄罗斯鞑靼人的文艺复兴，因为他们的地位酷似突厥语世界的

犹太人。背井离乡的命运有效地激活了启蒙主义性质的民族发明，跨国散居的现实有利于诸图兰共同体的想象。他们发明的图兰各民族包括了西方的匈牙利和东方的日本，令奥斯曼主义黯然失色。鞑靼知识分子虽然失去了克里米亚的葡萄园，却赢得了中亚“各民族教育者”的荣誉。齐亚·乔加勒夫渴望的大图兰没有实现，但1920年代的播种毕竟给高加索、浩罕和六城的新民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灰狼党和行动党⁶⁹的朋友没有忘记为满洲和陕甘的穆斯林社区发明身份，恰好符合日本泛亚主义者在大陆扶弱锄强的倾向。太宰松三郎的《支那穆斯林》和后藤英男的《满洲伊斯兰教》虽然并不支持泛图兰主义想象，却鼓励了东洋和内亚的图兰主义者。日本穆斯林山冈光太郎和田中逸平集日本人的执着和穆斯林的虔诚于一身，开东洋伊斯兰信徒赴麦加朝圣的先河，为二战前夜的“图兰热”推波助澜。小林元的《回回》点破了泛亚主义和泛图兰主义的纽带和应许：

“满支蒙的回教徒们也必须正视这种现代化道路，不，他们难道不应该调整自己的新生活，沿着自己的新生之路向前迈进吗？他们不能再可悲地坚持着消极保守的立场了。我曾看过斯丹巴厄监制的《求救者》这部电影，我记得在它的结尾，是求救的人们向着初升的太阳迈步向前的场面。初升的太阳是‘明日’之光。作为‘求救者’的满支蒙回教徒们也应该沐浴着朝阳之光，实际上他们也正在追求着。被称为‘识宝回回’的回民们具有鉴识现代化瑰宝的能力，这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我期待着看到回民们沿着现代人生活之路前进，寻求新太阳的雄姿。但是，在亚洲地区，现在像太阳般光芒四射的是我们日本，日本国旗是冠绝世界的‘太阳旗’。”⁷⁰

三、国民政府的历史——国族建构和区域霸权主义

本节引言：

二十世纪争夺远东的三股势力当中，新国民党是最弱小的。俄罗斯自拿破仑战争以后，一直是只有大英帝国可以令其退避三舍的超级大国。共产国际耗尽宿主的资源，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日本帝国虽然是列强当中最弱小的一员，毕竟是东亚区域的最强者。国民党在蒋介石时代以前，一直是日本泛亚主义者或共产国际的附庸，并无跟两个保护人竞争的实力。共产主义者和泛亚主义者都希望接管大英帝国和条约体系撤退后的遗产，愿意利用国民党作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白手套，但绝不允许国民党获得分庭抗礼的机会。蒋介石政权企图通过重新发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对抗共产主义国际共同体和泛亚共同体。他在两强的夹缝中粉身碎骨以前，竭尽全力地吞并和破坏东亚大陆残存的各个自治体系。

1. 蒋介石的赌注

早期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一直是日本和苏联的学徒，几乎没有堪称独创的理论。蒋介石在1927年孤注一掷，打乱了共产国际的部署²¹，进而借助宋美龄和基督教的公共形象，不仅赢得了英美舆论的零成本掌声，还实现了毁灭金融、海关和租界自主权的自杀性胜利。大英帝国率先抛弃远东，宣布了“对华新政策”：“不干涉中国内部纠纷，同情强有力的国民运动”²²。鉴于大英帝国和国际联盟倡导的武器禁运首先惩罚了遵守规则的北洋政府，然后又宽恕了破坏规则的共产国际和北伐军，绥靖政策对革命外交发挥了火上浇油的鼓励作用，丝毫不足为奇。列强一旦承认了蒋介石革命政权的合法性，宋子文就利用列强的承认消灭自由贸易体系的残余。“国务院放弃了华盛顿会议已经建立的合作政策，突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商定单独的关税条约，并开始向中国人要求结束治外法权的压力屈服。”²³中美《关税协定》签署后，英、法、意相继跟进²⁴。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在东亚外围地带落下帷幕，正如十五年前的欧洲核心地带和三十年后的南洋边缘地带。每一次谢幕的始作俑者，都在接踵而来的洪水中自食其果，然而错误的因果关系认知颠倒了成功和失败的标准，驱使意识形态的牺牲者为弥补失败而追求更大的失败。

1929年5月到1930年5月，中日两国完成了修约谈判。这是革命外交和币

原外交的巅峰时刻，但日本国内的政治平衡因此破坏。反动接踵而来，日本一变为主要的“条约破坏者”。入江昭对日本三十年代革命领袖的分析，其实同样适用于国民革命的领袖：

“在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内，列强在稳定相互关系，组鼓励以经济而非军事手段相互打交道以及通过一步步把中国整合入全球经济秩序来吸引中国民族主义等方面大体是成功的。正是这种成功促使日本的一些势力——陆海军军官、右翼组织、排外主义知识分子——不顾一切地冒险。它们在国际体系和全球经济秩序中看到的仅仅是灾难：国际体系在逐渐向中国做出种种让步，而全球经济秩序则把日本这个国家的繁荣与不断波动的贸易平衡和兑换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谴责日本的领导人制造了这样的形势：这个国家的命运越来越依赖于列强和中国的善意。除非采取某种行动，否则日本不久就会完全受这些外部力量的支配。日本反国际主义势力看到了唯一的解决办法：通过用武力赶走信奉国际主义的国家领导人来扭转国家政策上的这一趋势以及在中国行动时不受华会条约的约束。他们判断30年代初是完成这些任务的时机，也许这是这样做的最后的机会。”⁷⁵

蒋介石政权在苏联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驱使下，被文学青年无限热爱的“新气象”冲昏了头脑，英勇地跳进了凯末尔侥幸脱身的泥潭——同时向共产国际和帝国主义挑战。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凯末尔迁都安卡拉为蓝本，意在抛弃辛丑条约-海峡公约保护的京津走廊-黑海咽喉，在列强鞭长莫及或不感兴趣的亚洲内地建立新邦，可惜画虎不成反类犬，不肯效法凯末尔成功的关键秘诀——

凯末尔从革命外交转向国际协调的心路酷似汪兆铭，达达尼尔战役(Dardanelles Campaign)和长城抗战的惨烈牺牲发挥了关键性的刺激作用；凯末尔从联俄容共转向抗俄剿匪的心路酷似蒋介石，洛桑觐觐事件和上海滩密谋发挥了关键的刺激作用⁷⁶；奥斯曼帝国和大清、青年土耳其党和国民党在世界格局当中的地位有一定的相似性，至少足以使苏联和国民党都有意识地以此为参照系。内亚切割和剿匪决断具有互为因果的性质，因为正如安娜·科穆宁娜公主⁷⁷所说：即使你是赫拉克勒斯，也承担不了两线作战的重负。凯末尔身为青年土耳其党的中坚力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有不小的责任，在达达尼尔海峡血战澳新军团，目睹奥斯曼帝国和恩维尔帕夏的末路，决心不再重蹈覆辙。他在1921年屠杀了土耳其的李大钊（穆斯塔法·苏布希）及其同党以后，就明白自己已经用完了二三其德的资本。摩苏尔问题和亚历山大勒塔问题解决后，他重

新想象的新土耳其民族完全切断了内亚帝国的羁绊。《蒙特勒公约》签署后，土耳其共和国扫清了重返国际体系的障碍。凯末尔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培养了欧化精英集团的传统，足以在他身后守护他划定的路径。

2. 国民政府的蓝图

国民政府在1928年以后的短暂蜜月期，一度有过类似的机会，但他们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原因绝不是大清的內亚遗产比奥斯曼更多。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发明⁷⁸将新国民党变成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和恩维尔帕夏的合体⁷⁹，至少从理论上要求国民党承担共产国际和泛亚主义在远东的全部应许。梁启超的奥斯曼主义是为大清帝国转型为中华帝国而准备，非常乐意将韩国、台湾、南洋的诸夏留做大英帝国和日本帝国的自治领。日本的泛亚主义虽然要求解放亚洲各民族，却没有统一众多假定同盟国和卫星国的意图。共产国际一开始就将民族解释成资产阶级发明的虚假共同体，遮蔽了真实的阶级共同体，将建构者的负担变成了解构者的资源。新孙文主义者自以为能够结合三者的优点，扮演黄雀在后的角色，实现弯道超车的使命。于是，孙文同时继承了尧舜周孔、林肯列宁和明治维新的道统。新中华民族同时包括了大清的蒙古盟友和大英的马华社区。三民主义先锋队同时承担了将蒙古、印度和韩国从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和泛亚主义魔掌中解放出来的使命。

理论家可以天马行空，实干家则必须分清主次。三民主义先锋队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蒋介石的答案完全不同于斯大林和凯末尔。他否定了“一国建设三民主义”的“革命终结论”，坚持反帝斗争仍然是国民政府的核心任务：

“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难道中国除却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就没有被压迫的民众吗？对于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的被压迫民众，尤其是被帝国主义者所压迫的民众，本党就可以任其受痛苦，而不代表其利益吗？我们只知本党有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绝对不承认有代表农工单一阶级利益的理论，更不能有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⁸⁰

那么，什么是国民党维护的中国民众呢？《中国之命运》虽然在四十年

代才定稿，但并非不能反映蒋介石在其黄金时代就已经形成的思想脉络。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在三千年前，我们黄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诸流域，有多数宗族分布于其间。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较多，宗族的组织，更班班可考。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在中国领域之内，各宗族的习俗，各区域的生活，互有不同。然而合各民族的习俗，以构成中国的民族文化，合各区域的生活，以构成中国的民族生存，为中国历史上显明的事实。这个显明的事实，基于地理的环境，基于经济的组织，基于国防的需要，基于历史上命运的共同，而并不是全出于政治的要求。”⁸¹

三民主义者一面破坏殖民主义残余秩序，大大缩短了本来就已经所剩无几的喘息时间，一面醉心于如此复杂而矛盾的构建，终于淹没在各种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洪流当中。

3. 条约维护者的后退

国民政府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宗旨，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就是消灭上海的自由资本主义和自治政体。宋子文建立的中央银行、公债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币制委员会将民初二十年积累的资本罗掘俱尽⁸²，为南京政府的统制经济和债务财政奠定了基础。没有进步主义者的汲取技术，蒋介石不可能削平群雄、力争内亚⁸³、抗战建国。清党尚未结束，上海资本家就不得不面对袁世凯时代闻所未闻的勒索。“款数过巨，复电措辞甚难，……俟委员会诸君筹议后，按实电复。”⁸⁴“自清党以来，……而前辙依然，故吾犹是。其较为明了者则曰：训政方当期月，责备未可过严。其属于谨愿者则曰：彼此同属一丘，改革已经绝望。且事实俱在，尽有优渥之口惠，奚解现时之倒悬！”⁸⁵《字林西报》一再用“批判的武器”鞭打欲壑难填的国民政府，但大英帝国的军舰拒绝保护他们。工部局（上海市议会）既然已经允许共产国际以自由市为基地，从事颠覆华界的革命活动；现在很难拒绝军统的特工人员如法炮制，在租界行使类

似黑帮或恐怖团体的制裁权。上海自由市的纳税阶级为了购买人身安全和业务自由，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

二十年代末，“上海问题”构成远东问题的试金石。条约破坏者和条约维护者虎视鹰瞵，唯大英帝国马首是瞻。1929年费唐调查团来沪以前，工部局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⁸⁶。1927年5月，Finlayson备忘录设计了Free City of Shanghai方案。Free City of Shanghai以国际联盟保护的Free City of Danzig（但泽自由市）为模板，要求中外各方合作维护远东的自由贸易中心。所有各方都应该“真诚地承认正是外国人的首创精神、外国的企业、外国的管理和外国的保护造就了今天的上海。”⁸⁷The Greater Shanghai应该以吴淞为圆心，包括半径三十英里以内的所有地区，远远超出了工部局治下的旧自由市范围。理事会依据国联批准的法律或规章，由中、英、美、日、法、德、意、瑞士各国人士组成。各国理事的人数，由国联根据各国的商业、资本的利益确定。在任何情况下，某一国籍代表的人数不得超过其他三个国家代表的总人数。理事会由Free City of Shanghai的纳税人定期选出，然后互选产生理事会指导的行政管理机构（类似原先的工部局）。国际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保证Free City of Shanghai的中立地位，Free City of Shanghai有权组织一支由国联军官指挥的小型军队。Free City of Shanghai作为国联保护的部分主权邦国（Quasi-State），司法、财政和税收独立于中华民国和其他国家。英国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建议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不要接受，因为他预期中国和美国都不会支持⁸⁸。

1929年3月，亨特雷·戴维森(Huntley Davidson)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The Free Port of Shanghai方案。The Free Port of Shanghai由国际委员会管理，华人占据国际委员会的一半名额。The Free Port of Shanghai的治安由国际警备队保护，直至中国政府表现出履行条约义务的意图和能力。只要租界时代的安全和信任得以恢复，The Free Port of Shanghai就可以交给中国保护。The Free Port of Shanghai的日常事务由华董负责，除非外籍董事感到有必要提议采取积极的建设性行动。上海英国商会和上海工部局英美籍董事认为他的计划不仅切实可行，而且还有多方面的附带好处。The Free Port of Shanghai摆脱了各种政治纠纷的牵累，有助于稳定全局。中国社会的建设性力量将会获得利益，政治家也会发现履行条约义务的好处。合理的民族主义诉求可以得到满足，英美的原有政策也不会受到损害。国际委员会本身就是自治能力的训练所，将会为将来的合作培养良好的基础。他们担心外交部会重复处理汉口外滩问题的绥靖政策，将上海出卖给蒋介石。他们的恐惧果然应验了，英国外交股官员

维克多·韦斯利(Victor Wellesley)断定戴维森的计划纯属纸上谈兵⁸⁹。

1929年4月，一份怀特(Alexander Frederick Whyte)备忘录向英国外交部建议：逐步增加华董数额和工部局机构中的华人成员名额，由此训练华人参与市政管理的能力。英国应该鼓励工部局与中国签订协议，以此为基础解决上海问题。华董应该在增加权力的同时，相应地增加责任。英国政府应该切实履行制裁的权力，保证协议的执行不会受到干扰。“首先必须有足够的远见展望我们真正的努力目标，并且在拟定政策过程中有足够的勇气支撑我们的判断，这判断部分依赖我们的常识，部分依赖我们的善良愿望，部分依赖运气，部分依赖在合适的时机使用武力。其次，要敢于说不害怕混乱。总而言之，我们会使用武力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⁹⁰所谓的混乱显然包括了国民政府引以为荣的“流氓外交”和共产国际的暴力勒索，二者都是维也纳体系瓦解的附带后果。皇家海军如果确有保卫条约体系的决心，本来是应该在1926年和1927年之间果断干涉的。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最佳时机已经逝去。

驻华公使蓝普森给张伯伦的建议纯属敷衍，他说：“怀特备忘录的总原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能否与中国人达成协议，原因是目前无法确定这个协议的底线，因为这个协议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它既能令中国人满意，又未超出英国和其他列强认为安全的范围。那么能够让中国人满意的限度在哪里？如何保障这个新协议的实施？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目前尚无良策。”⁹¹1929年5月，蓝普森根据自己的调查得出结论：“在现阶段，由于我们面对的情况是随着中国的国内政治及其与列强的关系的不断发展和演化而变化的，因此，任何一种试图将租界的管理权渐进地交给中国人的计划或者程序都是无济于事的。”⁹²孤立无援的工部局从此苟且为治，只求保护外籍纳税人的生命财产，一步一步抛弃了保护华人居民的义务，最终毁灭了自身存在的根基。

4. 国民政府的巅峰时刻

1928年，工部局董事会同意国民政府向界内华人征收卷烟税。1930年，上海特别市土地局单方面宣布大清和民国以前发给租界居民的道契停止生效。美国领事克宁翰(Henry Quelch)抗议这种践踏1854年《土地章程》的武断行径，然而工部局还是承认了土地局的重新注册制度。土地财产权是所有财产权的核心，尤其是上海自由市所有宪法性文件当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一环，先于条约体系和民国宪法而存在，本身就构成了

二者的基石。依据光荣革命时代的游戏规则，这种肆无忌惮的抢劫足以构成革命和战争的充分理由，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叔季之世，反而变成了左派作家指控国民政府代表资产阶级的证据。毕竟苏联和苏区的业主和富农已经进了集中营，上海的房东和地主只是多出了一笔冤枉钱而已。

1931年，上海特别市法院夺取了走私案件的审判权。1935年，南京政府财政部开始对租界华人征收所得税。这一次，革命政府甚至没有费心跟工部局谈判。后者明显已经决定抛弃租界华人，以便交换外籍居民不受影响。这种心照不宣的交易做得说不得，正式的谈判只会让双方都没面子。英国外交家埃里克·台克满(Eric Teichman)预言华人社会无法理解代议制，外籍董事的撤退就是自治政体的末日⁹³。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自由主义-殖民主义体系仿佛在不断上升的洪水面前退却，位居低地的民国法统首先淹没，各地外滩组成的远东汉萨同盟仅仅多坚持了二十年，甚至位居山顶的美国很快都会沦为洪水包围的孤岛。

南京国民政府在其短暂的黄金时代，向它能够接触的所有对手发起了挑战。上海租界和长江三角洲增加的收入难以抵偿粤、桂、晋、满、蒙等各条战线的支出，更无法满足军事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对计划经济的爱慕。1929年4月，《中华民国国防计划纲领草案》进一步提出：“由外交之现势、地理之地位、历史之事迹而判断，将来与我国发生战争公算较多之敌国，首为陆、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山东问题及其他多数利害冲突问题之日本。”1929年10月31日，国府颁布了《兵工厂组织法》⁹⁴。同年，列强放弃了完全丧失意义的武器禁运。毕竟，他们的禁令已经消灭了所有愿意遵守禁令的主权者。革命政府利用犯规所得的奖赏，在三年内进口了价值31413078两海关银的军火⁹⁵。总体战随着1934年的经济计划委员会（国家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和1936年的“三年计划”，终于深入远东的心脏。德式新军和航空兵组建后，国军的战争意志急剧上升。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西克特将军甚至认为，日军不一定能够战胜国军。他为蒋介石争取到一亿马克贷款，购买德国军火和军工设备⁹⁶。1937年战争之所以能够爆发，德国对国民政府的慷慨支援发挥了关键作用。

四、瓜分旧秩序残余资源的斗争

本节引言：

三十年代以前的东亚大陆，大体在条约体系的保护之下。中华民国、联省各邦、特别是各口岸自治市镇的宪政试验，都有赖于大英帝国主导的远东和平。大英帝国撤退后，条约体系的三大挑战者都企图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侵夺这些资源，在另外两个竞争对手壮大起来之前，掌握尽可能有利的地位。上海自由市和内地的军绅自治政权相继沦为国民党的牺牲品。共产国际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扩张网络。泛亚主义者集中力量建设满洲蒙古基地。条约体系遗弃的孤儿一旦瓜分完毕，三股势力的斗争就会白热化。

1. 围绕上海的斗争

只要条约体系和民国宪制的剩余资源尚未瓜分完毕，莫斯科、南京和东京的觊觎之心就不至于正面冲突。三十年代初，三条路线的焦点迅速演化为热点。上海作为最宝贵的猎物 and 条约体系的象征，自然是热点中的热点。

美国既然以《九国公约》的柱石自居，感到自己有义务未雨绸缪。北伐军还没有抵达上海，美国公使约翰·麦克莫里(John MacMurray)就担心汉口外滩事件可能要在扬子江口重演。他给国务院的报告说：美国无论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有义务联合其他列强保卫上海自由市⁹⁷。美国国务院秉承威尔逊主义的精神，提出了“上海中立化”的建议。“美国希望相关列强支持这样的建议，即将上海公共租界设为非武装冲突区，控制着武装力量的相关各方应采取措施，禁止武装力量强行进入租界，甚至在邻近公共租界的地区亦不得驻扎军队。”各国应该保护租界居民的共同利益和外籍居民的人身安全，赋予租界中立的地位和权利。上海的最终地位问题应该通过各方的友好协调解决，美国乐于助谈判一臂之力⁹⁸。助理国务卿纳尔逊·詹森(Nelson T. Johnson)告诉英国驻美大使，美国国务院准备就上海公共租界中立化问题与中国相关各方沟通。他还补充说：租界与英、日、美密切相关，美国准备参加未来的磋商⁹⁹。弗兰克 B. 凯洛格(Frank Billings Kellogg, 《非战公约》的主要推动者)坚决反对使用武力，在欧洲和亚洲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将战场留给了愿意使用武

力的各方¹⁰⁰。

工部局在上海暴动前夜开辟恶例，将界内华裔居民遗弃给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地下组织。地下组织能够行使超越黑帮的实际权力，无需让幕后政治集团承担任何责任，自然构成二十世纪政治败坏的主要因素，预示了亚非殖民地即将面临的命运。上海滩的绵羊陷入这场剪羊毛的竞争，不能不怀念旧日青红帮征收保护费的公正和节制。共产国际在间谍方面的投入和经验远非国民党人所能望其项背，清党没有防止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渗入黑社会和警察署：“在上海静安寺路挂魔术大师招牌，在先施公司屋顶花园公开登台表演魔术，用以掩护身份，吸收门徒，结交流氓及帮会份子，利用公开职业的身份，广揽群众，特务工作的布置，遂得以顺利进行……共特对收买工作颇重视，过去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刑事侦察人员，均有被共金钱收买的，此类被收买者，对我们破案照例会同办理，往往于到达搜捕目的地时，逮捕对象早已逃逸，均为被收买的人员事先通风报信。”¹⁰¹

1930年以前，共产国际和国民党情报机构还存在某种心照不宣的合作。李克农和钱壮飞为南京国民政府特务机构的成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蒋介石和徐恩曾不可能完全没有警觉，然而针对上海和满洲的渗透又是双方共同利益所在，因此合作和斗争尚可并行不悖。1930年7月29日，远东局全面改组，米夫任远东局书记，雷利斯基和埃斯勒辅佐他¹⁰²。这次改组说明斯大林系对老近卫军系的胜利正在从中央向前线扩展。远东局作为国际恐怖分子的一大重镇，早晚不容于斯大林培植的土鳖新阶级。苏联内部的清洗升级后，肃反机构进驻上海。米夫和远东革命的早期负责人相继死于非命。相应地，火并的倾向逐渐压倒了合作。1932年以后，“红队”开始清除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的据点（以色列撤离加沙地带以后，哈马斯对法塔赫采取了同样的策略）：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红队队长邝惠安，率领五个队员，冲进调查科上海闸北分区斯文里的秘密办事处，实行刺杀，结果调查科工作人员王寿喜被击殒命，分区主任赵伯谦夫妇、工作人员郝鸣、吴修均被击重伤。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下午，调查科工作人员四人，路经南京路江阴街，发觉有红队五人在，乃迅速逃至岗警附近，红队仍开枪射击，死一人，伤二人，红队人员则在纷乱中逃逸；

同年五月，调查科工作人员一人，正前往法院，为一自首中共作证，以便保释，行至中途，又被红队击毙；

同年六月十四日，调查科上海区负责人史济美，由京述职返沪，赶往已定之约会，抵沪后即驱车迳赴约会地点，但一下车即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地的红队队员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同年八月十二晚，调查科新任上海区负责人钱义章，到职二个月之后，亦于中华饭店三楼电梯旁，被预伏该处之红队袭击身死。¹⁰³

红队并非战无不胜，《色·戒》主角原型丁默村、李士群就是在刺杀国民党特务陈静的途中败露被捕的。1933年秋到1934年秋，国民党在全国捕获了4505名地下党员，其中4213人叛变，“自首叛变率”高达95%¹⁰⁴。国民党部分出于意识形态的亲合力，部分出于情报人才的缺乏，特别喜欢重用前共产党员，丁、李二人甚至高升到汪兆铭政权情报首脑的位置¹⁰⁵。当然，国民党人更愿意用新三民主义和大中华主义的优越性来解释。“除了极少数（大概是五百比一）顽固倔强的交付法律制裁以外，其余都是给予自新报国的机会，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些从错误道路上挽救过来的青年，他们的服务成绩，一般都是非常优越，而其反共意志之坚决，尤其比一般未入圈套的人强的多，这大概是他们这一番痛苦经验换来的认识。”¹⁰⁶无论叛变的真正原因是不是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倒戈共产党员的贡献确乎毋庸置疑。中统旧人万亚刚在《国共斗争的见闻》书中“谜，还是谜”这篇文章中写道：“即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而论，有三分之一以上，被捕后转变，成为中统的成员。这些从共党过来的人，熟悉共党的地下活动，由于他们的指引，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底，将共党设在上海的地下总部和其他重要机关，全部破获。”¹⁰⁷

2. 共产国际的内陆攻略

斯大林亲自接管共产国际的工作以后，决定中国支部应该重点发展苏区和红军。既然刘存厚¹⁰⁸这样没有外援的帝制余孽都能割据亚洲内地，苏区的能力不应该比他更差。共产国际“为此帮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并力主派遣大批干部和工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¹⁰⁹因此，中共中央不得不迁往瑞金。斗争从上海向内陆各地蔓延，各省的土豪共同体相继落到了沪、吴资产阶级的类似下场。

共产国际和三民主义者经常合作摧毁民初自治政权的残余，也经常为争夺剪下的羊毛而火并。在三十年代初，条约体系-民国法统的残余还比

较丰富，双方以合作为主，共同剪毛，各自表述。蒋介石的战争为共产国际的渗透开路，共产国际的渗透为蒋介石的战争提供借口。到三十年代中叶，南方土豪的资源已经所剩无几，双方在长江流域的关系日益接近零和博弈。蒋介石就用软硬兼施、网开一面、以邻为壑的策略，将红军驱向更加外围的藩属，为他的下一步扩张提供理由。粤军和红军都感到蒋介石对他们的共同威胁超过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威胁，结成了针对南京的攻守同盟¹¹⁰。粤、桂、湘、蜀明显并不乐意为莫斯科和南京的盟约牺牲自己，独立外交的传统仍在发挥作用。

红军的西窜，同时满足了南京和广州的隐秘期望——“更能够在实质上决定红军命运的，还是其对手方的动向。红军和粤方的谈判成功，使其在长征之初事实上为中共开放了西进道路自是重要原因。同时，蒋介石的态度其实也十分复杂。李宗仁就曾谈过：‘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自应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¹¹¹“何、白这些急如星火的建议在蒋这里并未得到认真回应，除象征性要求加强构筑碉堡工事外，缺乏有效的实际行动。以致红军开始西进时，赣州一带防御相当空虚，‘南康县周围百里无国军。’”¹¹²“1934年底除旧迎新之际，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懈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为经营西南根据地张本，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¹¹³“红军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长征的最后准备时，蒋介石却从江西前线撒手西去，开始当时报章称为‘万里长征’的一个多月西北、华北之行……考虑到当时蒋介石正和苏俄寻求更紧密关系，西北之行传达的意思，对中苏、中日乃至国共关系，都透着历史深处一言难尽的微妙。”¹¹²刘湘则直率地指出，蒋介石以剿匪之名行谋蜀之实：“朱毛据遵义时，中央只口头宣称进兵，实则迟迟不到，现匪已经本军击破，而中央军各面如潮涌来，且进驻肥城，殊令人不解。”¹¹³

鄂、赣诸省一开始就在南京政府直接控制下，由于涸泽而渔的便利和军政人员的高流动性，首先陷入群盗如麻的混乱之中。这时，何键、陈济棠、阎锡山等人的辖区尚称小康。蒋介石在开明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的支持下，逐步消灭和削弱各藩属政权，社会解体的范围随之扩大，为红军提供了更大的可渗透区域。中央苏区的幸存和扩大，主要原因在于南京和广州的长期斗争和客军在江西的不断政变。唐生智和何键通过引狼入室的北伐战争，破坏了谭延闿和赵恒惕苦心维护的宪法，结果使乡邦

湖南沦为蒋介石、李宗仁和张发奎争夺的战利品，为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袭击扫清了道路。广东的苏维埃政权起源于汪兆铭和张发奎亲苏反蒋的布局，借助蒋介石打击胡汉民、李济深和陈济棠的机会发展壮大。广西的宪制和文化自成一体，原本没有外人阑入的空隙，由于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挑战和逃亡、蒋介石和李明瑞¹¹⁴的胜利和入侵，才造成了邓小平和百色苏维埃兵变的机会。

3. 竭泽而渔的苏维埃宪制

共产国际在三十年代的实验，给人类的宪制演化留下了两大遗产：干部-群众社会和特务政治。前者消灭和吞食了城市资本主义社会和乡村宗族社会，给苏联发明的超经济剥削技术提供了用武之地。工人和农民解除了失业和夺佃的威胁，得到了强制劳动和军事管理的保障；后者替代了吏治国家的科举制度和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解决了干部集团的管理技术和退出机制问题。干部解除了落第和败选威胁，得到了处决和监视的“保障”。

远东苏维埃宪制面临的政治问题主要是群众和士兵的逃亡¹¹⁵，因为苏区的边界没有像苏联一样关闭。经济问题主要是战争开支和行政开支有增无减，苏联的援助和土豪的财产都难以填补亏空。两者的共同特征就是涸泽而渔¹¹⁶，人力的枯竭和物力的枯竭其实只是苏维埃宪制的不同侧面。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队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¹¹⁷。“据《红星报》第54期的统计，从1933年8月到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扩大红军人数共达112105人。若加上1933年2月后的数目，总共人数大约十七万左右。以中央苏区当时的人口二百五十万来说，这个征集几乎把能当兵作战的青壮年人口都聚集到了红军。”¹¹⁸

苏维埃宪制取消了政治和社会的区别，也就取消了希腊和日耳曼意义上的政治人，将残余的生物人简化为干部-群众-人民公敌三层次。干部在人口当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同时劳动人口迅速下降、公敌人口迅速上升。“庞大的工作人员队伍，使脱产人员比例空前提高……第五次反围剿时，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三四十万人，平均每八个人就要负担一个脱产半脱产人员，民众的负担对象大大增加。张闻天曾经谈道：‘常常有这样的同志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

一点的。”¹¹⁹江西省苏维埃的报告说：“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一用数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实等于分赃形式。”¹²⁰“过去各级政府各自为政，私打土豪，私自开支。有些地方区政府一个月用到一万元，乡政府用到几千元之多。下级埋伏短报，上级提款不动。各地财政收支也不照系统，少先队、独立团、游击队、以及过境红军都可以自由地向当地政府提款，政府也不拒绝。这样必然就会发生贪污腐化的现象，把大部分财政用到无用之地。”¹²¹

“财政来源，专靠于土豪，最后就专靠打富农。可是浪费过度，土豪富农均已打尽。于是由富农打到中农，甚至一时间连贫农只要有少量现金余存储蓄的都打起来了……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没收来的东西（如玉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¹²²富庶的赣南支持不了五年时间，贫瘠的海南连五个月都支持不了。琼崖特委从“屠杀土豪劣绅，根本上推翻其政权（1927年9月）”¹²³和“要彻底铲除封建基础，杀戮土劣地主，没收一切土地，不交租，不还债，政权归农会（1927年10月）”¹²⁴开始，以“现计（1927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东路收入约共六千余元，均系没收反动派财产得来”和“在可靠的乐会、万宁两县，反动派的财产几乎没收清光，不能再筹，各县又只勉强自给，所靠者只有陵水一县”结束，原因无非是“内战时期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没收反动派财产和绑票资本家”和“资本家反动派有了经验，加以防备，因此我们的经济就感到极端的困难”。¹²⁵

私人财产转化为国有财产以后，该发生的事情自然会发生。国有财产的经营者利用专政赋予的垄断权，为自己牟利¹²⁶。阶级斗争的托辞，无法掩饰抢劫和贪婪的现实¹²⁷。所谓理想主义时代的革命者，不幸只存在于文宣部门事后制造的楚门世界中。

苏维埃政权挤干境内的橘子，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1932年6月、10月和1933年7月，由于财政紧张，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60万、120万、300万元。第一期公债大都用抵交土地税方式陆续归还，第二三期基本成为无偿的贡献。如果把1933年发行的300万元公债平摊到苏区约三百万人口中，人均负担将有成倍的增加。1934年苏区政权借谷近百万担，每担以价值五元计算，总值近五百万元。而此时中央苏区人口已下降至二百万人左右。”¹²⁸波尔布特在高棉的业绩，相形之下不免逊色。纸币同样在1932年开始发行，强制收兑了苏区残余的贵金属，然后

像列宁的卢布一样迅速破产。“1933年8月，国家银行纸币发行量为二百万元。至1934年10月中旬，发行总数竟高达八百万元。”¹²⁹通货膨胀犹如脱缰之马，苏维埃政权照例归咎于资产阶级的破坏。1932年的《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第八条规定：“如有人故意破坏信用、破坏价格者，以破坏苏维埃革命战争罪论处。”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煽动居民拒绝使用苏维埃的各种货币，或抑低苏维埃各种货币的价格引起市面恐慌者，或煽动居民向苏维埃银行挤兑现金，或藏匿大批现金，或偷运大批现金出口故意扰乱苏维埃金融者，均处以死刑。”《红色中华》在1933年第106期发表《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金融犯）特别是奸商、地主、富农，从逮捕禁、罚款，以至没收、枪决。”¹³⁰1933年，远东局领导米夫承认：“苏区的经济状况整个地说来是相当恶化了，这影响到革命的胜利。”¹³¹

这种现象并不是张闻天个人的失误，也不限于中央苏区一地。苏维埃所到之处，社会无不残破。有产阶级的消失非但没有减轻穷人的负担，反而使他们赤裸裸地面对专政机构的勒索。列宁主义者汲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出了儒家士绅和旧式军阀所能想象的程度。苏区像挤干的橘子一样，只剩下老弱病残和残羹剩饭。壮丁、财富和粮食，全都落入党手中¹³²。革命初期尚称殷实，有大批土豪可打，¹³³不出五年就残破不堪，只剩下嗷嗷待哺的老弱病残¹³⁴。

赣南和陕北的苏维埃政权从财政角度讲，虽然是远东各兄弟支部的长兄，却并不是共产国际的长子。共产国际给苏区的拨款从1928年的每月12820美元¹³⁵增加到1931年的每月15000美元¹³⁶，超过日本共产党十倍以上，但他们仍然经常有充分理由嫉妒冯玉祥和汪兆铭、甚至蒋介石本人的部属。1933年8-9月，远东局负责人埃维特拨给中国支部245600法郎、61600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和1864荷兰盾。同年10月，共产国际又通过十九路军为红军代购五万员军火和三万元药品。1934年，共产国际命上海局负责人李竹生“成立一个公司，从事贩卖四川鸦片生意，从四川向江西盗卖白银。这样我们就可以为购买江西红军所必需的东西提供极重要的资金援助。”¹³⁷1936年12月2日，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给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要求（向中共）在拨出二百万之外，再提供.....五十万美元¹³⁸。1936年6月，红军抵达陕北后的第一封电报就是：“请你们询问国际，能否每月帮助我们三百万元。”书记处的要求还包括飞机、重炮、高射机枪、步枪、子弹等。1936年12月5日，张闻天再驰电：“你们答应在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

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¹³⁹。苏维埃政权、西北军各部和盛世才政权稳定地接受苏联资助，再加上断断续续接受苏联资助的粤桂各部，占据了中华民国联省领土的三分之二。

4. 列宁党的组织资源

然而，组织资源比财政资源更加重要。从组织角度讲，亲疏和传承一目了然。斯大林控制共产国际后，对满蒙外围的政策日趋谨慎。远方的渗透越来越多地服务于苏联本身的安全利益，充当操纵南京国民政府的筹码。从长时段考虑，这些变化应验了托洛茨基的热月预言。情报机构的成熟和规范，本身是革命内生官僚化¹⁴⁰的证据。周恩来、康生、李克农、陈赓根据共产国际东方部1930年8月通过的《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模仿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奠定了政治保卫局的基本班底。政治保卫局奉行垂直领导的原则，同级党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无权节制。日后的公安部、安全部、社会部、中调部、统战部、外交部、新华社都是这棵大树分出的枝条，构成瑞金-延安-北京红色政权实质宪制的三大柱石之首，稳定性和延续性甚至超过了比较显眼的党、军系统。三十年代形成的基本结构，在以后的几十年间，虽然下游的修饰和变形甚多，核心元素仍然保存了原始的面貌。

精密强大的情报机构和散漫贫弱的原子群众直接接触，将最微不足道的中间团体都尽数删除，包括秦始皇以来任何暴君都不会过问的血缘家庭，将仅有的组织者——干部置于比苏丹家奴和皇室太监更可悲的地位，随时都会沦为群众践踏的人民公敌。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不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但苏维埃治下的群众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贫弱的。纳粹统治的本国社会、甚至征服的战败国社会，都保留了更多的社会层次和团体组织，其中至少包括家庭、教会和私有财产。纳粹不得不任用的军官、法官和外交官能够在党和革命群众之间维护团体的荣誉，甚少面临不公正的审判，更不是苏维埃干部所能比拟的。¹⁴¹张闻天冷静地指出：“我们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根据着革命的需要创造着我们的法律，因此一切反革命的案件，我们不能常常寻找到法律的根据。我们应该首先依靠于当时同反革命斗争的革命的需要，来处置这些案件……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份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把苏维埃法律用来给反革命份子辩护或减轻罪状。”¹⁴²

列宁党能够驯服江湖习气浓厚的红军，政保系统功不可没。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当中写道，红军将领许继慎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¹⁴³。军官好色的普遍性，并不逊于文官贪财。1929年9月8日，何玉琳报告中央：“安、麻、陂、光党里负责人除最少数外，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养成妇女向堕落、腐化、浪漫的方面走。”¹⁴⁴1931年7月1日，方英报告中央：“旷继勋和曾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党布置路线，准备找六个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种种原因，中生的事幸没有完成。在扩大会时，泽民同志提议组织‘审查此问题’，在常委中虽然收集了很大（多）材料，但国焘同志不同意此种小题大做，所以没有通过。红军与苏维埃尚未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尤其对于妇女关系的恶化非常。四军到麻埠时，有七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被红军强奸，十二师卅六团到霍山朱（诸），佛庵要苏维埃主席把（为）他们布置路线，也发生强奸少共青团事件。红军南下时，到各处都有强奸事发生，还有少数女子心（以）为拥护红军是解决性的问题，是唯一要务。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¹⁴⁵列宁党将旧秩序的残渣余孽改造成新秩序的燃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5. 南京国民政府的野望

蒋介石-张学良联盟在其全盛时代，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缺乏起码的认知，迅速沦为自己发明的意识形态牺牲品，致力于自坏长城的事业。他们各自占有中华民国名义领土的六分之一，不断侵夺西方和日本的条约权利，不断破坏各省和各邦的自治政体，不断干扰和打击自发产生的中间阶级。他们一旦清除了包围和保护自己的外交、政治和社会缓冲势力，就要面对凯末尔竭尽全力避免的考验。蒋介石的策略是模仿苏联和利用苏联，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然后在更大范围内重演清党故事。如果他发明的“中华民族”果真像波兰民族一样存在，无疑能够扶植他实现毕苏斯基的伟业。然而历史无情地嘲弄了他的想象，为他准备了哈米德苏丹和恩维尔帕夏的命运。他的抗战布局之所以能够展开，并不是因为他想象的中华，而是因为他不愿正视的苏联。“由于20世纪20和30年代早期大战略的失败，以及日本被假定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威胁，共产党在中国、蒙古及苏联远东地区的努力转为加强领土缓冲地带，以防日本入侵俄国。”¹⁴⁶雷霆极少击中同一个目标，孙文和他的门徒却创造了这样的奇迹¹⁴⁷。新三民主义确实是一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伟大程度往往体现于扭曲受众健全常识的力量。

新三民主义有两块试金石：满蒙和台湾。奥斯曼主义者哈密德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凯末尔肯定会在满蒙的十字路口分道扬镳，泛突厥主义者恩维尔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凯末尔肯定会在台湾的十字路口分道扬镳。只有在奥斯曼主义的前提下，摩苏尔和君士坦丁堡才有可能“自古以来属于同一个土耳其”。只有在泛突厥主义的前提下，塞浦路斯和君士坦丁堡才有可能自古以来属于同一个土耳其。如果你走上了哈密德和恩维尔的道路，凯末尔不会在道路的尽头等待你。凯末尔如果愿意发明自己的新三民主义，完全有机会利用大英帝国的撤退和苏联的扩张，以抗英统一战线领袖的身份联俄容共，从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摩苏尔和塞浦路斯，用本来可以创造小土耳其的资源买下《开罗宣言》的短暂荣耀，然后用塞浦路斯的流亡岁月偿还当年的透支，等待君士坦丁堡的苏维埃政权和尼科西亚的希腊独立分子合拢铁钳。新三民主义者以为意识形态有无穷的力量，足以欺骗神明和历史，犹如欺骗离不开符号的群众，结果只是成功地欺骗了自己。

在此期间，王家桢为张学良主持机要。他的风格模仿陈友仁，不亚于陈友仁模仿托洛茨基。安国军政府时代的日俄平衡、反蒋剿匪变成了排日反苏、联蒋容共，将满洲由东北亚的暹罗变成了关羽的荆州。“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的滑稽戏以其“诗意的公正”，为画虎不成反类犬的“革命外交”开路 and 送终。仅仅“东北国民外交”的辞令，就已经充分暴露了新三民主义者“只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的小聪明。第一层小聪明体现于“东北”，意思是通过国民党地下组织操纵法律上不能染指的关东。第二层小聪明体现于“国民”，意思是通过国民党地下组织破坏日本的条约特权。

国民党的特洛伊木马策略来自过去的革命导师和现在的竞争对手苏联，造成的结果比苏联自己的策划都更有利于苏联。国民党成功地渗入张学良集团的要害，通过国共两党地下组织的共同创始人钱壮飞。国民党成功地将“流氓外交”从汉口移植到满洲，通过国共两党抗日救亡的共同先驱者阎宝航¹⁴⁸。“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以六大宗旨著称：不去日本；不与日本人私人交涉；不向日本出口原料；不使用朝鲜银行券；禁止买卖日货；不雇佣日本人。阎宝航履行这些宗旨，在西京（日本京都）会议上公布了《田中折奏》，有效地消灭了张作霖之死创造的日蒋合作机会¹⁴⁹。张学良为了证明年轻人办事也不差，相应地发出了步步紧逼的密令：禁止向日人出卖土地、房屋（1929年4月）、禁止购买日货（1930年6月）、禁止与日本合办各项事业（1930年7月），并通令禁止日人到

东北内地旅行（1930年7月），通令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东北国民外交协会”最终通过“万宝山事件”，径直向若槻-币原政府提出“收回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要求，置东京的国际协调主义者于死地¹⁵⁰。

帝国主义者饱受革命外交或流氓外交之苦，自然不会过分同情太晚才挨打的新三民主义者。1931年11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西蒙向内阁提交了《满洲备忘录》。英国人以其在不涉及自身利益情况下总是令人钦佩的公正指出：日本在满洲的权益来自日俄战争，远在中华民国成立和国民政府存在以前，却没有妨碍国民政府声索满洲的主权、用不断升级的流氓外交干扰日本人的活动，最终酿成了9月18日的冲突。日本的过度报复违反国联的宗旨，但毕竟事出有因。事件不能视为一国军队跨越边境入侵邻国，因为南满铁路区域属于日本。日本有权在铁路沿线驻兵，保障铁路的通行¹⁵¹。外交部远东事务次官威斯利承认：“根据法律，很难限制日本发展其在满洲的条约权利。”¹⁵²恶人自有恶人磨，英国人犯不着亲自“给猫脖子系铃铛”¹⁵³。麦克唐纳政府训令英国驻外使节，“切忌首先对任何一方提出抗议。”¹⁵⁴

国联调查团认为双方都有不是之处，简单地恢复原状只会重演新一轮冲突，釜底抽薪的办法莫过于建立国际共管的“满洲自治政府”：“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就国联行政院提名单中，指派国籍不同之外籍人员二名，监督警察和税收机关……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中央银行之总顾问……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在外国顾问协助下组织特别警备队，构成境内唯一武装力量。”¹⁵⁵这种方案的精神酷似“上海自由市”计划，实际上就是建立挪威、罗马尼亚式缓冲国，进一步减少大陆出现统一或强权国家的可能性，进一步强化英国仲裁的世界和平。维也纳体系或自由主义世纪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端在列强浸淫绅士俱乐部的精神。问题在于德、奥、俄正统君主制能够做到的，莫斯科、南京和东京的革命政权却不可能做到。后者存在的合法性就建立在推翻国际秩序的使命之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国内宪制和国际秩序隔离开来。

维也纳体系和联省宪制不会对失败者斩尽杀绝，而革命外交的历史任务就是删除失败者。“国民党之外交政策，仍踏袭联俄时代之口号，呼号‘打倒帝国主义’，而实力又不足以副之。徒挑动世界各强国之恶感，初无可以使人惧我之道。外人每詈近年来中国之外交为狂妄夸大，有由来也。平心而论，国民党在外交上之失败，其最大原因，即为轻举妄

动，遍树敌人，无敏锐远大之眼光，纯鹜虚骄之气，事实上本已失败，而犹大言壮语以欺饰国民。”¹⁵⁶中东路事件¹⁵⁷和九一八事件证明新三民主义在东北亚正面战场不是共产主义和泛亚主义的对手，但在内亚侧翼仍然有能力吞噬十九世纪的残余秩序。内亚之于南京国民政府，无异于远东之于共产国际、满蒙之于泛亚主义——三大革命势力都在幻想，侧翼进攻可以替代正面战场的失败，结果都只是延长了失败的时间和牺牲的痛苦。共产主义的溃败或长征路线上，躺着从朝鲜到高棉的牺牲品；泛亚主义的溃败或长征路线上，躺着从菲律宾到新加坡的牺牲品；新三民主义的溃败或长征路线上，躺着从东蒙、南粤到西蜀的牺牲品¹⁵⁸。

6. 次级帝国主义的深入

晋绥和东蒙的纠纷由来已久，在条约体系-五族共和的弥缝之下尚能维持。国民政府在东北亚溃败后，对蒙、晋双方的侵蚀骤然加强。红军这时恰好沿着蒋介石希望的路线，闯入晋绥、西北军、内蒙和穆斯林宁海军犬牙交错的边界地带，发挥了给中央军带路的作用。阎锡山利用他身为同盟会元老在辛亥和北伐期间积累的资源，为晋绥自治政权争取到了相对较为体面的投降条件。这一东亚的模范、秩序的孤岛在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以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著称，给外人留下了酷似瑞士和乌拉圭的印象，现在终于像黎巴嫩一样沦为周边秩序瓦解的牺牲品。西北军一开始就是作为红色蒙古的延伸、远东真主党的先驱而存在的，终于通过制造卢沟桥事变，完成了最初的基因设定。宁海军依靠宗教的组织力，既能压制迪化和延安的红色政权，又能抵制南京的内亚拓殖，一直坚持到冷战全线展开，组织的优势才终于无法抗拒地缘的劣势。

1935年的巴蜀公路计划打开了“以贵阳为中心通向湖南、云南、四川、广西的主要干线，接着预定开通的干线合计达三十条。”¹⁵⁹这些经费来自巴蜀的征敛和公债，为抗战和冷战期间渐次升级的超经济剥削打开了道路¹⁶⁰。1935年11月3日的《币制改革紧急令》用纸币取代了巴蜀市场长期流行的硬通货，启动了进步主义者用恶性通货膨胀支付军费的锦囊妙计，永远结束了巴蜀斗米三钱、蜜橘如土的黄金时代。巴蜀十大银行步上海、吴越金融家的后尘，沦为中央银行的附庸，丧失了清末民初银行家抗拒官方征敛和赖债的职能¹⁶¹。通向计划经济的道路，在蒋介石和宋子文手中已经走了一半，而且是启动阶段困难最大的一段，以至于毛泽东和陈云后来的顺水推舟简直算不上什么成就了。一如既往，始作俑者的掠夺成绩不如后来居上者，于是在劫后余生的残民记忆中，始作俑者

反而变成了仁政的化身，真正轻徭薄赋的大清和北洋时代，反而因为少折腾的缘故，不容易留下鲜明的记忆。

历史鲜有真正的原创，多见改名换姓的复制品。二十世纪所谓的进步，恰好就是十七世纪英国和荷兰新教徒高举“宗教、自由和财产”旗帜大张挾伐的对象。巴蜀士绅和军官并非不了解革命政权的掠夺性，然而由于缺乏挣脱大中华主义认同绑架的勇气，只能为自己的掘墓人充当优秀助手。

#第三章 完#

附录四：关于解除进出口的禁止及限制的国际条约（輸入及輸出の禁止及制限の撤廢の爲の國際條約）

[文书名]关于解除进出口的禁止及限制的国际条约

[場所]日内瓦

[年月日] 1927年11月8日

[出典]日本外交年表以及主要文书下卷，外务省，第106-112页

[備考]

[全文]

于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十一月八日在日内瓦签署；
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批准；
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批准书交付保管；
一九三零年（昭和五年）一月一日实施；
一九三零年（昭和五年）七月十一日公布。

条约

德意志国总统、美利坚共和国总统、奥地利共和国联邦总统、比利时国皇帝陛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及大不列颠海外领土皇帝、印度皇帝陛下、保加利亚国皇帝陛下、智利共和国总统、丹麦国皇帝陛下、埃及国皇帝陛下、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芬兰共和国总统、法国共和国总统、匈牙利国摄政殿下、意大利国皇帝陛下、日本国皇帝陛下、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卢森堡国大公殿下、挪威国皇帝陛下、荷兰国皇帝陛下、波兰共和国总统、葡萄牙共和国总统、罗马尼亚国皇帝陛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南斯拉夫王国）皇帝陛下、泰国皇帝陛下、瑞典国皇帝陛下、瑞士联邦政府、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对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国际联盟总会的决议：

受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的结论的启发；同时，和前述会议的成员一样，我们也认为，进出口的禁止以及由此而出现的专横的习惯以及变相的差别待遇，前述措施产生的严重的利益损失，没能被各国所期待的财政利益和社会福利所弥补，给采取前述措施的各国带来了令人痛惜的结果。

我们相信，为了世界贸易的恢复及其将来的发展，各国政府不管是为了

各自的利益还是为了普遍的利益，都有必要抛弃有害的政策。

我们确信，找回国际通商的现实的自由是世界繁荣的主要条件之一。

同时，前述目的可以依据国际条约这一形式，再加上同时且一致的行动来最优化地达成。

如下任命全权委员：（全权委员名字从略）

第一条

本条约的规定适用于：对于缔约国的领域内的产品或是制造出的商品运送至其他缔约国的领域内的进口行为进行的禁止和限制，以及对于从缔约国的领域内运送至其他缔约国的领域的货物的出口行为进行的禁止与限制。

第二条

关于由以下各条所规定的例外，对此作出保留的缔约国，只在各自的领域里，在本条约实施后的六个月期间内，撤销所有对进出口的禁止和限制，同时保证以后不再作出前述禁止或是限制。在前述期间之内，缔约国应当为了将现存的禁止和限制行为减少到最小限度，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同时不应再增添新的禁止和限制措施。

除上述内容之外，缔约国保证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中央以及地方的所有官吏严格遵守本条约的规定，同时确保不指定违背上述规定的规则。

第三条

缔约国作出约定，根据本国法令，对货物的进出口制定有关进出口的方法、形式、场所或者标注记号的规则、手续和条件，这样的规制不应被缔约国认定为变相禁止或是专断的限制的手段。

第四条

下述种类的禁止和限制，在该项禁止和限制在同一条件下不被认为是属于外国之间专制的歧视手段或是国际贸易上的变相限制的方法的情况

下，不被本条约所禁止：

一、关于公共安全的禁止和限制。

二、依据道德上或是人道上的理由所设置的禁止和限制。

三、关于兵器、弹药以及军用材料，包括例外情况下其他一切军需品的交易的禁止和限制。

四、为了保障公共卫生或是为了保护动植物而对病疫、虫类以及有害寄生物进行的禁止和限制。

五、为了保护在美术上、历史上或是考古学上有价值的国宝而进行的出口的禁止和限制。

六、适用于金、银、货币、纸币、银行券或是有价证券的禁止和限制。

七、对于外国产物，适用对本国相同种类产物的生产、交易、运输以及消费进行的禁止和限制。

八、关于生产和交易时，在国内属于国家垄断产业或是国家监督下执行的垄断产业或是将来属于这种类型的产物，对其适用的禁止和限制。

第五条

本条约对于缔约国在非常时期进行的对本国重大利益进行保护而做出的对进出口的禁止和限制行为的权利，不造成任何影响。

前述性质的措施在执行的情况下，不应使前述措施对其他缔约国造成任何专断的歧视；前述措施的延续时期应被事情的起因和情况的持续时间所限定。

第六条

一、缔约国认为，某国履行前述各条规定的义务时，存在着事实上或是法律上的情况使其关于特定的产物无法立刻达成协议。在前述该国不再存在这种起因的时候，将立刻进行撤回或是对于暂时性的除外案例作出

保留——缔约国认为这样做是公平的。

二、另外，缔约国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也即某国撤销进出口的禁止和限制会使该国陷入严重的困难局面，并且前述禁止和限制不会对其他各国的贸易造成损害。缔约国承诺，对于这样的特例可以做出保留。

三、本条约的附属书中记载道：为了在附件中有所记名并且在今天签署了本条约的缔约国的利益，今天得到认可的除外案例属于前两项规定的范围内。

四、缔约国在今天以后想要要求的除外案例，应根据本条约的议定书规定的手续来进行处理。

第七条

一个缔约国针对某个外国的产物——不论该国是否是适用本条约的国家——不得不执行禁止和限制的措施时，前述缔约国采取这样的措施时，应尽可能地减少对其他缔约国的贸易造成的损害。

第八条

关于本条约的规定（除去第四、五、六条以及关于前述各条约的议定书的规定）的解释或适用，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缔约国之间发生纠纷时，不能靠直接在当事国之间达成合意来解决前述纠纷时，在所有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在诉诸仲裁裁判手续或司法手续之前，可以抱着友善解决的目的，将纠纷处理委托给国际联盟理事会或是相关当事国任命的专门机关。该机关听取当事国的意见，在必要的时候实现当事国之间的会晤后，给出劝说性的意见。

前述机关给出的劝说性意见，若是没有被所有纠纷当事国接受，那么当事国可以不受拘束；另外，前述纠纷当事国在达成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在诉诸前述手续之后或是以替代前述手续的形式，而诉诸起选择的仲裁裁判手续或司法手续。

关于本条约的规定（除去第四、五、六条以及关于前述各条约的议定书的规定）的解释或适用，发生法律上的纠纷时，当事国之间，根据某一方的要求，不论是否预先执行了第一项中所记载的手续，都应将该事件

交付常设国际裁判所或当事国选择的仲裁裁判决定。

关于纠纷是否属于法律上的纠纷，意见出现不一致时，该问题的决定应交付于常设国际司法裁判所或当事国选择的仲裁裁判所。

不论对于前述的第一项所记载的机关的手续或该机关给出的意见是怎样的，都应该停止引发争议的措施。在常设国际司法裁判所（在该裁判所没有根据第四十一条规定作出相反的决定的情况下），或是当事国选择的仲裁裁判所履行手续时也应如此。对于缔约国在常设国际司法裁判所的管辖问题上所承担的约定，或是关于调停或仲裁相关的缔约国间的两国间条约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本条约不应被解释为损害前述权利和义务的内容。

第九条

缔约国可以在本条约批准之时或是之后作出宣言：缔约国对其他同样承诺接受这一义务的缔约国作出约定：缔约国对于包含第四条、第五条以及第六条的整体或一部分的本条约的规定的解释或适用发生纠纷时，不论该纠纷是否属于法律上的问题，均适用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关于第四条、第五条以及第六条或是前述各条的一部分，以及关于前述各条的议定书的规定，没有给出第一项所记载的约定的缔约国，在其相互之间，可以对于前述事项适用第八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规定。

第十条

缔约国在署名、批准或是加入本条约时可以宣言，接受本条约时，关于其殖民地、保护领地以及其他有宗主权或委任统治的所有或一部分地区的相关问题不承担任何义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条约不适用于前述宣言所提到的任何地区。

根据前一项规定作出的宣言涉及的地区的整体或一部分，缔约国希望本条约适用于这些地方时，在之后可以在任何时候将此事通知国际联盟事务总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条约在国际联盟事务总长收到前述通知后的九十日后，适用于前述通知所记载的地区。

缔约国希望本条约不再对其殖民地、保护领地以及其他有宗主权或委任

统治的所有或一部分地区进行适用时，可以在任何时候作出宣言。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条约在国际联盟事务总长收到前述宣言后一年便不再对前述宣言所记载的地区进行适用。

第十一条

本条约不对缔约国作为当事国负有的有效国际条约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造成损害。

如果缔约国间设立有比本条约对关于进出口的禁止和限制作出的规定更加自由的制度，那么本条约不对这样的现有效力的两国间协定造成损害。

第十二条

本条约不对国际联盟规约产生的权利和义务造成任何的影响。

第十三条

关于为了实施本条约的规定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缔约国应在本条约在其领域内实施后十二个月以内，通过国际联盟事务总长来相互送达。

第十四条

本条约以法语和英语的文本共同作为正本，应标有今天的日期。

考虑到国际联盟的联盟国，或是向本条约的制定会议派出了代表而可能只是为了署名而通过国际联盟理事会来接收本条约的复本的非联盟国的情况，本条约的署名将截至到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

国际联盟的联盟国以及非联盟国为了其本国的利益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前署名的话，可以享受到第六条第四项规定的手续的利益。

第十五条

本条约应被批准。

批准书应寄往国际联盟事务总长，前述事务总长将接收情况告知所有联盟国和前条所述的非联盟国。

第十六条

国际联盟的联盟国或是第十四条记载的非联盟国可以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之后加入本条约。

为了交付国际联盟事务局进行记录，前述加盟行为应向事务总长作出通知。事务总长应立即将这一交付记录的行为署名到本条约，并通知一切已经加盟的国家。

第十七条

本条约根据下述规定的会议中决定的条件和日期来进行实施。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之间，国际联盟事务总长将邀请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之前署名的国际联盟的联盟国以及非联盟国通过正当方式派遣的代表者参加会议，前述代表者将在前述会议中决定以下事宜：

（1）根据第六条第四项通知缔约国之后，经过该缔约国的承认而在批准的时候可以进行的保留。

（2）条约实施所需要的条件，特别是（不论是否是署名国）国际联盟的联盟国以及非联盟国中需要预先确保批准或加入的国家的个数，以及在必要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国名。

（3）可以交付批准书的最终日期以及根据前一号内容在必要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本条约的实施日期。

前述期间到期时，作为本条约实施条件的批准状况没有被确保的情况下，国际联盟事务总长将与批准了本条约的国际联盟的联盟国或非联盟国进行协商，确认该国是否不考虑前述状况也想要实施本条约。

第十八条

本条约在实施之日起五年后，通过向国际联盟事务总长寄送书面文本来进行通知的形式，为了国际联盟的联盟国或非联盟国的利益可以将条约废除。前述废除行为在国际联盟事务总长收到通知十二个月后发生效力。并且，国际联盟的联盟国或非联盟国为了该国的利益只有按照前述方式进行废除才有效力。

特别的是，本条约在其日期开始起算三年后，根据第六条第一项所承认的除外案例依然有存在的话，在前述期间之后为了国际联盟的联盟国或非联盟国的利益可以废除这一条约。前述废除在事务总长收到通知六个月后生效。并且，国际联盟的联盟国或非联盟国为了该国的利益只有按照前述方式进行废除才有效力。

另外，本条在其日期开始起算五年后，如果国际联盟的联盟国或非联盟国认为，在第十七条规定的会议中得到缔约国承认的除外案例损害了本条约的效果，那么在前述期间之后为了前述国际联盟的联盟国和非联盟国的利益可以废除。

前述废除在事务总长收到通知六个月后生效。并且，国际联盟的联盟国或非联盟国为了该国的利益只有按照前述方式进行废除才有效力。

根据前述规定进行的废除，由国际联盟事务总长立刻通知其他所有缔约国。

第十七条规定的会议中缔约国所约定的本条约实施的条件，由于条约废除的结果导致之后没能满足的话，缔约国为了审议前述情况造成的事态而可以向国际联盟事务总长请求召开会议。促使本条约存续下去的合意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在作为前述会议召开的原因的废除行为发生效力之日起，免去其义务。

第十九条

如果适用本条约的国际联盟的联盟国和非联盟国的三分之一希望修正本条约，出于这三分之一的国家的利益而将这一情况告知国际联盟事务总长的通知，在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五年期满之前送达到前述事务总长处时，适用本条约的所有国际联盟的联盟国以及一切非联盟国承诺参加为此举行的会议。

本条约实施之日起五年之前，存在着前述修正的情况下，不接受修正后的条约的国际联盟的联盟国或非联盟国有权不受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的五年的期限而废除本条约。前述废除行为在修正后的条约实施之日起生效力。

本条约实施之日起第五年中存在前述修正的情况下，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废除期间延长一年。

附录五：关于山东派兵的政府声明（山東派兵に関する政府声明）

[文书名]关于山东派兵的政府声明

[場所]

[年月日] 1927年5月28日

[出典]日本外交年表以及主要文书下卷，外务省，第96页

[備考]

[全文]

最近发生在中国的动乱，特别是南京、汉口以及其他地方的事件的情况，展现出了军事混乱之际，中国政府没能充分尽到保护的责任，所以才导致了居留当地的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的损害。这是对帝国的名誉造成损害的暴行，所以现在中国北方的动乱严重的情况下，难以断定没有再次出现这种事情的危险性。现在，前述战乱波及到济南地区的话，关于居留该地的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难以放下危机意识。居住于该地的帝国臣民有一千多人；同时，该地是距离海岸很远的内陆，所以靠长江沿岸各地的海军力量来进行保护终究是不可能的。因此，帝国政府为了防止恶性事件的再次发生，到了不得不派出陆军士兵来保护当地国民的生命财产的地步。然而，为了进行前述保护性的派兵需要很长时间来进行准备，而战局却时刻发生变化。考虑到这一点，帝国政府决定姑且先采取应急措施，从在满部队中抽调约两千士兵派往青岛。通过这样的陆军力量来进行保护的行为只是为了保障当地国民的安全而已，完全是出于自我防卫考虑的不得已的紧急措施，不仅对中国及其国民不抱有任何不友好的意图，而且也不会对南北双方军队的作战进行干预或是妨碍其军事行动。

帝国政府声明，如今是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进行派兵。不过，帝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永久驻扎在当地的意图。到了当地的国民不再有遭受战乱的威胁的可能性之后，帝国政府将立刻全部撤回派遣军。

[1](#) 越飞遗书《致里昂·大卫度维奇·布隆施泰因》

[2](#) 世界革命的支持者有理由认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违反了列宁主义，只不过反映了无产者内部堕落分子的诉求，方便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追求享受。马克思和列宁认为，热月政变的领袖就是法国革命阵

营内部贪图享受的堕落分子。托派不久就宣称，斯大林分子就是俄国革命的热月党人。

3 参见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

4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文件集第2卷，1926-1927》第一册.莫斯科，1996，第257页

5 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1944），德国人，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他在上海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工作时，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合作关系。

6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532页

7 虞洽卿（1867-1945），浙江慈溪人，1920年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1923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他是东正教徒，上海东正教徒活动关系网的中心。安利烈·帕夫洛维奇·虞是他的教名。康生曾在他手上做事，被捕后由他保释出来。

8 唐纯良著《李立三全传》：“有一次，一个开澡堂的青帮小头目常玉清的徒弟绑架了李立三，有几个上海大学的学生看见了，就跑去报告党中央，中央赶快设法营救他。但是，李立三很快就回来了。他向中央报告说，常玉清是一个小头头，联系他有利于工运，党中央同意了她的行动。从此，他同青帮徒弟和下层头头就有了比较好的关系。”青帮头目王汉良也在五卅运动中保护过李立三。

9 1925年12月，斯大林指出，应该实行旨在“日本和英美之间打入楔子的方针”，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要集中于内部的巩固，不容许北伐。次年3月，陈独秀要求国民革命军立即远征吴佩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特别使团团长布勃诺夫表示强烈反对。中山舰事件爆发后，布勃诺夫转而支持北伐。6月，斯大林又派维经斯基来中国制止北伐。7月，迫于北伐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得不做出应对，而他们采取的紧急措施中限制性的规定比支持的措施多。北伐军进军江西时，远东局还提出应停止继续北进，与张作霖召开和平会议，缓和武装干涉的危险。参看《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马连儒，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1期

[10](#) 作为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运动长期发展的自然产物，英国工党一开始就把改良主义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传统接受下来，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英国共产党自1920年成立以后，提出集体加入工党的申请，但工党年会以绝对多数否决了这项提议，此后坚持排斥共产党。

[11](#) 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委员联席会议（1926年10月28日）

[12](#)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13](#) 苏智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上海帮会的动向》

[14](#) 同前注。

[15](#) 栗月静《上海工人运动背后的帮会》，《文史博览》2011年第11期

[16](#) 同前注。

[17](#) 同前注。

[18](#) 指一度拜在他门下的汪寿华等人绑票勒索，破坏江湖规矩。

[19](#) 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

[2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16-20页、第71页；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21](#) 同前注。

[22](#) 《阿布拉莫夫给诺莫夫的电报》（1927年9月6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6页

[23](#) 徐焰：《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第16页

[2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387页

[25](#)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2月），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16页

[26](#) 《皮亚特尼茨基写给斯大林的信》（1928年6月1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483-485页

[2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9号（特字第28号）纪录（摘录）（1928年6月11日），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第492-293页

[28](#)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第17-18页、24页

[29](#) 周恩来当时领导组织科和特务科，特务科包括：保卫股、情报股、特务股和匪运股，参见刘育钢：《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以及李春远：《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的秘密社会工作》，《二十一世纪（扩增版）》第二期（2002年5月31日）。

[30](#) 王建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1975，第163页

[31](#) 立宪政友会，1900年由伊藤博文创立。先后组织第四届伊藤博文内阁（1900-1901），第一、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1906-1908，1911-1912），原敬内阁（1918-1921），高桥是清内阁（1921-1922），田中义一内阁（1921-1929）和犬养毅内阁（1931-1932）。1940年解散。政友会的成员包括一半藩阀、一半民党，是为了消除旧有的藩阀和民党对立、进一步完善议会体制而产生的。其后，藩阀政治逐渐式微，而政党政治因此而得以完善。

[32](#) 立宪民政党通称“民政党”。1927年6月1日，由宪政会和政友本党合并成立。组织滨口内阁、第2次若槻内阁，和立宪政友会（政友会）共同实现两党制。1940年8月15日解散，和立宪政友会合流为大政翼赞会。

民政党与三菱财阀关系密切，主要代表城市资产阶级利益。与政友会相比，稍带自由主义色彩。

[33](#) 他把外交留给币原，等于回到了竞选时发誓要改变的旧路上，放弃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跟建制派妥协，背叛了竞选时吸引群众的承诺。

[34](#) 関静雄编著：《近代日本外交思想史入门》，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年版，第133页

[35](#) 日本国防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への道・1》，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第458页

[36](#) 《輸入及輸出の禁止及制限の撤廢の爲の國際條約》见附录4

[37](#) 周鲠生（1889-1971），国际法学家，曾任武汉大学校长。1927年，他写下《革命的外交》一书，主张：“中国今日所需的不是绅士式外交，正是流氓式的外交”，“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要“利用民众势力”，要“主动的、攻势的”“遇事生风、小题大做”。1949年后他曾任中共政府外交部顾问、人大代表，1956年加入中共，文革时被抄家。

[38](#) 陈源（1896-1970），散文家，西滢是他的笔名。三一八事件发生后，他认为学生“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被鲁迅痛骂。

[39](#) Emerald submission, No.7006, dated 29th March 1927, Nanjing Incident(March 1927)), ADM.1/8711/149, FO228/3576/27, NA. London.

[40](#) 《森冈领事关于南京事件为共产党煽动应对南军暴行予以制裁之意见书》，收于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I第一部第一卷》，1989，第528页

[41](#) 同前注，第527页

[42](#) 京师警察厅编译会，《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收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四十一辑（文海出版社，1988），第60页。

[43](#) 1927年3月24日，进入南京的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实际负责人）兼政治部主任为李富春，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林伯渠）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宅、学校、医院。英领事H. Giles受伤，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美国人）及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等遇害。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报告外务省：“昨日（即24日）自上午7时至11时30分，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军所属中国士兵约150人在准备了驴车、马车等搬运工具的情况下，身着军服，携带步枪，络绎不绝地闯入领事馆，随即开始了武装抢劫。……现场有士兵高呼：‘中苏一家，日英是帝国主义，赶走日本人，他们的财产自然就是我们中国的啦！’”

[44](#) 同前注，第242-250页

[45](#) 同前注，第32-34页

[46](#) 同前注，第90页

[47](#) 同前注，第70-85页

[48](#) 同前注，第62—65页

[49](#) 同前注，第257—258页

[50](#) 小谷豪治郎：《币原外交第一遣外舰队----关于南京事件与汉口事件》，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第272-275页

《（编号420）关于缓和南京事件要求条件以避免共产派推动蒋介石下台一事币原外务大臣致驻中国公使芳泽电（1927年3月30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I，第一部第一卷》，第529-530页

Doc.29, F4648/1530/10, Sir. E. Howard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 BDFA, Volume 32

[51](#) 《（编号411）参谋本部第二部关于南京事件对蒋介石总司令及武汉政府之方针（1927年3月28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I，第一部第一卷》，第519页

[52](#) 1928年5月1日，国民政府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打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还捣毁了日本人办的经销《满洲日报》的济南日报社。据北伐军第六十五团团长李默庵回忆，“进入日本使馆区时，第六十四团的士兵看到使馆区悬挂着日本国旗，便上去给扯了下来……5月2日，进城部队还未有组织收拢，仨一群俩一伙地在街上活动，不断有到日本大使馆去的，放两枪就又走了。”5月3日，十余名日本侨民也在济南城中被中国军民以“鸦片贩子”的罪名处死。双方摩擦愈演愈烈，引发强烈对抗。据日本方面的调查，此事件中中国市民的死亡人数为3600人，伤者1400人，日军死亡26人，伤157人。济南事件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指示各地党部“切实指导各种民众团体，如商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及与日商有交易往来之各行商，联合组织抵制仇货委员会，主持关于对日经济绝交之一切事宜。”

[53](#) 关于济南事件，《山東派兵に関する政府声明》见附录5

[54](#) 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第517页

[55](#) 田中义一：“南京政府值得列强信赖。” From Tokyo to H. M. Minister, 13th May, 1927. FO228/3587.

[56](#) 田中义一：“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主义如果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日本绝对没有支持张作霖，不用说物质，就是替张说话都没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便已安心了。”李华译：《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纪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5号（1981年8月），第218-224页

蒋介石：“（田中义一）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中国之统一。”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二卷，第111页

[57](#) 《殷汝耕阳西电（1928年5月7日）》，《黄郛档案》第二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微卷

[58](#) 傅启学编著：《中国外交史（下）》，台湾商务印书馆，第462页

[59](#) 蒋介石命李济深试探“英国取何态度？有何法补救？籍察英日对此事是否协调。”《蒋介石致李济深电》（1928年5月9日），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三卷，第299-301页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告诉李济深：“中日若决裂，英必守中立。美领意见略同，初战美必不参加。宜宣布日兵横暴证据，以博世界舆论之同情，最为上策。”《李济深致蒋介石电》（1928年5月14日），《黄郛档案》第二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微卷

蒋介石命黄郛恳请美国出面斡旋：“将福田条件及今日报告抄交美领，从中调停如何？”《黄郛致蒋介石电》（1928年5月13日），《黄郛档案》第二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微卷

5月23日，美国国务院表示：“日本和其他各国都有义务遵守《九国公约》。”《纽约李锦纶参事来电》（1928年5月24日），《黄郛档案》第二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微卷

[60](#)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提出：美国为了反对殖民主义，在苏伊士危机中绥靖纳赛尔，导致欧洲盟国丧失了维护海外利益的兴趣，结果在越南战争时期，无法阻止欧洲盟国绥靖胡志明。

[61](#) 赵瑞：《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158页

[62](#) 《阎锡山日记》，1931年10月6日

[63](#) 孔繁芝，尤晋鸣：《阎锡山与亚洲民族大同盟》，《山西档案》，2009年第6期

[64](#) 同前注。

[65](#) 珠海市政协、暨南大学历史系著：《唐绍仪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89，第317、318、325、347页

[66](#) 博克多格根（1869-1924），又称博克达汗，外蒙古的藏传佛教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名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1911年12月宣布外蒙古从清朝独立，自称“大蒙古国皇帝”，1915年因大部分王公不支

持独立，改为自治。

[67](#) 满洲青年联盟刊行委员会：《满洲青年联盟史》，密歇根大学，2006

[68](#) 图兰民族指的是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所有族群，甚至包括朝鲜和日本，这个概念在1870年代由土耳其帝国知识分子在德国发明出来，最有名的代表是齐亚·乔加勒夫，他认为土耳其版图应由阿尔泰山至博斯普鲁斯海峡。

[69](#) 土耳其民族行动党与阿塞拜疆的灰狼党是坚定的图兰主义者；狼是突厥族传统图腾。

[70](#) 小林元：《回回》中国回族古籍丛书编委会·中国回族古籍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银川，1992，第102页

[71](#) 工部局（上海市议会）当时已经近乎绝望，宁愿通过杜月笙和汪寿华的斡旋，以解除鸦片贸易的禁例为饵，换取远东局对外人生命财产的保护。总董费信悖（Stirling Fessenden）等人甚至认为四一二清党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且谓欧美各国均有共党，其人数虽不多，其声势则甚大”，二十四小时解决上海共党的“呓语”不值一驳。参见布莱恩·马丁《上海青帮》和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72](#) 孙莹、丁惠希著：《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第219页

[73](#) Merlo J. Pusey, Charles Evans Hughes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2 vol). 517.

[74](#)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三章“动荡年代”，第四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

[75](#)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7, P.5. 转引自王立新著：《美国的国际秩序观与远东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东南亚研究》第四-五期（2003年5月）。

[76](#) 参见涅任斯基，《俄国与黑海海峡》。苏联在洛桑会议期间，企图

唆使凯末尔拒绝跟协约国和解，发动工农群众，向列强挑战，收回黑海海峡。凯末尔明智地预见到，这样会使土耳其完全依赖苏联。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海峡和土耳其本身都会落入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者手中。他决定接受列强的要求，把海峡交给国际委员会，从而结束了土耳其革命时期的土苏联盟，排除了土耳其和英法结盟的障碍，随即大举镇压国内的共产党。换句话说，他暂时放弃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斗争。蒋介石在同样的情况（远东局的1927年上海滩密谋）下，发动了四一二清党。国民政府有意识地自比凯末尔，参见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77](#) 黄志高：《凯末尔革命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国际、苏联的对华政策》

[78](#) 见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79](#) 指戴季陶的理论试图将国民党说成既是中华道统的继承者，又是新时代的革命者，如同将土耳其苏丹和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混为一体。

[80](#) 蒋介石1929年讲话。

[81](#) 蒋中正、陶希圣：《中国之命运》，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

[82](#) 史全生：“江浙财团与蒋介石政权的建立”，《江海学刊》1984年第4期

[83](#) 指蒋介石将中央势力伸向西部各省，直至新疆归顺。

[84](#) 穆煜《“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

[85](#) Report of the Hon. Richard Feetham: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31—1932. 转引自王敏：“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 第105-117页

Richard Feetham是南非法官，他在上海的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讲，预示了

李顿调查团在满洲的下场。

[86](#) 王敏：“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5-117页

[87](#) 同前注。

[88](#) “Possibility of a ‘Free City of Shanghai’,” Robert L. Jarman, Shanghai Reports, Vol.16, pp.17—18, 出处同前注。

[89](#) “Sir Austen Chamberlain to Sir M. Lampson(Peking),” Robert L. Jarman, Shanghai Reports, Vol. 16, pp. 331-332, 出处同前注。

[90](#) “Memorandum on Shanghai by Sir F. Whyte,” Robert L. Jarman, Shanghai Reports, Vol. 16, pp. 289-290, 出处同前注。

[91](#) “Sir M. Lampson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 Robert L. Jarman, Shanghai Reports, Vol. 16, p. 359 以及Memorandum Respecting the Problem of Shanghai,” Robert L. Jarman, Shanghai Reports, Vol. 16, pp. 388-390, 出处同前注。

[92](#) “Sir M. Lampson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 Robert L. Jarman, Shanghai Reports, Vol. 16, p. 352, 出处同前注。

[93](#) 王敏，《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

[94](#) 《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及建设新兵工厂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2212

[95](#)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版，第27页；第50-51页

[96](#) 马振犊：〈抗战爆发前德国军火输华述评〉，《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1996年8月）

[9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7), Vol. 2, p. 49

[98](#) 同前注，Vol. 2, p. 60

[99](#) 同前注，Vol. 2, p. 355

[100](#) 同前注，Vol. 2, p. 211

[101](#) 内政部调查局编印「共匪的特务工作与保密工作」九、十一页，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10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军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第231-232页

[103](#) 郭华伦：《中共史论》，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中华民国五十八年九月，第238页

[104](#)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台北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第154-158页

[105](#) 岩谷将：《蒋介石、共产军、日本军----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国民党情报组织的成立和展开》，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第二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102年，第8页

[106](#) 参见徐恩曾在《暗斗》一书中的回忆。

[107](#) 王彬彬：《国共关系的一段往事》，《同舟共进》，2012年12期

[108](#) 刘存厚（1885-1960），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职于云南武备学堂，参与光复云南。护国战争中响应蔡锷。1917年任四川督军，后逐渐失势，但仍能控制绥定一带。1933年因剿匪战败被蒋免职。1949年在老同学阎锡山帮助下去台湾。

[109](#)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

[110](#) 力群：《一个值得查证的重要史实——初期推动陈济棠同红军谈判的中共使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第6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111](#) 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471页

[112](#) 同前注，第473-477页

[113](#) 土城之战，毛泽东称为一渡赤水。《康泽电蒋中正刘湘往军官团演说称中央军口头宣称进兵却迟迟未到》（1935年2月9日），《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民国二十四年（八）》，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206-035，第2页

[114](#) 李明瑞（1896—1931），原为桂系将领，因未能得到军长职位而勾结中共反蒋反桂，由邓小平等介绍入党，曾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红七军军长，在肃反中被以“企图率队逃跑”罪名杀掉。

[115](#) “在宁都，调动80余人去前线在20天内全部开小差回来。某支部的党员竟听到要十分之一的党员，就把家属带到山上去躲藏。1933年‘11月15日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在万泰，‘东缝区报告140余人而实际加入红军只有7人，古坪区扩大100余人而到老营磐全部开了小差。’‘会昌三月份动员三百人参战，没有到前方就中途折回。’甚至瑞金‘九堡模范营全连开小差，团部不准他回，与团部对立起来，还敢登山打枪，结果开小差走了70余人。’在于都，开小差的可编一个师。”何友良等：《苏区研究论文精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39-140页

[116](#) “会昌的某区少共区委，召开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在这一方式之下，少数的人起来报名了。主席就叫报名的另坐一边，夸奖他们勇于加入红军一番之后，便要已报名的向未报名的作斗争。而在瑞金，要么是封不当红军的人的屋子，要么是在不当红军人家的门口贴上耻辱牌。”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斗争》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117](#)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军区总指挥部联合通令——关于联合赤少

队开小差问题（1933年4月1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印，1992，第107页

[118](#) 同前注，第144页

[119](#) 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87页

[120](#) 同前注，第321页

[121](#) 《目前各级财政部的中心工作》，《红色中华》第33期，1932年9月13日

[122](#) 《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77页

[12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广东琼崖地区》[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第45页

[124](#) 同前注，第55页

[125](#) 同前注，第81, 110, 46, 65页

[126](#) “于都城某些党和苏维埃机关绝大部分工作人员，特别是负责人互相竞争贩卖谷盐进出口，因为这种生意是最赚钱的。谷子出口可换现洋，再贩盐进口……这方面的案例有县委书记刘洪清、县苏维埃主席熊仙壁、县财政部长罗凤林等。”朱钦胜：《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第154页

[127](#) “地主应编入永久的劳役队，富农则应编入临时的劳役队。在直接作战的区域，在军事必要时，即在直接作战区域的近后方，地主富农可以编入同一劳役队内。在基本地区，则仍应有这种区别。在所有战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富农应就地处决外，地主的家产全部没收，地主家属一律驱逐出境或移往别处，但对富农则只实行征发其粮食与现金，富农家属一般仍可留在原地。征发的程度可由当时战争的环境和战争的需要来决定，但不得少于基本地区的征发量。在所有基本地区，对于地主家

产仍然是全部没收，富农亦应开始征发其粮食。暂时决定每人五斗谷子。富农捐款的百分比应相应增加。除对于商店、停业、逃跑、操纵居奇，造成经济恐慌，以相应敌人进攻的商人与资本家的财产应全部没收外，目前应开始在主要市镇向商人资本家募集捐款，帮助革命战争的经费。”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1934年5月20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3号），《关于地主富农编制劳役队与没收征发问题》，《红色中华》第129期，1934年5月23日

[128](#) 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84页

[129](#) 俞兆鹏、张美琴：《中央苏区货币流通的经验与教训》，《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3年3月

[130](#) 同前注。

[13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第262页

[132](#) “豪绅地主和大富农都被赶出去了，同时又因为抗债的关系，农民无处借贷，粮食也不能出售，所以赤区农民感到革命后更痛苦，虽然没有地主豪绅及高利贷者的压迫和剥削了。”子修：《赣北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7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第264页

[133](#) “苏维埃初期，在苏区内乃至赤白边境地区打土豪，既是红军的政治任务，也为中共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便捷渠道。红军常有‘筹款部队专门负筹款责任’……1932年2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提到中共情况时说：‘工作将会进行得更快些，因为现在有钱。中央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价值约十万墨西哥元的黄金，从贺龙那里得到了一万五千墨西哥元的黄金。’1932年1月，赣东北苏区在自身财政已遇到困难时，仍响应中共中央‘各苏区要将筹款帮助中央作为目前主要战斗任务之一’的指示，先后给中共中央送去纯金条三百五十两。”同前注，第281页

[134](#) “毛泽东1933年底在兴国长岗乡和福建才溪乡的调查，也证实了当时苏区兵源穷尽的现实。兴国长岗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45岁）407人，其中外出当红军、做工的302人，占百分之七十九。才溪乡全部青壮

年男子1319人，外出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百分之七十七.....更具普遍意义的数据显示：1934年年中，中央苏区“红军家属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在兴国、瑞金、太雷、杨殷、上杭等有些区乡已达三分之二。”.....宁都“固村、梅江发生不去运输的打他的鸡子，竹窄埫、丸塘乡用捆绑的办法，东山坝、特别是洛口，不去运输的罚苦工、禁闭”.....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运粮食、抬担架基本上是妇女。’”同前注，第251页

[135](#) 同前注，第289页

[136](#)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词：‘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美元，（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国际的款都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掌握在周恩来手里.....’”王建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1975，第163页

[137](#) 同前注。

[138](#)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48、64、147页

[139](#) 《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1月20日）、《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2月5日）。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第17-18页、24页

[140](#) 托洛茨基的意思是：革命者如果不组成官僚机构，就会停留在业余爱好者的水平；如果组成官僚机构，自己就会变成官僚。老雅各宾党经过热月政变，变成了拿破仑帝国的行政官。

[141](#) 纳粹的掌权并不是对此前统治集团进行全面清洗的结果，德国仍留存有大量旧式贵族和职业官僚，尤以军队、外交和法院系统为甚。

[142](#) 张闻天：《无情地去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斗争》，49（1934）：6

[14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14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14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146](#)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六）》，东方出版中心，第243页

[147](#) 国民党后悔第一次联俄容共，发动四一二清党；为了对付日本，又第二次联俄容共。他们每一次都宣传，共产国际坑害了他们。问题在于共产国际的目标是公开的，行为是一贯的，就算第一次该怪别人，第二次难道不该怪自己么。

[148](#) 参见辽宁省党史研究所：《阎宝航自传》；关东厅警务局高等警察课：《国民外交协会排日运动大要》；尾形洋一：《沈阳的国权回收运动—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札记》。

[149](#) 王美平：《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东北问题——中、日学会的交锋》，《近代史研究》，2008年2月

[150](#) “《赵凌勋给张学良等的呈文》1931年7月13日称‘东京蔡智堪密报若槻内阁藉万宝山事件以示威于北满，一举而欲造成其新势力于长春近郊，以便坚固其所得之长春路利权。’”辽宁省档案馆编：《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沈阳，1991，第101-103页。

蔡智堪的报告内容如下：“万宝山事件系乃若槻内阁对北满施威之试金石，恳我政府必须以强硬的与之对抗，虽须牺牲亦不可以辞。”辽宁省档案馆编：《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沈阳，1991，第104-105页。这种口吻与其身份极不相称，仿佛他已经习惯参加蒋介石-张学良政府的决策。

鉴于蔡智堪同时又是《田中折奏》的情报源，势必引发更多的猜疑。邹有恒的《<田中奏折>真伪论》（《外国问题研究》1940年第10期）

说：“1929年，当时的外务省亚洲局长有田八郎认为，从文件的幼稚程度上看，凡是有点常识的人，一见之下便可识破其并非真物。”

秦郁彦在《追踪昭和历史的秘密》一书中，更是详细地罗列了奏折中的史实错误：第一，奏折称田中义一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而事实上田中义一上海遭刺是在马尼拉的归途中。对于这样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当事人在上奏文中写错应该是可能性极小的。第二，奏折中称大正天皇与山县有朋等人商谈九国公约的执行问题，而事实上在9国条约签字前山县已经去世。第三，关于中国政府铺设吉海铁道问题。事实上吉海铁道的开设是在昭和4年5月，上奏的时期是昭和2年，也就是说，奏折是预知了2年后发生的事情。

1999年9月7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托洛茨基在被暗杀前的1940年，曾经向《第四国际》这本杂志投稿，称《田中奏折》是苏联特工1925年伪造的。

1928年以前，国民党无疑是有意识地执行共产国际外交路线的。1928年以后的国民政府在什么情况下是有意执行参照苏联、利用苏联但不同于苏联的新三民主义革命外交，在什么情况下是因为内部遭到渗透而无意中沦为斯大林的人肉盾牌，尚有一定的模糊空间。冷战时期的国民党为了攀附西方，明显夸大了后一种因素。共产党为了宣传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反动性，明显淡化了前一种因素。下面的材料暗示：在《田中奏折》问题上，前一种因素更有可能占主导地位。

国民党党史会曾在1953年6月以‘史北字第一一四号函’向1928年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查证蔡智堪取得《田中奏折》事。王正廷于6月26日函复党史会。信函主要内容如下……‘当时东北尚有局部外交’，‘大致系各据所闻随时具报者居多’，‘谓所抄取之奏折……于折内字句行数之间，稍为变易。’……‘所费之款，记为万余至二万元之谱，系由部中秘密款项支出。’……‘我国之国际情报，确有真实而又灵敏之价值，田中奏折不可不视为嚆矢。’”《王正廷致国民党党史会函》1953年6月26日，全文见程玉凤《台湾志士蔡智堪传》，台北，1981，第158-160页

[151](#) 周勇、耿密：《利益依归：九一八事变后英国远东政策演变（1931—1933）——以英国内阁文件为中心的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1月

[152](#) 罗杰·路易《1919-1939年英国远东战略》（Roge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牛津，1971年，第200页

[153](#) 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制：西方、国联与1931-1933年远东危机》（C.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伦敦，1972年，第200页

[154](#) 罗汉·布特勒《1919-1939年英国外交文件集》（Rohan Butler, 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伦敦，1960年，第2卷，第8册，第739号，538号，694号附件

[155](#) 《国际联盟委员会关于日华纠纷的报告》（李顿调查团报告）

[156](#) 王芸生：《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1931年12月23日），见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102年，第367页

[157](#) 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围中，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断绝外交关系。9月至11月，“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进攻中国东北边防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代表蔡运升受张学良委派，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伯力协定》。在本次事件中，东北地方当局虽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暴露出虚弱性。

[158](#) 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28-230页

[159](#) 家近亮子：《1935年蒋介石的分析----四川省建设与抗日战争的准备》，收于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102年，第185页

[160](#) 《蒋中正电请孔祥熙速照第一案公布发行四川公债七千万元以定川局》（1935年6月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统一时期（一四一）》，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10200-00141-005，第1-3页

[161](#) 家近亮子：《1935年蒋介石的分析----四川省建设与抗日战争的准

备》，第187-188页

第四章 从二战到冷战

一、国共抗日与国际统一战线

本节引言：

斯大林政权的稳固，不仅是单纯的人事和权力斗争，同时意味着主要由新一代本土干部组成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派”在苏联内部战胜了主要由国际恐怖分子组成的“世界革命派”。共产国际为苏联利益服务的程度，逐渐超过了俄罗斯资源为世界革命服务的程度。共产国际的新政策转向团结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党，集中力量反对苏联的地缘敌人，在西欧要求各国共产党为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党牺牲，在东亚要求共产党为国民党牺牲。蒋介石未能像凯末尔一样利用苏联自私的外交政策，消灭共产党。毛泽东却成功地利用了斯大林和蒋介石联合抗日的新政策，为共产党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二战全面爆发，苏联和西方民主大国结成统一战线，不仅是斯大林外交政策的胜利，也使得共产国际能够利用西方大国支持远东的革命事业。

1. 日、苏、蒋三角变局

卢沟桥事变前夜，三大革命势力的瓜分工作已经接近完成。除非三方同时放弃进一步的扩张计划，否则火拼无从避免：苏联得到了外蒙、陕北、华北、西北和新疆，跟蒋介石分享张学良残余势力和粤桂联盟反覆无常的效忠，比张作霖去世以前的任何时刻强大得多；日本得到了满洲、东蒙，勉强保存了日俄战争以后的基本盘，但因此不得不提前承担冷战以前的冷战责任，孤军奋战地收拾欧洲导师抛弃的残局，虽然终于将满洲建设成亚洲最发达的工业基地，却始终无法清除冀察缓冲区的恐怖和渗透活动。

1935年的《国权报》事件¹证明，日本人在这种游戏中吃哑巴亏最多，正如他们在公开战争中占便宜最多。从行为模式的角度看，高桥坦的交涉预演了围绕卢沟桥事变、通州事变和广安门变事的交涉。国民政府吞噬了欧洲列强在长江流域的绝大部分遗产，以巴蜀土豪为牺牲品³，建立了第二个核心基地，进一步削弱了晋鲁豫滇的自治政权，跟苏联分享张学良残余势力和粤桂联盟反覆无常的效忠。在耗尽自由资本主义的残余生

产力以前，国民政府能够动员的资源超过了蒙古帝国以后任何东亚大陆政权——穆斯林宁海军政权和达赖佛教政权的领土过于贫瘠，社会组织过于特殊和严密，任何扩张者只有在解除了心腹之患以后，才能集结足够的剩余资源，觊觎这些高成本负收益的目标。

三角关系天然缺乏平衡，斯大林-蒋介石联盟夹击日满鲜体系的格局日益形成。1932年，外交部长罗文干宣称：“松岗（洋右）活动，当完全失败于我人之手！”⁴南京和莫斯科恢复外交关系以后，内田外相随即拒绝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⁵。1933年4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若俄倭重新开战，倭必灭亡，吾能自强，当可立国也。”⁶1934年，蒋廷黻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访问苏联。他代表蒋介石，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站在日本一方与苏联作对，在一定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之敌。”⁷斯托莫尼亚科夫向他表示，1927年以来的清党和绝交不会影响莫斯科对蒋介石的友好和尊重⁸。斯大林根据西班牙内战以后的统战布局，把蒋介石列为相当于西班牙共和派的操纵对象。莫斯科在张景惠和安国军元老派集体倒向日本，五色旗残余势力在华北跃跃欲试的情况下，必须对南京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蒋介石根据他对凯末尔主义的拙劣理解，以为可以重演北伐时代首先骗取资助、然后反戈一击的妙计，在利用苏联将帝国主义赶出远东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之后，再一次利用苏联将帝国主义赶出远东的摩苏尔和塞浦路斯。国民政府培养和资助朝鲜和台湾解放组织的时间不仅早于卢沟桥事变，而且早于九一八事变，对马来华社和印度国大党的居心，也没有瞒过大英帝国的眼睛。蒋介石政府的动机始终是反西方，因此联合苏联的策略有其必然性。西方自然不会像对待及时转向维护条约体系政策的凯末尔一样，保护他的政权。

内田外相的《处理对华时局的方针纲要》要求：“对于各种悬案，要尽可能在各地方政权之间加以解决，努力避免发生事态；万一中国本部发生危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的重大事态，除重要地点以外，要适当撤退侨民；对于侨民中的惹是生非之徒，驻华外交官员要与陆海军方面合作，加以严重取缔。”⁹几乎与此同时，陆军《处理时局纲要案》要求打倒蒋介石这个反日的祸根。外务省交涉后，文件才删去了蒋介石的名字，把排日活动的责任推给“赤化势力”，要求在反共基础上实现中日和解¹⁰。这种妥协的精神酷似美国要求法塔赫驱逐哈马斯的和平条件，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模一样的。南京国民政府明知自己在正规战争中消灭不了日本，自然不愿意替日本人解除超限战的骚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

夜召集全国将领，准备在日本最薄弱的绥远前线开战¹¹。

2. 西安事变无关大局

西安事变证实了日本人最坏的预见，他们有理由断定蒋政权已经变成了共产国际的白手套。陆军省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宣布：“日本依然坚持并希望实现既定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要以特别公正的态度对待此次事变，以期掌握中国的民心。但如果南京政府及其他地方政权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抗日、反日思潮，侵害日本侨民安全或在华权益，则须毫不犹豫地发动自卫之权。”¹²这份文件其实不是针对南京政府，而是为了打击外务省一天前的会议决定：“等待正确的消息，不应采取利用中国乱事而为日本图谋或易于招致误解之任何行动，目前应止于静观事态之演变，避免积极行动。”¹³外相有田八郎在会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时表示：“由于此次事件对于日本的影响甚大，日本政府当然予以重大的关心，并注视事态的发展……对于那些主张容共联苏者，无论其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日本都希望他们迅速消失。”¹⁴这次交涉像日本在一战以后的所有交涉一样，只收到促使事态向相反方向发展的效果。广田政府（1936年3月~1937年2月）成立后，日本外交重新回到了自说自话的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南京的“统一战线”政策由隐蔽转为公开。

1935年7月4日，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回答：苏联政府是否有意签订互助条约？¹⁵1935年10月4日，日本外务省和海陆军提出“广田三原则”。广田三原则直截了当地要求南京政府放弃以夷（苏联）制夷（日本）政策，在国际反共联盟的基础上重构东亚体系。国民政府深感形势紧迫，加快了莫斯科-南京谅解的进度。1935年10月9日，孔祥熙进一步询问苏联大使：如果对日战争导致海路关闭，南京能否通过新疆陆路获得苏联的军需品？¹⁶1935年10月19日，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委员长在会议中再次提出，莫斯科和南京都需要比互不侵犯条约更进一步的合作。蒋介石不仅指望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指望军事互助协定¹⁷。1935年底，陈立夫和张冲奉命根苏联人“商谈对日军事同盟”¹⁸。

1935年11月15日，斯托莫尼亚科夫同意接受孔祥熙的要求¹⁹。如果蒋介石联苏抗日的庙算在1935年还是国民党高阶层的猜测，在此之后无疑已经变成了全党的公开话题。广州革命政府的时代又回来了，日本人只有在北洋旧势力当中寻找交涉对象。1937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和鲍格莫洛夫达成协议。莫斯科承诺用贷款和武器支持国民党抗日，国民党承诺

不再进攻陕北的共产党残部²⁰。张学良的西安事变除了断送自己未来的副总统资格以外，几乎没有影响到历史进程。

国民政府倾向于联苏反帝抗日，现实利益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兼而有之。满洲沃野千里，是远东唯一的“北美殖民地”。上海自由市虽然只有弹丸之地，财源却超过了历届北京和南京政府从内亚获得的全部收入。苏联侵入的土地虽然远为辽阔，显然要贫瘠得多。日本国际协调主义者的协调对象明确指向英美，并没有把南京放在眼里。日本泛亚主义者以英美大资本家和苏联大地主为假想敌，同样没有把国军放在眼里。蒋介石点兵西安，只准张学良做预备队，严重伤害了后者的面子，直接触发了西安事变。英国人和日本人对蒋介石的态度同样轻蔑，造成的后果也差不多。蒋介石甚至在抗战爆发以后，明显有求于英国人的时候，仍然对绅士的高冷做派耿耿于怀²¹。苏联人自己就是半个亚洲人，给蒋介石带来的心理压力小得多。结果应验了布罗代尔的格言：所有人在更穷的人眼里，都是值得觊觎的富翁；奥斯曼帝国咬住欧洲不放，波斯帝国又咬住奥斯曼帝国不放。日本人眼中只有苏联，蒋介石眼中只有日本。抗战虽然对国民政府极为不利，但至少可以教训日本人不要把蒋介石当做空气对待。

3. 蒋介石挑起战争

1936年3月17日，日本陆军省军务课与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上村伸一课长协商对华政策时，军务课方面主张：“预定于1941年完成对苏战备，因此外交上的准备要在这六年内完成。”具体内容是要设法“完成华北五省自治”，以保证对苏开战时后方的安全²²。后方的问题主要是维护社会稳定，也就是镇压共产国际和国府秘密策动的暗杀和袭击。超限战早在这个名词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1937年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华北非军事区处于类似“南黎巴嫩安全区”的状态。日本（以色列）并不觊觎该地的主权，但依据停战协定禁止中央军与地下组织（尤其是党部与特工）进入。于是，此地沦为半真空灰色地带。这时的日本外交与1967年后以色列外交没有差别：以东北换华北，以撤军换和平，以反恐换合作。然而，蒋介石绝不愿意牺牲东北以收回华北。于是出现了胜利者渴望和平，失败者渴望两败俱伤的格局。长期抗战的整个战略，就建立在蒋对两败俱伤的期望之上。宋哲元不准北上抗日的中央军越过保定，不在北平设防。这样一来，华北的事态就难以升级了。蒋介石明白日本仍然是胜利者，除非他能将战场移到上海，将列强拖进战争。

日本具有一个以色列人没有的弱点，最终陷入了以色列人迄今一直得以避免的困境：他们在意“皇军的面子”，不能忍受遭到弱者攻击而无法报复的尴尬。如果不是这样，卢沟桥事变以后的交涉其实对日本相当有利。国民政府的国际信用非常低落，很难指望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支持。英国驻华使馆秘书郭万安在1937年7月12日说：“在谈到中国方面认为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有意挑起的时候，我应该说明我的观点，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当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因病正在天津、大量的日本外交防卫人员在通州、多数参加演习的日本人员已经返回到丰台，要说谁先开的第一枪已不可能。”²³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我仍相信日本政府不是有意有计划地开始侵略的……我绝不相信日本政府会在此时会在中国愿意冒一场军事冒险。”²⁴英国驻日使馆的临时代办多兹说：“没有满意的证据向我们表明卢沟桥事变上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日本报界异口同声地说首先开火的是中国人……日本向中国派出军队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日本在中国华北的安全和利益。”²⁵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认为，“这或许并不是日本有意挑起的事变，日本也不想把事态扩大化。”²⁶张伯伦的调停计划的内容实际上是要求各方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几乎肯定会将南京政府置于较张作霖去世时前更为恶劣的处境²⁷。这时唯有打破格局的非常事件，才能将卢沟桥事变有别于《塘沽协定》以来不了了之的众多地方性冲突。列强盘根错节的上海自由市比华北更适合充当舞台，虹桥事件和淞沪会战承担了扭转历史路径的任务。淞沪会战没有实现蒋介石的目标，但八年抗战大体上做到了。日本人愚蠢地损害了列强的利益，他就不用继续吃哑巴亏了。这种策略生效了，国民党在以后几十年一直引以为荣。其实，这就是他们毁灭的原因。

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决定在上海开战。列强不出所料地出面斡旋，和谈预计在8月9日举行。然而“虹桥机场事件”就在这一天发生，和议永远没有机会举行。数十万国军化装成保安队，进驻安全区。8月11日，日军要求中国撤除上海保安队与其防御工事。8月12日凌晨，中央军精锐部队的第87师，第88师包围了国际租界的日本人区域。日本驻上海领事再次召集国际委员会，要求中国军队撤退。下午5点50分，日本海军的第3舰队给日本军令部发电报，请求日本陆军派兵的电报。下午8点40分，收到东京的回复，增援人员抵达时间要花费2周，故指示尽量不要扩大战斗。8月14日，中国空军轰炸日本陆战队总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除了军舰，船舶以外，也向上海市区投下炸弹，造成大量中国市民伤亡。同日，18架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和南京。从此，战

争一发而不可收拾。中国方面的材料宣称，“虹桥机场事件”是日本人的挑衅。日本人自然不承认，麻烦的是欧洲人也把责任放在蒋介石身上：

8月9日的《朝日新闻》：“陆战队第一中队长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由一等水兵齐藤要仓库驾驶的汽车经过上海公共租界纪念碑路时，遭到大批中国保安队的机枪和步枪射击。”

8月10日的《大公报》：“日本海军官兵乘坐汽车来虹桥机场，打算进入场内。机场的卫兵打算阻止，日军方面开始开枪。枪战造成一名保安队员和一名日本人当场死亡，另一名日本人重伤之后死亡。”

巴黎《古兰·格阿鲁》报特派员埃德阿鲁·耶鲁森撰写的《中国事变观察》：“8月9日发生了守备虹桥机场的支那士兵杀害日本海军士官的不幸事件。如果日本官兵能够当心，事变或许能够避免。但无论如何，事变都是支那一方有意策划的。南京政府决心最晚也要在15日以前在上海点燃战火，这是不容置疑的。这样不仅是为了将日本一部分力量引向中国南方，更重要的是隐含了这样的动机也就是将日军拉向中立地带引发难以避免的国际争端。这是一个通过频频爆发的事件和各种误解来诱导西方舆论的妙计，得到了蒋介石本人的同意，甚至蒋介石本人也感到有些得意。我10月末在南京见蒋介石，向蒋介石询问。他回答说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当初日本政府和军部期望避免交战，认为进攻上海很危险。”

4. 莫斯科和南京的交易

只有莫斯科和南京要求国际联盟宣布日本为侵略者，但他们的提案在英国、波兰和澳大利亚的反对之下未能通过²⁸。美国对交战双方实施一视同仁的武器禁运，扣押了蒋介石购买的十九架飞机²⁹。近卫首相宣称：日本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也不会支持满洲国声索关内的土地³⁰。日本以《防共协定》为和平条件，实际上是要求蒋介石放弃1935年的南京-莫斯科联盟。建议由德国转交给蒋介石，遭到后者的断然拒绝。蒋介石坚持，“今日中国舍联俄无路。”³¹南京如果加入东京主导的反共产国际联盟，联俄抗日的主角蒋介石确实很难继续领导国民政府³²。

苏蒋最初合流的时候，瑞金苏维埃政权就像刘豫和穆斯塔法·苏布希一样多余而碍事³³。蒋廷黻和张冲（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总干事）根据土耳

其经验，提出了反攻必先联苏的妙计。苏联驻南京参赞表示：“俄愿以联络土耳其之方法，与我国联络；尊重外蒙及新疆之我主权；缔结互不侵犯之约，附以军事合作文件；对于武器愿极力帮助。”³⁴

鉴于土耳其人这时已经彻底消灭了本国的共产党合作者，这种承诺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斯大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游戏规则，完全可能将瑞金和马德里的支部一起召回莫斯科，直接送进卢比扬卡的地下室销毁。然而蒋介石根据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软弱本性，反倒以为放红军逃往接近外蒙和新疆的边界，就是给斯大林送了一份见面礼，即使斯大林并不领情，红军给内亚各政权造成的破坏也会有利于黄雀在后的中央军³⁵。斯大林的惯例是：改变政策，就要杀掉执行原先政策的干部。米夫和远东局领导的末日清楚地显示，斯大林已经打算把他们的支部放在盘子里送给蒋介石——他如果爱护支部，就会另派一批自己训练的心腹来，而允许毛泽东这种路人皆知的梁山外围角色逆袭上位，本身就足以证明斯大林已经视支部为鸡肋蒿箭，就像老爷肯定会把得宠的丫鬟留给少爷做姨娘，不会随便许给打杂的小厮。

5. 毛泽东改变生态位

此时，上海和瑞金的大多数共产际苦力还没有看清自己所在的生态位多么岌岌可危，毛泽东却依靠他从华夏古典文史作品学到的格局判断力凌驾于同侪之上，凭借超人的洞察力和隐忍功夫，熬过了夹缝偷生的惨淡岁月；蒋介石放弃了最好的机会，听任红军逃到陕北。1937年3月26日，蒋介石开始给陕北的红军发放军饷给养³⁶。1936年，中共中央还相当依赖打土豪所得的652858元收入，到了1937年，莫斯科和南京的拨款就上升到延安总收入的77.2%³⁷。国民党既然主动放弃追剿，毛泽东刚刚攫取的新中央也就不再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障碍。斯大林发现弃子居然生还，也就不再计较毛泽东窃取了弃子的领袖地位。蒋介石既然自己愿意用陕北的红军做见面礼，斯大林自然更不会介意用苏联的武器多换一点回报。

毛泽东直到赫鲁晓夫上台，才摆脱了随时可能遭到苏联遗弃和出卖的恐惧。他后半生对苏联和亲苏派班底的政策，深受《天方夜谭·瓶中魔鬼》式延迟性屈辱和报复反射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他当时的利益。瓶中魔鬼在完全丧失得救希望以后，发誓要将仇恨发泄在第一个救他的人身上，仅仅是因为郁积的仇恨不能不释放，而害他的人早已死了。赫鲁

晓夫不幸充当了第一个善待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领袖，自然免不了体验民间传说蕴涵的“诗意真实”。

列宁主义团体始于地下组织，因此苏维埃宪制的核心权力在情报组织。党的领袖如果不能主持情报系统，就不会比统战花瓶强多少。毛泽东知道自己不是共产国际钦定的候选人，经过了三四年“当家姨太太”的暧昧生活，才勉强摆脱了“妾身未分明”的痛苦。1939年2月，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³⁸。研究调查委员会成立以后，毛泽东自为主任。情报部直属研究调查委员会，以康生为部长、叶剑英李克农为副部长³⁹。即使在此之后，毛泽东在延安的地位仍然不能跟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地位相比。周恩来、李克农、康生、陈赓都是苏联训练出来的老特务首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绝非毛泽东这样的外围人士在短期内能够撼动的。毛泽东讨好叶剑英、培植刘少奇、重用任弼时的动机，跟摄政王提拔吴禄贞和袁世凯赏识蔡锷的动机非常相似，都是想给自己无力破坏的网络掺沙子。毛泽东当家以后，中国支部开始产生不同于莫斯科本部的风格。毛泽东同样需要通过清洗强化自己的地位，但他宁愿依靠群众运动和“治病救人”的手段，较少采取列宁、斯大林、张闻天、张国焘习惯的方式，由契卡、克格勃、政治保卫局批量屠杀，除了毛泽东个人的江湖气和落第秀才气以外，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缺少亲信的特务机构。群众运动和草莽将领多多少少能够分散，但始终不足以替代危险而有用的列宁主义组织。这是毛泽东政权自始至终无法摆脱的死结，也是他无法放弃领袖崇拜的难言之隐。

6. 国民党准备总体战

新三民主义者相信自己能够打败日本，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尽管处处不如日本，却拥有日本由于古旧扭曲的宪法结构而无法有效实施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使一战末期的德国人濒临饿死，使苏联人长期生活在饿殍状态，但确实是一剂预支未来的春药，能够保证落后社会在军事动员方面反超先进社会。1937年8月10日，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总动员计划大纲》。外汇管制立刻导致法币在上海市场一落千丈。蒋介石像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坚信这是英国资本家的阴谋和汉奸资本家的贪婪所致，必须进一步强化金融管制⁴⁰。1939年9月8日，《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宣布：“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合组联合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种业务。”蒋介石亲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包括战时金融委员会和战时经济委员

会。“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之职权。”⁴¹

革命政权控制了绝大部分命脉行业和大中企业，将货币、生产物资和物价的调配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之手，却将中小企业和土地留在私人资本家手中，又没有让秘密警察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操纵消费市场的程度。社会主义上半身和资本主义下半身的混合物天然不能稳定，总有一方会吞噬另一方。革命政权要么进一步，废除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将生产和消费同时纳入统制体系，以免黑市和投机活动肯定会扰乱计划经济的正常运作；要么只能后退一步，放开金融管制、生产管制和价格管制，丧失其操纵社会和发动战争的大部分力量。蒋介石政府企图在短期内实现的战争目标和大国负担只有列宁主义才能胜任，而他既不肯放弃前者又不肯推行后者。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至少在其最初阶段离不开殖民主义的保护和养育。这条路线只有在蒋介石走投无路以后，才能卷土重来。新三民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分支，预支未来的能力不如列宁主义，因此逃不了短期的失败；作为资本主义的分支，养育未来的能力不如自由主义，因此逃不了长期的失败；作为奥斯曼主义的分支，继承正统的资格不如满洲国，因此逃不了短期的失败；作为凯末尔主义的分支，发明民族的资格不如台独，因此逃不了长期的失败。

7. 斯大林和毛泽东斗法

抗战正式爆发，苏联就立于不败之地。斯大林不遗余力地鼓励蒋介石做苏联的人肉盾牌，同样不遗余力地鼓励延安做蒋介石的人肉盾牌。王明的《目前抗战形势和任务》折射出斯大林对日本的恐惧和尊重、对国民党真实力量的蔑视和担忧：

“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着抗日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

——拥护国民党在中国政府及军队中的领导权力，共同纲领，共同负责，共同磋商，互相帮助，不是争取领导权

——承认孙先生革命三民主义为救中国的基本方针，而以民族解放为中心做起，直到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

——团结一切力量，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孤立愈好。”⁴²

如果远东局仍然存在，王明和张闻天肯定会将整个支部投入远东马德里（武汉）保卫战。只有毛泽东宁愿相信自己的切身经验，谨守活狗总是比死狮子更正确的教训。他善于体会鸿门宴精神，把握“阳奉”与“阴违”间不容发的边界，在避免触动两位领导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双方的资源。蒋介石只要坚持联苏抗日，就只能为了苏联而容忍延安的越轨行径。延安只要以撕破统一战线的面子为要挟，就能让蒋介石吃暗亏。斯大林只要坚持渗透同盟国的要害部门，就只能听任延安搭国际共运网络的便车。“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苏联本身也是千载难逢的宝贵机遇，全世界无产者的大元帅不可能因为梁山头目的小算盘而耽误大局的。师哲当时在毛泽东左右，非常清楚虎口掠食的危险性。“他们老是啃着一个死公式：国内要团结（指同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力量），党内要团结（不搞任何斗争），一致对外，抗击日寇。因此，无论是出现了反摩擦斗争，或党内斗争，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认为不利于抗战，使抗战力量削弱或相互抵消。毛主席除多次给远方发电解释外，同时还多次给苏方驻延安情报组的人员作过关于整风运动的介绍或解释。但这一切都是枉然的。因为他们内心里总是抱着自己主观上的看法，加上王明个人的认识和想法，往往使问题弄不清了。”⁴³

内向掠食的机智是没落文明的特长，也是他们自取灭亡的主因。强者难以在诡诈方面战胜弱者，因为既强大又诡诈在演化意义上意味着资源的浪费。毛泽东的智慧对西方人和共产国际而言都非常难以理解，却瞒不过浸淫《水浒》、《说唐》文化的游民英雄。他殚精竭力地培植彭德怀、许世友之流，居然暂时压制了训练有素的列宁主义者。费拉（斯宾格勒所言Fellah,文明灰烬）的智慧建立在解构残余秩序资源的基础上，专门研究怎样比竞争者更擅长降低底线，即使这些底线在蛮族和年轻时期的文明人看来，已经不比垃圾箱的鸡爪更值得啃咬了。费拉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可供掠夺的秩序生产力，外来秩序扔下的残羹剩饭对他们而言就像一笔财富。如果巨人相互残杀，游民英雄的伟大就体现在第一时间掠劫失败者钱包和衬衫的果决，错误地判断胜负和掌握时间有偏差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游民懂得运用达尔文式敏锐嗅觉发现自己的英雄，抗战对他们就是一次达尔文选择，将游民英雄和命中注定的饿殍和食料区别开来。

8. 毛泽东拯救共产党

毛泽东依靠游民社会的遗产，将他的党派从最高领袖预定的人肉盾牌命

运中拯救出来。他的策略分为三个层次：地方-前线（苦力），苏联-日本-国民政府（为争夺升级机会而自相残杀的挑战者和觊觎者），英美和世界体系（统治者）。基本技术异常简单和雷同：如果搭便车的形势存在，就利用别人的资源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搭便车的形势不存在，就以降低自己的消耗为最高目标。毛泽东在地方-前线层次找到了自己的天地⁴⁴，他的阶级本能就是在苦力生长的夹缝中锻炼出来的。⁴⁵

苏联-日本-国民政府层次的线索掌握在列宁主义训练产生的中级干部组织手中，毛泽东在这方面并不是最精明的。他只能利用蒋介石急欲冒充大中华共同领袖的心理弱点，乘机让国民党吃暗亏。斯大林和蒋介石最初心照不宣，将红军移动到蒙古和华北之间。⁴⁶

张克侠主持西北军，为苏联发挥了阎宝航在东北军内部的作用⁴⁷。斯大林渴望已久的三国志终于以最有利于苏联的方式爆发⁴⁸，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此只有一件事情需要担心：“抗日战线内部存在投降派和妥协派的情况下，投降已经成为实际的直接危险……因此，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最主要任务是：动员中国青年的一切力量同投降行为作斗争，坚决把抗日战争继续进行下去。”⁴⁹

蒋介石并非看不清汪兆铭、章太炎和蒋廷黻都能看清的事实，但新三民主义-大中华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他存在的基础。如果他甘愿承认现实的蒋政权根本不能胜任想象的大中华使命，就等于承认北伐以来的所有革命行动都是错误的。他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像拉磨的驴一样，追随面前那根永远无法到口的胡萝卜⁵⁰。统一战线的磨盘不停地转动，很快了毁灭了他从1927年以来清党建党的所有成就：“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份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地位。”⁵¹

日本人看到国民党公开联苏容共，不可能不想到1927年币原绶靖的后果，很快就放弃了议和的希望⁵²。昭和政治家都明白，自己之所以占据现在的位置，是币原时代绥靖主义者身败名裂的结果。国民党戏弄了每一位释放善意的谈判对手，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或能够重蹈覆辙。明治宪法的藩篱和人民对天皇的敬畏，都无法抑制忍无可忍和悔不当初的普遍情绪。利益和期望的参差不是和平最大的障碍，交涉对象的任何承诺都不值得信任，才是和平无法逾越的障碍。

9. 共产国际通过西方经营远东

英美和世界体系层次掌握在世界中心的正统派和粉红色左派⁵³手中，对世界体系的边缘行使的生杀予夺大权仅次于神明。共产国际核心层在这场游戏中也不过是个小角色，并不比毛泽东夹在斯大林和蒋介石之间的处境优越多少。美国的卡车和贷款提前或推迟几个月，就会改变斯大林格勒或昆明的命运。蒋介石在争夺租借法案物资⁵⁴的斗争中，一再落到斯大林的下风，自然对左右华盛顿的匪谍深恶痛绝。

粉红色左派利用莫斯科制造的马德里和延安神话，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品牌塑造，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丧失了列宁时代的恐怖记忆。《真理报》早在战前就开始为朱德和毛泽东造势，将他们描写成北欧和印度神话的巨人。“他来自遥远偏僻的山区，身躯高过任何大树。他伸出双手，就能喷出团团烈火，烧死任何敌手……眼观四方，能看到百里之外。”⁵⁵斯诺则声称：苏区非但“没有贩卖鸦片，而且……实现了权利平等和男女平等”⁵⁶；“没有什么可称恐怖的，而且我怀疑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恐怖。”⁵⁷他的神话塑造了二战时期和冷战初期美国自由派人士对亚洲共产主义的看法。费正清和芭芭拉·塔克曼都通过斯诺的眼睛，向西方读者介绍陌生的东亚⁵⁸。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忠实读者，三次召见斯诺，甚至打算同时承认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我在同（中国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⁵⁹他果然说到做到，在开罗会议上提出了这项建议⁶⁰。1941年1月皖南事件爆发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指责华盛顿亲共人士的统一战线策略正在破坏国民政府的抗战努力⁶¹。1944年，史迪威和谢伟思促成了美军观察团的延安之行⁶²。战略情报局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大批军事援助，包括两万五千游击队的武装⁶³。铁托、毛泽东和胡志明都是战略情报局的乳汁养大的，可以视为统一战线在世界边缘地带的投影。

毛泽东从斯诺和延安的时代到赫鲁晓夫和莫斯科的时代，一向没有掌握技术指标的能力，但他具备东方无产者（游民、妃嫔和太监）的特长，善于捕捉蛛丝马迹透露的态度和意图。赣南苏区的残酷斗争早就教会他，小人物的成功和毁灭通常都是大人物郢书燕悦的副产品。他明知斯大林允许他篡夺张闻天，主要因为误解和轻视，自然不会反对美国人因为同样的理由，允许他侮弄蒋介石。他秉着赌徒的精明和勇气，明确指示林伯渠、董必武和王若飞向纳尔逊和赫尔利提出，美援军火至少应该由“国共平分”⁶⁴。蒋介石愤怒地要求，只给配合国府军令的共产党部队提供美援，但他明显无法区别听话和不听话的共产党人，如果这两者真有任何区别的话。谢伟思公开赞成平分军火，并不令人惊讶⁶⁵。史迪威

对外声称“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⁶⁶应该得到美国的支援，但他真实的目标显然是要打击心怀叵测的蒋介石。

史迪威的延安计划来自他的顾问戴维斯，而后者非常清楚：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完全用游击战来打日本。日本人一来，他们就疏散。日本人一撤，他们就集中，并占领村镇。他们没有力量抗击日军，因为他们的武器太差，而且也不愿意浪费已有的弹药。他们要留着等将来夺取政权。日本人也不想向他们进攻，因为他们占领的地方没有什么军事价值。中国共产党设法避免进攻日军，因为害怕遭到报复，要说他们有什么协定可能太过分，但双方确实都不想真打。”⁶⁷史迪威需要为日本人在亚洲大陆的军事胜利寻找责任人，罗斯福则需要向美国公众论证全球统一战线的正当性。斯大林、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场游戏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都必须根据美国人、而非他们自己的需要来确定。他们只能竞争观望风色、因利乘便的敏感性，而蒋介石在这方面的执拗和迟钝众所周知。尽管温斯坦（Allen Weinstein）、瓦西里耶夫（Alexander Vassiliev）、海因斯（John Earl Haynes）和克莱尔（Harvey Klehy）根据20世纪90年代披露的苏联档案和维诺那计划（Venona Project）破译的3000封莫斯科密电，证明财政部、国务院、战略情报局、曼哈顿计划署等要害部门确实遭到匪谍渗透，其中包括罗斯福的特别顾问柯里

（Lauchlin Currie）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助手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但他的挫败仍然必须归因于更深刻的原因：美国人反对日本的泛亚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喜欢蒋介石或斯大林的亚洲帝国主义或欧亚帝国主义理想⁶⁸。美国精英阶级从统一战线时期的纵容匪谍转向冷战时期的镇压匪谍，看似相反其实相成，目标都是打击当时最有可能成功的大陆霸权觊觎者。

真相并不是不重要，但只有在符合格局需要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蒋介石从来不擅长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而赌徒的运气早已在二十年代用完。他最后沦落到平话小说听众的水准，把一切问题归咎于蒙蔽圣明天子的坏人，像平话小说里的忠臣一样喋喋不休：“罗斯福总统应该记住，共产党人是不能公开使用苏联来为自己撑腰的。他们能够而且的确做到了的是利用美国来强迫国民党答应他们的要求。”⁶⁹“谈判总是由共产党人破坏的，罗斯福总统的斡旋会损害自己的威信。”罗斯福不为所动，要求蒋介石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协议⁷⁰。赫尔利向莫洛托夫交涉，得到了苏联支持统一战线的保证：“俄国从来没有帮助过，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武器，今后也不会提供。”⁷¹美国人觉得莫斯科和重庆都已经屈服，接下来的技术问题应该不

难解决²²。赫尔利自信地告诉谢伟思：“不用发愁，我会把双方（国共两党）撮合到一起。他们（共产党）将会得到美国武器，那正是我在这里所致力。”²³赫尔利-莫洛托夫-蒋介石交涉实际上预演了雅尔塔-马歇尔交涉，将蒋介石从开罗会议的幻觉中拖出来。蒋介石发现事态的发展应验了汪兆铭的预见，1945年的所谓胜利比1937年的所谓失败更为不利，就像输光了最后一条内裤的赌徒一样，毅然主动地冲向悬崖，牺牲了本来就已经没有希望的现实，保护了苦心经营的新三民主义-大中华主义意识形态，回到仅仅属于自己和门徒的世界中，永远享受“胜利者”和“正义者”的荣耀。

二、“满洲堡垒”和泛亚各国的民族构建

本节引言：

战争既然爆发，日本人就彻底抛弃了西方国际秩序的约束。泛亚主义者在其短暂的胜利期间，建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多国体系，以有色人种的反帝反殖叙事为基础。满洲国变成了东亚的模范国家。汪兆铭政权重新发掘孙文的泛亚主义思想。缅甸和菲律宾的独立虽然徒具形式，仍然对西方殖民统治的基础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暹罗利用日本的干涉，推动泰民族构建和反法战争，推动了战后泰王国的民族国家化。马来穆斯林利用日本和马来华裔的互不信任，保护自己在马来多族群社会的地位。荷属东印度的穆斯林社会利用日本人提供的机会，为独立战争做好了准备。

1. 日本激进派的满洲梦

蒋介石在幻想的空中帝国飞翔，斯大林在灼热的地下帝国挖掘。与此同时，日本人正在经营阳光下的土地。

泛亚主义者认为，九一八事变仅仅是纠正了二十年代绥靖主义的错误。“满洲堡垒”的伟大意义不限于此，应该为亚细亚各民族的新生开辟道路。朝鲜和台湾的殖民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游戏规则，没有对母国的宪制和殖民地的社会造成革命性的冲击。而满洲国的成立表面上以条约体系的残余为打击目标，实际上体现了日本国内进步主义者对明治宪法的隐蔽革命。这些进步主义者对“东北亚美利坚”的期望，非常接近于英国清教徒对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期望。战后日本和韩国的成就，在政治上和表面上奉美国倡导的民主主义为正朔，在经济上和实质上却沿袭了“满洲实验室”的某些元素，尤其是开明官僚-产业政策-大企业的配合默契。“满洲实验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以前的朝鲜和台湾殖民地、甚至日本本土，并不具备推动社会实验的条件。“满洲国”不仅在远东国际体系内，而且在日本宪法结构内制造了一片真空地带。“处女地效应”为日本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提供了机会，否则他们在国内的前途原本是很成问题的。“满洲国”存在的十几年时间，保证了他们的历练和成熟。战败适得其时，将实验室成果交给大众。

詹森（Chalmers Johnson）在名作《通产省和日本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中宣称，满洲国的发展计划是战后通产省政策的蓝本。吉田茂和岸信介跟满洲国时期的官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弃其名而取其实”的方式，把“统制经济”这个难听的名词包装成“产业政策”，挂起一面自由资本主义的大旗。企画院（日本战前直属内阁的物资动员和政策规划机构）充满了热爱进步的东京大学毕业生，相信自己能够加速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岸信介在这里结束了他的成长年代，然后在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任内找到了大显身手的场所。总务厅和内阁的关系，相当于《是，大臣》里面的汉弗莱爵士和哈克大臣⁷⁴。“满洲国”的特殊政治地位要求总长和大臣必须由本地人和统战对象担任，次长和顾问则多半是实际秉政的日本人。战后民主主义表面上强调民选政治家的权力，实际上并不能真正革除优秀官僚左右平庸政治家的隐秘权力。政治家忙于选区事务，通常只能满足于审核官僚制定的为数不多几种方案，发挥歌舞伎表演的职能。“满洲国经济建设要纲”、“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都是岸信介的杰作（当然他在战后就不再用“五年计划”这种苏联色彩浓厚的语言了）。

2. 新天地的开辟

战前日本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合流，其实是外围国家常见的现象。国家主义者照例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兴趣，却往往会赞赏列宁主义的某些手段（而非目的），因为其中似乎隐藏着赶超核心国家的秘诀。岸信介在大正民主的黄金时代，曾经以左派同情者自居，认为天皇制度已经腐朽，国内的统治阶级不可救药，北一辉的改造计划值得推崇——北一辉本人到底算左派还是右派，本身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大企业和知识分子比农民和穷人更倾向于统制经济，也是全世界共同的特征。能干的官僚和少数优秀企业合作，有意识有目标地推动重点产业的发展，似乎比听任众多散漫和低效的小企业自由发展更迅速而可靠。苏联在北满的投资集中在渗透和颠覆方面，但中东路的存在仍然足以妨碍满洲铁路网的合理规划。张作霖父子的竞争性路网和港口建设，在南满发挥了同样的妨碍作用⁷⁵。张作霖-王永江政府对裙带经济的宽容态度，大连的市政官员实难忍受。基层政权的腐败和武断，引起了满铁青年的农民自治运动⁷⁶。满洲新青年集团和关东军集团积不相能，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力图破坏军人的独立企图，但不可否认只有在满洲国政权赶走了张学良和苏联人以后，他们心爱的整体规划才能大刀阔斧地展开。新京战胜了大连和奉天，酷似巴西利亚对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胜利⁷⁷，暴露了进步

主义者对“一张白纸好画图”的热爱。《日满议定书》存在的意义，主要就是为《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和满洲交通规划提供方便。

议定书²⁸

因日本国确认满洲国根据其住民之意思自由成立而成一独立国家之事实

因满洲国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约款其应得适用于满洲国者为限即应尊重之

满洲国政府及日本国政府为永远巩固满日两国间善邻之关系相互尊重其领土权且确保东亚之和平起见为协定如左

一 满洲国将来满日两国间未另订款约之前在满洲国领域内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据即存之日中两方间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即应确认尊重之

二 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胁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胁威相约两国协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

本议定书自签订之日起即生效力

本议定书缮成汉文日本文各二份汉文原文与日本文原文之间如遇解释不同之处应以日本文原文为准

为此记名两员各奉本国政府之正当委任将本议定书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大同元年九月十五日

订于新京

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

满洲国国务总理 郑孝胥（印）

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 武藤信义（印）

日本重返亚洲大陆，根本目标在于整合全亚洲的资源对抗西方和苏联。满洲国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对抗苏联的目的性尤为明显。日本军官大桥曾经对后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说过：“只有我们能阻止俄国将亚洲苏维埃化的计划。如果满洲国和日本失败了，那么中国将轻易成为牺牲品。”⁷⁹后来的历史完全证明了他的预见，唯一疏失是没有将印度支那也加入牺牲品名单。

斯大林体制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尤其是涉及军事和交通的产业。即使牺牲农业、造成饥荒也在所不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这种政策的原因不难理解。日本在满洲国的建设出于同样的考虑，具有同样的特点：重工业获得的资金远远超过轻工业和农业。区别只限于，进步主义者不能取消私有制，因此“粮谷出荷”没有造成集体农庄的危险后果。“满洲国”迅速转化为亚洲屈指可数的工业中心，在某些关键技术上甚至领先于欧美。“亚细亚号”高铁快车以一百三十公里的时速奔驰在大连-新京-哈尔滨铁路上，保持世界记录长达八十年之久。战争结束时，满洲的工业产值已占全中国七成以上⁸⁰。这个纪录意味着满洲国的生产能力至少两倍于大后方。在远东的三角外交中，日本和苏联才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如果不考虑其他盟国的援助，重庆只是一个次要角色。超高速的重工业建设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势必造成国民当前的生活困难和中长期的发展陷阱。然而，日苏两国的目标都是满足近在咫尺的战争需要。如果在眼前的战争中失败，具有长期优越性的模式对它们并不是什么安慰。

1936年11月1日，满洲国政府确定了《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次年4月1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部资金50.8054亿元，其中39.9854亿元投入工矿业。交通部门投资6.44亿元。农牧业投资不过1.35亿元。1941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生铁产量从八十五万吨增加到一百二十万吨，钢产量从五十八万吨增长到一百一十万吨⁸¹。第二个五年计划投资一百亿元，其中六十亿由日本提供⁸²。到日本投降时，计划仅仅执行了三年半，生铁产量增加到一百八十万吨。松花江和鸭绿江发电站已经开始发电。满洲飞机制造股份公司年产1200架。农产品增加了二百万吨⁸³。盟国的轰炸将日本本土化为一片废墟，却没有打断“满洲国”工业建设的上升线。战争结束时，东北工业所受的破坏甚轻，遗留的资源极为丰厚，足以给当事各方留下深刻的印象。苏军对东北的搜刮和中国内战各方对东北的争夺都体现了日本经营的分量，对此后的历史进程发挥

了很大的间接影响。然而，这种模式的种种长期负面因素也不得不由数十年后的东北和中国承受。

产业计划成就了满洲对亚洲大陆、甚至对日本本土的优势，而且优势每年都在扩大。倘若盟国靠山都在1945年退出战争，兵精粮足的满洲国必胜无疑。新京-重庆的军工差距不是以多胜少，而是以有胜无，足以将战争变成单方面的屠杀，较清兵入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后来的历史发展正是如此，只是满洲统治者由日本代理人改为俄国代理人，战争机器依然如故。这个军事强国年产飞机上千，在外贸中断的情况下，五年内钢铁产量倍增，道路里程增加三分之二，粮食产量增加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它的敌人连卡车螺母都必须依靠进口。四川士兵的蛋白质摄入量不及东北囚犯的三分之一。鉴于苏联只派了一百多架飞机就足以将国民党赶出华东，满洲堡垒的继承人不难在六个月之内从山海关打到上海。“战争结束时，还有大量农产品和军需粮未及运出……山中存粮足够两个师团用六年。”⁸⁴如此，满洲远比1955年以后的韩国、南越、马来亚、印尼更能抵抗苏联南下。毕苏斯基与梵蒂冈寄予厚望，绝非无因⁸⁵。郭药师燕云之师，卒亡全宋。宋徽宗海上之盟，自毁藩篱。

3. 满洲国的宪制

新京政权的力量并不仅仅来自经济建设，处在上承满蒙帝国正统、下合民族构建常轨的有利地位。君统衍生法统，其成本低于任何革命政权。满洲国组织法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皇帝作为统治满洲国的元首，经过立法院的“翼赞”行使立法权，统督国务院行使行政权，根据法律使司法权行使司法权。皇帝还统率海陆空三军。关于重要国务，以参议府作为咨询机关。皇帝得令参议府提出意见。监察院掌管监察和审计、宫内事务。组织法规定：皇帝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不负刑事责任，国务上也无回答之责。地方性邦国发明民族，难度低于任何帝国继承者。满洲国在1937年底，通过《关于撤销治外法权和转让满铁附属地行政权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收回了日俄战争遗留的南满铁路区域。契机在于日裔满洲人以新满洲国民共同体的一员自居，利用满洲国名义上的独立地位，把原先日本国内的新旧斗争变成了国际争端，向母国声索了比张学良政权更多的权益。征服者为自己的胜利，必须付出比失败更大的代价⁸⁶。日本人和苏联人在同一个试验场，发现了同样的真理。石原如果失败，日本不难抵抗蒋介石-张学良政府的骚扰，更长久地保存纠纷的根源。林彪如果失败，苏联同样不难抵抗蒋介石-张学良

政府的骚扰，更长久地保存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更不用说两个五年计划的巨大牺牲了⁸⁷。

日本官员愤怒地指责日裔满洲国顾问“只知有满洲国不知有日本”，对亲邦采取“对抗而非合作的态度。”⁸⁸其实，这种现象恰好是“五族新民”的共同体想象应有之义。满洲国因此自诩在民族国家建构和反殖革命外交的道路上，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日本式顾问政治确实将满蒙贵族变成了傀儡，但仍然比苏联和国民党在同样环境下的做法温和得多。日本殖民者没有集体屠杀任何族群的精英阶级或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损失（这两者恰好是苏联统治的特征）。满洲国、兴安四省和蒙古联合邦给原住民保留的权利，明显多于东北九省、察哈尔和绥远行省。如果以自治为标准，日本的泛亚主义不及大英帝国，但在取代大英帝国的三种革命势力当中，仍然是最不坏的选择。如果以建设为标准，日本的纪录优于当时和以后几十年的所有竞争者。如果以汲取能力为标准，日本仅次于苏联，通常超过国民党，但三者都超过了英国人和十九世纪秩序的遗留政权。

4. 汪兆铭推动东亚联盟

1939年8月，汪兆铭公开指责蒋介石背叛了孙文的泛亚主义理想⁸⁹。《大亚洲主义》⁹⁰的创刊号刊登了孙文遗像和神户演讲，试图将蒋介石复活的梁启超式民族建构逐出三民主义的神庙。汪兆铭提出：国父的民族主义建立在泛亚主义的基础上，三民主义本质上就是泛亚主义在东亚大陆的进一步胜利。南京国民政府的宣传部长林柏生提出：国民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为目标，东亚联盟自然是其合乎逻辑的归宿⁹¹。汪兆铭政权恢复了辛亥前夜的小中华建构，用西方帝国主义取代内亚帝国主义，作为主要斗争对象，从而将满蒙从敌人变成盟友。新京和南京通过义务教育，携手发明了鸦片战争和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神话。上海工部局近在咫尺，构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现成素材——南京和新京都把欧洲裔居民主导的上海议会民主制，发明为“万恶的帝国主义侵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上海回归的纪念活动，一面告慰总理在天之灵，一面羞辱重庆的帝国主义仆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5. 日本经营南洋

德国征服欧洲大陆，给东南亚的反殖民主义造成了填补真空的机会。有田外相试图配合英美维持南洋现状的政策，随着短命的米内内阁倒台而烟消云散。第二届近卫内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向呼之欲出的举国体制做出了新一轮让步，给奄奄一息的政党政治钉上了又一颗棺材钉，对棺木已拱的国际协调主义掘墓鞭尸。大联合政府“站在帝国独立自主的立场上，走帝国独自的道路。虽然说是独自的道路，但它绝不意味着消极的自主外交。必须认识到，这不只是简单消极地应付世界局势的变化，而是要自己主动地指导世界的变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世界新秩序.....为了坚决推行上述外交国策，必须尽早摆脱依靠外国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同满洲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以及向南洋方面发展的必要性正在日益增加。”²²“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包括广州湾），力图彻底断绝其援蒋行为，同时迅速迫使其同意我军担负补给任务部队的通过和使用机场等，并力求取得帝国所需的资源。根据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武力。对于香港，与彻底切断缅甸援蒋公路相配合，强有力地推进各方面工作，首先迅速铲除敌对势力。对于租界，首先谋求消除敌对势力和撤退交战军队。同时诱导中国（汪兆铭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使逐渐收回之。”²³

1940年7月23日，日军越过印度支那边界。7月28日，美国随即下令禁止对日输出钢铁。通向珍珠港的道路就此打开，日本再也无法回头。“独立自主外交”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意味着outlaw（法外世界）针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注定将战争和饥荒带给挑战者统治的平行体系。国民党身为世界秩序的挑战者黑吃黑，自然可以不受直接的惩罚；东南亚殖民地却有合法的保护人，outlaw很快就会体验警察的力量。蒋介石在上海陷落以后期待的国际反应，终于在印度支那陷落以后出现了：尽管方式没有多少值得羡慕的地方，但重庆国民政府依然由此实现了报复日本的梦想。

泛亚主义在东南亚经营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并非没有留下自己的种子。南洋的历史时间表比东北亚慢半拍，自由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直到六七十年代才最终解体。日本的入侵对东南亚的冲击，效果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东北亚的冲击。冷战颠覆活动在南洋历史格局当中的地位，类似共产国际和国共两党在东北亚的地位。在两种情况下，第一冲击波都构成了后继反应的背景。日本人在东南亚的破坏和建构作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菲律宾除了地缘以外，完全不属于亚细亚社会，日本只能采取类似欧洲的占领军模式。泛亚主义完全不能唤起亚洲天主教徒的共鸣，面对美国的训政体制，大东亚共荣圈也没有什么吸引力；缅甸、马来亚和印尼的国族发明直接源于日本泛亚主义，政治精英的传统同样来自日本

在二战期间的反殖民主义；暹罗王国转化为泰语民族的国家，主要也是日本刺激的结果。日本培养的学徒（指缅甸、马来亚、印尼、暹罗）在战后发动独立运动，大体实现了皇军未了的期愿。日本任何时候想到重返亚洲，都会在这里找到箪食壶浆的追随者。印度支那的形势介于两者之间，天主教社会已经存在，但不够强大；日本的挑战足以破坏，但不足以建设。两败俱伤的残局为北方的渗透提供了合适的条件，将西伯利亚局和远东局的衣钵传给了南方局。

6. 东南亚的国家构建

缅甸曾经是英印帝国的分支，英印帝国则是英国殖民主义的拱心石。泛亚主义以推翻殖民主义统治为己任，急于通过构建缅甸国族，实现解构大英帝国的梦想。日本占领军的《林集团军政措施要领》规定，英属缅甸应该在战后获得独立。昂山将军和日本人合作的经历，构成缅甸建国神话的核心。⁹⁴

泛亚主义者不仅哺育了东亚的孙文主义和内亚的图兰主义，也是南洋伊斯兰主义最忠诚的保姆。日本和东南亚穆斯林社会分享了许多共同的目标，其中包括促进这些社会的国族建构和国家独立。⁹⁵今天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有理由感谢日本人的干涉。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国家，直接继承了日本人的经营。

“日本占领马来亚后，一方面对于抗日的华侨加以逮捕、杀害，另一方面对于原住民的马来人则希望取得他们的合作；于是华侨与马来人对于日本的统治政策有着截然不同的观感。（略）在日本统治下的马来人领袖可分为四种类型：（一）苏丹和贵族，他们都与日本合作；（二）宗教领袖，日本企图扶植这些人，表态支持伊斯兰教，但是被一部分士兵和地方官僚无感觉的行为所抵消；（三）成为日本行政体系的官僚和乡村头人，他们必须帮助日本征募强制性劳役，并实施日本的政策，他们中的有些人被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杀害，而其中有许多人失去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四）战前的马来人民族主义组织之领袖，日本官员坚称这些人培植了马来极端分子，但其中一个组织KMM（马来青年同盟）的领袖易卜哈欣（Ibrahim Yaacob）否认他提供活动的援助，宣称他已经承诺KMM不会抵抗日本的进攻。”⁹⁶

早在战争爆发以前，泛亚主义思想家大川周明就开始论证日本和东南亚

穆斯林共同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天然盟友关系。日本军政府没收荷兰人的图书，建立了雅加达伊斯兰图书馆。爪哇穆斯林社会对日本占领军也相当友好，他们的领袖Wondoamiseno 和 Mas Mansur积极配合大东亚新秩序。印尼穆斯林咨询委员会在日本人的监护下，行使了行政当局的职权。未来国父哈达的穆斯林党在委员会的所有支部，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Wahid Hasyim（穆斯林党副主席）利用伊斯兰经校（pesantren）的网络，将穆斯林社会（ummah，乌玛）从政治上、行政上和军事上组织起来。1945年7月，爪哇人继承了共荣圈的最后遗产——雅加达穆斯林大学和穆斯林大会厅⁹⁷。

泛亚主义的垂死挣扎造就了印尼，将战争留给荷兰人。日本训练的乡土防卫义勇军，构成印尼共和派在独立战争时期的军事核心⁹⁸。海军中将柴田弥四郎青睐共和派，让印尼人染指日本军械。十月三日，荷兰海军军官作为盟军的第一批代表抵达泗水(Surabaya)。柴田首先向他们投降，然后宣布承认印尼人对城市的实际控制。他命令日军将剩下的军械交给印尼人，让后者负责转交给盟军。（当然，印尼人没有这么做。）从十月底到十一月初，伊斯兰教师联合会（Nahdlatul Ulama）和穆斯林党(Masyumi)的领导人宣布保卫印尼祖国的战争为圣战，穆斯林人人有责。伊斯兰长老(kyai)和学生从爪哇东部的伊斯兰学校蜂拥而出，挤满了泗水。激进派政治家 Soetomo (1920–1981)以托莫兄弟著称，通过地方电台煽动全城的革命情绪⁹⁹。

日本设想的国际新秩序¹⁰⁰浸透了缺乏操作细节的愿景，以其空洞性和抽象性体现了革命性。暹罗王国改名为泰王国，意味着国本从君统转向民族构建。新的构建对英法殖民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直接挑战。君主国的边界跟民族构成无关，但大量泰语系各族群散布在暹罗王国的边界之外。法属印度支那西部和南部都有泰语族群的聚居地，在历史上曾经是暹罗的臣属。《日本和泰国同盟条约》¹⁰¹的缔结，使新王国得以逆转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优势，将边界向湄公河流域推进。作为回报，泰王国加入了日本策划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新旧盟国仅仅得到了国族创造的框架，但即使最空虚的形式都能够保存原本不一定产生的路径和机会。

“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员如此庞杂，既没有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纽带，又没有共同的愿景和共同的价值，除了战争的临时需要以外，没有多少存在的理由。即使如此，独立、自由和平等的诉求仍然击中了美国人固有的救世情怀。国民党人的老朋友赫尔利把自己评定为‘反帝国主义的英

勇斗士’，他抨击了英帝国主义，说英帝国主义正处在崩溃的前夕，而美国人已经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两次挽救了英国人。但是，美国人已经不愿意再这样做了¹⁰²。

抗日战争最积极的支持者赛珍珠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文章，颂扬泛亚主义的新秩序：

“东条让缅甸独立的诺言于八月一日实现。

.....十月十四日，菲律宾宣布独立，一个星期后，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也宣告成立，由鲍斯担任国家元首。西方没有认识到这些事件的意义。这些新政府都是日本的傀儡。但是，亿万亚洲人通过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从白人统治下获得了自由。他们的热情在十一月初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上达到了顶峰。中国、泰国、满洲国、菲律宾和缅甸派代表到东京出席了会议。

.....这是正在觉醒的亚洲的声音。对东条说来，这几个小时是他的生涯中最满意的时刻。东条巧妙地操纵着整个会议的进程，慈父般地朝各代表们微笑。他不只把这次会议看成是军事联盟，他自己也被泛亚精神所陶醉了，可是，他的军队中的同僚却为之大伤脑筋。

.....这是大西洋宪章的太平洋翻版，是实现亚洲人长期以来的梦想的许诺。那些到东京去的人也许都是傀儡，但是，他们是在奴役状态中出生的，此时已是自由了，并第一次共同宣布为亚洲建立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日本人无法满足美国人对普世主义的追求，在未来的三年内输掉了他们的帝国。欧洲人和苏联人在未来的三十年和六十年内，落到了同样的下场。

三、华北、南京和重庆的法统复辟与革命投机

本节引言：

如果中华民族已经构建成功，抗战就是愚蠢的决断。抗战在政治上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蒋介石政权需要藉此推动中华民族的构建。为此，诸夏的历史和传统必须牺牲。汪兆铭政权以孙文主义的嫡系自居，视重庆政权为篡位者，试图在南京延续党统。维新政权以1923年宪法和联省共和国的合法继承者自居，视重庆政权为共产国际代理人，试图在北平延续法统。延安一面在形式上承认蒋介石的领导，一面暗中跟汪兆铭政权合作，利用双方的猜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战争的压力迫使各方越来越多地推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和革命的外交政策。南京政权在革命外交方面，暂时领先于重庆。

1. “抗战建国”的虚构

只要战争的骰子仍然在空中转动，所有各方都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读。对重庆的蒋介石集团而言，战争可以弥补自身的双重不合法性：北伐作为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战争，肆无忌惮地践踏了辛亥以来一脉相传的法统。蒋介石依靠军方驱逐胡汉民和汪兆铭，又粗暴地践踏了三民主义党派的正统原则。训政需要党权，宪政需要国会。前者对蒋介石不利，后者对国民党不利。蒋介石如果将革命战争转化为护国战争，就有希望通过全民战争产生全民领袖的需要；如果借助对日战争消灭旧中华民国宪制内的众多部分主权实体（quasi-state），就有希望通过大中华国族主义开发华夏文化圈的历史资源。战争伤害的范围越广，重构历史记忆的需要就越强。

战争爆发以前，诸夏由众多隔膜的小团体组成。大多数团体对待遥远的中华民国，犹如对待古老的朝廷。朝廷和天灾一样难以抗拒，但根本上属于异类。中华民族或任何建构想要打破这些隔膜，都必须首先摧毁这些小团体。流亡重庆的下江人首先发现自己“属于”中华民族，否则就会沦为无家可归的浪人和难民。他们从此别无选择，必须以抗战-建国为借口发动革命-征服，瓦解巴蜀士绅军官和西南蛮夷部落，将总体战结构深入到原有社会的废墟内，才能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中华民族原先只是众多可能存在的未来路径之一，此后就是证明自己正确的唯一途

径。“抗战建国”自动转化为“建设新中国”，实际涵义就是通过虚构旧中国，锁定未来的路径选择范围。意识形态的创新弥补了正统性的欠缺，如果蒋介石的发明获得胜利，“下江人的流亡”就会自然形成新民族的诞生史诗，介于《伊利亚特》和《出埃及记》之间。

建国神话有自身的逻辑，很难接受一部分而排除其余部分。共产党取天下以巧诈，以致于没有积累到建国神话的最基本元素，不得不剪贴拼接苏联、日本和国民党为自己不同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建设新中国”和“虚构旧中国”的核心程序，结果在《出埃及记》部分留下了难堪的空缺，只好发明更加脆弱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作为无产者的瓜菜代替。民族英雄蒋介石的形象塑造通过SM式感情炼金术，熔铸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形象¹⁰³。

1937年11月的国民代表大会流产后，1938年3月的国民党临时代表会议通过了《抗战建国大纲》和《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国民参政会处在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中间状态，发挥了联接统战外围和党国核心的纽带作用。虚拟共同体（中华民族）像机车喷出的烟雾，保护和遮蔽了真实共同体（国民党）。中华民国与国民党不可分割，新中国和新三民主义不可分割，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不可分割。重庆流亡政权相信，这样的三层次锁定足以造成法统虚位，给革命党的社会重组计划提供充分的自由。

2. 南京的党统与北京的法统

汪兆铭集团在新三民主义阵营内的生态位，酷似托洛茨基集团在列宁主义阵营内的地位。他们看到迟钝的庸人篡夺了领袖和先知的遗嘱，惊愕的程度仿佛希律王的子孙穿上了所罗门的靴子。他们不希望在党权在重建社会的使命完成以前，就让名义上的“行宪”变成革命半途而废的借口。他们的党治理想非常接近苏联意识形态专家痛心疾首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但他们自以为完全有能力继承列宁主义的组织优势，同时无需付出残酷斗争的代价。历史如果赋予他们较好的机会，就会产生酷似纳赛尔主义和庇隆主义的左翼法西斯国家。抗战爆发前的十年，他们彷徨于不同的军事集团之间。每一次失败都降低了他们下一轮讨价还价的地位，越来越依赖汪兆铭的个人形象。

汪兆铭不大依赖他的集团，也不大照顾他的集团。自恋的诗人沉溺于拉

马丁和十二月党人的浪漫镜像中，一向没有怎么缺乏过自愿投靠的追随者。他看清了蒋介石策略的隐秘期望和致命弱点，对蒋介石的道德和智力都没有多少尊重。他能够容忍机会主义者占据权位，只要能保障自己珍贵的记忆或幻觉；但如果黄雀在后的篡夺者连导师的意识形态遗产都要吞没，不合时宜的骑士之血就要重新点燃小资产阶级文人的虚弱薪柴¹⁰⁴。他如果不能拯救国民党，至少可以死在蒋介石断送国民党以前。他的策略如果配合国民党的全部实力，确实可以实现辛亥泛亚大同盟的理想主义，但由于这一点根本不可能，他只是发挥了分裂国民党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的左派倾向吸引的匪谍比重庆更多，尤其在国共合作从未中断的情报机构。汪兆铭企图阻止的，都由周佛海、潘汉年和李士群加倍地做到了¹⁰⁵。

南京国民政府的组织最初亦步亦趋地继承“以党治国”的1928年原则，召开了平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否定了1939年1月1日以后的蒋介石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将总裁制和蒋介石的总裁职位一起撤销了，通过了具有训政时期基本法性质的《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关于授权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制定了政策指导文件《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汪兆铭政权希望坚持北伐和训政的正当性，以1923年宪法为主要假想敌。他们之所以同意在《日华基本条约》中做出重大让步，就是为了购买日本的支持，压制北平的五色旗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勉强放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国会重开的希望，换取了“中央政治会议”三分之一的席位和最终“实施宪政”的承诺¹⁰⁶。“中央政治会议”的地位相当于同时的“国民参政会”和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包容性大于仅仅属于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940年的中央政治会议产生了孙文设想的五院及其《组织法》，批准了训政时期的人事任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汪兆铭、院长褚民谊，立法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和，监察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考试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汪兆铭个人的宪制理想和1930年代的痛苦记忆体现于军政和军令系统的分离，保证了南京国民政府不可能重新出现蒋介石式的“委员长”。

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其转瞬即逝的机会窗口内，重提吴佩孚和北洋旧人年年不忘的1923年宪法，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以废除一党专政为主要号召：“恢复民主国家，煎绹污秽党治，同时绝对排除共产主义。”¹⁰⁷王克敏、朱深祖述宋教仁和梁启超，草拟了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复活了民初宪制的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在非常时期代行三权。他们秉承梁启超在北伐时期的意见，将蒋介石政权视为共产主义的培养基，企图利用日本的干涉报复苏联的干涉，通过抗战的反作用力抵消北伐的作用力，指责国民党“窃据政柄，欺罔民众者十有余载”；“反复容共，倒行逆施，不顾社稷之将覆”；“拾共产唾余，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私国家为己有”；“蒋介石执迷不悟，倡言容共”；“以焦土抗战为号召，而百战百败，未数月而丧其国都，省市几失其半”；“托名于国防，而消耗之金钱，不知几十亿万何”。总之，“国民党亟宜悟容共之非，谢罔民之罪，自承失败，引咎下野，是非听诸公断，政权还之吾民。”¹⁰⁸他们以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向全世界呼吁：

“自党府专权，轻开战衅，师徒败绩，日不绝书。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应时势之要求，先后成立。皆所以缓和战祸、恢复邦交，救中国垂死之遗黎，兼以树东亚百年之大计也。数月以来，两政府悉心体察，觉对开两府，固感要政之不易推行；即树立中枢，亦须各方之详加考究。几经商榷，而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遂于今日产生。本救国之精神，求反共之效率，通力合作，责任綦重。不待入会政府当努力从事，誓践此言；即未隶两府版籍之朝野诸贤，亦望其深憬民艰，保全国脉，参加组织，共策进行。其民众之误信宣传者，亦宜力戒盲从，急图觉悟，认明安危利害，以自造于福利之途。至于共产党人，乘中国之危机，诡私统一之方，莫逾联共，目前以尝试党府，将来以赤化中国，此则尽人皆知，无待复说。岂蒋介石执迷不悟，倡言容共，为饮鸩止渴之谋，又复出其爪牙，肆为簧鼓。不讲立国之道，专惑在远之人。国中有识之士，亦不免受其威逼利诱，堕入彀中。蒋氏遂借此负隅，延长战祸，以造成今日之局。须知我两政府同人之抱负，联合委员会会务之进行，皆不愿中国受悲惨之牺牲，华人增无穷之苦痛也。果使中国厉行反共，则国事可以安定；国事安定，则东亚立现和平；东亚和平，则世界举蒙其福。然则联合委员会之设，非徒为中国而已。世界人士如能俯见此诚，则向来通好之国家，皆吾弟昆，皆吾素友。其有阴助蒋氏，扶植共党，假托旁观，使中国民众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冀收渔人之利者，则虽欲敦我睦谊，其道无由。肺腑之言，度蒙谅解，中国前途之荣悴，亦将于此征之。谨此宣言，用告中外。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¹⁰⁹

北平政权的宪法理论源于久已消亡的自由主义世纪，外交上却得不到自由主义核心国家的支持。日本干涉者正在忙于消灭本国的自由主义残余，非但没有为大陆的孑遗而兴灭继绝，反而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待华

北的“法统复辟”和“联省复辟”，强迫他们并入南京政权。旧国会的梦想随着最后的维护者吴佩孚，不明不白地退出历史。南京和重庆的残余政权虽然彼此敌对，却同样坚定地走上了政党协商制的道路。汪兆铭和改组派指责西方代议制的弱点，向往协商机制和组合国家，这为此后数十年的“协商制民主”理论提供了蓝本¹¹⁰。社会各部分的协商-组合需要一个超越性的政党，否则国民联合体就会始终处在虚悬的状态。汪兆铭的众多敌人迄今仍然不得不借用他的模型，为一党制国家辩护。

战争总是对统制经济有利，促使北平、南京和重庆的敌对政权加强物资和流通的管制。汪兆铭政权的“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囊括了棉业、米粮、粉麦、油粮、日用品五大领域，后来又扩充到钢铁、非铁金属、矿石、棉花及棉制品、羊毛及其制品、麻及麻制品、橡胶及其制品、矿油、煤炭、机器及附属品，强迫业主和商人接受官方的登记、征购和调配，但一般不会触动利润本身。汪政权尽管在理论上偏左，却较少推行国有化和国家直接投资建设，部分原因在于华南社会的资本主义性格更为浓厚，部分原因在于汪兆铭和他的朋友们把主要精力用于收回日本控制的军事设施和残余的租界¹¹¹。重庆政权统治了一片几乎没有工业、金融和基础设施的土地，又携带了资源委员会和四联总处理事会的全套班底，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国家投资驱动（尤其是农业、军火和交通建设）的路线。西迁的私人企业为数不多，又陷入原始和陌生的经济环境，越来越离不开官方的贷款和采购支持，至少在功能上已经沦为战时社会主义的次要齿轮¹¹²。华北政务委员会为了保存民初宪制的最后一点遗迹，抗拒南京和东京日益强大的压力，推迟“一个主义（大亚洲主义）、一个党（仍然是国民党）、一个领袖（汪兆铭取代蒋介石）”的意识形态二次北伐，已经没有余力和兴趣推动经济建设。华北的小企业大多数来自逃避乡村掠夺者的本土小有产者，性质酷似1972年的西贡。大企业多数来自日本财团和满洲会社，同时大量劳动力流入繁荣的满洲¹¹³。这些企业在1945年被蒋介石的代表国有化，至今仍然构成华北国有经济的骨干¹¹⁴。

3. 孙文主义的最高峰

1942年10月13日，东条内阁同意放弃全部在华特权。汪兆铭自豪地宣布，他签署了“中国近百年来独一无二的平等条约”¹¹⁵。《同盟条约》和《附属议定书》取消了日本从《辛丑条约》到《日华基本关系条约》（1940）获得的所有特权，从战争的重要导火索华北驻军、源远流长的

东交民巷使馆区到鼓浪屿租界，性质和内容都非常接近1937年的满洲国-日本条约、1944年的蒋介石-西方盟国条约、1955年的毛泽东-苏联条约¹¹⁶。事实上的附庸国通过充当人肉盾牌和贡献后勤补给，从保护者手中买到了名义上的平等权利。南京政权觉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都是自己的丰功伟绩，足以告慰祖师爷孙文和头山满的在天之灵，对历史本身也算有所交待了¹¹⁷。陈公博直到战后还向蒋介石政权表功：“同盟条约内容，已取消一切密约附件，更取消所谓华北驻兵及经济合作，而且更将内蒙返还中国。所剩下来的，只有一个东北问题了。”¹¹⁸殊不知蒋介石之所以必须将汪兆铭集团的经营从历史中抹去，正是因为不能容忍中国人民居然会在敌人的领导下抢先站了起来，这样岂非证明他自己的抗战建国计划既无用又有害，下江人的迁徙由悲壮的史诗一变为可笑的闹剧？

不久后，毛泽东就依据同样的理由，用蒋介石对待汪兆铭的手段对待蒋介石，将“中国人民”自1928年以来一次又一次“站起来了”的排演塞进壁橱，再用精心设置的无菌乐园培育下一代青年，最后将知道得太多的老一辈见证人赶尽杀绝，以免“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没完没了地发生。

四、毛泽东的色拉米香肠战术¹¹⁹与梁山路线

本节引言：

毛泽东机敏地发现，罗斯福、斯大林、蒋介石和汪兆铭的路线冲突为他提供了玩弄权术的大好机会。党内的列宁主义者习惯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应该为莫斯科和重庆的统战大局牺牲。毛泽东凭借他对东方权谋和流寇社会的深刻理解，挫败了列宁主义者，将斯大林和蒋介石的资助用于保存实力和扩展领地的目标。蒋介石出于借助共产党消灭地方势力、害怕影响重庆—莫斯科关系的考虑，默许了共产党吞并华北、华中和西北的大部分土地。二战结束前夜，延安和南京达成针对重庆的互助协约。华盛顿和莫斯科关于战后建立联合政府的安排，进一步捆住了蒋介石的手脚。

1. 斯大林改变远东政策

斯大林根据西班牙内战的经验，指导了远东阵线的初期部署。武汉在他的规划中相当于东亚的马德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代入西班牙共和派和共产党的相对位置。蒋介石和王明忠实地执行了斯大林的计划，毛泽东不敢公开反抗他们。欧洲的危机和武汉的陷落几乎同时发生，促使斯大林改变政策。前期的政策是利用蒋介石政权，拖住深入亚洲内陆的日军。后期的政策是联合德国和日本，破坏和瓜分摇摇欲坠的世界体系。前后两期的转换大致以慕尼黑绥靖和武汉陷落为界，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日中立协定》¹²⁰而完成。三大革命势力在东北亚胜负已分，日本和苏联实现了满蒙互换。华北缓冲区由北平的政务委员会和延安的中共中央瓜分，负责保护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外围，正如南黎巴嫩军为以色列守边，黎巴嫩真主党为叙利亚守边。

莫斯科和东京瓜分了东北亚，内亚则是苏联的禁脔。苏联技术人员打通并维护莫斯科—阿拉木图—迪化—西安交通线，同时给重庆和延安输送军事装备。内亚各邦的长官无论名义上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穆斯林，实际上都是莫斯科的藩属。周恩来和任弼时在这里建立了可靠的后方基地。¹²¹

蒋介石事实上已经出局，但他继续自欺欺人，因为害怕全国领袖的空架

子被戳破，不敢公开为他留在华北的余部鸣冤叫屈。后者纷纷效仿石友三和吕正操，分别投靠北平和延安。苏联和日本实际上都已经将蒋介石视为汪兆铭、王克敏和毛泽东的同僚，分别跟这些地方政权交涉，只有西方列强仍然承认重庆名义上的中央政权，但蒋介石的革命行动仍然以列强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为主要目标。他在抗战时期的渗透活动（支持印度国大党反对英印帝国的备战工作，组织西藏革命党反对达赖十三世，为越南国民党和共产党提供滇桂基地，越过英国当局直接动员缅甸和马来来的华裔人力财力）得罪了英国人，给日本人提供了入侵的借口，为国际共产主义打开了期待已久的门户。国民党在南洋的分支机构将闽粤移民社区变成了超限战的战场，最终使他们落到类似东欧日耳曼人的下场。

2. 毛泽东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敏锐地看出，二十年代革命家的恐怖主义策略已经不合时宜，苏联现在需要的是缓冲区，他只要大方向正确就能乘机营私。蒋介石最怕在观众面前暴露自己沦为地方政权的事实，因此吃了哑巴亏也不敢声张。日本人越是公开宣传重庆不过是地方政权，蒋介石就越有必要付高价购买中央政府的门面。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在1936年仍然战战兢兢，为张学良区区六万发子弹的接济而感恩戴德¹²²，在偏师的袭击下仓惶逃离赤都瓦窑堡¹²³，在1940年就能够肆无忌惮地越界蚕食国民党辖区了。毛泽东觉得现在是该替自己人打算的时候了，但这话必须翻译成黑话，既能让出身草莽的愚蠢部下明白怎样保护自己，又不能让精明冷酷的列宁主义干部抓住破绽：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前提。”¹²⁴

这样的理论在米夫的学生看来，明显散发着异端的气味，但在做不到言必称希腊（马列）¹²⁵的流民和枭雄耳中，真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的解放感。

毛泽东最大的困难在于，他只能戏侮和恐吓列宁主义干部群体，在组织

上却永远找不到替代品。他狡猾地培植梁山系人马，足以牵制苏联系的旧班底，但某些至关重要的任务只有后者才能胜任，尤其是列宁主义组织的命脉——情报机构¹²⁶。如果他有自己的贝利亚，就不应该允许莫斯克斯·周、康生、陈赓、李克农和叶剑英活下去，然而任何外国支部在莫斯科的触角监护之下，都只能允许领袖享受如履薄冰的生活。

虽然斯大林在四十年代，无论如何不会允许毛泽东除掉共产国际留下的明哨暗哨¹²⁷，但他直到垂暮之年仍然不得不听任周恩来和康生自然死亡，就已经解释了许多问题。他“个人崇拜”和“群众路线”的意义就是监视和牵制介于领袖和群众之间的干部。换成掌握了捷尔任斯基和贝利亚的斯大林，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暧昧混乱的“治病救人”¹²⁸取代了精确高效的肃反，因为社会部仍然是政治保卫局的直接延续。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心里有数，组织为他安排的“女主人”可能来自克格勃或中央保卫委员会（中央社会部的别名）。毛泽东虽然任性地坚持自由恋爱，仍然不能不允许康生审查未来的妻子。康生有充分理由为江青洗脱国民党特务的嫌疑，因为后者就是他自己派到鲁迅艺术学院的网员（告密者），在保卫部长许建国的直接领导之下¹²⁹。康、江二人在延安一见如故，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同乡和旧识的缘故。毛泽东根据普世原理“得不到自己喜欢的，就只能喜欢自己得到的”，相应地发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胜利法。文化大革命即使真能打倒匪谍的核心，也无非是把权力转给匪谍的外围。江湖枭雄无论多么机警狡诈，终归不过是列宁党蜘蛛网内的一只昆虫。

抗日根据地作为远东共和国的孙辈，有丰富的统战经验可以继承。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人民民主（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企图欺骗永远不会吸取教训的资产阶级。毛泽东相应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和“三三制”的副本，首先在延安付诸表演。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宣称：边区有近二百万人口，二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五人的自卫军，二万八千零八十七人的少先队，七百多个锄奸委员会，近九千个锄奸小组和十万多的锄奸组员¹³⁰。民兵和锄奸团只能为正规军和情报机构提供辅助服务，考虑到林伯渠作为外围人士得不到核心人员的名单，党政组织和社会组织必不可少的核心干部尚不计入，我们不难估计，群众的监视者人数不会低于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张闻天的赣南同样有共产国际的资助、打土豪分田地的赃物和国有土特产垄断企业的收益，都已经在八个群众供养一个干部的压力下崩溃，在

五年内损失了三分之一人口。延安的干群比例甚至更为恶劣，仅仅依靠莫斯科和重庆的补给是根本不可能减轻群众负担的。民主演出只能依靠强力部门的工作和左派文人的宣传，而且后者其实也是前者的外围。周恩来在重庆、李克农在桂林的重要工作就是组织这些知识分子，毛泽东亲自出马教育投奔延安的文学青年怎样做党员。谢觉哉承认：“第一届边区各级参议会，虽然是普选，但非党员和富有阶级当选的很少，少得几乎看不见。都是党员，都是执行党的决定，没有异议，更说不上争议，因此大家觉得议会可有可无。两年来边区各级参议会的不能按期开会及改选，这也是原因之一……第一届参议会聘了十位非党的地方绅士，我们把他当傀儡，他们也自认为傀儡，没有什么实际意义。”¹³¹赣南苏区地形复杂，大为“群众的反抗、群众的上山”所苦¹³²。延安的地形虽然便于监视控制，但最可靠的巩固方式毕竟莫过于渗透、劫持和蚕食邻近地区。即使苏联本身也只有不断扩张边界，才能压制核心地区的反侧之心。

3. 统一战线与渗透策略

统一战线允许八路军为军事方便，进驻或通过边区以外的各县。当然，他们来了就不会走。国民政府的基层组织薄弱，县以下几乎没有工作人员。共产党的任何组织一旦将触须伸入白区，就会迅速建立大量的党组织和民兵组织，人数和实力大大超出通常只有数十人的国民党现政府¹³³。知趣的县长这时会主动辞职，换取开明人士的名分。不知趣的县长则会发现政令不出县府，自己在共产党大队人马的包围下形同囚犯。如果他这时仍然拒绝交出权力，县政府的少数工作人员就会在冲突中全军覆没¹³⁴。如果共产党的民兵和群众组织未能消灭县政府人员，八路军就会以消极抗战的借口介入。最后的结果，总是边区不断蚕食白区。国民党的地方官只能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则为了维持统一战线的门面而隐忍¹³⁵。最严厉的反制措施不过是修建防线，禁止边区进一步扩张，已经丧失的地区，从来不曾收回，然而即使这样的自卫措施，也被粉红色媒体称为“反共高潮”。

毛泽东把红色根据地视为自留地，尽量开发斯大林和蒋介石的信息落差，急迫之心溢于言表，说明他知道时机多么短暂：

“（一）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

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

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三）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四）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⁸⁾，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五）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

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荫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¹³⁶

教条的共产主义者相信历史必然性，缺乏辨认和捕捉机会窗口的敏锐。因此从列宁的十月赌注开始，成功的共产主义者一直都是改头换面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种人信任江湖经验，鄙视理论和书本。毛泽东知道自己不是斯大林或任何列宁主义者的亲信，只有“胜利者不受责备”原则才能保他安全。他的胜利是西西弗斯和麦克白苦刑的综合体，既不能退也不能停。天赋或精力不济的人长期陷入这种处境，肯定会死于肾上腺皮质激素紊乱。实验员熟悉这样的小白鼠，不亚于审讯员熟悉这样的犯人。他们要么陷入呆钝或幼稚行为，要么爆发出以自毁为目标的超凡智慧。只有特别强壮和狡猾的个体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忍受煎熬，称之为特殊材料¹³⁷并非过誉。当然，他们最后的成功可能就是一种隐秘的自毁。毛泽东在抗战中期就已经明白自己对格局的把握超过大多数同侪，越来越自信地冒他们不敢冒的险。他发现苏联是蒋介石的上级，无情地践踏后者最珍惜的门面。皖南事件给蒋介石提供了表演各党各派共同领袖的机会，毛泽东却直接询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如何办？”¹³⁸他明白蒋介石已成笼中困兽釜底游鱼，居高临下和宽大为怀的态度无非是为了掩饰自己越走越窄的路径。“蒋介石无论他怎样造反但闹来闹去，只会把他自己闹垮台的。”¹³⁹如果不是因为斯大林的反¹⁴⁰，他已经准备进攻重庆了¹⁴¹。

蒋介石甘愿吃暗亏，以免向苏联暴露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号令全国的可悲处境。西北军和晋绥军、更不用说地方团练同样宁愿吃暗亏，以免向蒋介石暴露自己的半独立政权根本没有抵抗收编整合的能力。他们经常希

望借助共产党的统战支持，抗拒或延缓蒋介石统一政令军令的步骤。国民党同样热衷于借刀杀人，简化他们心目中的反封建任务¹⁴²。毛泽东指责晋绥军将领张荫梧是冀中敌后游击区的“摩擦专家”，冀、察战区赵侗的游击第七纵队则是国家社会党的武装。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看到他们和八路军冲突，就乘机解散了他们的部队。阎锡山和牺牲救国同盟会合作，结果导致了三晋新军（薄一波的决死队）和旧军的全面冲突。阎锡山为了保存自己的特殊体系，宁愿听任新军并入编外共产党军队，以致太行、上党之险尽失。

4. 发展是硬道理

背叛和投机的游戏没有产生多少清白的演员，加害者和受害者仅仅因为极为偶然的因素就会交换位置。卫立煌和程潜都喜欢配合八路军消灭地方势力，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本人或身边的匪谍。蒋介石对待长征红军和川滇军阀的手腕，为他们提供了“能做不能说”的秘传心法。蒋介石从未允许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解散遭到新四军袭击的部队，却愿意对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各种僭政睁一眼闭一眼。华北诸军心里有数，脚下明白。鲁、豫、冀属于西北军的传统范围，跟北洋和苏联的关系都比跟蒋介石黄埔系的关系深厚。投靠北平和延安的军队以此系为最，两者经常交叉，尤其在黄淮和胶东，孙良诚和吴化文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最终实现了曲线报复蒋介石的目标¹⁴³。

对这些投靠的人马，彭德怀专门为他们制定了优惠政策：“1.对反正伪军，按照抗日友军待遇，不缴枪；2.对反正伪军，给以抗日军番号，不编散；3.对反正伪军，一视同仁，帮助其发展，共同抗日。”¹⁴⁴吕正操领导的冀中军区收编北平政权的部队，尤为积极。“高阳边窝、清苑石桥两个据点反正的伪军两个班编成了高保中队，委任反正的石桥据点班长马继田为中队长，把他们树为伪军的一面旗帜……争取文安县伪军小队长李学增率全体反正，授予文新霸抗日先锋中队番号……分区党政军民在石门桥为他们（任丘军）光荣反正召开了欢迎大会。授予反正部队‘冀中第九军分区抗日义勇支队’番号。任命张崇武为支队长……我军争取一个县的全体伪军反正，接受我军改编，在冀中区来说还是首次，堪称争取瓦解伪军工作的典范。”¹⁴⁵“对土匪则不是消灭，而是中立之，并建立密切关系并打入工作，联合其扰敌行动。”¹⁴⁶1938-1939年，冀中八路军士兵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来自伪军¹⁴⁷。

日本人的军事训练往往比他们的敌人更胜一筹，为其叛逃的附庸赢得了更好的物质待遇。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提出：“对反正伪军的待遇不应和我们八路军一样，只要他们抗日，斟酌情形予以特殊待遇，不但可以巩固反正的伪军，而且可以影响其他伪军，××反正的伪军，反正后我们将他们升了一级，生活上给予特别待遇，该部不但巩固了，而且扩大了，并影响到据点内伪军，这样反映‘还不如到外面抗日,还吃馍馍呢！’的确，这样对其他伪军是起了瓦解的作用，我们对×县和×××的反正的伪军，由于不关心他们的生活，同时要求和我们一样，所以造成内部情绪不高，再加上日寇的勾引，所以又重投敌一部，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¹⁴⁸

兵荒马乱之际，土匪同样是宝贵的资源。晋察冀边区为了争取进一步统战土匪的机会，跟他们约法三章：“第一，抗日，给八路军送情报，掩护抗日人员；第二，划定各自的活动地域，在有抗日政权的地区内不许绑票，但可以‘养秧子’(绑架来的人质)，允许其到老敌占区掏那些汉奸、亲日分子和豪绅地主；第三，听从我之指挥，准许我派干部定期前来上课……这样就相当的约束了他们对群众的危险，而把其破坏性引向对敌。”¹⁴⁹

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壮大，摩擦愈演愈烈：

1938年1月，八路军在新河袭击河北民军赵云翔部。

1938年12月，八路军围攻博野的冀中游击司令部。

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歼灭了鲁西、徐海行政专员公署。

1939年6月，刘伯承、贺龙在邢台歼灭河北民军张荫梧部。

1939年9月，八路军在浑源歼灭第二战区第二游击师。

1939年12月，八路军在盐山歼灭冀、察战区游击第三支队。

1940年1月，聂荣臻和贺龙在灵寿歼灭冀、察战区游击第七纵队。

1940年1月，八路军在元氏袭击冀、察战区游击第二、第四纵队。

1940年4-11月，八路军主力进攻河北省主席鹿钟麟。鹿钟麟逃离战区后，重庆政权再也没有恢复他们在河北的领地。

1940年8月，八路军在鲁村围攻山东省主席沈鸿烈。

1940年9月，新四军在泰兴袭击江苏省政府陈泰运部。

1940年10月，新四军在黄桥袭击八十九军。

1941年1月，新四军在茂林袭击第四十师。

1942年4月，八路军在浮山袭击六十一军。

1942年5月，八路军在莱阳袭击第十二师。

1942年8月，八路军袭击杀害山东省政府建设厅长秦启荣。

1943年2月，新四军劫持江苏省主席韩德勤。

1943年5月，八路军与日军夹击太行山国军预八师和四十五、四十六两师。

1944年7月，共产党运货支队袭击微山湖专员公署。

1944年8月，李先念在黄陂袭击第四纵队。

1944年8月，津浦路共军在沛、萧县袭击国军第十二、二十六纵队。

1944年9月，八路军与日军在浮山夹击国军六十一军¹⁵⁰。

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接受了第十八集团军不断配合日军夹击国军的报告，《大公报》发表了《恳劝第十八集团军》的社论。周恩来做了一番不着边际的辩解，发誓说八路军绝对没有进驻太行山区。张荫梧到大后方上访¹⁵¹，得不到蒋介石的同情。委员长最后用中央军校的教官职位打发他，侮辱的涵义多于安抚。“摩擦专家”发现军政部和军令部里的敌人比华北还要多，只能用反驳《新华日报》的小册子自我安慰。

重庆的国民党人试图向毛泽东的上级告状，但胜利者总是不受责备的。斯大林的代理人对他们的态度，犹如蒋介石对待太行山区的游击队员。1945年6月19日，白崇禧对苏联代表彼得罗夫说：“鹿钟麟的部队在河北讨伐日本人的同时，还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袭击，一部分士兵还被解除了武装。在山东，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封锁了道路，并解除了受到日本人攻击而撤退的省政府军的武装。在华中地区，面对日本绝对优势兵力而撤退的韩德勤将军，遭到了背后的袭击……我当然不愿意说，共产党人是同日本人商量好并按照日本人的命令行事的，但他们在客观上利用了日本人的攻击行动……共产党人吹嘘说，他们有九十多万常规部队、三百多万民兵……他们在开始防御战争时，只有大约三万支步枪。他们靠什么补充了这么多武器？共产党人吹牛说是靠从日本人手中缴获来的。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指望日本人你是不可能获得这么多武器的，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共产党是通过解除地方保安团和国民政府军队的武装才获得了这么多武器。”¹⁵²当然，这时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思想”已经胜利了。甚至日本人自己在完全丧失太平洋以后，也开始考虑撤退到亚洲大陆，跟莫斯科和延安联合起来，坚持抗美反蒋的游击战争¹⁵³。

5. 渗透-劫持-重组-汲取

共产党的扩张程序由渗透-劫持-重组-汲取四个阶段组成，成败取决于干部队伍和目标社会的组织资源落差¹⁵⁴。共产主义的干部和军人群体比三民主义和儒家社会对应的精英群体庞大得多，一旦渗透成功就不难将后者变成瓮中之鳖，但是正因为组织更加强大和庞大，劫持和重组以后的汲取力度必然会大大加强。1938年3月15日，《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颁布。延安成立了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随后在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各地建立了十二个军政干部学校。合法地位和真空地带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机会窗口。¹⁵⁵

军官的专业性质较强，不像党政干部容易培养，因此更加依赖统战。《中央对根据地军事政策之原则指示》写道：“在军队的领导权握在我党手中的条件下，可以吸收大量的同情份子（抗日而又不反共的国民党军官及无党无派的军官）加入我军。”¹⁵⁶

军政干部首先渗入社会，以人数和组织的绝对优势，包围寥寥无几的旧政府官员，然后切断其社会纽带，果子自然会从砍断的树枝上落下。相对于人类其他文明，儒家传统的农村社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散沙化程度极高。孤立的小农除了血缘家族以外，相互之间几乎没有共同利益和合作习惯。宗族长老和地主乡绅除了应付衙门的税收以外，很少为普通农户和公共事务承担责任。小农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庇护不多，服从他们的习惯也很薄弱。封建领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士的组织网络和动员能力，在这里完全不存在。社会软弱，统治者就不需要太强。大清以数十名县衙官员，统治宗族长老和地主乡绅。国民党通过部分的列宁化，将基层政权伸入各区和各村，在农村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共产党的彻底列宁化，又将脱产干部的人数增加了数百倍至数千倍。

八路军和新四军进驻县城，就足以震慑国民党干部手下的治安人员。党组织建立以后，通过民众抗战动员，将外围组织渗入基层。各级组织的人数都比同级的国民党行政人员多出数百倍以上。各级党支部、群众组织和红色民兵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足以绕过国民党行政人员，向小农征收公粮和物资，组织征兵和劳役。他们根据延安的政策和当时的需要，统战一部分亲共的乡绅和长老（所谓的开明绅士），以牺牲顽固分子和缺乏统战价值的普通农民为代价，给他们的子弟安排有利可图的肥缺，对反共的乡绅和长老，展开骚扰和迫害，迫使他们逃到较大的城市，以便扣上汉奸或消极抗战的罪名，侵夺他们留下的土地和财产，消灭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社会控制完成后，壮丁、粮食和金钱都流向共产党的组织和军队。国民党干部得不到人力物力，政令也出不了自己的办公室。这时，共产党组织就会游说或强迫国民党干部辞职。留下的空缺，由共产党人和开明绅士填补。国民党干部如果招来国民党军队，就由八路军和新四军解决。¹⁵⁷红军从抗战初期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结束时的数百万人，为组织的扩张提供了关键的保障。

6. 统战与革命一体两面

刘少奇向部下解释统战与革命的区别，尤其是统治的奥秘时说：“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定要肃清暗藏的反革命，但要慎重不乱杀人。统一战线始终不变，不用国民党的罪名，不因为他是国民党而枪毙任何人。如果是最坏的，进行暴动、杀人、破坏，那当然要杀。依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法律来制裁，不问他是否国民党员，也不必公布他是否国民党。任何政权的建立，统治的建立，不杀人就不能建立统治的权威。没有威，就没有恩，给他很多好处，他的感觉，反而背后笑我们无能。我们一定要有威力，‘有威则知恩’，因此对真正的汉奸反革命，今天应采取镇压政策，毫不留情的对付他。但绝不能乱杀。我们做到不放走一个奸细，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流氓、反革命的土匪头子，土豪地主真正反革命的，我们也可杀几个，不过我们要慎重顾到群众中的影响等。例如对那些鼎鼎大名的，有地位的，过去在群众中有些威望的绅土地主，因为他的地位太重要的，虽然他是顽固的反对我们的，但因为捉了他或杀了他影响很大，就不能不在事前慎重考虑和决定处理办法。”¹⁵⁸

小农的保守性格始终如一，因此地方干部仍然必须发动积极分子。毛泽东在湖南农运时期发现的流氓无产者，时隔二十年仍然是革命最宝贵的依靠力量。社会边缘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风险承受能力自然较强；长期受人歧视，报复社会的情绪自然浓厚；平时习惯以零零碎碎的犯罪活动谋生，侵夺财产的技术自然熟练。这些素质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负资产，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宝贵资源。“我们不要怕流氓，并可利用他们，因为当一个运动开始时，老实头常常不敢出头打场面，这些分子，往往成为群众运动的敲门砖。”¹⁵⁹

可以明显看出，“统战对象”和“革命对象”其实是同一批人。统战时期应该慎重对待，意思就是在（以前和以后的）革命时期应该杀掉。1945年

以后的革命比1937年以前的革命容易了许多，关键就在于统战时期剪除了旧精英的社会联系。土豪的财产和官职可能没有变化，但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曾国藩、别廷芳¹⁶⁰动员宗族、乡邻的组织资源。社会重组完成后，干部取代了乡绅在社会网络当中的位置。土豪从凝结核变成局外人，自然就会变得不堪一击。如果革命者像三十年代一样直接进攻土豪，很可能同样会陷入众多小别廷芳的汪洋大海。统战工作之所以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原因一目了然。

7. 毛泽东贰心日涨

随着自留地的扩大，毛泽东对两位领导的贰心日益明显。他在斯大林面前还有掩饰的必要，在蒋介石面前就肆无忌惮地露出了勒索者的嘴脸。德国人入侵苏联，造成西伯利亚边境空虚。斯大林让毛泽东派兵代守，许诺多给他一些装备，毛泽东虽然背后藏私，还是服从了领袖的意志，派杨成武和吕正操进驻满蒙边境¹⁶¹。他的忠诚得到了意外的回报，因为这里恰好就是蒋介石部队在1945年争夺关东的咽喉要道。

苏联驻延安的情报官（对外称塔斯社记者）孙平（本名彼得·巴甫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虽然掌握了所有物质意义上的优势，在亚细亚式权术方面却远不及毛泽东老练。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毛主席把孙平拉得紧紧的，目的是通过孙的嘴巴，把我们的看法汇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最后两年，双方越来越亲密，孙平的电台几乎成了毛主席的电台。孙平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也随时可以叫他来……毛主席正想进一步改造和培养他，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让他宣传我们的观点。

于是，从1944年6、7月开始，到‘七大’召开前，毛主席差不多每隔一周或两周就同孙平长谈一次有时甚至一周内同他谈两次。每次要花三、四个小时，几乎像上党课一样。

谈话内容包括建党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形势变化，及我党的政策、方针、路线，我党取得的成绩、遭受的挫折各个时期党、政、军的发展变化、派别斗争等等……‘七大’前夕，毛主席把‘七大’的准备工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内容都给孙讲了，同时告诉孙，让他作为客人列席‘七大’，并指定由我担任翻译。会后，毛主席还

一再问我，各次会议孙平是否都参加了？

‘七大’结束后，毛主席不满足于孙平参加听会，还专门把孙找来，向他介绍了大会的情况。实际上等于给了他一个提纲，让他照提纲向莫斯科汇报。这个提纲的中心内容有三点：一、大会是团结的，全党达到了空前的一致。二、‘七大’通过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全党的拥护。三、大会一致拥护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¹⁶²

毛泽东不仅要求蒋介石承认色拉米战术造就的既成事实，而且拒绝保证放过香肠尚未切完的部分。这些条件包括：给共产党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中共在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政府及其各项设施；恢复接济粮饷弹药；公平获得盟国援助之武器装备；通令取消各种侮辱和污蔑中共及军队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的各种破坏活动；释放所有中共被俘和被捕人员；禁止发表造谣文字；允许中共在各地办党办报；恢复中共在重庆和西安办事处的电台。他志得意满地宣称：“八路军、新四军除了要大力巩固根据地以外，还要准备夺取城市。只要我们有实力，有地盘，拿不下全国，我们也可以搞联邦的办法来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而实际上，依据河南发生的情况，事实上很可能我们的力量要强过国民党。如果反攻非用我们不可，罗斯福很可能会选择共产党，直接援助我们，那样我们就会变成铁托，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¹⁶³。蒋介石最初断然拒绝，但在美国人的威胁下，不得不勉强接受以“军队国家化”交换“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原则。

8. 美国调停失败

美国人一旦放出信号，统一战线各方就不得不假戏真做了。1945年5月10日，莫洛托夫煞有介事地向赫尔利保证：“俄国从来没有帮助过，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武器，今后也不会提供。”¹⁶⁴赫尔利觉得大局已定，兴致勃勃地赶往延安。后来，他自鸣得意地表示：“我看到一些报道，说苏联做了某些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主权的事情，但坦率地说，我没有发现使我相信这是事实的证据。我相信，美国 and 苏联在对华政策上是一致的。”¹⁶⁵毛泽东自然不会公开忤逆斯大林，在自留地里面却不见得不会玩弄老兵油子的忽悠技术。

1944年11月10日，赫尔利在延安和毛泽东达成五项协定：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此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¹⁶⁶

蒋介石清楚毛泽东意义上的“服从国民政府”是什么意思：歼灭和吞并蒋介石真实或理论上的部下，让蒋介石用默认交换共产党对他名义领袖地位的承认。只要牺牲品仅限于各路藩镇土豪，他就乐于放出红军替自己“干湿活”（指暗杀或策动政变等不能说明的事情）。共产党的大多数受害者，正是他推动中央集权的障碍。共产主义威胁造成的恐惧，又为他攫取独裁权力提供了最好的借口。过去十几年来，蒋介石的势力和共产党的势力一直是同步扩展的。他从国民党的后生晚辈，上升为国民党的派系领袖，最后得以战胜国民党其他派系，以国民党的组织力量构建中华民族，觊觎国家最高领袖的地位，每一步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配合。

当然，这样的游戏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1944年的政治生态系统已经高度简化，蒋介石的障碍物和毛泽东的猎物已经所剩无几。毛泽东如果继续扩张，就要越来越多地牺牲蒋介石的嫡系。后者不是蒋介石集权的障碍，而是集权的支柱。蒋介石自然也明白，在他从名义领袖通向实质领袖的道路上，残余的障碍物越少，共产党在残余障碍物当中的地位就越

突出。毛泽东如果骗到了美国人的武器，接下来会干出什么事情，委员长并非毫无猜疑。针对赫尔利和毛泽东在延安达成的五项协定，他决定提出毛泽东无法接受的条件，以便让美国人相信，决裂的责任完全在共产党一方。1944年11月17日，蒋介石提出三项反建议：

- 一、统编所有军队，待遇装备一视同仁。
- 二、共产党人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 三、共产党服从国民政府。

赫尔利看不出双方的建议有什么区别，照样欣然同意，但周恩来没有这样天真，断然拒绝。毛泽东辛辣地评价说，蒋介石的意思无非是“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¹⁶⁷

蒋介石暂时稳住了每况愈下的局面，但没有任何反败为胜的机会。重庆政府的漏洞比筛子还多——周恩来和李克农一点都没有浪费这几年的合法地位。广田弘毅的政府曾经认为，三十年代的国民政府纯属匪谍培养基。其实在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照下，前者简直像幼稚园一样纯洁。八路军在各地的办事处和各地的抗战民众组织，为经验丰富的特工领导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何况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无产阶级政党总是比任何竞争对手更适应地下工作。莫斯科了解国务院和战略情报局的动向，反过来却并非如此。延安和重庆之间，情况同样如此。两党领袖知己知彼的能力，尤其相去悬绝。毛泽东知道自己不是斯大林的嫡系，又片刻不能离开斯大林的支持，无论盲目服从还是公然对抗都有粉身碎骨的危险，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斯大林的底线，一有危险就立刻停止，集中精力整肃自己的部下，不给他们任何吃里扒外的机会。

蒋介石半生从事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仅仅因为破坏国际体系的能力不如日本人，仅仅是在日本入侵印度支那以后，才获得列强半心半意的支持，却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循环，一面假装他是为西方的利益抗战，甚至是西方必不可少的代理人，幻想美国人的耐性永远没有尽头，一面假装他是跟列强平起平坐的大国领袖，实际上却没有控制部下的能力。

国民党漏洞百出，瞒不过苏联的耳目。1945年2月14日，周恩来向苏联代表斯克沃尔佐夫汇报联合政府谈判经过：“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王世杰和赫尔利，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蒋介石声明说，革命给予了他权力，他将把这些权力转交给人民，而不是什么政党，而且只能通过国民大会进行，而不是通过某种党派之间的协商会

议.....我向周恩来同志询问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之间的关系，周对此的答复是，民盟拥护中国共产党，并与共产党人协商他们的工作，因为它自己单独是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的。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左翼分子赞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们还制定了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行动的纲领。在回答了我的相关问题以后，周恩来同志说，参加国民党左翼分子集团的人有：孙科、覃振、邹鲁（他认为邹鲁是最近几年变成“左倾”的）、王昆仑（纲领的作者）、钟天新、李烈钧.....周恩来同志认为，只有当宋子文本人失去权力的时候，他才会成为蒋介石的对立派。”¹⁶⁸

美国人漏洞百出，同样瞒不过苏联的耳目。蒋介石试图让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相信，美国的政策是为他服务的，除了成功地欺骗自己以外，很少能骗住任何其他入。蒋介石在罗斯福政府内部的朋友寥寥无几，只有赫尔利和魏德迈数人；在自己的国民党内部，也只能得到非常可疑的效忠。国务院的左派分子盼望延安胜利的心情，跟国民党分裂分子渴望蒋介石失败的心情不相上下。1946年11月，赫尔利致信杜鲁门总统：“我们的职业外交人员仍在向共产党人进言说，我阻止国民政府垮台的努力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就是这些人公开告诫武装的共产党人拒不将中共军队统一编入国军。”¹⁶⁹其实，这些都是国民党元老重臣天天都在做的事情。

#第四章 完#

1 1935年5月初，天津日租界著名亲日人士《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和《振报》社长白逾桓相继被刺杀。事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随即会见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2 高桥坦（1893-1986）香川县小豆郡人，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从1934年12月开始出任“北平在勤武官辅佐官”，即驻北平副武官。期间他与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一起策划了《何梅协定》的签署。1944年10月成为“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晋升为中将。战后在悠闲的生活中写了回忆录，于1986年1月8日死亡。

国民党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日本人在明面上报复，却无法阻止国民

党撕毁承诺，一面撤出地上政府党部军队，一面派回地下特务组织，用恐怖活动维持华北的实质统治。

[3](#)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为坚持抗战不断加大汲取力度，四川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消耗巨大，四川原有的士绅阶层也损失惨重。

[4](#) 张云伏：《中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4页

[5](#)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五卷，莫斯科，1968，第683页

[6](#) 王宇高、王宇正编：《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斋初稿》，台北：国史馆，1933年4月27日条

[7](#)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八卷，莫斯科，1973，第44-45页

[8](#) 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第54-55页

[9](#) 外务省记录A.1.1.0.10：《帝国ノ对支外交政策关系一件》(松本记录，第一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10](#) 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第320—321页

[11](#) 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

[12](#) 臧运祜：《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3](#) 同前注

[14](#) 同前注

[15](#) 《俞大维自南京致蒋中正九月巧电·摘要》（9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卷457，《呈表汇集》30，资料号38201

[16](#)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八卷，莫斯科，1973，第662页

[17](#) 《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报》（1935年10月19日），收于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第220页

[18](#) 陈立夫：《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近代中国》，1977年第2期，第20页

[19](#)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八卷，莫斯科，1973，第663页

[20](#) 程天放：《中俄关系史》，华盛顿，1957，第211页

[21](#) “英国老绘之刻薄，世无其匹，难怪倭德俄意皆与之为敌也。”，《蒋中正日记》，1939年7月18日

[22](#) 熊沛彪：《日本外交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第75页

[23](#)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1939, Volume 45 [B].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p.40

[24](#) 同前注，41-42页

[25](#) 同前注，71-75页

[26](#) 同前注，53页

[27](#)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77，第60页

[28](#) 「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第十七次会议纪录」（1937年9月27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第十九次会议纪录」（1937年10月4日），〈国防最高会议第11-20次常会纪录〉，《会议记录》，党史馆藏，档号：会00.9/3，转引自林美莉：《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走向对日决战的时局判断》，《国史馆馆刊》，2015年12月（第46期），第33页

[29](#) 同前注，第31-32页

[30](#) 同前注，第36页

[31](#)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4册，1938年1月11日，第214页

[32](#) 《蒋介石日记》，1938年1月9-12日

[33](#) 刘豫是金国放进宋国的特洛伊木马，苏布希（土耳其共产党领袖）是共产国际放进土耳其的特洛伊木马。莫斯科为了争取土耳其反对协约国，听任凯末尔镇压土耳其共产党。苏联要争取国民党反对日本，瑞金就是类似土耳其共产党的障碍。国民党如果像凯末尔一样坚持以牺牲国内共产党为交易条件，苏联是很难拒绝的，但国民党急于报复日本和收回满洲，对苏联就强硬不起来，因为不敢承担单独反对日本的风险，也就是说南京需要莫斯科的程度，超过了莫斯科需要南京的程度。凯末尔之所以能够强硬，因为他以放弃摩苏尔为代价，赢得了英国人的支持，他不需要反对帝国主义，也就不在乎苏联支持不支持，结果是苏联需要土耳其的程度，超过土耳其需要苏联的程度。

[34](#) 《戴笠自杭州致蒋中正九月敬午电》（9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迭肇事端》第三册，资料号24020731

[35](#) 蒋介石如果听任穆斯林军阀继续统治内亚，补给断绝的红军本来会陷入类似西路军的绝境，斯大林不大可能因此改变扶蒋抗日的布局。但蒋介石无意乘机消灭红军。红军不仅帮助蒋介石吞并了川、黔的统治者，也为他削弱了湘、桂、粤、滇和穆斯林地区的统治者。蒋介石空降安插的班底为了获得资源和压制勉强退让的穆斯林军阀，不能不实行亲苏政策，打开了张闻天和毛泽东梦寐以求的中亚—陕北国际交通线。

[36](#) 王宇高、王宇正编：《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斋初稿》，1937年3月26条；《蒋中正自杭州致何应钦等三月艳电》（3月29日），《国民政府档案》，档号200A/0161.42/4450.11-15

[37](#) 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137-192

[38](#) 中央社会部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但1938年已开始运行。康生为部长。参见：《中央书记处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收于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编：《组织工作文件选编（1935-1945.8）》中共中央组织部，北京，1980，第274-275页

[39](#)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已设立调查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7月30日改称“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下设情报部，将中央与军委一切情报机构统一于此部，康生为部长，叶剑英、李克农为副部长。各地党委与军队一切情报工作，统受中央情报部的领导。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合署办公，实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参见：《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委员会的通知》，收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六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第421页；王建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第413、423页

[40](#) 《蒋中正日记》，1939年6月20日、6月24日、7月18日、7月20-22日；《蒋介石致胡适电》（1939年7月3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对美外交：财经援助（一）》，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300-00030-017，第1页

[41](#) 吴景平：《蒋介石与战时国民政府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收于黄自进、潘光哲主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形塑（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102年，第252-253页

[42](#) 陈绍禹：《陈绍禹抗战言论集》，汉口民族解放社，1938年2月

[43](#) 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205页

[44](#) “这一决策，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第一、妥协阶段，在此阶段中，应藉自我牺牲，表面上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并奉行三民主义，但事实上这只是掩护本党的生存发展；第二、竞争阶段，以二、三年工夫，建立本党的政治与武力基础，并继续发展至能与国民政府抗衡而破坏之为止，同时极力消灭国民党在黄河以北的势力；第三、进攻阶段，在此阶段中，深入华中地区，建立根据地，割断中央军在各地区的交通，使

他们孤立而失去联系，直至我们反攻力量已准备成熟，然后从国民党手中夺取领导地位。”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23-224页

45“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通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通过’则行不通。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大概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导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是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坏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6-528页

46“苏联至少可以保护其侧翼，同时它（根据地）也给苏联提供了保护。”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六）》，东方出版中心，第243页

“1936年9月20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已经开会讨论了对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为此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的报告，请求提供二百万卢布的贷款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后，10月18日，共产国际就已经致电中共中央表明要从财政上来援助中共了。其电报称：‘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的物品。’11月3日，苏联注意到南京政府的军队与日伪军将

要在绥远爆发战争，莫斯科在要求红军改向新疆接运军事物资，并主动将援助物资的吨位提高到1160吨的同时，也制定了专项拨款援助的计划。1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王明和陈云电告中共中央称：‘经济上不能按月帮助，决定为你们帮助的总数五十五万美元，第一批送去二十五万。你们大约在十一月底可以在你们指定的上海转款人手中收到。’”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245页

“他们甚至许诺，一旦红军能够接通新疆，苏联方面可以将援助物资再增加一倍以上，总重量可以达到2000吨左右，其中还包括了红军所急需的火炮，以及在西北地区作战中极为有用的轻型装甲车等。另外还可以送给红军50名左右在莫斯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炮兵、装甲车等项技术的中国同志。不仅如此，共产国际这时还根据中共中央的请求，陆续开始通过上海和天津的秘密接收地点，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据共产国际电报称，苏联方面2月间已经确定的援助数额即可达到将近200万美元之多。”同前，第436页

[47](#) “张克侠是冯玉祥的连襟（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之妹是张克侠的夫人）……张克侠早在1929年就被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发展为特别党员，要他在西北军中开展工作，不可暴露身份，不得与地方党组织联系，由中共中央直接派人与他接头。1936年张克侠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中央派肖明与他联系……制定了一个集中兵力于平、津、保地区，计划在日军增援以前，以二十九军的十万之众，一举消灭在华北的两万日军，亦即‘以攻为守’的方针……张克侠接受指示后，即开始积极筹划。”张涤：《七七事变前后的肖明与张克侠》，《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

[48](#) “苏联之外交政策，完全避战政策也。国人切不可有丝毫之误会……苏联当局一面极望吾人抗日，其代表与国人私自谈话亦竭力鼓动吾人抗日，然彼辈政府曾未与我国政府说一句负责的实着边际之话，且苏联本身对日尚力求避战。……更可恶者，彼在我国制造抗日潮流，使我人民与我政府为难，几至挟我人民以迫我政府。我人民知识幼稚，感情用事……彼所愿者为中国多负责任，盖中日多事，则日苏之间可少事矣。”参见：《蒋廷黻关于苏联概况、外交政策及中苏关系问题致外交部报告》（1937年4月），《民国档案》第一期，1989年2月，第25-31、50页。

4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一集），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第435页

50 斯大林对杨杰保证：“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良好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与日开战。”李嘉谷：《中苏关系研究二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51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1937年8月12日

52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597-598页

53 正统派指宪法保守派，鲍德温、邱吉尔和兰登，左派是麦克唐纳和罗斯福。

54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签署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依照这个法案，总统有权向“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任何国防物资”，并决定受援国的偿付方式。国民政府多方争取，美国在1941年5月6日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但在租借物资分配方面，美国分配的数额少于中国的申请额，而中国实际获得的物资数量，又少于分配定额。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先欧后亚”政策——英国获得美国全部租借物资的63.71%，约309亿；苏联获得22.76%，约110亿；法国获得5.85%，约28亿。中国在抗战结束前，获得的8.457亿美元物资，只占全部租借物资的1.8%。参看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李琳：《租借法案在华实施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55 《真理报》1935年12月6日，12月13日。参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科学出版社，1986，第526-531页

56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收于《斯诺文集》第一卷，第210-213页

[57](#)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220页

[58](#) 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88页

[59](#) 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第175页

[60](#) 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春光新闻社，1947，第154-155页

[61](#) NARA, RG59, 893.00/14631, Johnson to Hull, January 3, 1941

[62](#) 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第139-146页

[63](#) Yu, OSS in China, p.159-160. 参见：方德万，“重看史迪威”，《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战争（1925-1945）》第一章，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64](#) 《南方局党史资料（一）》，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242页

[65](#)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276-279页

[66](#)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第163页

[67](#) ‘Diary of Fu Bingchang’, entry of 1945-4-7. 戴维斯似乎不知道潘汉年（长江局情报部长）在上海的任务，后者的悲惨下场主要是为了洗刷直接上司李克农、甚至李克农背后的更重要领导人：“他（岩井）当然会想到潘汉年这位中共情报官员会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馆’猎取日、汪方面的情报。但他更重视潘汉年所能为他提供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重庆政府和苏、美等大国关系的情报……都甲（李士群的军事顾问，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要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线。’”《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第112-170页

[68](#) Weinstein, et al., The Haunted Wood and Haynes, et al., Venona.

Lowenthal, Venona and Alger Hiss,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XV: 3(2000).

方德万：《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战争（1925-1945）》，三联书店，2007，第8-9页

[69](#)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76-578页

[70](#) 同前注，582-583页

[71](#)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33页

[72](#) 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和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第149页

[73](#)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285页

[74](#) BBC制作的政治情景剧。讲述了在野党人士吉姆哈克当上内阁大臣之后，与事务官汉弗莱爵士以及私人秘书伯纳德三人之间斗智斗勇的故事。吉姆哈克是内阁大臣，本应是三人中权力最高的一位，另外两人应服从他的命令。然而，他的部秘书汉弗莱是事务官，与其属于文官体系中的两个分支，在种种事情上不配合吉姆哈克。公派的私人秘书伯纳德夹在两人之间忙于应付。

[75](#) “从中国本土来说，一个更合乎需要的系统也许是以汉口为中心的辐射网。而实际的系统是一个平行的铁路网，过于集中于华北和华东。在满洲，曾发展过一种辐射与平行相结合的铁路网，但由于20年代中日在东北的竞争，这种铁路网受到不经济的复线的损害。”《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二章《经济趋势，1912-1949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10页

[76](#) 郭冬梅、杨盼，“橘朴的‘满洲国’与‘农民自治’论”，《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

[77](#) 巴西殖民地最初的首府是港口圣保罗，独立后的首都都是港口里约热内卢，内地大多是经济落后地区或未开发地区。巴西政府在二战后为了开发内地，迁都巴西利亚。巴西利亚在荒地上建立，不需要拆迁改造旧城区，变成了设计规划人员的天堂。满洲国出于类似的原因，放弃了历史悠久的大连和奉天，选择在内地建设新城。

[78](#) 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JACAR） National Archives Japan）
Ref.A03021877600、御署名原本・昭和七年・條約第九號・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ノ日滿議定書(國立公文書館)

[79](#) 芭芭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新星出版社，2007，第156页

[80](#) 钟放，“满铁技师的欧美考察与亚细亚号列车”，《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02期

[81](#) 腾利贵：《伪满经济统治》，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第63页

[82](#) 关口寿一：《满洲十年经济史》，第30-31页

[83](#) 腾利贵：《伪满经济统治》，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第69页

[84](#) 张士宇：《伪满“粮谷出荷”政策与实施》，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85](#) 二战爆发前，波兰一度和日本走得很近，也承认了满洲国。梵蒂冈在1934年委派吉林代牧区宗座代牧高德惠负责“与满洲国政府交涉”，不过这是否属于承认一直存在争议。

[86](#) 蒋介石的要求没有满洲国的要求多，而且日本能够拒绝敌人的要求，难以拒绝自己人的要求。满洲国的交涉代表是日本的激进派，在满洲国建立以前，长期遭到日本国内老派人士的压制，现在利用满洲国做自己的阵地，地位比以前有利多了。后来苏联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它能够在中东路事件当中拒绝蒋介石和张学良，却难以在朝鲜战争以后拒绝毛泽东。

[87](#) 毛泽东的一五和二五计划，都是苏联出钱出技术的。如果蒋介石在位，苏联当然不用承担这样的牺牲。

[88](#)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第9页

[89](#) 裴京汉：《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182页

[90](#) 汪南京政府1940所办杂志，宣扬国家集团主义，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与日本合作，化敌为友，让日本这个先进者提携后进者，谋求东亚民族的共存共荣。孙文1924年神户演讲也以此为题。

[91](#) 同前注，第185-186页

[92](#)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第29页

[93](#) 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1940年7月27日

[94](#) “三十志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受军训的以翁山为首的三十名缅甸青年。也是联合日本进入缅甸的“缅甸独立军（BIA）”的重要组成部分。旧版对于缅甸和日本合作的原因，并没有作太多的叙述，课文中也没有出现被新版描述为英雄的三十志士，只有提到一群和日本合作的爱国青年。新版则是详细叙述当时追求独立的德钦翁山和其他德钦领袖们和日本合作的原因，认为日本是亚洲的领导者，相信日本可以为缅甸带来独立。”高嘉玲：《缅甸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史观》，第11页

[95](#) “日本人保留了各土邦苏丹的行政机构，并用日本顾问取代了英国驻扎官。马来语被作为东南亚的公共用语。日本人也继承了英国人“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利用马来警察部队对付主要由华人组成的抗日游击队。另外，日本还支持有反英倾向的马来民族主义运动。占领期间，一批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领导人希望借助于日本人的力量达到马来亚独立的目的，而日本人出于经济与军事上的考虑，也支持他们的计划。在日本支持下，马来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准军事性的青年组织“祖国的保卫者”(Defenders of the Fatherland)。1945年，在伊布拉希姆·雅各比与布哈努丁博士领导下，“半岛印度尼西亚人联盟”(Union of Peninsular Indonesians)成立，其目标是取得马来亚的独立并与印度尼西亚实现联邦。”陈晓律、王成：《马来人特权与马来西亚社会》，《历史教学》第八期，2014年

[96](#) 李盈慧：《战争与族群互动：太平洋战争中的华侨、台湾人和东南亚原住民》，《国史研究通讯》2016-10，第64-71页

[97](#) 本段：The Encyclopedia of Indonesia in the Pacific War, Leiden/Boston, Brill, 2010, pp.301-309

[98](#) 周益群：《日本在印尼的统治政策及其影响》，《东南亚研究》1987年第3期

[99](#) M. C. Ricklefs :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since c.1200, Palgrave, 2001, p.266-267

[100](#) 大东亚共同宣言

[日期] 1943年11月6日

[出处] 《日本外交政策年表主要文件下卷》，外务省，593—594页。

昭和十八年十一月六日大东亚会议事務局发表

昭和十八年十一月五日及六日于东京出席大东亚会议的各国代表如左

日本 首相 东条英机阁下

中华民国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汪兆铭阁下

泰国 首相披汶（Luang Pibulsonggram）元帅阁下之代表 卫塔雅康亲王殿下

满洲国 国务总理大臣 张景惠阁下

菲律宾共和国 总统 何塞·帕西亚诺·劳雷尔（José Paciano Laurel）阁下
缅甸国 首相 巴莫阁下

世界各国应相倚相扶，共享万邦共荣之乐，以确立世界和平为根本要义。

然英美为求自国之繁荣而压抑他国、他民族，对大东亚不断进行侵略压榨，逞其称霸大东亚之野心，更颠覆大东亚安定之基础，此为大东亚战争之原因。

大东亚各国应互相提携，完成大东亚战争，从美英桎梏之下解放大东亚，以求自存自卫。根据左边之纲领，期待寄望确立世界和平。

一 大东亚各国相互协同，确保大东亚安定，本着道义，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

二 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彼此之自主独立，呈现睦邻之成果，确立大东亚之和睦。

三 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之传统，伸扬各民族之创造性，发扬大东亚文化。

四 大东亚各国尊重对方的传统，发展各民族的创造力，互相提升东亚国家各文化。

五 大东亚各国在互惠之下紧密提携，促进经济发展，增进大东亚繁荣。

六 大东亚各国和世界万邦诚意往来，撤废人种差别，普及文化交流，开放自由，期对世界进步有贡献。

（译文：李文卿，《共荣的想象：帝国日本与大东亚文学圈（1937-1945）》，稻乡出版社，2010年6月，第3页）

[101](#) 日本和泰国同盟条约

[地点] 曼谷

[日期] 1941年12月21日

[出处] 《国际条约集1934-1944》

[全文]

日本帝国政府和泰国王国政府，深信东亚新秩序的建立是在这一范围内实现繁荣的唯一方法和恢复及加强世界和平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基于

彻底铲除阻碍这一切目的之一祸根的坚定和不可动摇的意志，议定各条如下：

第一条

日本和泰国在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两国的同盟。

第二条

遇有日本或泰国同一个或几个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泰国或日本应立即站在另一方的一边作为其盟国并用它所有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方法向其提供援助。

第三条

关于实施第二条的细则应由日本和泰国主管当局共同协议予以确定。

第四条

日本和泰国在共同进行作战的情况下相互保证除非获得完全共同的协议，决不缔结停战或媾和。

第五条

本条约应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十年。在此项期满前适当时间，双方应就本条约的延期相互协商。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为此目的正式授权，在本条约上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昭和16年12月21日，即佛历2484年12月21日订于曼谷，共两份（注）。

日本特命全权大使 坪上贞二

泰国总理兼外务大臣 庇布拉松格拉姆

[10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32-37页

[103](#) 国民党以抗战为材料，把蒋介石塑造成民族英雄，通过伟大领袖蒋介石的叙事，发明中华民族。共产党原本是中华民族构建的积极破坏者，但为了窃取国民党的遗产，套用了国民党发明的叙事体系，只是用

毛泽东的名字换成了蒋介石的名字。

104 汪兆铭：《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抗战以来，军队和人民都已充份的表现了民族意识，这是不可磨灭的；然而同时我们又必须知道，这种民族意识，如今已被共产党完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识，在民族意识的掩护之下，来做摧残民众断送国家的工作，在共产党是以为当然的，他们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要把中国来牺牲，牺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牺牲的时间越长越好，牺牲的人数越多越好。中国固然牺牲个精光，日本也必受创，这在第三国际看来，真个是一举两得。何况天从人愿，抓着了蒋来做幌子，以尽情发泄十六年以来“剿共”的仇恨，等到尽情发泄之后，他们自然会回到第三国际老家去，用不着一些留恋。因为这样，所以三番几次得着了恢复和平的机会，偏要说抗战到底。这就是说：中国永远得不着和平的，非替第三国际牺牲到底不可。”

105 据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回忆道：“我的外祖父杨自容，二十年代曾去长沙明宪女中教书，他很喜欢一个女学生，名叫杨宇久。杨并认我外祖母为干妈，我母亲杨淑慧就成了她的干姐姐了。后来杨在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到了南京做护士。那时，周佛海已叛变中共，当了国民党的高官。杨宇久经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称她杨阿姨。那时，我们都知道杨宇久是刘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刘少奇的影响，思想很进步，抗战以后，周做了汉奸，任命杨宇久的亲弟弟杨叔丹为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兼管周家警卫。周之任命共产党员杨宇久的弟弟为自己的警卫队队长，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为，我们那时都知道杨宇久在苏北新四军工作。（略）

周佛海、杨淑慧首先问杨宇久，为什么到南京来？。（略）原来杨宇久是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命令，到南京来的。她想通过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见面，了解周当了汉奸后有何打算，并探询今后能否保持联系。（略）。

问题既然已经摊了出来，周就对杨宇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从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内也当了十几年官，但一直不得意。关于抗日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因此，这次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也跟了出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觉得日

本人远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什么‘共存共荣’等等，特别是日本军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既不统一，朝今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挤，人事调动频繁，事情很不好办。前途究竟怎样？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于和共产党，我当然希望保持一个联系，何况有你在其中说话。你这次来，我保证绝对安全，你随时都可以回苏北。”周佛海的这一番话，使杨宇久也满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一九四五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共产党派杨宇久来找我，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她和我家关系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会被人注意。”。（略）

周佛海与共产党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一九四三年春，冯龙来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略）冯接着问：“你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菜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和平、反共、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反共’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共产党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事呢？”冯说：“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到苏北；第三，我们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军具体办理，惟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我们也向我们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苏北，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略）

大约在一九四二年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共产党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做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会见了周佛海。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号”晤谈。他们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一九四二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临行前，周还在“七十六号”为潘饯行，李士群当时也在场。”程舒伟、郑瑞峰：《汪精卫与陈璧君》，团结出版社，2004，第296-302页

另外中共前领导人王明对此也有描述：“至于对内政策，毛泽东事先不让党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过中共中央军委电台，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以他的名义派出代表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谈判共同反蒋的问题，同时命令停止抗击日军和汪精卫的军事行动。可是当时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汪精卫都不会相信毛泽东能成为‘汪精卫第二’。他们怀疑共产党搞什么阴谋来反对他们，以企图把他们诱人陷阱。所以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略）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藉口反对‘高（岗）饶（漱石）联盟’而逮捕了饶漱石并把他折磨至死，同时利用这次运动把潘汉年（前新四军侦察科长）以及胡均鹤抓起来，胡还被处决了。因潘汉年是饶漱石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派去和日军与汪精卫谈判的代表，而胡均鹤则是前日占区和汪精卫的谈判代表（胡均鹤当时背叛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在上述谈判过程中潘汉年成功他说服了他重新为我党工作）。毛泽东的这些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清除他执行民族叛卖路线的见证人。（略）

因此美英帝国主义者就会懂得：既然毛泽东甚至在日本侵入中国、全民起来抗日救国的情况下都能与日本结成联盟，甘当民族叛徒，那末，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他毫无疑问也会和他们结成联盟。”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第190-193页

[106](#) 南京国民政府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第25-30页

[107](#) 张同乐：《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三联书店，2012，第429页

[108](#) 同前注

[109](#) 同前注，第33页

[110](#) 汪兆铭：《民族的国民》、《怎样树立民主势力》、《国民革命之意义》

[111](#) 张根福：《试论汪伪战时经济体制的形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古厓忠夫：《对华新政策与汪精卫政权——从军配组合到商统总会》

潘健：《汪伪政府财政特点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

浅田乔二：《华中农产品掠夺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载《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112](#) “到抗战中期，后方公营工厂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公营厂家的资本额约占后方工业资本总数的69%强。其中，四川占36.68%，云南占10.30%，广西占6.38%，贵州占2.03%，湖南占1.47%，陕西占2.25%，甘肃占2.77%。而且，这些公营企业规模大，资金雄厚。据统计，公营企业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占60%，民营厂家只占30%，公营厂家平均资本为200万元，而民营厂家还不及20万元。到抗战中期，后方公营工厂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公营厂家的资本额约占后方工业资本总数的69%强。其中，四川占36.68%，云南占10.30%，广西占6.38%，贵州占2.03%，湖南占1.47%，陕西占2.25%，甘肃占2.77%。而且，这些公营企业规模大，资金雄厚。据统计，公营企业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占60%，民营厂家只占30%，公营厂家平均资本为200万元，而民营厂家还不及20万元。”张燕萍：《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特种矿产统制述评》，《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113](#) 《昭和十四年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并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关系会社概况》

《满铁北京事务所之统计》

《中央银行月报》，新2卷第12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2期

《北支主要工场及事业场生产实绩一览表》第25-44页

王方中：《中国经济通史》，第9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2年版，第954-955页

浅田乔二：《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满铁的侵入华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日人之华北十年水力火力发电计划》，载《战前及沦陷期间华北经济调查》

[114](#) 孙宅巍：《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工业述评》，《民国档案》，1992年01期

陈晓敏：《抗战胜利后敌伪产业处理概况》，《民国档案》，1993年03期

赵志强：《抗战胜利后河北省敌伪产业接收述论》，河北师范大学，2002年

张玉英：《抗战后国民政府对河北平津区敌伪工矿业接收述评》，河北师范大学，2005年

[115](#) 汪兆铭：《永久友好关系之结成》

[116](#) 石源华：《论日本对华新政策下的日汪关系》，收于《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建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2页

[117](#) 《周佛海日记》，1943年8月1日

[118](#) 参见陈公博审判时对于起诉书的答复。

[119](#) 意大利的色拉米香肠通常比较粗，有5厘米左右，食用时每顿切下几片，直到把整根香肠吃完。因此，逐渐分化敌方、一点一点蚕食对方领地的战术也被称为色拉米香肠战术。

[120](#) 苏联与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在战争中相互保证中立的条约。1941年3-4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欧，前后途经莫斯科，同斯大林、莫洛托夫进行会谈，4月12日达成协议，次日正式签订此约。条约共4条，有效期5年，主要内容是：双方保证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保持中立。并同意暂不签订有关北库页岛权利转让的附属议定书。签约同日，双方还发表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121](#) “（八路军迪化干部学校）为了培养军事技术干部，学校设立了以下各班：炮兵班、航空兵班、坦克兵班及驾驶员和无线电报务员培训班……需要解决一些必要的军事装备和教员（给他们提供几架各种型号的飞机、几辆坦克、五六部汽车、一名火炮方面的教员、一名坦克方面的教员）的派遣问题。如果从政治上考虑，不便给他们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教员，那就需要把其中的一部分优秀学生送到苏联莫斯科和阿拉木图地区，在那里成立一座能够接收二百名学生继续学习和专门军事学校或军事培训班。”《联共（布）、共产国际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卷，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第287-288页

[122](#)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102页

[123](#) 奥托·布劳恩说：“我们在瓦窑堡呆的时间不长。五月底，驻扎在榆林的国民党第八十六师乘一方面军远在西部和苏区相对无防御之机，进行了突然袭击，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出现在瓦窑堡城前，所有的中央机关都在这里，但几乎没有军队防守。在毛的指示下，城市不战而弃，人员仓卒撤退，例如我就是在撤退前一个小时才得到出发的命令的。所有的机关都转移到保安，我们是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才到达那里的。这件事实在太丢人了，以致瓦窑堡再也不作为临时红都而为人所提起了。”刘东社：《赤都瓦窑堡失陷史事钩沉—西安事变纵横考之六》，《陕西教育学院学报》，第二十卷第二期，2004年5月

[124](#)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25](#) 毛在延安整风会议上所做《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黑话。

[126](#)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派来军事情报组驻延安。情报组设在延安枣园，有一个功率大、效率高的电台……电台后随中共中央迁到北京，一直工作到1949年7、8月间。毛主席除使用‘农委’的电台外，有时也使用苏联情报组的电台。在他认为凡是需要送斯大林的信件，都通过这个电台发出去。斯大林的回电也是由这一电台转交毛主席。斯大林回电都用化名。他用过两个化名：菲利波夫和亚历山大洛夫。

1940年初，我回到延安时，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就已设在枣园。这原是陕北军阀高双成的家园。被没收后，我保卫机关驻此。苏军情报组也驻在枣园的后面。康生把整个这块地方都弄得很神秘，不许任何人进入或接近，就是无意到此地的游人都可能被怀疑为敌特、汉奸。这种做法也使得枣园内部的人极少有同外界接触或来往的机会……1940年冬天，苏方为了加强在东方的情报工作，派以基斯林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到延安来……向毛主席介绍他们的打算：在华北、东北活动，特别是在解放区边沿地带及各大城市建立情报网。

毛主席说，要搞好这项工作，最好是我们两家合作，分享成果……基斯林科和其他苏方人员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莫知所云，不敢继续谈下去了。不久，他们就正式表示不同意这样做……由于当年苏方不同意同我们合作，1939年至1943年苏军情报组在延安曾独自开办了训练班，轮训年轻的情报人员……虽然苏联不同意在情报工作中与我们合作，但是我们搜集到的情报材料，仍然提供给苏军情报组，由他们报告莫斯科。”

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208-211页

[127](#) 亚历山大·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联经，2015，359-363页

[128](#) 治病救人是整风运动的黑话，意思是只要你配合认罪表演，我们保证不会像斯大林一样枪毙你。

[129](#) 杜超：《调查江青的人——许建国的悲剧》。《文史精华》，2007年第8期

[130](#)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特刊》（1939），《解放》第68期

[131](#) 谢觉哉：《边区政权工作经验的点滴》，载《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附录，第121-128页

[132](#) 张闻天的文件，说赣南的民众不堪重负，纷纷叛乱或逃入山林。黄道炫：《张力与界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54页

[133](#) 《陕甘宁边区实况》称：“双十二事变解决时，中共盘据地区仅延安、安塞、保安、安定等县之一隅，旋乘机扩展，自称边区为十三县，二十八年秋，以武力攻略陇东，二十九年春又占绥德区各属，然后复提出保卫边区二十三县之完整口号，是以，边区已由三数县之一隅，扩张为十三县，复由十三县扩张为二十三县。二十三县总面积合计为六十四万八千九百八十方里。”李六如、和培元，《陕甘宁边区实况》，第89-90页

[134](#)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发生酈县事件：酈县原驻有八路军特务团，分踞城厢各地，一九三九年八月，该县之永平、榆林桥两区联保主任为共军逐走，并藉口“民众要求”，侵占为边区疆界。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共军藉口共党区委委员刘忠被打伤，向大义、阜财、加兴各区进攻，拘捕保安分队长王子玉，保安队长韩振江，入晚包围县府，掳走县长蒋隆琰，保安团队全被缴械，县府公私财物亦被抢劫一空，酈县全县遂落入共军之手，被俘之蒋县长迟至四月，始于缴纳“罚款”七千元后获释。同前注，第251-259页

[135](#) “一九四〇年二月爆发绥德事件：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共由河西调一二〇师王震部四个团回驻绥德，旋以“破坏统一战线”、“制造摩擦”为借口，要求天水行营及陕西省政府澈办专员何绍南，并提请行政院委王震接充该区专员。二区专员何绍南因共党之攻击辞去专员职务，省府乃决定以包介山接替，何当于二月二十一日返绥办理交代，共党遂发动武装游行示威，声言“捉拿犯官”何绍南，专署方面，当即戒备，双方进入备战状态。同时林伯渠、萧劲光又电天水行营及陕西省府，反对包介山接任二区专员，坚决要求以王震充接。二月二十六日即捕去绥德义合镇

联保主任武启友，保长平侯、马德麟，并枪杀保安第七团团部副官刘成祥。二十七日又将吴堡宋家川、绥德义合镇、安定枣林坪三处保安队包围缴械。二十九日专员包介山率保安第三第十两中队撤离绥德，沿途遭王震部六次袭击，保安队被击溃；前任专员何绍南亦率队撤离，同遭截击，三月一日始退至榆林镇川堡。绥德遂被共军占领，划入边区范围，并自行委任王震为该区行政专员。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侵占吴堡：共军于二月二十七日将吴堡宋家川保安队包围缴械后即将吴堡县党政人员全部逐出，占领吴堡并划入边区范围。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攻占安定：二月二十八日共军向安定进击，该县保安队奋起抵抗，终以众寡悬殊，忍痛退出。惟县属老君洞地方民众及哥老会，以平日愤恨共党压迫，自动集合武装二千余人，抗击共军，激战两昼夜，亦以弹尽援绝，退出县境，该县遂为共党全部占有。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占领清涧：八路军营长钟善声，以哨兵被击伤为藉口，于二月二十八日夜二时半，率部包围县政府，掳去县长李鹏飞，缴去长短枪二百二十枝，保安第七团第八中队自清涧奉命返绥，途中亦遭袭击，损失惨重。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攻占延川：共军旋又于三月五日上午十二时包围延川县政府，保安队两班被缴械，县长被扣，县府财物印信被抢一空。”华统，《陕甘宁边区全貌》，统一出版社，1940，146-147页

[136](#) 毛泽东，《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5月4日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

[137](#) 红色文宣自我标榜“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138](#)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511页

[139](#) 毛泽东：《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1941年2月1日）

[140](#)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第491-492页

[141](#) 《毛泽东等关于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给彭德怀等的电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10页

[142](#) 国民党口号当中的封建势力，包括一切抗拒中央集权的地方势力：

北洋军阀余部、各地军阀、民团、商团、帮会、共产党。共产党消灭其他（国民党心目中的）“封建势力”，在国民党看来是封建势力自相残杀，减轻了以后统一军令政令的难度。

[143](#) 程潜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和河南省主席。卫立煌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官和后来的第一战区司令官。第一战区大致包括河北山西，第二战区大致包括河南安徽。八路军的扩张，主要是在他们的保护下展开的。他们的司令部里，都有共产党特工人员潜伏，但他们的亲共立场，并不仅仅因为匪谍的影响。他们有理由认为，蒋介石同样希望利用共产党消灭地方势力，因为蒋介石对长征红军追而不打，借此机会将川滇黔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华北的国民党将领学习委员长，结果导致八路军坐大。

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在长江流域，基本上没有北洋余党和其他非嫡系势力。新四军扩张势力，就要牺牲国民党嫡系部队。华北的非嫡系部队被共产党打了，蒋介石就乘机取消他们的番号和建制。长江流域的部队是蒋介石的自己人，就不会遭到这样的待遇。华北的非嫡系部队明白蒋介石想借共产党的手消灭他们，当然不会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因此大批投奔亲日派政权和亲苏派政权，例如孙良诚和吴化文（都是先投日再投共）。他们对国民党反戈一击，是含有报复意味的。

[144](#) 彭德怀：《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节选)》(1940年9月25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9、420页

[145](#) 张志强、杨同锁整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敌伪军工作》，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9期)，1985年5月5日，第10、18页

[146](#) 《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523页

[147](#) 丙奇：《由晋冀两省的现实论游击战》，《经世战时特刊》，第41-46合刊，重庆，大东书局，经世半月刊社，1939，第36页

[148](#) 《××敌伪军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前线》半月刊（第21、22合期，1941年9月1日），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出版，第38页

[149](#) 吕品：《十分区的外围军》，《冀中武装斗争》(上)，第405-406页

[150](#) 中华民国文献编撰委员会、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印：
《共匪祸国史料汇编（三）》，第282-293页

[151](#) 张荫梧的上访材料说：“毛泽东先生指荫梧为‘摩擦专家’，其主要原因自然由于河北民军坚持抗战，未能俯首贴耳以受其屠杀，未能听共产党之意旨，听命帮助其宰割河北人民，窃夺华北政权，实现其一切阴谋。所以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冀代表朱瑞，在陵川时，对河北民军工作数月，因鉴于‘分化’、‘争取’之困难，乃致函于张存实等，批评荫梧‘向右看齐’！于是拉拢不成，便施之以分化瓦解。打了别人，回过头来还反诬别人为‘摩擦专家’。此种颠倒是非、阴险毒辣的狡计，断难以一手掩盖天下耳目。荫梧对于自命为中共负责人毛泽东之污蔑，卒不愿多费唇舌，但为抗战前途计，为个人名誉计，不得不略加辩正。

最后，本人尚有几个问题应请全国同胞公判的：

割裂中央在华北之行政系统，设立‘晋察冀边区政府’，违抗中央命令，不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等，是否不是破坏统一之封建割据，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擅自引发边区银行钞票，发行救国公债数百万，是否不算‘无法无天’？拒绝河北省政府行使职权，擅自颁布法律命令，委派专员县长，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强迫征收河北地方抗日武装，掠夺民间财富，绑票勒捐，复加托派汉奸帽子，择肥噬人，捐罚之外，暗杀活埋，使河北生灵涂炭，冤气冲天，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以威胁诱骗手段，解决了段海洲部、赵棣华部、孟阁臣部、窦同义部、劭北武部、史省三部、并将抗敌最有成绩军纪最好的赵棣华、史省三、及史之旅长愚忱、政治主任安克贞割鼻砍头。难道这几位抗日英雄也是‘摩擦专家’？也曾打过八路军？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在冀中一区，惨杀及活埋国民党员二百余人，其余各处，尚无法统计。此种残暴非法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勾引敌人，消灭抗日友军，友军消灭之余，则收拾其人员械弹，以为己有。此种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扶植地方氓痞，鼓动阶级斗争，搜刮食粮，囤积深山，利用减租减息口号煽惑暴动，加深农村困难，减弱抗战力量，阻碍建国进行。此种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对敌人游而不击，敌人走后，则冒人之功，以为己有，蛮横强暴，截夺友军所获之敌人械弹，并以解决友军枪械捏报为战利品。此种行为，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表面高唱‘统一战线’、‘拥护中央’，实际则阴谋反对，禁止悬党国旗及总理遗像、总裁肖像（各民众集会场所，只悬挂马列像及朱毛像），赤化太行民众，高唱打倒国民党、反对三民主义等口号，是否不算‘无法无天’？”

中华民国文献编撰委员会、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印：《共匪祸国史料汇编（三）》，第269-270页

[15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43-44页

[153](#) “匪军想进入市区，派人和日军联络……本来日军中就有一部同情匪军，他们到了这个穷途末路的时候，更主张跟匪军一起打游击。”《周佛海日记》，第1286页

“敌寇目前正在力图讨好苏联，故不惜利用各种手段，与中共妥协俾作与苏联更接近之媒介。且可籍奸伪军事力量阻碍国军反攻，以策其部队之安全。故双方谅解，亦属必然，而奸伪则可乘机壮大军权与政权，坐收渔利……奸伪中央今年决定加强伪军工作，企图利用伪军为媒介，以与敌军沟通……双方谈判在北方者……奸方代表为彭真、萧克，敌方代表为岛田……在南方者……奸方代表为陈毅、潘汉年，敌方代表为马场中将等，而其最后决定，虽有待东京与延安之指示，但终须视苏联幕后之决策耳。”《中央联秘处郑中华致外交部情报司长何凤山检送“敌寇与奸伪勾结之研究判断与其处置方法”一件请查照慎密办理函》，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一日，第139-140页

“双方约定：1.双方各自维持现在占领地区，各不妨碍交通；2.日本撤守地点由中共接收，以防渝美势力之发展；3.对渝动态互换情报；4.指定地点办理物资交换。”《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呈蒋委员长报告中共代表彭真与日敌北平陆军联络部岛田谈话内容电》，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三日，第135-136页

“日军驻徐州旅团长大田与共军第四师张爱萍部第十一旅旅长张震在宿东晤谈，双方决定：甲.敌必要撤退时，通知匪方接防；乙.匪方须掩护

其退却，不得袭击；丙.平时互不侵犯，不做刺激动作。现匪方已分别令所部遵照。”《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呈蒋委员长报告苏北中共企图消灭我所有部队以及与日军旅团长晤谈勾结电》，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第13页

[154](#) 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组织更强大，也更庞大。强大意味着组织纪律性和动员能力更强，自身拥有和向所在地方社会索取的资金和武器更多。庞大意味着干部队伍的人数更多，而且在社会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更大。

[155](#) 以冀鲁豫为例：“1938年4月，经过初步恢复整理的边区党的组织，仅有党员百人左右，到10月就建立了10个县委，连学生、士兵支部共达174个支部，党员数达1786人。1939年10月间，冀鲁豫区党委建立，党的组织也大量发展，到1940年4月，仅直（隶）南、豫北两地党员即达24207人。1939年1月，鲁西区党委成立，统一了鲁西、鲁西北各地党的领导……从1939年3月到9月的半年中，单是太西区，党员就由四百多人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到1940年2月止，全区即有党员30397人。”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第198-203页

[156](#) 晋察冀边区政府：《党的政策讲授提纲》（1942）

[157](#) 以太行根据地为例：“武乡县各级政权的改造，在晋东南是比较典型的。全县原来的县长、区长和四十八个编村的村长，都是旧政府委派的，但每个人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有地下共产党员，有进步的知识分子，此外大部分是地主阶级上层人物，还有少数反共顽固分子。根据这种情况，从1938年春天开始，中共武乡县委，按照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区别对待。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村长，鼓励他们积极工作；对一般的旧村长，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让他们坚决抗日并认真实行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政策；对那些经教育不改，仍然消极或破坏抗日的村长，则进行不同形式的斗争，并加以撤换。民愤大的，则发动群众到县政府控告和请愿，开会进行揭发斗争。到1938年7月，县政府四个科中，教育和财政两个科长，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8月，第三行署将旧县长调离，派来新县长。这就使县区两级政权，基本上为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所掌握……牺盟会除自己建立游击队外，还派干部进入自卫队和公安局。旧县长被撤换后，就将自卫队和公安局加以合并，成为抗日县政府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太行革

命根据地史料丛书----地方武装斗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5-6页

[158](#) 《刘少奇对盐城保卫人员训练班之讲话》（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三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锄奸工作》

[159](#) 刘玉柱：《贯彻放手发动群众方针》，《拂晓》第22期，第4—5页，中共华中七地委宣传部，（中华民国）法务部调查局档案052.1/812

[160](#) 别廷芳（1883-1940），字香斋，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阳城乡张堂村人。历任内乡县民团第二团团团长、宛属十三县联防司令、河南省第六区抗战自卫团司令等职。他从1929年开始推行地方自治，“以自卫保护自治，以自治促进自养，以自养根治穷和乱”，效果卓著。十年内战期间，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均避其锋。抗战爆发后，别廷芳部曾袭击襄阳、确山、桐柏、沁阳四县交界处新四军竹沟办事处。1940年，别廷芳病死。1946年6月，共军李先念部通过该区，仍遭到民团顽强阻击，损失惨重。

[161](#) 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13—215页；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第272、261、131页

[162](#) 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20—222页

[163](#) 同前注

[164](#)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33页

[165](#)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远东政策调查》，第130-131页，转引自约翰·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美亚文件和中美关系上的若干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05页

[16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638页

[167](#) 《毛泽东年谱（中）》，第560页

[168](#)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5页

[169](#) General Hurley to President Truman (1945-11-26) in FRUS, 1945, The Far East and China, VIII, p.723.

第五章 冷战与反殖民主义

一、从满洲到朝鲜，格局选择宪制

本节引言：

日本的投降导致东亚大陆出现政治真空，只有苏联才有能力填补。莫斯科希望以支持蒋介石统治关内各省为饵，换取蒋介石接受苏联对满洲的统治。尽管满洲的工业—军事力量远远超过东亚其他各地的总和，事实上已经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蒋介石仍然坚定地拒绝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和平，再一次将毛泽东从牺牲品的命运当中挽救出来。斯大林转而大力援助毛泽东，将中东铁路、大连港和苏联占领的北朝鲜变成了林彪的后勤基地。金日成要求斯大林和毛泽东回报，导致战争从满洲扩大到朝鲜半岛。

1. 苏联占据满洲

日本的投降满足了蒋介石的反帝感情和复仇欲望，同时也消除了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缓冲地带。昭和帝国在自己垮台以前，成功地将欧洲殖民主义体系破坏到无法复原的地步，在亚洲大陆留下了宽阔的真空地带。威尔逊体系至少在培植初期离不开美国的辐射，而美国人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内亚部分毫无兴趣。即使蒋介石愿意听取魏德迈将军的忠告¹，恐怕都很难激发盟军进驻满蒙维和的兴趣。何况，维持现状正是所有革命家最讨厌的事情。蒋介石不顾民穷财尽的现实，筹备了渗入越南、马来亚、朝鲜、台湾、西藏和满蒙的干部团体，纵然眼高手低，毕竟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任何政治势力的边界都只能在挫败之处划定，蒋介石的悲剧在于野心和力量的落差太大。失败允许他保留的幻想，在胜利面前分崩离析。他把日本当做最大的敌人，结果应验了日本人的预见：“实际上满洲已不仅是日本，而且也是东亚乃至全世界防止苏联赤化的堡垒。试看满洲建国二十年过后的今天，这一堡垒垮了。赤化的浪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冲击着东亚，甚至整个世界。”²

在日本遗弃的亚洲大陆上，苏联是唯一兼具革命意愿和革命实力的行为

主体。“苏联的力量，特别是它在满洲和朝鲜的力量，接着日本的战败而大大增强。此外，共产党在中国北方、越南和印尼所处的位置也是额外的力量之源。”³严格说来，苏联从未离开满洲。斯大林虽然承认了满洲国，出售了中东路，却不出所料地没有遵守承诺、停止跨界渗透活动。周保中和苏联远东军在比金建立直接联系以后，“苏联远东军取代了中共代表团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满洲党和抗日联军的领导和支援……为了在冬季训练抗日联军，于是让他们进入苏联境内。进入苏联后，抗日联军的干部在伯力或海参崴接受游击战术和侦察等政治和军事训练，其他人员被收容到曼佐夫卡附近的收容所里，他们得到苏联的供给。此外，苏联远东军还为抗日联军治疗伤病员，提供资金、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等等。苏联远东军为抗日提供了空间。”⁴苏联进军满洲时，这些代理人立刻派上了用场。

1945年8月25日，丘维林报告华西列夫斯基：“请从中国、朝鲜、其他北方民族、俄罗斯等民族组成的八十八旅当中派878人供第二方面军使用。请派215名中国游击队员、64名前满洲国士兵前往满洲工作。其中115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和助手，153人作为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关的成员，40人作为一般当地居民……派98名朝鲜游击队员、15名在苏联的朝鲜人前往朝鲜从事如下工作：47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职，15人任翻译，37人为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关的成员……周保中中校、旅长、前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派往长春市。张寿箴（李兆麟）少校、副旅长、前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派往哈尔滨市。金日成大尉、前抗日联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派往平壤市。王效明大尉、前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派往吉林市。姜信泰大尉、第四营营长、前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派往延吉市。金策大尉、第二营政治副营长、前北满省委书记，派往咸兴市。冯仲云上尉、旅政治部主任、前北满省委委员，派往沈阳市。”⁵1945年11月25日，王若飞对米克拉舍夫斯基介绍了11月17日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各民族代表大会的情况：“代表大会将成立东北地区联合自治委员会，将选举张学良担任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张作相（现在北平）、李度（现在重庆，是满洲派的首领）、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和林枫（共产党员）。与此同时，东北各地区将成立人民政府。阎宝航将被推荐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职务。高崇民和刘澜波将相应地担任安东省政府主席和副主席职务。接着王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⁶

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命令东北局“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 and 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⁷林彪的部队在苏联占领

军保护下，建立了以哈尔滨和大连为中心的两大缓冲地带。苏联在 북한의 占领区，为中共中央东北局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在平壤成立，开辟了四条胡志明小道。第一条走陆路，从安东经新义州、南阳到图们。第二条走陆路，从通化经辑安、横浦到图们。第三条走水路，从大连到南浦。第四条从大连水路到罗津，再走陆路到北满⁸。苏联占领军、东北局和朝鲜中央成立军事合作委员会，负责整顿朝鲜境内的中共军队，为他们提供医疗和休息场所，解决干内地和苏联干部过境问题，转运朝鲜的粮食、食盐、工业品和苏联的军需品，管理朝鲜和满洲东北的贸易⁹。姗姗来迟的国军无论通过南满铁路还是葫芦岛海路，都形同瓮中之鳖。

2. 蒋介石自取灭亡

现在大局已定，只剩下两个问题悬而未决：蒋介石能否接受苏联代替日本，红色满洲国会不会直属苏联。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又取决于第一个问题。蒋介石如果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购买苏联的友谊，至少可以争取某种西哈努克式的解决方案：以投靠国际共产主义为代价，换取镇压国内共产主义的权利。苏联得到满洲-朝鲜的周保中-金日成政权，至少需要五年时间经营从联合政府到一党专政的过渡期。蒋介石（西哈努克）有充分的机会镇压关内的毛泽东-波尔布特，让延安-红色高棉为满洲朝鲜-南越寮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牺牲。这种前景对蒋介石而言并不美满，但仍不失为1937年战争爆发以后所能指望的最佳结局，不过如果蒋介石愿意接受这种性质的选择，1937年战争就根本不会爆发了。

抗战结束后的几个月，毛泽东陷入了他毕生最无力的困局。他所有的才智和资源都毫无用处，命运完全取决于敌人和外人的选择。国民党远征军夺路出关以后，他的地位就像珍珠港事变以后的蒋介石一样安如磐石。蒋介石如果愿意接受有名无实的主权，斯大林就有强烈的动机维护缓冲国脆弱微妙的平衡。满洲和朝鲜的共产党比延安的大军更容易冒充“地方自治政权”，他们的领袖也比狡诈的梁山好汉毛泽东更符合列宁主义的忠诚标准。如果蒋介石以倾国之师阑入满洲，有可能在敏感的机会窗口荡平苏联数十年的经营，斯大林就只有顾大局不计小节，集结延安、满洲、朝鲜共产党的全部力量反击，因为毛泽东一统东亚虽然不如延安、满洲、朝鲜相互牵制和竞相效忠，但总比蒋介石及其大中华主义一统东亚更有利。后一种前景实际上会导致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以后陷入的两线作战困境提前三十年出现，而列宁以来二十年的远东战略就是为

了打破这种可怕的包围圈。

蒋介石放弃了安全可靠的“局部胜利”加“局部失败”策略，选择了“赢家通吃”或“一败涂地”策略，非常符合四一二政变和抗日战争发动者的赌徒性格。斯大林不是赌徒，所以并不支持十月赌注。正因为如此，他才比列宁的知心朋友托洛茨基更适合守成。如果列宁是斯大林，十月政变不可能发生。如果斯大林是列宁，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像三民主义革命一样短促而悲惨。斯大林的特征是谨慎和坚韧，尽可能长久地将尽可能多的选择余地留在自己手中，直到美国军舰运送国军在秦皇岛登陆，他才下定决心大规模放水¹⁰。

3. 满洲-朝鲜无国界

亚洲冷战从满洲-朝鲜区域开始，一开始就没有国界的概念。所谓的国共战争只是这场斗争的一部分，而且并不是最关键的部分。大连的苏军基地为毛泽东所做的贡献，比他在华北苦心经营的十个根据地多得多。八路军北上抢占满洲，满洲的军火南下接济苏鲁前线，林彪的残兵退到朝鲜休整，都仰仗大连的基地。美国人知道满洲-苏鲁战区和朝鲜-大连后方在苏联的部署当中不受国界的限制，却只能听任对方破坏游戏规则¹¹。

国军扫荡南满期间，“先后有18000余名伤病员、军属和后勤人员撤到了朝鲜境内，有85%的战略物资转移到鸭绿江以东。在安东、通化收复后，绝大部分人员经陆上通道回到了东北解放区，2万余吨战略物资几乎完整无缺的运回了南满……经这4条交通线使北满的粮食和煤炭、大连的食盐、布匹、医药和医疗器械以及工业原料等得到了交流。所转运的物资已经无法全面统计，仅有据可查的，1947年头7个月就转运721万吨，1948年全年为30.09万吨。过境人员1946年下半年有18批计3000人，1947年由安东去辑安的有2000余人，由大连去临江者3000人，由大连去北满的干部2000余人。到1947年6月单计经朝鲜过境者不少于10000人，辽东地区随来随往者，尚不计其内。1948年通过图们-南阳口岸的过境人员达8685人。许多著名人士，如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参加新政协会议时，都是从香港，经海上通道，转赴哈尔滨的。途经陆上通道的中共高级党政干部有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肖华、张爱萍、韩先楚、周保中、于若木、蔡畅、李立三、伍修仪、滕代远、韩光、欧阳钦、何长工、杜平、李一氓、吕京等。”¹²

4. 不平衡的内战

国军攻陷四平、长春后，苏联驻旅顺口军事委员会将大孤山存放的日本武器库分两次交给东北局的代表肖劲光¹³。苏联滨海军区命令苏联驻朝鲜占领军，将日本留在朝鲜的武器库也交给东北局。林彪收编的关东军为解放军建立了第一个空军学校，但飞机缺少零备件。刘亚楼前往旅顺口求援，苏联海军立刻满足了他的要求¹⁴。而国军自从失去了印度—缅甸交通线运来的美国配件，卡车螺丝钉都只能用一个少一个。茹拉夫廖夫率领的苏联铁路专家组进驻哈尔滨，为1947年的满洲里—外贝加尔斯克联运做好了准备¹⁵。苏联船只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共青城出发，向佳木斯和松花江各港口输送军需品。张闻天坐镇佳木斯，统筹后勤工作¹⁶。而国军秦（皇岛）葫（芦岛）基地依靠美国在抗战后期运来的物资，在华盛顿的制裁解除以前得不到补充¹⁷。

林彪和东北人民自治军对苏联的依赖，比广州革命根据地的蒋介石和东征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人都是政治将军，将指挥作战的技术问题留给了友邦的无名英雄。仅从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在中共军队中的苏联军事顾问（包括军官和士兵），就有102人阵亡，700人受伤（不包括受伤后死亡的）。此外，在中共军队进攻沿海港口的战斗中，苏军还出动军舰掩护港口工人的日常作业，以及保护从苏联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共军弹药和补给的船只。共军内战中所需要的一切几乎全部来源于苏联。另外，几乎每支中共部队都配备10名左右的苏联顾问，协调各个部门的行动和保证战斗分队的效率¹⁸。苏联计划当局为了支持远东的革命，几乎将国内的生产能力罗掘殆尽，甚至像卫国战争时代一样，要求各部门节约紧俏物资。1947年7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向东北提供工业品¹⁹。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像饥渴的婴儿一样，连最细微的需要都会向莫斯科的乳房索取。苏联对他们的关爱同样无微不至，从军事、经济到和谈的细节，直到举行庆典的信号弹。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和获得的重要情报，都会第一时间送到斯大林面前。列宁的遗嘱经过了二十年的曲折和奋斗，终于到了九转丹成的时刻，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绝不能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功亏一篑。

与此同时，马歇尔和艾奇逊正在折磨可怜的蒋介石。国民党的支持者像

祥林嫂一样到处呼冤，但得到的回应总是为时太晚²⁰。相反，林彪发出的信号通常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1946年3月，《中共军与苏军勾结之最新情况报告第二期》称：苏军在东北交给中共战车4500辆、火炮900门、重机枪8000挺、轻机枪22000挺、军车3000辆、军马6500匹、电话15700个、无线电5200台、步骑枪百万支，还从苏联境内和北朝鲜供应步骑枪、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山炮、野炮、手榴弹、地雷、重炮车、汽车、飞机、装甲车、火车、轮船、军服、米粮、煤炭及无数弹药。苏联教官在东北各地举办军政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学校、空军学校，为共军培训军官²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生产能力只相当于苏联援助的零头：15300支步枪，510挺机关枪²²。他们能够支持数年之久，主要是由于来自关内解放军的低素质削弱了武器优势。蒋介石重蹈了九一八的覆辙，四处呼冤，应者寥寥。1946年6月，国民参政会通过的《建议采取强硬外交，维护中国领土主权案》“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主持正义，制裁侵略活动。”²³1947年2月，华北、东北民众代表要求外交部向联合国提出控诉²⁴。1949年8月31日，行政院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直到1952年第六届联合国大会，才正式通过²⁵。

1948年9月10日，林彪通过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致电斯大林，要求支援各领域专家至少一百人。²⁶

1948年9月，“东北民主政权向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请求援助。请求向他们提供有关苏联发展人民经济的材料和制定五年计划的资料。”²⁷

1948年12月16日，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苏联派去的铁路专家在东北的工作成果²⁸。

1948年12月31日，交通部长贝舍夫向贝利亚报告向东北运粮的数量频次²⁹。

1949年1月5日，科瓦廖夫向斯大林转达东北民主政权的进一步要求，需要支援专家至少500人³⁰。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就和谈问题指示毛泽东：

“第一，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要建立中央联合政府机构，并将五分之三的（政治）协商会议席位、三分之二的政府部长职位留给共产党，而将余下的议员席位和部长职位分配给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

第二，应当把总理、总司令，并尽可能把总统的职位都留给共产党。

第三，应当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这样建立起来的联合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而其他任何妄想篡夺中国政府地位的政府都是欺世盗名的叛乱集团，应于取缔。

最后，应该通过联合政府，不但向你们的军队，也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命令，要求军队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并保证立即停止对那些已宣誓效忠的军队采取军事行动，而对拒不宣誓的军队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我们对南京方面调停建议的答复，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意见来起草。”³¹

1949年2月2日，米高扬向斯大林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要求：

“我们能否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日式、德式和捷克斯洛伐克式的高射炮和炮弹，以便保卫北平、天津、沈阳和其他城市。现在他们有108门高射炮。

我们能否提供一定数量的反坦克炮，他们现在共有150门反坦克炮。

派遣专家并援助一些设备，以便生产武器。

在商品流通中列入一些原料，其中包括用于生产弹药的三硝基甲苯。

提供一些顾问来组建军队、军校，里来组织后方，其中包括军事工业。”³²

1949年2月3日，米高扬向毛泽东传达了斯大林的亚洲战略³³。斯大林胸怀全局，东北亚的胜利只是东亚和东南亚下一阶段斗争的垫脚石。毛泽东要对莫斯科负责，东亚各国共产党要向毛泽东负责。只要世界革命的远东输液管穿过北京，毛泽东就不用担心得不到苏联资源和技术的水分。冷战的金流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尼罗河造就了埃及。

1949年2月，毛泽东向苏联借债3亿美元，希望苏共提供日常必需品、石化产品和汽车（他提出的具体数字是3000辆）等物资。他还特别提到希

望得到白银，以便在中国发放硬通货。当然，毛泽东对苏共是否会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发放这么一大笔有偿债务，心里也没底。他曾经说：“3亿美元是我们的请求，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会给我们这个数额，或多或少，假如你们不给，我们也不会生气。”³⁴“中共的领导人甚至表示希望从1949年开始在随后三年的时间里分期得到这笔巨款，并说，他们将来会连本带利偿还这笔债务。”³⁵周恩来说得更加具体，希望苏联提供共产党军队极其匮乏的反坦克武器（那时解放军里只有150件这样的武器）。还希望苏联提供重型坦克（那时共军的作战坦克最重的不超过15吨，徐州缴获的70辆坦克，大部分都已损坏）。他还说，共产党部队还希望苏联提供制造军火的原材料，比如三硝基甲苯（TNT）等。苏联最好连军事专家带设备一起提供。此外，中国急缺善于组建军队、实施军事教学和组织后方以及军工生产的苏联顾问。对此，苏联政府代表的答复是：“我们原则上同意帮助组织军火生产和派遣顾问，但是关于高射炮和反坦克炮，我无可奉告，有待禀告莫斯科考虑。”³⁶不久，周恩来又向苏联伸手：“我们想要钢轨、液化石油气、大约5000辆汽车和其他产品……”³⁷

1949年6月28日，斯大林会见中共代表团，中国向苏联借贷的事情才算有了眉目。当时会见现场的苏联速记员速记的内容如下：“关于借贷。斯大林同志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他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签订这样的协议在两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年息为1%的3亿美元贷款将以设备、汽车和其他材料、货品的形式，按每年6000万的数额，分5年提供。中国将在贷款全部提供完成之后10年内偿还贷款。为此，斯大林同志说，毛泽东在给他的电报中说，1%的年息对于这笔贷款来说太低了，应当提息。”³⁸斯大林在谈完贷款问题之后说：“我们还准备向你们提供上海黄浦江江面的扫雷援助，包括专家（我方很多）和扫雷艇。我们还可以向满洲政府出售几艘扫雷艇，并且在大连、旅顺和弗拉基沃斯托克为扫雷培养中国水兵。”斯大林还开玩笑说：“可以把他们（被培训的中共水兵）卖给中央政府哦。”他还慷慨地表示，苏联可以为中共提供40架歼击机，以消灭马步芳的骑兵。他还想帮助帮助中共建立海军，打捞中国近海的沉船，并协助修理。特别是，斯大林表示他愿意为中共组建空军³⁹。解放军的根基，由此得以奠定⁴⁰。

1949年9月22日，华西列夫斯基报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代表请求（苏联）向北平发送15000枚信号弹，以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典活动。”⁴¹

新人民政协仅仅开了十天会，就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根据斯大林事先的指示，确定了冷战初期的统战体制⁴²。周恩来为此不得不煞费周折，在香港收买国民党元老和各种泡沫小党。美国人对他们想象中的民族民主势力估计过高，苏联人对他们想象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同样如此。清党先驱李济深和摩擦专家陈明仁因此光临北平，在共产党内部引起了一片“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怨言。

5. 毛泽东和蒋介石隔海建国

毛泽东知道他应该付出什么代价，不断重申“一边倒”的基本原则。他坚定地拒绝了司徒雷登及其掎客的试探⁴³，通过《共同纲领》第55条⁴⁴向苏联宣誓效忠，实质上等于满足了列宁对北洋政府的期望。这项决定实际上就是针对美国政府的合法性三原则⁴⁵，让斯大林相信毛泽东不会做第二个铁托⁴⁶。如果美国民主党政府是优秀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那他们选择的挑拨离间手段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就他们此前和此后的一贯作风推断，他们的目标不外乎继续折腾走投无路的蒋介石。

1950年1月6日，俞国华⁴⁷致电蒋介石：“援台案前途既多阻碍，连日与国会领袖晤谈，均以反对派主要借口为“中枢领袖不为台湾人民信任，台民真意为脱离中国”等调言，为抵抗起见，建议台湾省议会即日致电美参众两院声明，参议会为民选机关，代表台民，现受中共暴力独裁侵犯，本于美政府援助自由人民保障其自由之原则，希望美国能予自由的台民以军事政治援助，并欢迎美国派员监督其使用等辞句。上述建议对于消除各种恶意滥言，当有极大补益。又，翟石（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氏若赴台，我亦因尽力设法消除其台湾人民对中央不满，要求独立之观念。”⁴⁸俞国华1950年1月12日致电蒋介石：“查战后美援华各案均由共和党发动，国务院对华设施向不依照对欧之两党或超党外交程序征询国会意见，在执行时亦多方刁难，企图拖延时间减低实惠，此次我与国务院直接谈判似有端倪，最后仍被推翻，可见其全无诚意。据白吉尔将军(O. C. Badger)及最近访华参议员费格森云，最后决定仍系马卿所主张。”⁴⁹蒋介石无法绑架美国人，但还有余力绑架台湾人。美国人愿意支持台湾抵抗共产主义侵略，却不见得欢迎蒋介石扎根台湾。台湾必不可少，不等于蒋介石必不可少。如果台湾人民能够及时摆脱蒋介石，他们就会让蒋介石无处可去。俞国华知道蒋介石已经命悬一线，千万不能让

国务院得到任何借口。美国人和国民党都知道蒋介石需要台湾，但台湾不需要蒋介石，如果让台湾人民也知道这一点，那蒋介石就彻底完了。

毛泽东意外的胜利和美国人意料的冷漠给斯大林和金日成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试探性赌博的边界或许还在更远的地方。朝鲜战争结束了他们的暧昧和犹疑，固定了所有各方的位置。腊斯克(David Dean Rusk)⁵⁰公开宣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是一个斯拉夫人的‘满洲国’，要像反对苏联一样有力地反对中国。”⁵¹这样的定性对斯大林非常不利，意味着他从此以后再也无法享受统一战线的优惠待遇了：罗斯福的统一战线，最大受益者是苏联。莫斯科一面依靠华盛顿的输液，一面用美国的援助颠覆美国的盟友。冷战公开化，美国就不会继续援助苏联了。实际上，公开决裂就意味着苏联一定会饿死。饿死的具体过程和时间，都是无足轻重的细节。“人民民主”的白手套已经弄脏，苏联重新回到必须为各国支部承担责任的时代⁵²。

毛泽东对这样的定性倒是求之不得，美国人的敌意帮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占稳了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的交椅。他终于不必担心无数潜在的蒋介石、王明、周保中和金日成了。战争升级对他反倒是天赐良机，可以让苏联老大哥买单，建立斯大林式的军事-工业体系。蒋介石之所以在最近的两次战争中垮台，关键就在于他缺乏这样的体系。生命和人力是廉价而丰富的，机器和技术则是昂贵和稀缺的。斯大林主义宪制可以视为列宁主义组织适应这种环境的产物，蒋委员长这种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陷入同样的环境就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还处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正在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为了加强我们的国防，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包含各个技术兵种的人民解放军，以便收复台湾，保卫我国领土，打击帝国主义侵略者，我们不得不优先发展重工业。”⁵³“五年计划规定，轻工业投资和重工业投资的比例为一比七点三，即百分之十二比百分之八十八。”⁵⁴

6. 土改、镇反与朝鲜战争

格局决定路径，宪制适应环境。反蒋战争产生土改，反美战争推动镇反。每一次战争都为红色政权解除了原先的困难，扩充了原先的汲取范围。

抗日根据地大量发展党员，培养干部，收编各路武装。增加的开支一方

面依靠公粮、公债、无偿劳役和土特产垄断，另一方面依靠逃亡富人的财产。抄没收入往往以“打击汉奸”的名义进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单纯。华北、华中各地无疑存在广泛的投日现象，但吴化文、孙铭九之流真正的汉奸几乎没有遭到制裁的可能。相反，他们的武装力量是各方竞相收编的对象（共产党的术语称为“开展敌伪军工作”）⁵⁵。邓小平领导的太行根据地“以一切努力发展建设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认真组织游击集团，”“深入敌人心脏地区开展工作……直接打入敌伪组织，特别是伪军、伪组织中……先后争取土匪头子、伪军排长王奎英和一个伪军大队起义。”⁵⁶

八路军和民兵以“维持会”和“伪自卫团”为主要作战对象，日本人伤亡的纪录极为罕见。太行根据地1942年5月至7月打垮了272个维持会，却没有跟任何日军发生冲突⁵⁷。陈赓领导的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在1941年8月的四次战役中总共俘虏伪军3名，第三军分区在12月的攻势中总共争取23名伪军反正⁵⁸。维持会及其附属民团大抵是农村有产阶级和良家子的组织，没有多少战斗力。他们的动机通常在于防范兵荒马乱之际必然四起的流氓无产者及其盗匪组织，愿意贿赂任何能够维持地方秩序的军事集团。除非组织者确有在任官员或退休官员的身份，明清双方和其他各方都不会将他们视为叛徒。国民政府将欧洲总体战的原则引入东亚，践踏了“有贰臣无贰民”的古老传统，但由于三民主义干部队伍不够充实，无法彻底兑现其革命理论。八路军官多兵多，替他们完成了社会革命的任务。这种作战方式既不像真正的战争那样危险而困难，又能卓有成效地通过抄没解决财政困难。汉奸的罪名同样可以方便地消灭其他派系的军队，因为灰色地带的军队很少有不脚踏两条船的。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和八路军冲突时，就同样有理有据地指控对方私通北平。随着富裕阶级的破产、抄没和逃亡城市，日本统治区的经济优势不断扩大。1942年以后，华北各根据地重演了赣南苏区的破产内溃。残余的爱国地主、开明士绅和红色政权保护下成长起来的新富农构成抗日根据地能够控制的仅有财源，但统一战线的存在妨碍了共产党的进一步征敛。毛泽东迫切需要决裂，因为和平竞争只会扩大他的劣势。

解放军继承和发扬了八路军依靠“人民战争”和“军民鱼水情”的传统，实质上就是发挥列宁党对散沙群众的组织优势，颠覆“军人应该保护平民”的战争传统，强迫平民、妇女儿童为解放军充当人肉盾牌⁵⁹，既能消耗敌军的弹药，又能损害敌军的战斗意志⁶⁰。老大哥化身为作威作福的村干部，化身为报复社会的无业游民，甚至化身为监视大人的儿童团，深入千家万户的炉灶和床头。私人生活和私有财产一起消失了，一切都

必须奉献给党。严格的纪律不仅适用于劳动力和物资管理，而且适用于思想和感情。

反蒋战争解放了共产党的手脚，全方位释放了农村的财富和人力，排除了农村社会重新产生本土精英的可能性，保证了党组织长期垄断所有社会关系网络。

土改工作组发挥了投名状的作用，参加者不再有叛变或自诩中立的机会。前线的军事斗争和后方的思想改造同步。思想改造的目标是毁灭中间分子的存在基础，强迫他们选择一边倒。这就是土改为什么必须流血的原因，非如此不足以造成无法和解的仇恨。革命干部如果没有形成牢固的共犯心理，队伍就无法避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有的涣散性⁶¹。革命群众如果没有形成牢固的共犯心理，干部就无法将他们置于过河卒子无路可退的地步⁶²。

土改既是瓦解社会基础共同体的革命，又是战争财政的组成部分。⁶³有产阶级在乡村体现为地主，在城市体现为商人。无产阶级得到解放，意味着旧社会的基础共同体瓦解为原子化的个人。乡绅和资本家领导的小共同体会阻碍，至少是分散党组织的权力。无产者的政党必须首先制造和释放无产者，然后才能保证新社会对党组织的绝对依附地位。有产阶级数百年的积累，在几年的战争开支当中消耗殆尽。资本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出于阶级本性，无法开发这种自杀性的利益。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者在战争财政方面的短期优势和动员能力，确实要归功于他们没有这方面的顾忌。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逃出晋绥边区的山西商人，如来自陕西吴堡与山西隰县者，在土改时也被晋绥边区要回去，斗垮、斗死。”⁶⁴

“就在政府的刻意动员下……1947年晋绥边区的营业税收入呈现惊人的大跃进，不仅占了1942年以来历年营业税总收入的75%，而且还是1942年以来首次营业税超过出入口税（货物税）的一年。然而，用这种方法征收商业税，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也发动了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制止过去由大商人掌握之商会进行不公平的摊派，达成社会正义的政治目的，但商业也因此停滞了……针对晋绥边区九个代表性市镇的调查发现，因为土改斗争而停业者高达25%，缩小营业者则有5.5%，伤害不可谓不小。”⁶⁵

“随后的1947年，边区物价总平均涨达34倍。过去边区是靠输出鸦片、食盐来解决此一问题，但抗战结束后，潞盐西来，边盐市场缩小，「卖不动了」。”⁶⁶“兼之三边盐池在国共内战时期为国军所占，所以现在边区只能依赖鸦片输出。原来边区在抗战结束之初，以为国内和平局势到来，没有必要再搞鸦片贸易了，故采取「低价旺销」政策，大量推销鸦片。然而，1946年以后，环境愈益严峻，物价日益高涨。中共只好再搞起鸦片贸易，只有靠输出鸦片换回物资，回笼市面上多余的钞票，财政才有办法，金融也才能稳定。因此，鸦片贸易成为当时「全部工作的基本关键」。”⁶⁷

“早自1946年始，边区即开始有组织地大量向外推销土产。主要是由贸易公司统一推销，或是由野战军随军销售，少部份允许小公组织群众出口(但是这一办法引起严重的走私现象，以致鸦片价格日益跌落，也减少了大公的销量)。”⁶⁸“鸦片向西出口到国统区后，换成金子与法币，其中法币换回布匹与棉花，金子则拿到东边的晋察冀边区去换回布匹、棉花等必需品。这些换得的布匹与棉花则拿回边区投入市场，回笼本币，如此就稳定了金融。”⁶⁹

“但是，因战事的阻挠，鸦片的输出并不容易。1947年2月间，关中、陇东分区相继沦陷；3月，国军占领延安，共军撤至以绥德为中心的周围地区。边区主要对外口岸大部沦陷，鸦片卖不出去，边区物价飞涨。5月间，国军再占绥德，物价又一度飞涨。所幸中共从晋冀鲁豫、晋察冀与山东边区及时调来20万匹布、23万斤棉花，才渡过难关。”⁷⁰“随后，国共两方在绥德与黄河沿岸形成拉锯战。解放军随军携带鸦片，采取过去红军「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乘占领口岸之际，抛售鸦片。如1947年3、4月间三边地区沦陷，解放军就带着鸦片等重要物资撤离；7月初解放军克复三边，中共乘机大量抛售鸦片，在短短二十多天内就销出「肥皂」（即鸦片）三千余箱，换回土布二千余匹，买入麻油五千余斤；随后国军再占三边，解放军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凯旋撤退。”⁷¹“整体来说，1947年一年边区的「销皂数」即有十七万余箱，比战前总销皂数十二万余箱还多了近五万箱左右。”⁷²

反美战争并不需要新的脚本，上海商人不难套进晋绥商人在边区曾被中共勒索的角色。党组织一面切断资本家的社会关系，一面动员无产阶级斗争他们的老板。东亚贸易在帝国主义保护下，一百多年积累的民间财富，在高瞻远瞩的世界革命家手中迅速收割殆尽，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新剧本和旧剧本的唯一区别在于，美国人并不是蒋介石那样的纸

老虎，但巩固政权才是最大的利益，损兵折将毕竟可以视为必要的成本。三反五反即使不能在前线获得满意的战果，至少足以推动后方的社会重组和财政丰收。共产党由此获得了以前任何政权都不能想象的社会控制权，没有理由不感到心满意足。“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得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很多事情不好办。”⁷³“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⁷⁴毛泽东满意地说：镇反运动“粉碎了神秘主义、小手小脚、畏首畏尾的作风，收获非常之大。”⁷⁵

工人团体自从省港大罢工以来一直是国民党的重要阵地，在清党运动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而且具备一定的战斗力，自然构成主要的镇压对象。1951年4月27日前后，上海公私各厂逮捕了6077人，其中包括325个基层工会主席或委员，73个上海总工会和产业工会干部⁷⁶。工人组织瓦解后，企业已成釜底游鱼。镇反运动自然延伸为三反五反，将孤立无援的企业家各个击破。

党委幕后操纵群众运动的模式并不是共产党首创的，英国人和日本人对国民党人的流氓外交早已深恶痛绝，但共产党不仅用阶级共同体取代了民族共同体，而且破坏社会基本细胞的决心绝非半心半意的国民党人所能望其项背。

薄一波的南下干部得意洋洋地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镇反心得⁷⁷。他们根据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原则，逐层加压，迫使同行互相攻讦检举⁷⁸。1952年4月2日到4月8日，自杀者已达67人，由于工作组扩大做家属工作，资本家夫妇一起自杀的情况越来越多⁷⁹。党和群众团结起来，“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⁸⁰

新社会必须在旧社会的废墟上才能建立，新人就是解除了一切社会性感情和纽带羁绊的物种。“人民获得解放”，意思就是生物人从“资产阶级塑造的虚假人性”中解放出来。

7. 新中国的宪制

新中国的宪制产生于满洲-朝鲜战争，正如苏维埃俄罗斯的宪制产生于1914-1919战争。1950年11月，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财政工作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的原则⁸¹。1951年7月17日，陈云告诉苏联代表，国防开支占了国家开支的63%⁸²。金日成的军队在满洲为林彪作战，林彪的军队在朝鲜为金日成作战⁸³。苏军一面在扬子江下游基地抵抗国民党⁸⁴，一面在南满基地抵抗联合国军。⁸⁵

在列宁的东方反帝革命战略和斯大林的抗日统一战线战略当中，国民党仅有的资本都是充当人肉盾牌。肉盾一方的主要期望，就是以过剩的人力换取稀缺的武器。毛泽东一旦夺取了蒋介石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代入了蒋介石的角色。这种角色与其说源于领导人的决策，不如说源于东亚社会自身的性质：内卷化社会和散沙社会的基层组织资源极为薄弱，无法稳定巨大的流民和潜在流民人口。流民的众多不仅是高生育率造成的问题，更是儒家小共同体缺乏涵育能力的证明——宗族组织对个体的保护和约束能力，都比欧洲的教区组织和中东的教团组织差得多。良民和流民、流民和叛军相互转化的门槛，也低于基督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编户齐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内溃的危险性永远高于外患。

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争内外配合，为社会基层的列宁化服务。前者在宗族的废墟上，建立了列宁主义的基础共同体。后者的组织能力相当于教团，却又不像教团那样构成抗拒中央和世俗权威的自治组织。汲取的难度和动乱的危险降低到宋明以来未有的程度，创造了饿死在家门口的奇迹社员。儒家士绅的统治如果处在同样的情况下，必然因为流民四起而灭亡。任何消灭社会负资产的战争都对新社会的建构有利，何况社会负资产还能卖出肉盾换武器的好价钱：“中国进入朝鲜的援朝部队，是为了改装自己。部队来后先改换自身的装备，然后送上前线，打一个时期的仗，然后撤回国去，又调来一批新的部队到朝鲜来。如此轮番进行，以便拿到新式武器改装自己。”⁸⁶朝鲜战争将毛泽东的流民负资产转化为正资产，对“前三十年”的相对稳定功莫大焉，正如资本主义全球化将邓小平的流民负资产转化为正资产，构成了“后三十年”相对稳定的基础。

苏联的负担与日俱增，毛泽东索取的胃口却永无餍足之日⁸⁷。满洲战争的胜利唤起了斯大林对朝鲜的虚假希望，将苏联境内的生产能力发挥到极致⁸⁸，不到一年时间就难以为继。

1951年6月2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

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已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年、1952年、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仍有很大困难。”⁸⁹事实上，这些资助的十分之一就足以打败蒋介石了，然而蒋介石失败仅仅两年以后，美国已经在朝鲜半岛抛弃了针对亚洲大陆的孤立主义政策。两年前足以横扫东亚大陆的火力，如今不足以坚守半岛战线的方寸之地。苏联一满洲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国民党统治区，但在美国兵工厂面前不值一提。苏联的胜利总是发生在模糊地带，止步于明确的边界。朝鲜战争以后的美国接管了昭和帝国的遗产，设防边界随之固定。国际共产主义的生产能力这时已经接近枯竭，只能向尚未设防的东南亚转进。苏联为其胜利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失败，而且仅仅是开始。

远东冷战第一回合始于满洲、终于朝鲜，确定了东北亚大陆政治生态环境的卡萨布兰卡顺序⁹⁰：组织力量和决断意志以外，成败首先取决于军事工业。核心组织交了学费以后，迅速将教训落实到新社会的格式化操作当中。北京和平壤两大次级政权根据满洲-朝鲜战争的需要，增加了宪制的层次。它们的三层宪法结构包括：核心党-特务组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先锋队）；军事-工业共同体（斯大林主义的精髓）；外围党-行政管制体系（统战的内部界面）。三层同心圆以外的社会属于征服和捕食对象，猎物和外围社会的真实或假想凝结核列为阶级敌人。只要三层同心圆无懈可击，涣散的外部世界确实无异于纸老虎。次级政权的宪制更接近斯大林宪制，因为满洲-朝鲜战争实质上就是欧洲总体战向外围扩展的结果。斯大林宪制注定会产生技术官僚外围，分散了特务-恐怖核心团体的权力。

列宁主义的理想捕食对象既没有组织力量，又没有军事-工业支持。先锋党的渗透-分化-突袭就足以吞噬克伦斯基和孙文这些松散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却很容易遭到艾伯特国旗队和蒋介石蓝衣社的镇压。斯大林主义比纯粹的列宁主义更残暴，因为三层掠食者比核心团体的消耗更大；同时又比纯粹的列宁主义更温和，因为猎物的范围相应地缩小了。斯大林将组织力量和军事-工业共同体结合起来，用斯大林格勒和长春式的钢铁洪流取代了阿芙乐儿和中山舰的零星炮火⁹¹。即使中心地带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也必须牺牲十九世纪的自由概念，用战争动员体制和专业情报机构堵死入侵的门户。殖民主义遗留的真空地带尚未完成国家建构，通常只有美国的干涉才能阻止斯大林主义的入侵。

中国支部的核心党-特务组织早在毛泽东取得发言权以前就已经根深蒂固，五十年代的改组仍然维系了原有的班底。周恩来负责领导1949年以后的情报机构改革，将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调查部和中央军委联络部的班底整合为情报、公安两部⁹²。邹大鹏、马次青和冯铨都是从中央军委联络部调到中调部的，但无论哪个部门都是周恩来的人马⁹³。1949年10月11日，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改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⁹⁴。莫斯科情报委员会在外交官身份的掩饰下⁹⁵，积极协助中央调查部的改组⁹⁶。新华社习惯于充当情报部门的白手套，无论1949年以前还是以后。吴冷西宣称：“在许多其他分社，新华社记者均接受调查部及使馆调查组指定的一定任务。几年来，这方面的任务是必要的，有成绩的，应当加以总结。”⁹⁷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离不开苏联的上线，而梁山系的水准完全不能胜任列宁党的核心工作。毛泽东不得不生活在他们的包围中，难言之隐不可谓不深。

1949年10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应毛泽东的请求，兹责成苏联国家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伊万诺夫和韦利卡诺夫等同志，以苏联国家全部顾问身份，协助其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的工作。批准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的如下电报草案：‘致毛泽东同志：应您关于派工作人员协助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工作的请求，兹派遣苏联国家全部伊万诺夫和韦利卡诺夫等同志前往你们那里。’”⁹⁸1950年11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责成苏联国家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向中国派遣敌人地下电台探测专家——库列绍夫和叶夫多基莫夫等同志（携必要技术设备）、边境部门工作人员阿尔杰费耶娃同志和警察机关工作人员法季杨诺夫同志，以援助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⁹⁹

美国方面的情报从相反的观察角度，证实了苏联情报机构的纪录：

“作为中国共产党安全局的局长、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与苏联的安全局局长紧密配合，甚至有一些事情连毛也不知道。推断的结论是，苏联为了自己的目的，正在通过康将安全局的所有机构模式化.....仅根据大连分居就可以完全展示出苏联对安全局运作的控制情况。在这里，中国和苏联的安全警察‘在一起工作，几乎如同一个单位’。苏联的特务指导着大连社会部的工作，以至于大连的机构已经类似于苏联的同类组织了。当地的苏联国家全部的官员鼓励中国人直接向他汇报。俄罗斯人对他们的中国同事进行在职训练，他们与哈尔滨的警察训练学校有着数不清楚的联系。俄罗斯人经常寻求在中国

密探之间建立并维持某种团结精神，当社会部成员被派遣到海外时，他们主要为苏联国家全部驻当地的代办处从事特殊的工作……结果是，大连社会部几乎全部是亲苏的。……大连分局有五个主要的部门：秘书处、教育办公室、情报办公室、审讯办公室和外国密探办公室……情报办公室的一个科，有693个全职密探，负责掌握关东外国人的活动，另一个科有500个全职密探，负责调查当地老百姓的活动；两个科的密探均有权拘捕可疑者。情报办公室还有一个11人组成的档案科。这个科有行动和分析的功能，陈说‘比其他科有更大的权力，可以派遣其他科的密探组成特遣队’。

审讯办公室对当地的法院工作有很大影响，但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政治清算。审讯科进行严刑逼供，监狱科负责看管政治犯，直到得到满意的招供，然后由判决科发落他们。外国密探办公室由大连分局局长直接负责，它与情报部的国际科联系密切。它是介于中国共产党总部与党的密探之间的联络处。许多从这个办公室出来的中国密探都是有影响的党员……‘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大连建成了一个向外国输送密探的中转站和基地。这是因为大连有通向世界的航运，有商业为密探作幌子，残留的朝鲜人和日本人可以提供与这些国家联系的方式，还有密探所需的装备以及苏联的积极援助。’……中国共产党派往国外的大部分密探都直接在社会部的领导之下工作。另外，还有一个‘联络部’，受林枫领导，并设法获得海外中国团体的支持¹⁰⁰……苏联影响下的伊犁和呼伦贝尔的警察组织是独立的，不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¹⁰¹这些部门精通开发和控制人体弱点的科学，正如爱德华·克兰克肖所说：“他们精神崩溃前，其身体就将死亡……被彻底的身心疲惫完全阉割，并转化为一种震颤性的条件反射，不是勉强而是急切地扑向无形的折磨。”

8. 东亚冷战结构的凝固

苏联外围的军事-工业体系同样离不开革命中心的扶植，这就是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比斯大林更激进的原因。毛泽东离不开斯大林的输血，因此只能一边倒，激进的政策起到了投名状的作用，相当于自己主动切断改弦易辙的退路。没有这些基础，他的胜利不会比蒋介石有名无实的抗战胜利更可靠。毛泽东不知道斯大林的信任能够持续多久，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弄到尽可能多的资助。北京设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本比莫斯科的还要夸张，给苏联造成的压力超过了朝鲜战争。斯大林不得不压制门徒的积极性，毕竟此后要由他负责买单了。颠覆者的成功意味着统治者的

负担，对苏联国力的损耗比失败更大。¹⁰²

五十年代，中苏签署了七项协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四项协定当中，包括苏联援建的四十三项大型军工项目¹⁰³。除了资金、设备和技术资料以外还有苏联专家顾问的对口支援¹⁰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个项目当中，共有一百六十项进入实际施工，其中118项在内地，沿海只占21%，背靠苏联老大哥的布局非常明显¹⁰⁵。苏联为周恩来的货币改革印制人民币¹⁰⁶，修建中蒙铁路¹⁰⁷，出版《长征回忆录》¹⁰⁸。1952年，斯大林给毛泽东提供了20个师的装备和450架飞机。“三反五反”在苏联大使罗申的监督下开展¹⁰⁹，“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斯大林本人的指导下制定¹¹⁰。美国主导的新条约体系将“中华民国”解释为“金马台澎”，将东亚大陆视为法律保护范围以外的蛮荒，排除了北京和东京签署终战和约的可能性¹¹¹。非缔约者从法律上讲不是缔约各国的敌对国家，而是人人得而诛之的outlaw。老大哥应周恩来的恳求，推迟了撤出旅顺口的时间，以防日本人或其他人据此行使卷土重来的战争权力¹¹²。

柏林危机固定了欧洲的冷战边界，朝鲜战争固定了东亚的冷战边界。美国抛开苏联占领区和卫星国，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北约；抛开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签署了《旧金山条约》¹¹³。苏联得到了东欧和东北亚，却失去了统一战线——不仅自己失去了来自资本主义的输液管，还需要自己给卫星国输液。国际体系大体上回到1920年代的状况，共产主义世界回到麻风隔离区。赣南苏区和华北根据地的困境在远东更大范围内重演，苏联的支援和征服资产阶级的战利品只能稍稍延长挤干橘子的时间。周恩来、李维汉、冀朝鼎根据苏德拉巴洛合作¹¹⁴的剧本，策划了1952年莫斯科经济会议。希望通过东欧国家的媒介，绕过联合国的禁运，打开西欧和前殖民地的贸易渠道¹¹⁵。这些途径都无法长期畅通，事实证明只有香港才能承担共产主义输液管的任务¹¹⁶。

社会主义阵营在东亚的形成，断绝了同盟国一起签署对日和约的可能性。铁幕截断了半个远东，也使得美国获得了另外半个远东的行动自由。《旧金山条约》解决了日本投降以后的远东秩序问题，将苏联统治区逐出国际社会。蒋介石政府既不愿意放弃，又不能够统治亚洲大陆，因此陷入尴尬的境地，无法跟其他盟友同时结束战争状态。约翰·杜勒斯和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森达成谅解：“媾和条约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履行签署手续（即不邀请任何一方的中国代表参加媾和会议。日本今

后对中国的态度，将在日本拥有主权、获得独立之后，由日本自己决定。）”¹¹⁷“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条约本身不能决定这些岛屿的未来。”¹¹⁸1951年12月，《吉田书简》根据《杜勒斯草案》提出：“日台双边条约适用于中华民国政府现在或将来控制的全部领土。”¹¹⁹蒋介石政府的谈判代表叶公超担心，“or”可以解释为：条约适用范围是在现在统治的台湾和将来统治的大陆之间选择其一¹²⁰。然而，他没有更好的选择。蒋介石政府如果拒绝签署《对日和约》，就只能以盟军代表的身份继续占领台湾。其他盟国结束对日战争状态以后，台北政权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战争权力统治台湾¹²¹。1952年4月28日，《台北和约》签署。文明世界的成员和Outlaw（法外）世界互不承认，前线从朝鲜延伸到海峡。板门店形成了没有条约效力的正式停火，金门连正式的停火都无法形成。

二、1954年体制的巩固和演变，宪制适应格局

本节引言：

苏联为了支持朝鲜战争，为北京和平壤建立了完整的计划经济体系。红色中国根据自己在冷战当中的位置，确立了建国初期的斯大林体制。朝鲜战争启动了远东的全面冷战，推动了农村和城市的社会改造。土地改革摧毁了农村的有产阶级，三反五反摧毁了城市的有产阶级。朝鲜战争结束后，远东冷战边界凝固在板门店和金门岛之间。莫斯科和华盛顿达成了保持现状的默契，分别约束北京和台北的冒险主义。毛泽东制造金门岛危机，企图绑架赫鲁晓夫。蒋介石压制台湾本土势力，以免他们在美国和日本的保护下卷土重来。

1. 美国保护台湾

五十年代中期，美国社会的主导情绪是：“我们上当了”。美国为了建立威尔逊主义世界秩序所需的高信任度，主动放弃了现实主义外交不必也不会出让的巨大利益，苏联却卑鄙地利用了美国人的慷慨和天真，吞噬了东欧和东亚的广阔缓冲地带。麦卡锡参议员虽然鲁莽灭裂，但麦卡锡主义整体上发挥了健康社会的免疫应激作用：统一战线时期潜入要津的共产党代理人一旦曝光，就会发现在社会中多么孤立。艾森豪威尔总统未能实现“推回”共产主义的承诺，但美国公众已经决心不准悲剧重演。

1954年1月12日，国务卿杜勒斯在《外交政策的演变》演讲中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纽约时报》十年前还在高谈统一战线，现在却像1944年的蒋介石一样充满猜忌：“用最明确的语言告诉中共和俄国人，今后无论在朝鲜、印度支那、伊朗还是其他任何地方发生新的代理人战争或灌木丛火灾式战争，美国都可能立刻用原子武器对苏联和红色中国进行报复。”¹²²

毛泽东一面公开发表《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955年1月28日），一面向苏联索取原子弹技术¹²³。赫鲁晓夫太轻易地同意了，反而唤起了毛泽东的觊觎和轻蔑之心，但刘少奇、周恩来和彭真仍然掌握党的安全体系，继续向苏联老大哥汇报党务工作¹²⁴。1954年宪法是中共中央根据

苏共中央修改意见制定的，概括和总结了满洲-朝鲜战争体制¹²⁵。

美国人坚定的敌意和苏联人坚定的支援将1955年边界两侧的所有政权固定在冷战轨道中，迫使他们根据冷战的需要巩固宪制和积累资源。1955年3月24日，国务卿杜勒斯对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强调：过去六十年来，台湾并不属于中国。美国从日本手中夺取了台湾，而“北平当局自以为是地要求我们应将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的领土，由我们移交给一个公开对我们持有敌意的政权。”¹²⁶4月底，饶伯森¹²⁷致电杜勒斯：美国的许多盟国和美国部分舆论赞成在签订对日和约的四十八个国家保护下，将台湾中立化¹²⁸。1955年4月26日，国务卿杜勒斯宣称：美国不会在没有台湾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他们的权益和他们的要求；举行正式谈判，并不代表承认北平。苏联通过《苏联代表团在日内瓦四国会议上的立场》，企图利用朝鲜战争停火和战俘问题，为毛泽东政权争取外交空间的努力，遭到国际社会的全面抵制。周恩来对“北平”一词深恶痛绝，不亚于杜勒斯拒绝握手¹²⁹。他在此后的二十年一直致力于抹去苏联驻外情报首脑的公众形象，但只能满足于“边界两侧各自表述”的现实。

蒋介石政府痛恨美国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亚于痛恨苏联人和他们的朋友。他们力图将冷战保护伞解释为大中华的空头支票，但同样只能满足于“党内党外各自表述”的现实。无论威尔逊主义多么强调平等，弱者毕竟很难绑架强者。台湾仕绅的孑遗撤退到宗主国日本，成立了廖文毅领导的台湾共和国政府。台北政府极力阻止美国人接触台湾本土精英，但未能如愿以偿。1955年，美国国务院准许廖文毅入境¹³⁰。这是针对国民党流亡者的明确警告，蒋介石只得默默咽下耻辱。

国务院在1956年8月发布了《台湾独立运动：1683-1956》，相当精确地描述了国民党的政治德性和未来命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主张台湾从日本独立出去。但是在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退往台湾之后，共产党人开始宣称‘解放’台湾是完成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美国干预朝鲜事务和美国的第七舰队奉命维护台湾的中立以后，共产党人的‘解放’主题才再加修改，包括了强调中国对台湾自古以来的所有权的主张……绝大多数的大陆籍人并不是特别容易接受共产主义，但共产党号召的民族主义对他们的吸引力变得越来越大……在没能光复大陆这件事上，政府倾向于把责任推到美国人身。这增加了官方授意的在美国驻台军事基地进行示威和暴动的可能性。政府控制的媒体不断宣传，因为美国没能给国民党人足够的支持，才造成了久久不能进攻大陆的局面。”¹³¹苏联同样看清了美国人对岛内自

由派、第三势力和台独流亡者的友善态度，然而冷战的天花板约束阻止了这些纠葛浮出水面¹³²。

2. 毛泽东挑战赫鲁晓夫

1956年，苏联进一步扩大了东亚大陆的基础建设规模¹³³。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被转让的米格-19、图-14和四种战术导弹是当时苏联的最先进产品，打破了斯大林时代的惯例。苏联还提供了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¹³⁴。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前夜，赫鲁晓夫移樽就教¹³⁵。苏联接待毛泽东的礼遇，为斯大林时代所未有。

赫鲁晓夫无疑有施惠的用意，毛却以为自己的地位已经上升到“辅佐幼主的元老”级别。他在各国共产党领袖面前肆无忌惮地谈论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的斗争，暴露了王车易位的不轨之心。米丘诺维奇¹³⁶回忆当时的场面：“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绝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¹³⁷

卡德尔¹³⁸目睹了当时的场面，预见到“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共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¹³⁹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纪念讲话中提出，苏联要在十五年内超过美国。毛泽东不甘示弱，随即提出中国也要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哥穆尔卡¹⁴⁰明确表示，他一点都不相信这种可能性¹⁴¹。“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计划直接源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权的斗争，任何国内因素都不得不随之调整¹⁴²。挑战和被挑战对象的不对等关系，足以显示中心和边缘的差序格局：苏联位于英美的边缘，企图挑战英美；北京位于莫斯科的边缘，企图挑战莫斯科。前一种挑战已经开始数十年，冷战就是世界革命的自然延伸；后一种挑战产生于前一种挑战，证明世界革命无法在革命阵营内部建立世界新秩序。

始于1958年8月23的金门炮战危机进一步暴露了华盛顿、莫斯科、北京的层次差异，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公开分裂，写下了1972年外交革命的序曲。8月29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准备对毛泽东的军队使用核武器¹⁴³。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决定，不向国民党人通报该计划。9月2日，美国军方向国务院解释拟议的核战争计划和核弹头清单¹⁴⁴。华盛顿释放

的信号是：一面要断绝苏联继续侵略的侥幸心理，一面要断绝国民党复活大中华主义的侥幸心理。美国凌驾于所有各方之上，保持最大限度的决策自由，向盟友体现“不轻易承诺，但所做多于所言”，向敌人体现“不轻易警告，但随时都有能力说到做到”。苏联看到美国人的反应，断定“北京打算借助这种行动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借助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¹⁴⁵

赫鲁晓夫无法向美国人解释自己并不知情，觉得毛泽东让他吃了哑巴亏，这种判断相当可靠——共产国际在抗战前夜和抗战时期就是这样陷害国民党的，蒋介石如果惩罚名义部下的越轨行径，就会暴露自己冒充和珍惜的大中华领袖身份其实有名无实；如果拒绝惩罚肇事者，就得在兴师问罪的强邻目前代人受过。他无论如何选择，都只能吃暗亏。毛泽东喜欢天下大乱，因为乱局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窗口。资产阶级讨厌天下大乱，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流民英雄（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东亚版）最喜欢天下大乱，因为资产阶级的损失总会比自己更多。流民既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失去，又不像资产阶级（体面人士）那样不习惯挨打和丢脸。流沙社会的胜利经常属于最不要脸和最不怕疼的流民英雄，因为他们顺应了所在文明崩溃没落的大趋势。欧洲人、甚至斯拉夫人即使无产阶级都难以理解厚黑学的精妙，但梁山好汉及其军师几乎生而知之。实际上，厚黑策略只有两种破解之道，其一是斩草除根的屠杀，毛泽东就用这种手段消灭了自己的同类和竞争者；其二是麻风病隔离式的“三不政策”，体现了蒋介石长期痛苦经验的智慧结晶。

苏联最终不得不采取类似“三不”的政策，如果不考虑华盛顿妨碍他们核平北京的因素，主要就是证明了世界的差序格局。苏联在欧洲面前是无产阶级，在东亚居然变成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最初总是委曲求全的，因为他们害怕损失原先的投资。“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权威对赫鲁晓夫相当重要，不亚于“中华民族唯一领袖”的权威之于蒋介石。苏联继续满足周恩来永无止境的需索，将米格-19C歼击机和C5导弹交给北京¹⁴⁶。赫鲁晓夫首先在美国人面前保护毛泽东¹⁴⁷，然后在自己人面前批评毛泽东¹⁴⁸。这种做法太像抗战时期的蒋介石，无异于向流氓无产者暴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软弱性”。

毛泽东立刻拿出了斯大林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对付蒋介石的策略，谴责最高领袖在帝国主义面前软弱无力，他1959年12月在内部会议上评论说：“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帝国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¹⁴⁹这种轻蔑的态度暴露了他的隐秘心理：列宁主义实质是欺骗和陷害资产阶

级的秘传心法。革命以后上台的晚辈像注定失败的资产阶级一样天真，没有资格继承列宁和斯大林的衣钵，虽然拥有资产阶级盲目信任的物质资源优势，肯定斗不过列宁斯大林心法的真正传人。他显然认为铁的事实已经证明自己才是斯大林的知音，跃跃如也之心溢于言表。《红旗》和《人民日报》随即通过《列宁主义万岁》的檄文，发出了“鼎之轻重可问”的明确信号。

毛泽东根据长期和痛苦的江湖经验，早已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善意的馈赠，强者必然为所欲为——斯大林和蒋介石在他们有能力主持鸿门宴的时候都没有错过机会（例如蒋介石以为立法院长胡汉民没有兵权，将他扣押，然后在广州的军事压力下，又将他释放。斯大林在消灭老布尔什维克以前，满足于驱逐托洛茨基出境，消灭了国内的派系以后，就要把流亡的托洛茨基斩草除根）。善意是软弱的信号，苛刻则是强大的同义词，如果有人突然从苛刻转为友善，肯定是因为实力大损或地位不稳。这时恰好最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莫沾虚名学霸王”。

3. 流沙社会与赌徒策略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策略仅仅适合稳定的阶级社会，适用于同侪之间的长期博弈。流沙社会的江湖枭桀没有固定的阶级或身份，一切都取决于天赐良机和捕捉利用机会窗口的果决。冒险家如果对强者以牙还牙，就会自取灭亡；如果对弱者将心换心，就会坐失良机。充分的消息通常只会在机会窗口关闭以后出现，因此胜利通常属于能够依据最少信息做出最快决断的一方。机会窗口才是江湖社会的最稀缺资源，因此迅速而错误的决断优于迟钝而正确的决断。赌徒不为枭桀，即为刑徒。懦夫永远为人鱼肉，不会在食人乐园的历史上留下泡沫。在博弈长期稳定的阶级社会，保守主义策略（播种者或建设者）优于赌徒策略和懦夫策略，但在流沙社会内部，它则跟懦夫策略没有可见区别。流沙社会即便仍然存在远古残留和外界输入的信任、希望和善意，也会在冒险家的博弈当中迅速消耗殆尽。

毛泽东没有发明这个社会，只是不幸生在这个社会。他关注无数缺乏幸运或决断的无名毛泽东，不会超过儿童关注消失在母亲子宫门口的无数精子。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的理由，其实就是拉登反对美国的理由。如果强者没有使用力量的意志，看上去就像弱者。暴行可以因强大而获得欢呼，善意必然因软弱而收获污蔑。毛泽东和拉登发现自己的误判，都

已经为时太晚。他们最后的机会就是将错就错，尽可能传播和繁殖自己的错误，在自己和毁灭之间，部署尽可能多的追随者。

赫鲁晓夫和美国人人都不能充分理解，理性决策仅仅是稳定预期的产物。毛泽东既然已经决定问鼎东方，自然就要在革命的积极性方面超过修正主义者；正如他上次问鼎东亚，就要在革命的积极性方面超过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经济要服从政治，小局要服从大局。长期利益需要虚构的稳定环境，不如短期的涸泽而渔策略能够满足或创造宝贵的机会窗口

（“天下大乱”）。土改在经济上无异于自杀，但华北根据地早在土改以前就已经每况愈下了；政治上，土改不仅能够掩饰过去的失败，还能通过短期汲取动员的优势，利用满洲和上海的战利品收益，弥补华北社会的生产力损害。人民公社在经济上同样乏善可陈，但统购统销政策同样早已无法延续了。而政治上，人民公社一举解决了散沙小农分别征敛成本高的问题，实现了民间资源向中央的进一步转移。落后的东亚向相对先进的东欧挑战，自然要承受更大的牺牲，但如果错过“土豆烧牛肉”庸人送上门来的机会窗口，无异于为窑洞而牺牲黄浦江¹⁵⁰。

4. 一九六〇年代的逆袭

毛泽东的智力并没有在1960年代突然降低，倒是自作聪明的批评者陷入了外围群众专用的欺骗性认知图景。如果你对照1940年代的东亚战争地区和1960年代的世界革命战场，就会发现毛泽东在这两场超限战当中的地位和战略没有多少差异。赫鲁晓夫和蒋介石除了实力和领地的差异以外，所处的格局和战略也是极为相似的。真正的差异在于美国人的格局和战略与日本完全不同，大略相当于日本处在一个只有东亚的世界上，致力于本国和盟国的建设和发展，对层次远远低于自己的挑战者采取隔离政策，坐待后者油尽灯枯（局部战场的相似性尤其明显，六十年代的敌后根据地重蹈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覆辙。斯大林和满洲的资源及时输入以前，八路军的处境非常接近六十年代的马来人民解放军和北加里曼丹游击队）。赌徒策略通常会导致小概率的异常胜利和大概率的频繁失败，但赌徒名垂青史的机会肯定远远超过不赢不输的庸人。

东亚地区的大多数居民作为斗争所需的资源，命运就此注定。具体的政策有错误，并不是不能纠正或改进，具体的干部有错误，并不是不能罢免或纠正。然而，目标已经决定了代价的数量级，代价分布的具体方式不会影响基本盘。沙皇不需要乌克兰农民饿死，因为他的野心仅限于巴

尔干的斯拉夫人。世界革命战略的目标越宏伟，命中注定的饿殍就越多。1960年代的逆袭目标遍及全世界，对1954年宪制提出了空前的考验，大批农民只能原地饿死，红色中国通过了列宁主义的质量标准（历代王朝在远为轻微的考验面前，就因为流民的冲击而垮台了）。毛泽东的优孟衣冠造成了东方皇权复活的幻象，然而组织力量才是真实宪制的核心。儒法国家的碎片可以作为点缀存在，但动员和汲取的强度都达不到列宁主义组织的及格标准。领袖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不会认错真正的力量和真正的威胁。

毛泽东不是创造者列宁，也不是组织者斯大林。他是组织的后来者和陌生人，像野蛮人面对复杂的机器，既不能离开组织的服务，又不能信任组织的忠诚。因此他格外需要保持进攻性姿态，以免清晰的阵线暴露自己的孤立和脆弱。他掌握格局的能力高人一筹，擅长游走于危险边缘。混乱能够破坏组织对领袖的柔性规训，消耗组织或社会积蓄和沉淀的力量。乱局即使对他不利，也总是对他的潜在威胁者有更大的妨害。周期性的运动将一代又一代重新凝聚的核心打散，将社会保持在软弱和猜忌当中。针对苏联的挑战绑架了党内的列宁主义者，使后者无法名正言顺地架空领袖。他运用流民，得心应手。后者虽然成（领袖之）事不足，终究败（他人之）事有余。老列宁主义者和新技术官僚一旦形成组织上的结合，他的末日就会来临。刘少奇恰好代表了这种危险的结合，他自然要翦除隐患。

毛泽东篡夺世界革命领导权，完全重复了他篡夺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布局 and 策略。他的反戈一击将苏联置于蒋介石的生态位，两位前领导的真实历史地位都会将毛泽东置于尴尬和屈辱之中。世界革命的逆袭即使没有成功，至少也发挥了重构党史一革命史的功能。毛泽东只有在自己摆脱了红色石敬瑭的地位以后，才能锁闭老列宁主义者重返红色满洲国的路径。梁山系统对组织力量的嫉妒、散沙社会对征敛屠杀的恐惧、前朝余孽对苏联夙敌的怨毒，经过巧妙的感情炼金术，从不同角度将能量注入1960年代的逆袭。苏联发现自己三十年前陷害国民党的手段，通过自己殚精竭虑养大的逆子，像飞去来器一样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数十年来第一次，他们不得不防御和自辨。“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事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扩大国际联系用于推广自己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观点相矛盾的特殊观点，以很不正当的方式把一部分兄弟党吸引到自己一边，以便排挤苏共并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¹⁵¹“苏联坚决反对把和平共处理解为：维持国家内部的某种‘原状’和拒绝支持

民族解放运动。在一系列针对苏共的污蔑性攻击中，中共领导人的主要谬论之一在于，苏联所执行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似乎意味着其忽视了各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利益，并号召‘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和平共处。这里不妨指出，中国领导人对和平共处的有意曲解，实质上与帝国主义集团对和平共处原则的理解没有任何区别。”¹⁵²这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语言就是说：“和平共处”和二十年前的“统一战线”一样，仅仅意味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单方面和平。无产阶级继续保持革命的权利，资产阶级放弃反革命的权利。北京恶毒地污蔑莫斯科有意遵守协议，完全不符合事实。

5. 世界革命的失败与文革

1960年代的世界革命在内部重演和放大了1935年和1943年的格局¹⁵³，从人民公社走向文革。土改和查田的收割对象其实是共产党统治期间产生的新富农（无产者的简单积累），旧中产阶级大多数早已在根据地建立时逃亡或毁灭，最上层残留的统战花瓶寥寥无几，在资源收割的意义上可以忽略不计。新富农（例如毛泽东在延安统战时代的宠儿吴满有）仅仅勤劳而贪婪，没有文化和远见，从来不是秩序生产者和社会凝结核，甚至指望搭共产党秩序的便车，无需经过长期细致的孤立、分化和切割、除根，就能轻易汲取和消灭。1960年代的新富农、知识分子、走资派官僚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实际上他们全是体制的产物。如果说章鱼会在严冬吃掉自己的肢体，党在收割殆尽的时候就要吃掉自己的外围。

问题在于，亚非拉没有第二个满洲国。北京仅仅在东南亚放的冷枪就比卢沟桥多几百倍，却没有把第二个蒋介石拖下水。同样的病毒在产生新的变异以前，不大可能造成两次瘟疫。冷战时代的危机管控机制已非萨拉热窝或卢沟桥时代可比，毛泽东本来早该在第二次金门危机的时候就明白的。印尼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的不同命运已经预示了逆袭的失败，毛泽东没有足够的资源扮演东南亚革命的斯大林。文革前夜，美国人断定毛泽东败局已定。“两年（1964）前，北平看来是成功地迈出了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拥有直接能挑战莫斯科支持者的步伐，现如今，尽管中国人仍然拥有少数支持者，但很明显，在影响力方面，莫斯科占了上风，中国对苏联领导权造成的重大威胁已不复存在。北平所能指望的，只剩下阿尔巴尼亚、新西兰共产党，以及若干从个别党中分裂出来的小团体。”¹⁵⁴

毛泽东的经验告诉他，领袖不能承认错误。学究意义的正确和错误无足轻重，关键在于不能放出示弱的信号，否则时刻盘旋在他头上的秃鹰就会群起而攻之。他把重整计划经济的任务让给了刘少奇，已经感到卧榻之忧。共产国际的惯例是：每一次改变政策，都要肉体消灭原先政策的执行者。他在五十年代末期反戈一击，却没有及时清洗掉苏联留下的班底，只是批斗了一小撮轻如鸿毛的小人物。斯大林绝不会冒这样的风险或是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如果世界革命一路凯歌，他或许可以指望挟胜利之威慑服反侧。失败需要替罪羊，关键在于谁先下手为强。

仅仅从党内的人事布局就可以看出，红卫兵其实大大低估了苏联班底的威胁。伟大领袖与其说睡在一个赫鲁晓夫身边，不如说睡在一群赫鲁晓夫当中。毛泽东要想成为东亚的斯大林，就必须清除在他当权以前就已经位居要津的苏联代理人。

从美国人的报告看，他并非没有这样的警觉或意图。政治安全机构在1965年其后经历了全面洗牌，中央社会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公安部都陷入瘫痪。¹⁵⁵1967年，政治安全部门落入康生、谢富治和汪东兴之手¹⁵⁶。然而这些人当中，只有汪东兴勉强可以视为毛的私人班底。康生和叶剑英寿终正寝，毛氏宗族不得瓦全。伟大领袖始终忌惮周恩来，却只能以非人的隐忍等待满腹秘密的红蜘蛛自然死亡。

所有这些迹象都暗示：即使在文革的最高峰，伟大领袖的真实处境仍然谈不上安全。梁山将领、激进文人、拜神群众的支持都不足以抵消或替代列宁主义者的班底，因为毛泽东统治的体系已经不是古老的王朝。列宁主义政权需要特殊的组织和干部，秦政文法吏、江湖枭雄、文人生员在技术意义上都无法胜任。毛泽东陷入了武则天晚年的困境，只能在恐吓和羞辱干部以后，重新把他们放在原有的位置上。政治做法多么危险，久经考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不可能看不到。然而上官婉儿和宋之问即使能够历练到独当一面的层次，武则天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了。毛泽东任用华国锋，在权术的意义上酷似武则天命令李家和武家子弟盟誓不相仇杀。枭雄老矣，力不从心，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6. 大中华主义在台湾失败

国际共产主义体系像传说中的养蛊密室，通过匮乏的资源和激烈的斗争，筛选出吞噬同类的胜利者或幸存者。冷战前线的另一方大体建成了

威尔逊主义实体的幼苗温室，用集体安全体系保护了前近代社会最敏感脆弱的转型期。远东体系以旧金山诸条约为基础，以日本为政治和地缘的拱心石。吉田政策实际上相当于日本版的“一边倒”，利用国际新秩序锁定了日本的国内宪制。民主政体在美国主要是一个宪法解释问题，在日本主要是一个国际体系定位问题。冷战时期的远东各国大抵形成了以美军为宪法仲裁者的习惯法体系，然后根据这个习惯法体系塑造自己的成文宪法。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国家建构一宪制演化—国际博弈交错互动的局面，在东亚表现得格外明显。由于冷战边界穿过金门海峡，台湾的宪制经常像试纸一样敏感。日本对战前的殖民地和战后的重要水道非常关注，但战败国的身份使他们格外谨慎。1961年3月17日，日本政府制定了《日本的中国政策》：“美日两国的中国政策，在将台湾留在自由世界的同时，扩大与中共的交流方面，基本政策是一致的。日美间所不同的是，美国与中共坚决对立，而且台湾已处在美国的军事庇护之下；而日本由于内外条件所限，不能采取刺激中共的政策。同时对国民政府，日本的影响也很有限。因此，日本的中国政策不得不以低姿态出现。”¹⁵⁷佐藤荣作认为，台湾“不是中国的国内问题。”¹⁵⁸

其实更简捷的表述方式应该是，中国想象本身就是冷战塑造的产物。国民党需要把自己塑造成坚定的反共斗士，将自己和苏联长期而复杂的暧昧关系从记忆中抹去，以此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共产党需要将曾经见证革命的几代人从现实中抹去，在一张白纸上发明一代新人，以此斩断和抹黑东亚—内亚诸文化的历史及其正当性。神话理应实现自欺欺人的效果，但经常只能实现前者。中国概念的功利性及其载体的投机性，在美苏双方的内部材料中暴露无遗。1961年6月20日，中央情报局发布了《对中华民国政府前景的预测》。报告将台湾人分为四类：数百名中国领袖，一百五十万中国民众，一千多万台湾民众，十八万土著。只有第一类人渴望光复大陆。第二类人最容易受到共产党诱惑而多少有些自愿地与北京和解。第二类人和第三类人的关系将会日益紧张¹⁵⁹。1945年12月29日，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正如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耍手腕一样，蒋经国作为昔日的联共（布）党员，也想在蒋介石和我国之间耍手腕，他会把自己装扮成苏联的无私朋友……蒋介石的亲信并不喜欢蒋经国，不仅因为后者以前是左派，而且因为他是蒋介石政治遗产的觊觎者。事实上蒋经国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丝毫不能和宋子文那样的生意人和政客相比。”¹⁶⁰

明眼人不难看出，冷战时期的中国想象实际上是给威尔逊主义需要的台湾冷战政权敷一层糖衣。国民党政权残留的列宁主义和大中华主义成分

太多，需要根据冷战自由主义的标准修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最后挣扎非但不能代表冷战体系的需要，反倒让新三民主义者得以拖延体面失败的结局。1960年，胡适对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Everett F. Drumright）表示：党外精英即使在雷震入狱后仍然没有放弃组党行宪的努力，他们的运动背后还有副总统陈诚的暗中指导。蒋介石用“反攻大陆”的紧急动员需要化解了国民党上层的反抗暗流，然而台湾本土人士对“反攻大陆”从未如此缺乏兴趣和动力¹⁶¹。

美国情报结构认为这样的军事行动没有美国的大规模援助是不可能胜利的，然而美国的压力可能会将北京重新赶进莫斯科的怀抱。肯尼迪政府要求蒋介石政府说明增加军费的性质和内容，否则就重新审查援助计划¹⁶²。1962年6月22日，哈里曼-杜布里宁谈判达成了苏美双方共同维持台湾海峡现状的默契¹⁶³。蒋介石不得不让步，1963年以后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准备¹⁶⁴，我们如果考虑到人民公社时代涸泽而渔的动员和汲取，就不难得出结论。蒋介石要么以类似的残暴和彻底准备战争，要么就会因为汲取能力不足而无法实现战争目标。如果蒋介石仍然像三十年代一样独立自主，很可能会做出类似抗日战争的选择，无论能不能得到名义上的胜利，台湾本土经济都会落到类似上海在二三十年前的下场。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美国的约束都挽救了台湾幼弱的资本主义。

蒋介石以这种方式拖延转型，对流亡者内部的自由主义者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他们原先的社会关系网留在亚洲大陆，无根的花朵只能消耗枝叶残留的最后一点能量。六十年代的挫折夺走了他们最后的机会，今后的命运唯有凋零。蒋介石的土改虽然瓦解了台湾原有的社会凝结核，使流亡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占据了本土精英的生态位，但冷战体制迫使列宁主义的学徒模仿威权主义，因此无法遏制本土社会通过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新一代精英。台独活动长期以日本为大本营¹⁶⁵，原因同样在于《旧金山条约》体制给日本设置的框架性约束¹⁶⁶。池田勇人首相和小坂善次郎外相推动一中一台最为积极，在1961年6月的首次日美首脑会谈中警告肯尼迪总统和腊斯克国务卿：国民党领导人有深厚的苏联背景，将来并非不可能重演国共合作；美国应该敦促台湾政权，放弃声索中国主权的幻想¹⁶⁷。美国则根据“继承国家论”，提出了“简单双重代表权方案（台北继承安理会席位并接受北京加入联合国大会）”¹⁶⁸。这种做法非常符合美国宪制将政治问题法律化的习惯。中世纪的古老自由通过美国的种子银行，正在发育为世界秩序。

三、反殖真空地带的颠覆与反颠覆

本节引言：

殖民主义撤退遗留的真空，为共产主义的渗透提供了条件。共产国际以香港和广州为基地，渗透印度支那。蒋介石政府援助越南国民党和共产党，加速了胡志明的胜利。蒋介石溃败后，斯大林将亚洲各共产党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干涉越南，协助胡志明赶走了法国人。北京和莫斯科关系恶化，使东南亚变成双方的战场。北京为了排挤莫斯科，加大了对越共反美战争的支持力度，渗透泰国、马来和印度尼西亚各地，发动游击战争。随着政治真空的消失，共产主义在1970年代越过了最高峰。

1. 胡志明的崛起

耶稣会士罗历山在越南传教（1620-1649）期间，为土著创立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越南国语”。他撰写了《拉丁-国语天主教教义问答》和《拉丁语-葡萄牙语-越南国语辞典》，奠定了现代越南文化和认同的基础。1923年，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废除汉字。国语普及教育展开后，殖民地居民的识字率高达98%，在远东名列前茅，为越南共和国（南越）日后的经济起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¹⁶⁹。

1923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为远东的革命培训了年轻学员里诺夫·胡（后来改名胡志明）。1924年，季诺维也夫统治的共产国际派他到广州实习国民革命。他获得革命组织经验以后，又奉命去暹罗建立当地的国际支部，结果恰好错过了蒋介石和李济深的“清党分共”。1929年，他奉命在香港建立越南支部。共产国际每月发给越共五千法郎，将寮国和高棉的民族支部建设工作委托给他们。国际对里诺夫同志的工作很满意，接下来派他去马来联合邦和海峡殖民地播种，最后任命他为远东局主管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地区的代理人。1930年，他组织的革命遭到法国外籍军团的毁灭性打击。1933年，里诺夫同志逃回苏联。此后五年，他在列宁学院研究伟大导师的殖民地革命策略。国民党联苏抗日的策略打开了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北方门户，给他提供了新的机会。1938年，里诺夫同志来到滇桂边界。桂军和粤军（尤其是胡志明和叶挺的老朋友张发奎）长期通过汪兆铭系统和克格勃法国支部联络苏联，又对华人团体密集的东南亚各邦怀有大中华主义的暧昧感情，将里诺夫同志视为国民党北越

支部建设的好帮手。

越南独立同盟会的成立既是国民党和越南国民党的胜利，又是苏联和越南共产党的胜利。法国在欧洲战败后，无力抵抗日军的进驻，也暗中纵容越盟建立武装，以免让日本人占尽便宜。日本完全占领印度支那以后，盟军开始全方位地支持敌占区的抵抗组织。美国战略情报局送往越南的大部分军事物资，都落入独立同盟会之手。里诺夫同志依靠这些资源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抓住日本突然投降造成的短暂窗口，率领少数人马和几位战略情报局特工闯入河内，宣读了一份酷似《美国独立宣言》的文字，希望给群龙无首的观众造成错觉，以为他是盟军派来接收的大员。甚至保大皇帝都一度相信他的宣传，愿意将政权交给冒名顶替的盟军代表。其实盟军已经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和英国军队分别负责越南北部和南部的接收工作。

事实证明蒋介石军队在北越的活动对越南独立同盟会非常有利，不亚于他们在卫立煌战区的活动非常有利于晋察冀边区。国民党急欲支持他们在印度支那的小兄弟，尤其急欲打击殖民主义的余威，大肆抢劫和清洗法语教育和天主教会培养的越南上流社会，把主要城市的管理职位交给越南国民党人和独立同盟会员。两者都由少数开明绅士和大量共产党员组成，跟国民党在中华民国和马来华社的组织非常相似，发挥的过渡作用尤为神似。国民党后来抱怨说：苏军把满洲的资源留给了共产党人，将他们晚来一步的接收部队置于绝地。其实，他们自己在越南就是这样对待法国印度支那政府的。

蒋介石的军队刚刚撤出越南，里诺夫同志就对过期统战对象大开杀戒。越南国民党领袖阮世业(Nguyen The Nghiep)、阮玉山(Nguyen Ngoc Son)首先遇害，整个国家像熟透的桃子一样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其他“民主党派”几乎与此同时落到相似的下场，革命在其新阶段镇压的对象包括：越南宪法党领袖裴光昭(Bui Quang Chieu)，越南南方保守派领袖胡文珩(Ho Van Nga)，大越南党领袖张秀英(Truong Tu Anh)，越南托洛茨基派共产党领袖谢秋收(Ta Thu Thau)，越南民族联合阵线领袖阮文声，和好教领袖黄富楚，广南省省长吴廷魁，保大皇帝驻东京（北越）地区代表张霆知(Truong Dinh Tri)和元老名士范琼。越共安全部队和锄奸团在血腥的1945年和1946年，几乎将越南解放区的异己势力、天主教徒和富裕阶级斩草除根，甚至嫁给法国人的越南妇女都没有放过。后来建立越南共和国的天主教徒，大多数来自这次屠杀造成的难民。越南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在武鸿卿、阮祥三相继败亡以后，一蹶不振。法国接收部队

登陆后，将越共从主要城市驱逐出去，迎接流亡香港的保大皇帝返回西贡。皇帝根据1949年《法越协定》，宣布越南独立。于是，越南有了两个政府。

2. 毛泽东干涉越南

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要求毛泽东承担支援印度支那革命的任务。1949年10月，刘少奇接见了越共的求援代表阮德瑞和李班¹⁷⁰。1950年1月6日，刘少奇告诉苏联代表史白夫：“当前中国在边境的军事机构已经同越南民主政权建立了紧密的接触。”¹⁷¹同一天，刘少奇指示追击国民党残部的林彪部队：“对于越南人民和武装部队必须尽可能地提供便利和帮助，准许他们在需要和困难时进入中国国境躲避或借道通行，他们所需武器、弹药和粮食也应尽力帮助”¹⁷²。罗贵波（军委办公厅主任）、陈赓、韦国清率领的大批军事顾问在随后几个月进驻北越红区，为胡志明建立了越南人民军的基本构架¹⁷³。他们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至少为人民军建立和装备了九个师、一个主力团、两个炮团和大批地方部队¹⁷⁴。人民军的汽车、粮食和汽油都是由解放军提供的，各部队轮流到滇桂境内培训和休整¹⁷⁵。1950年3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批准了苏联外交部的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的利益，由中国大使馆代理¹⁷⁶。1951年5月，斯大林同意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社会主义联盟¹⁷⁷。毛泽东梦寐以求的共产党东方情报局虽然没有成立，但莫斯科至少已经默许缅甸、越南和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归北京领导¹⁷⁸。马列学院第一分院对东南亚发挥了莫斯科孙文大学的作用，学员一干部来自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和巴基斯坦的共产党。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初，也纳入东南亚各国范围。刘少奇任马列学院的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

1950年9月，陈赓和武元甲的联合部队打开了越南北部边界的道路。从此以后，法国人就陷入了蒋介石在满洲的窘境。艾森豪威尔一面要求法国人清算殖民主义残余，一面要求法国人抵抗共产主义。法国人对这种无利可图的义务巡逻兴趣不大，越来越倾向于以绥靖政策报复美国人的高调。德拉特将军退守红河三角洲的堡垒群，将大部分作战任务交给越南国军。越共绕道无力自卫的寮国，从背后攻击红河三角洲。法军围魏救赵，越过红河环形防线进击奠边府。北京用每月4000吨的军用物资支持武元甲发动消耗战¹⁷⁹。奠边府陷落后，法国人终于失去了耐心。尽管这场战场对德拉特防线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越共对永福的进攻一如既往

地败北，但巴黎的政治家预见到华盛顿会采取反殖民主义的策略，即使法国人在军事上打败了共产党，也会被迫把越南移交给美国人心目中的民族民主力量，因此不必为他人做嫁衣裳，狡猾地决定抢先一步退出，将残局扔在美国人头上。

《日内瓦协议》将越南一分为二，却没有切断越南和寮国-高棉的边境。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由此而生，将停战协议变成了笑柄。麦克阿瑟将军推测：莫斯科和北京决定让越共签约，是为了争取在河内建立正式政府的机会，而且得到红河三角洲的物资以后，渗透南方就会更加便利。由于美国 and 保大的越南国都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和周恩来的代表性，各方正式签署条约的可能性并不比朝鲜停战谈判更大。周恩来以娴熟的统战手段诱导各国代表正式签字，遭到杜勒斯国务卿严厉的拒绝。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份宣言，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北京分别表态赞同。美国人抽象地表示支持任何有利于和平的措施，但不肯承认谈判达成的具体安排。越共的地位相应地提升，但北京间接争取承认的努力完全落空。美蒋联盟重演了抗战前夜的史汀生主义（即美国政府在外交上拒绝承认满洲国，但默许国民在自负其责的前提下可以跟满洲国发生私人联系。蒋介石采取类似的政策，绝不承认满洲独立，但默许民间组织的非正式交流），将毛泽东变成了五十年代的满洲国皇帝，结果在印度支那造成了君臣倒置的奇特现象：毛泽东以胡志明的保护人自居，然而在国际社会和红色阵营的地位还不如胡志明。大多数国家同时承认南越（越南国和后来的越南共和国）和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后来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却只承认台北的中华民国。胡志明以斯大林时代的元老和越南的孙文自居，把中国同志视为晚辈和派系领袖。河内后来在莫斯科和北京的斗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先机已肇于此。当然，胡志明个人的姿态并不影响北越党国的性质。“1954年7月6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占领越南城市中心颁布了八点指示，本质上与1948年12月23日中共方面在类似形势下公布的指示相同。”¹⁸⁰越南版本的土改、镇反和国有化将残余的天主教徒驱向南方，在莫斯科和北京的支持下建立了计划经济体系¹⁸¹。

3. 南洋穆斯林社会的抵制

东南亚的形势不同于朝鲜半岛，国界线只存在于地图之上，各国都有大量的华人社团。国共两党争夺华社的斗争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开始，在冷战时期达到白热化程度。双方都致力于破坏华社加入国族建构或自行建

构民族的可能性，结果把华裔变成了土著反共运动和反殖运动的共同目标¹⁸²。陈平的马来民族解放军依托国共合作的抗日组织，在马来人当中毫无基础可言，又没有一条连接共产主义国家的边界，因此很快就一败涂地了。

穆斯林社会不仅难于渗透，而且敏锐地抓住了冷战的机会窗口，将反共、反华和国族发明结合起来，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马来西亚联邦是英国和穆斯林王公、地主合作的产物，印度尼西亚军政府则是美国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合作的产物。东古·拉赫曼和苏哈托里应外合，将南洋华人的希望和共产党人的希望扼杀在襁褓内。

北加里曼丹人民军政委洪楚廷在《漫漫求索路：北加里曼丹革命四十周年探讨（1950-1990）》序言回顾这段历史说：“在国际革命浪潮的冲击和鼓舞下，沙捞越解放同盟和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毅然负起时代的使命，坚决领导我国各族人民，开展争取自治独立的斗争。由于当时革命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我们经历的道路显得特别艰难、曲折和漫长。值得庆幸的是，中华文化和先进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直是指引我们前进的精神支柱。”1953年，松散的左翼组织“沙捞越解放同盟”成立。1956年，叶剑英宣布：“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沙捞越解放同盟”随即重演了从国民革命到苏维埃的剧本，将中央交给了毛派领袖文铭权、黄纪作。1965年，解放同盟正式改组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他们在毛泽东和苏加诺的支持下，展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丛林游击战。1973年，黄纪作率领主力向马来西亚政府投降。文铭权流亡中国，洪楚廷统率残部继续作战。柏林墙倒塌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相继瓦解。1990年，最后52名游击队员走出森林投降。

杜勒斯国务卿后来说，日内瓦会议重演了（罗斯福出卖蒋介石的）雅尔塔会议¹⁸³。河内得到红河三角洲的人力资源和中共两国的武器援助，建立了东南亚最强大的军队。列宁主义以例行的饥荒和暴行为代价，迅速将农村资源转移到军事部门。北越军队的人数超过南越三倍以上，民兵和大批地下恐怖组织尚不计入。吴庭艳的共和国推翻保大皇帝以后，在农村推行台湾式的土改，收编或镇压了各教派和豪强的军队，把权力集中到西贡，结果在农村留下了组织真空。北越完成社会整合以后，在1961年大举入侵寮国。高棉的西哈努克明白优势在哪一方，将东部各省让给北越，换取了北越对他镇压红色高棉的默许。胡志明小道穿过寮国和高棉，从三面伸入南越。湄公河三角洲继红河三角洲之后，变成了1946年的满洲。越共在日内瓦会议前渗入西贡附近时，必须跟错综复杂

的高台教、和好教和五花八门的地方豪强作斗争，因此没有取得明显的成绩。他们在六十年代初叶面对孤立无援的中央官吏，阻力明显减轻。南越每月发生上百起恐怖袭击事件，百分之六十的农村沦为游击区。

1963年9月，周恩来在广东从化召见越南、印尼等国共产党。他宣布，“中国是东南亚革命运动的大后方。我们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我们会以最大的努力来支持东南亚各国的反帝斗争。”¹⁸⁴仅仅从当时到情况看，印尼的革命似乎比越南更有希望——苏加诺软弱而动摇，吴庭艳坚定而强大。然而，他们依托的社会恰恰相反：西贡酷似1928年的上海，内陆腹地的泛儒家社会早已溃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独裁政权追求高效率的中央集权，消灭了潜在的曾国藩和郑明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更加彻底的列宁主义者打扫房间；爪哇的穆斯林社会在殖民主义的保护下发育成熟，比社会主义政府和革命军队强大得多。儒家士绅即使在其黄金时代，组织能力、保护能力和动员能力都不及伊朗的教法学家和印尼的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共产主义者在华人社会中如鱼得水，在穆斯林社会中却像灯塔一样孤立和暴露。南越的政变摧毁了吴庭艳苦心经营的干部体系，西贡以外立刻沦为战区。印尼军官团的武器装备不如南越，也没有吴庭艳兄弟模仿共产党建立的基层组织，然而穆斯林社团自发的麦卡锡主义足以抵消军政府的涣散和低效，屠华暴行其实正是民间排外反共免疫的副产品。并且，越南和印尼共产党的支持者和路线不同。双方都不会拒绝莫斯科和北京的援助，但偏重是一目了然的。越南共产党离不开苏联的干部党和唯武器论，而艾地的党却把人民战争的神话当真了。

4. 莫斯科和北京在河内的竞争

苏美博弈在明处，苏中博弈在暗处。1965年9月3日，中央情报局报告：“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似乎已经明确划分了在某些特定领域内各自向北越提供军事援助。这看起来并非是合作的结果，而是反映了他们之间越来越明显的竞争性。每个国家都在提供各自最有能力提供的东西，但没有一个尽其所能。很显然，北越觉得他们能够提供而且应该提供更多的援助。苏联的军事援助大多用于空中防御，主要是过去两个月里出现在北越的地对空导弹（萨姆导弹）装备。苏联人还提供了防空武器、精密雷达设备、一些全天候米格战斗机、8架IL-28喷气式轻型轰炸机，并且显然已经取代中国人来训练北越飞行员……在提供援助的共产党国家中，只有苏联能够提供足量的相对高级的设备。在苏联供应这些设备的

同时，中国人继续并增加了他们的常规援助。中国仍然是北越地面部队所需的小型武器和大多数装备的主要来源。而且，最近他们的作用扩大了。在过去的两个月，已经进驻北越的中国地面部队此时至少在后勤支持和工程建设方面发挥了作用。”¹⁸⁵“毫无疑问，在北越部署有限然而重要的苏联军队，无疑加剧了业已激烈的中苏对越南影响力的竞争。苏联表现出愿意很好地履行自己保护越南的诺言，使得河内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能够采取独立的立场在两个共产党伙伴之间进行挑拨。越南人几乎肯定会试图利用这种局面，提高北京和莫斯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水平。中国人本来希望在北越建立自己独有的势力范围，最近苏联的闯入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更重要的是，中国无法向北越提供苏联那样的先进设备。7月下旬，苏联萨姆导弹在北越的出现，标志着长久以来中国试图把苏联排除在外这一努力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一直在努力抵消苏联增加的援助。如我们已经提到的，6月中旬，一支很可能与后勤事务有关的中国军队开始出现在越南，并且一直在扩大行动。在一个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高级代表团访问北京后，双方于7月17日发表联合公报，强调为了共同打败美国，中国决定向越南提供新的无偿经济和技术援助。”¹⁸⁶

六十年代后期，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接近最高峰。“我们已经发现至少有五支，可能还有一两支中国军队正在进入北越。这些部队好像包括一个防空炮兵师、一个被怀疑是边境、海岸安全防卫师、一个铁道工程兵师、一个汽车运输团、另一个可能至少是团级规模的安全部队。”¹⁸⁷越南变成了冷战时代的凡尔登，吸引全世界的资源，直到玩家油尽灯枯或主动止损。越共一面在南越发动恐怖活动，一面在高棉和寮国积攒物资，准备真正的战争。

美国情报机构报告：“共产党正继续从柬埔寨获得大量的食品和其他非军事物资……许多满载食品和药品的船只正沿着湄公河一路北下，而这些物资就是供应给驻扎在老挝的北越军队的。尽管有报道称，这些船只受到了一些阻挠，但今年的运输规模看起来与1966年大体相同。”¹⁸⁸

越共1968年1月的“新春攻势”以十万大军进攻西贡和南越各地，付出了阵亡三万二千人、被俘五千八百人的代价，三分之一的地下党员牺牲、暴露和叛变。美军和南越军队只损失了三千多人，左派控制的舆论却大肆宣传美国政策的失败¹⁸⁹。约翰逊非但没有利用军队的胜利，反而下令单方面停止海空作战，不再谋求连任，同意跟北越和谈，结果配合了左派的宣传，将军事胜利变成了政治失败。

1968年9月8日，美国和北越在欺骗南越的情况下举行秘密谈判。1968年6月26日，中国援助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七千万人民币。7月23日，中国援助北越价值七亿七千万人民币的物资。9月30日，中国同意1969年援助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两千五百万美元外汇¹⁹⁰。“仅1965年至1968年3月，中国援越防空部队共计15万余人。中国支援部队主要由防空、工程、后勤等部队组成，一些部队实行轮换，平均每年在越南执行任务的部队有13至14万人，最高年份为1967年，达17万人。从1965年至1969年3月，中国先后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各类援助部队23个支队、95个团和83个营，共计32万余人。”¹⁹¹莫斯科和北京的决裂，有助于河内更好地利用两大后盾的竞争性支援。1969年4月，苏联指责北京为苏联援越物资设置障碍¹⁹²。莫斯科和北京在漫长的内亚边界上虎视鹰瞵，在世界革命的前线相互破坏和指责。尼克松作为美国政治传统中罕见的老练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敏锐地捕捉到楔子最适当的插入点，决心开发共产主义阵营的裂痕，实现提前制定的国内政治目标。1972年外交革命就此开始，解救了骑虎难下的毛泽东。

李光耀回顾远东冷战的最后回合时，承认所谓的中间势力都是毫无原则的投机者。“美国准备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方，同共产党人对抗到底，这一点倒让我松了口气。正因为美国坚决反共，跟共产党人势不两立，所以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赛尔、印尼的苏加诺才有条件走不结盟路线。采取不结盟的姿态是很自在的，我也这样做了。一开始却并未意识到，这其实是美国人付出代价后所提供的回旋余地。”¹⁹³风行草偃是秩序边缘地带的特征，犹如西班牙和法兰西的几百个探险家的胜负就能改变数万印第安辅助部队的立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殖民主义造成了世界秩序最后一个薄弱环节，提供了列宁长征转进一侧翼包围战略的最后一个机会窗口。

从二十年代的中欧到七十年代的亚非拉，共产主义终于走遍了全世界。今后的世界只剩下两类社会：挤干的橘子和挤不动的橘子。第一类没有或不能产生有效的免疫反应，已经沦为先锋队的汲取对象。第二类能够或已经完成了共同体塑造，不可能以战争以外的方式破坏或征服。边界由模糊变得清晰，捕食的速度越来越无法追赶消耗的速度。

四、梁山的逆袭，1972年外交革命

本节引言：

毛泽东反对苏联，发动文革，都未能彻底消灭卧榻之侧的党内列宁主义者，也未能培养出保全自己遗产的干部班底。随着东亚大陆的资源损耗，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外交，为他提供了最后一次绝处逢生的机会。华盛顿—北京的机会主义联盟不仅解除了苏联的外部威胁，也切断了党内列宁主义者重新投靠苏联的渠道。北京投入西方阵营，导致了日后的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

1. 尼克松和毛泽东的宫廷外交

毛泽东的战略从党内和世界两翼同时展开，指向东亚和世界的列宁主义者。两者都意味着发动针对前一波革命者的革命，颠倒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相对地位。中国共产党觉得自己通过依附和颠覆国民党的经验，比苏联更好地掌握了统一战线的精髓，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夺取“中华民族”建构的同样方式反客为主，夺取“世界革命”的衣钵。刘少奇—邓小平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内外同步的再革命布局中，恰好占据了边区三三制政权和国民政府在抗战结束时的同样生态位¹⁹⁴。最初的攻击没有确定的重点，直到被革命对象以“迎头痛击”或“土崩瓦解”的反应为革命者指引方向。1964年8月20日，中国驻东德使馆提出了《关于利用德苏矛盾对德进行争取分化工作的请示报告》¹⁹⁵。苏联人以蔑视的态度对待这种幼稚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其实这些手段早已在阎锡山和宋哲元的系统内多次创造奇迹——北京用以前煽动宋哲元和阎锡山反对蒋介石的同样手段，煽动东德共产党反对苏联。

毛泽东的真正问题在于，他没有适当的班底可以填补列宁主义者留下的政治真空。刘少奇垮台，留下的干部仍然是一群小刘少奇。周恩来和康生的特工系统反而更加强大，比党政干部危险得多。国内外的红卫兵和毛派团体都是昙花一现，无法替代苏联式干部党和专业颠覆技术员。军事—经济援助给北京造成的压力，又比莫斯科大得多。军管会和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产生，标志着文革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梁山系统在解放军内部的势力最大，辅以激进文人和革命群众，尚能延

缓列宁主义者卷土重来的速度。海外的革命缺乏流沙社会特有的梁山好汉和士大夫社会最发达的激进文人，崩溃的速度自然更快。六十年代末，海外的毛派势力已经只剩下几个孤立的据点。毛泽东理解和操纵梁山系统的技巧纵然高人一筹，后者由于天然的流沙性和投机性，仍然不可能形成足够稳定的组织资源，而且并非不可能为党内根深蒂固的列宁主义者所用。林彪系统和江青系统积不相能，其实只是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冰山一角。江湖枭桀无论就其阶级本能还是利益纽带，都不可能跟激进文人长期合流。

1968年，毛泽东已经明白自己四面楚歌：“东北、西北、华北要准备苏联来，南方各省要准备美国来。”¹⁹⁶林彪1969年的《一号命令》¹⁹⁷表面上针对苏联，实际上却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猜疑。九一三事件暴露了党内的暗流，争夺世界革命领导权的运动败相毕露。

毛泽东知道只有一个办法才能防止上级的报复，就是挑动“上级的上级”反对上级。如果他没有及时下手，上级就会挑动他自己的下级反对他。四十年代，只有斯大林能够打击蒋介石。七十年代，只有美国才能打击苏联。上级一旦败在“上级的上级”手中，他就能在下级面前恢复英明革命家（上级无法惩罚的叛逆者）的形象和地位。投机性革命家防患自己的下级如法炮制，一向都是无比困难的任务。毛泽东在这方面表现出真正的天才，然而非但不能挑明，反而必须在自己并不出色的领域假充高明。

美国政治家在宪制传统的约束下，无法像1945年的斯大林那样充分开发同样有利的局势。台湾问题在斯大林的体系内不会比蒙古问题更难处理，现在却形成了复杂的政治和法律纠葛。1971年7月23日，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Walter P. McCaughy)向蒋经国建议：为了维持联合国席位，即使放弃安理会席位也是值得的（复杂双重代表权提案）。蒋经国表示无法接受¹⁹⁸。8月6日，宋美龄在台湾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美国的打算，是让我们死在台湾，最后造成两个中国，让台湾独立或成为联合国托管地。”¹⁹⁹国民党如果在五十年代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对自身和台湾无疑都是更好的路径，然而他们的习惯就是尽量给朋友制造麻烦，更敌人提供方便。他们长期消费美国的原则性，没有料到越战给机会主义者带来的便利。

“狡猾的迪克”（尼克松）依靠美国保守派精英和“沉默的大多数”，却无意实现他们的期望，扭转六十年代激进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潮流，宁愿相

信个人和私人的聪明才智，以为欺骗人民才能最好地保护人民。他的统治像所有缺乏原则的聪明人一样，给自己和国民带来了小范围的胜利和大范围的溃败。他这样“非美”的领导人能够出现，本身就反映了罗马义务对美国宪制造成的挑战。威尔逊主义作为美国宪制世界化的中继站，无法避免面对诸如此类的挑战。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宫廷外交导致国务院系统的严重信息脱节，破坏了美国外交官长期行之有效的协调，结果将沙特代表引起的偶然事件放大为联合国大会的全面失控，断送了蒋介石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²⁰⁰。基辛格本人崇拜俾斯麦外交和欧洲大陆的权力主义传统，非常鄙视威尔逊主义的乡愚性质，声称“就秘密外交而言，国安会系统的一个优点就是，总统和我既可以隐瞒我们的计划，又可以获得各个部门的观点和想法。”²⁰¹然而，连他都认为：美国的政策调整导致友好国家不再担心因背叛而遭到惩罚，因而反倒增加了阿尔巴尼亚提案的赞成票²⁰²。

上级（华盛顿）为了遏制叛逆的下级（莫斯科），可以而且应该利用下级内部的敌人和叛逆者（北京）。尼克松和基辛格将如此初级的权术引进了清教徒乡愚的新大陆，自以为立下不世奇功，殊不知在紫禁城的主人和江湖好汉的盟主看来形同儿戏。

通过1972年外交革命，毛泽东摆脱了野心和地位不相称所造成的困境。在林彪出走和尼克松来访之间，他的处境一度间不容发。党内的列宁主义者很容易通过删除他的存在，廉价地解除他的冒险后遗症。周恩来或任何苏联老友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会恢复五十年代的历史叙事，将东亚和东南亚革命的所有成就归功于苏联长期和正确的领导，将党内、国内和国际的一切痛苦和失败归咎于修正主义者、混入党内的农村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富农路线的始作俑者毛泽东。美国人无需做任何事情，只要出现在北京城的光天化日之内，就能堵死他最大而且不能暴露的隐忧，绑架全党走上亲美反苏的不归路，从而不仅保障了自己在世的安全，而且保障了党在自己身后的历史评价。

只要紫禁城的继承人为了购买美国的友谊而反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就只能是他（而非苏联的老朋友们）。任何列宁主义者想要否认他的历史地位，就只有两条道路。要么同时否认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将自己变成叛徒和罪犯的同谋者。要么否认他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只能回归国父斯大林和老大哥苏联的正确路线了。毛泽东既然已经获得了如此重大的收获，自然不会太介意细微的外交利益和技术细节。他假装撇开门面套话，直接诉诸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诚实：“其实这

个公报没有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罗！”²⁰³美国人能够心满意足地理解，华盛顿和北京的机会主义联盟将莫斯科置于两面作战的窘境；却会因此忽视，联盟的主要价值在于将毛泽东从两面作战的窘境中救出来。杜勒斯深知亚细亚式虚虚实实的诡诈，报以清教徒厌而远之的洁癖。基辛格为自己的诡计多端而自豪，却没有看出越复杂的机谋可供算计的目标越多。

2. 东亚格局再次改变

日本利用尼克松宫廷外交的马基雅维利性质和北京的正统性焦虑，廉价摆脱了战败国负担，为对台政策留下了回旋余地²⁰⁴。“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的措辞故意保持模糊，目的就是允许双方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解释。周恩来的解释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从台湾撤走大使馆、领事馆，蒋介石集团的大使馆、领事馆撤离日本。战后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在台湾解放时当予以适当照顾。”²⁰⁵日本方面的理解是：《台北和约》作为《旧金山和约》的延续，结束了1941年正式开始的日本帝国—中华民国战争，但并不适用于中华民国有效管治范围以外的地区，将亚洲大陆置于不正常状态。日本希望更多地保障亚洲大陆的安全和贸易，但不会因此影响旧金山条约体系的基本结构。只要苏联的威胁仍然处于压倒优势，双方就会满足于各自表述基础上的求同存异。1972年3月8日，北京利用新得的联合国席位，要求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将香港和澳门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适用的《非自治领土名单》清单中删除，埋下了日后香港问题的伏笔²⁰⁶。

尼克松的诡诈手段成功地完成了止损任务，大体将越南前线恢复到吴庭艳时代的状态。美军的伤亡基本结束，越共对大后方的信心摇摇欲坠。美国空军和南越国军的配合成本低廉，却仍然不会减少苏联的消耗。如果仅仅从外交技术考虑，尼克松政府有理由索取美国人民的感激，然而东方式的内廷政治侵蚀国本，在水门事件中引起了国会政治的保卫战。尼克松的印度支那犹如格拉古的帕加玛和奥古斯都的埃及，已经构成了元首政治的潜在资产和元老院的潜在威胁。国会以真正罗马式的坚定，为世界宪制的核心防微杜渐，断然切除了东方宫廷政治的培养基。

1975年，洪流淹没了美国遗弃的西贡和金边。北京乘南越溃败之机进军西沙群岛，拾起了蒋介石1945年的声索。至此，共产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遗产（或重负）完全落到二者的逆子身上。远东的线索追随世界的隐秘法则，走向萨马拉的约会场²⁰⁷。

#第五章 完#

[1](#) 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1897-1989）盟军中国战区第二任参谋长。1947年7月奉国务卿马歇尔命为特使到中国调查，8月22日，他面对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六十多位国府高级官员发表长达数小时的演讲，严厉批评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他在给美国国务院的考察报告中警告：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于劣势，中共很可能夺取中国。魏德迈建议美国承诺给予国民政府援助，但他的报告在美国政界发表后，使美国高层更加深信国民政府已经无法挽救。

[2](#)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第10页

[3](#)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六）》，东方出版中心，第243页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译处：《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中央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第40页

[5](#)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69-70页

[6](#)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95页

[7](#)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第1177-1180页

[8](#)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第628-629页

9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第627页

10 沈志华：《斯大林和中国内战的起源》，《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11 《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称：“中共和苏联在北朝鲜进行可能合作的迹象要回溯至1946-1947的秋天和冬天。安东1946年10月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后，中共军队在北朝鲜的存在就经常得到报道。1947年3月，XXIV部队估计苏联区域大概有5-7.5万中共军队。一向可靠的渠道表明，1946年12月到1947年1月北朝鲜的铁路被用来运输这些部队，并且住宿和补给由苏军指挥部和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分担。虽然在此期间中共在北朝鲜的活动特点不能明确认定，但报告说他们接受训练并将这一地区作为进攻满洲东部中国国民党的基地。

最近XXIV部队主要通过审讯北朝鲜人民军逃兵获得情报，倾向于接受北朝鲜部队已经进入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满洲东北地区。（苏联不承认那里存在北朝鲜人民军活动，但是得到了关于其存在与发展的相当可靠的证据。）XXIV的报告包括：（1）前北朝鲜人民军的军官供述说，整营的军队正与中共在满洲前线并肩作战；（2）声明说派驻在北朝鲜的人民军打击满洲东部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3）声明说1946年秋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和满洲的中共军队建立了通信联系，控制派往中国的北朝鲜军队。没有受过训练的，至今一直驻扎在北朝鲜的人民军战术分队看来符合这几份报告，即北朝鲜部队一完成在北朝鲜的规定训练，就被送到满洲并融入中共军队。

这些军队转运在逻辑上从几个方面有助于推进苏联目标：（1）他们给中共军队提供一定援助；（2）他们处在或者靠近实际战斗区域，向北朝鲜军队提供战斗经验；（3）缓减食品匮乏的北朝鲜向其军队提供粮食的问题。与北朝鲜食品短缺相连，1947年中期国民党军队在军事行动中俘获的一小部分朝鲜人告诉美国助理军事随员：他们志愿参加中共军队只是出于‘经济原因，比如失业、食品匮乏等’，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北朝鲜的粮食形势部分是由于苏联将粮食从该地区输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大连的结果……显然中共已经从中国和朝鲜港口和苏联控制的大连之间的积极贸易中获取一定利益。一种更重要的援助形式，至少对山东省的中共而言，看来是由往返于大连和山东烟台的苏联舰船提供

的。美国大连总领事报告说，6月23日一艘载有卡车、轮胎和汽车配件的苏联轮船离开大连驶往烟台（一般是一天的航程）。一天后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烟台的人员注意到这艘满载着包括卡车、中国乘客在内的轮船抵达烟台。根据烟台的情报，同一艘轮船6月7日进港，那艘航程装载的是生铁和‘木箱子’。据报道，这两趟航程的装卸由中共士兵在夜间‘非常神秘地’加以执行。报告进一步宣称，苏联船舶安排它抵达烟台的时候，明显利用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船只停泊，以免遭到中国国民党空袭。毫无疑问，中国国民政府非常担心山东-大连的贸易。与这项运输相连，国民党在山东省的司令官声称，如果大连归还南京政府，山东的战事可以减少六个月。”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一）》，东方出版中心，第245-246页

[12](#)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第627—628页

[13](#) 博伊科：《解放使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中国的道路上（1937-1945）：回忆录》莫斯科，1989，第336-337页

[14](#) 伊·柳德尼科夫：《穿越大兴安岭》，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中国的道路上（1931-1945）：回忆录》，莫斯科，1989年，第302-304页

[15](#)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三联书店，1982，第19-20页

[16](#) 同前注，第24页

[17](#) 胡美、任东来：《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的几个问题》，《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

[18](#) B.杰里岑，《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285-286页

[19](#) “要求各部和主管部门于1947年11月1日前，按附件一向外贸部提供超出1947年出口储备额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

附件一：药品和医疗设备

军用电线50千米

棉布几千米至一万里，可减少对国家后勤部的供应数

毛料200米，国家后勤部提供

吉斯牌汽车400辆，减少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供应数

摩托车15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自行车300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滚珠轴承4500台，减少苏联部长会议储备数

砂轮500个，转子300支

汽车附件30万卢布

普通汽车轮胎5000套，计划外生产

巨人牌汽车轮胎（大型载重车用）5000套，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自行车轮胎1万，计划外生产

橡胶靴两万五千双，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定向电台四座

功率10千瓦收发报电台，减少对塔斯社供应数

军用整流器2000台，各种用途的电话机3200台

电灯泡（用于照明、轮船、交通信号以及其他用途）12万只，各种功率的电力发动机60台

青铜锭、巴比特合金、铜板、锌板

各种规格和用途的管子

金属丝（钢丝、弹簧丝和其他类型的）

消防车

压缩机和其他各种机器制造机械

铣床和其他车床、钻头等

各种交通设备（交通部）

传动皮带、涂胶皮带、变压器带、各种用途的电线、电气机械、闸刀开关、开关等

重油、润滑油等

造币纸、新闻印刷纸、拷贝纸等

各种化学原料、各种酸、油漆、染料、溶剂等”

1947年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给东北提供了原材料和货物清单（支付价值为二百万的铁路枕木）：

“棉布4000米

制装用棉花300吨

缓燃导火线100万米
密封容器100万件
阿芒炸药300吨
火柴2000箱
烟草20吨
糖500吨
大马哈鱼200吨
驼背大马哈鱼200吨”

1949年提供给满洲的苏联货物、设备和原材料清单：

“运输汽车3000辆
汽车外壳一万五千二百件
价值1910卢布的汽车附件
航空用汽油1500吨
汽车用汽油两万三千八百吨
拖拉机用和照明用火油一万零八百四十吨
油和润滑油一千一百八十三万吨
其他石油制品5707吨
拖拉机205台
黑色金属轧件7300吨
轧制件2050吨
有色金属轧件2100吨
电线四十七万八千米
动力电缆四十一万八千米
电动机1443台
金属切割机床657台
棉布1500万米
帆布十五万米
棉花一万五千吨
羊毛短袜一百万双
价值5580卢布的药品和医疗器材
造币纸7000吨
打字纸1580吨
新闻用纸2930吨”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03-204页

[20](#) 胡美、任东来：《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的几个问题》，《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

[21](#) 《苏军支持中共叛乱之调查报告》，第591-616页

[2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经，第六册，第515-518页

[23](#)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1，第669-671页

[24](#) 外交部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第246-247页

[25](#) 1949年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控告苏联违反中苏条约与联合国宪章，威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及远东和平案》；萧道中：《冷战与中华民国外交：控苏案研究，1946-1952》，《辅仁历史学报》，第17期，2006年11月，第471-515页

[26](#) “我们至少需要一百名以上各部门专家：

计划专家和整个国民经济专家10人。

黑色有色冶金专家15人。

煤液体燃料加工和硫酸盐、盐酸、硝酸制造专家6人。

采矿工业，包括煤炭加工专家10人。

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专家6人。

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专家6人。纺织专家5人。

采金专家4人。

水泥专家4人。

造纸专家4人。

混凝土大坝建筑和水电站设备专家8人。

财政专家4人。

军事铁路学校教员6人。

以校长为首的工业学院教授、讲师12人。

我们再次对您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您帮助解放了中国东北人民。布尔什维克敬礼！”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79页

[27](#) 同前注，第281页

[28](#) “遵照您1948年5月17日的指示，派往东北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组织并亲自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奉天-鞍山、锦州-山海关路段。这一时期共修复大、中型桥梁62座，其中东北中部的桥梁都进行了大修：哈尔滨至长春方向，松花江上桥梁970米、饮马河上桥梁320米、伊通河上桥梁200米；吉林至长春方向，吉林市附近松花江上桥梁420米，饮马河上桥梁190米。上述铁路线的及时修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长春市重兵集结，然后是义县和锦州城下的集结。这些城市的被围之敌——国民党军被歼以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着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镇，有力地促进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同前注，第315-316页

[29](#) “据瓦休科维奇同志关于运输东北粮食的电报，我报告，交通部已指示远东铁路局长和后贝加尔斯克及滨海铁路负责人，保障每昼夜换装和发走400节车厢，通过满洲里车站300节车厢。”同前注，第332页

[30](#) “为制定彻底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和组织生产的计划，至少需要500名苏联专家，其中军事工业35人，燃料能源40人，冶金和化学30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35人，铁路和通讯116人，造纸和林业20人，建材业20人，轻纺20人，食品20人，地方手工业6人，农业15人，国民教育65人，卫生保健55名医生，财政信贷20人，外貌和国内贸易20人，综合和平衡预算6人，统计和会计10人。对设备和材料大体需要如下：

军事工业

为完成1949年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生产计划，必须建立山炮和野炮制造厂并保障其设备，生产能力需达到日产炮10门，必须提供TNT炸药3000吨，火药200吨，铜3600吨，特种金属一万吨，自动车床150台，炮身钢管300吨，钨100吨，钼50吨、钒700吨、电线2500米、电缆线50000米、皮线十万里、超强度线四万里和其他物资。此外，中国同志要求满足他们1948年1月所提出的军事工业所需各种仪器和材料的要求。

冶金工业

根据东北民主政权提出的计划，1949年要恢复和利用42个矿山冶金企业（其中7个是铜工业企业）。首先恢复鞍山和本溪的冶金企业，到1950年生产能力要达到年产40万吨钢、一万二千吨纯铜。为了完成这一明显提高的计划，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其中需把拆除运往苏联的鞍山钢厂第一、第二车间、大型轧钢车间和小型轧钢车间运回来，而且还需运来专门材料.....

计划1949年完成主要铁路线的修复工作，其中包括部分中长铁路，长春-四平街-奉天和义县-承德-北平线。此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要求，还制定了修复中国内地铁路的计划，其中包括：山海关-北平-天津-济南-徐州，徐州-南京-上海，北平-开封-汉口，北平-张家口-太原-西安”

同前注，第335-336页

[31](#) 同前注，第353-354页

[32](#) 同前注，第396页

[3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应该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有三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纳其他政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对此我做了肯定的回答。”同前注，第411页

[34](#) B.杰里岑，《燃烧的中国》，莫斯科，2003年，第279页

[35](#) A.列托夫斯基文集，第73页

[36](#) 同前注，第71-72页

[37](#) 同前注

[38](#) 同前注，第85-88页

[39](#)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一个飞机装配厂，我们可以给你们最先进的战斗机，想要捷克的，想要俄国的都行，目的就是你们用这些飞机培养自

己的空军干部。”同前注。

[40](#) 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遣：

中国人民解放军下属机关：指挥人员15人、顾问4人、服务人员6人、翻译3人，共计28人。

空军（6个空军军校）：指挥人员42人、教官96人、飞行员-教官84人、军官-教官238人、准尉-中士教官278人、翻译42人，共计780人

海军：指挥人员5人、教官75人、翻译6人，共计86人

炮兵：指挥人员1人、军官-教官20人，共计21人

向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将军、军官、准尉、上士和非军职雇员传达1949年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424-1425cc号决议。

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发放六个航空学校用的飞机334架；装有射击指挥仪和测距仪的高射炮360门；高射炮用炮弹，每门三箱弹药基数，；7.9毫米高射机枪360挺，100万发子弹，现有缴获的德国战利品。”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09-110页

[41](#)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16页

[42](#) 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我们不同意这样做（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级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

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短现在还很难确定）内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有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资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资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谨告诉您的是。在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党派存在，这些党派都是人民阵线的成员。”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51-252页

[43](#) 1949年6-7月，陈铭枢扮演了司徒雷登毛泽东谈判的掮客角色。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5期，第25页

司徒雷登发现，“没有任何偏离目前政治路线（一边倒）以改善对美关系的迹象。”《美国外交文件集》第八卷，1949年，第782-783页

1949年7月19日，邓小平致信华东局：“占领全国、一边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135页

[44](#)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对国民党政府过去跟外国政府所签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45](#) “事实上控制中国领土和国家机构，能够维持公共秩序；愿意并能够履行国际义务；政府的统治权得到人民的普遍默认。”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9, The Far East, 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pp.22-23

[46](#) 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实际上是表明美国不会偏袒任何一方，预防蒋介石拖美国下水，诱惑毛泽东做国务院左派期望的温和改革派。后来麦卡锡说国务院是潜伏匪谍的大本营，就是指他们这种态度。三原则流露的放水和开价意图如此明显，自然足以引起斯大林的疑心。毛泽东强调一边倒，实际上是为了让苏联放心。

[47](#) 俞国华（1914-2000），1947年赴美任华盛顿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副执

行董事；1951年任国际货币基金会副执行董事。

[48](#)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革命文献》，档号002-020400-00029-150

[49](#) 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革命文献》，档号002-020400-00029-155

[50](#) 腊斯克（Dean Rusk，1909-1994）二战时是史迪威主管情报的副参谋长，后任助理国务卿，促成美国出兵朝鲜。1961-1968年间任国务卿。

[51](#) 孔华润（Warren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第189-190页

[52](#) 1934年的华盛顿远东司对赣南的“苏维埃共和国”不屑一顾，认为这些事务属于苏联宣传范围，跟他们负责的东亚毫不相干。二十年代的苏联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处境不比塔利班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强多少，因此统一战线造成的窗口对outlaw（苏联）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其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59页

[53](#) 《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593页

[54](#) 《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第239页

[55](#)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第2册，第235页。
参见周晓东：《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瓦解敌军工作》，《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56](#)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13-30页

[57](#) 同前注，第25页

[58](#) 《陈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7，第96-108页

[59](#) “八路（其实这时已经改称解放军）向我们宣称，八路是人民的军队，他必须人民的力量来掩护他们。因此，每次国军一来，他们总是闻

风先走，而地方的民兵在大队之后掩护撤退.....妇女儿童根本不准离开。他们说这样便可以迟滞国军的行动，和展开地下活动.....（我们‘积极分子’）不是死于八路的玩弄，就是死于国军的刀枪。因为八路便是这样一个东西，既要玩弄你，又不能保护你，你若不听从他的话，他本身就先杀了你。”杨雨亭：《国共斗争中的憎恨（1927-1949）》，中华民国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第84-86页

60 “国民党一走了以后，没留下任何组织形式，任何一个力量都可以乘虚而入。那么他现在有一个力量他过来了，共产党是有有心人，他们有计划有组织有一套完整一贯的做法步骤，这是国民党无法比的。他们先要找一个村长，一个在当地听话而敢做事的人，叫他来做村长当官，他也高兴啊，村民这辈子没做过官，现在有做官了，有了权利，有了生杀权，是村里的土皇帝，当然有人愿意做。有了村长以后，就按照共产党的那一套方法一步发展组织，组织了以后，村长讲话大家就要听啊，谁要是跟他讲的话有意见，或是说法不一样，就不行了，那叫思想有问题，一般人思想有问题只是表示不同意见，没什么大不了，共产党说你思想有问题啊，那可不得了，是生死攸关的。村长他有一个排的民兵，有枪杆子在手，谁敢不听话。像我这种对他不满意的人很多对不对，但是有什么没办法啊。每天一出门，村里的组织网就罩上来了，青年妇女队随时看着你，儿童团天天监视着你，把你做的什么事都报告村长，你没有任何办法.....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去听墙根，晚上到人家窗外去听，听这家人讲什么话，是不是对政府不满意，是不是国特。再就是闻香队，吃了什么好东西如鸡蛋之类，规定家里东西要拿出来给解放军，不可私藏。你家煎个蛋他闻到了，向上报告，立刻就自抓你，问你怎么吃这个？你不是全都捐出来了吗？闻香队，听墙根，有了好的表现是可以记功的。”林孝庭、阮秋芳：《于兆堂访谈录》，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东亚馆藏部，2014年3月25日

61 汪宣：《我在土改工作中的体验》，《光明日报》1950年4月2日；吴景超：《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光明日报》1951年3月28日

62 “群众斗争起来了要打人、使用肉刑、杀人，现在总是控制不了.....杀的方法上，有活埋的、枪毙的、活剥的、还有勒死的，剥了以后还要挂在树上和门上.....给他们杀人权.....总比没有法庭好.....问题不是杀不杀，而是军事力量达得到不？”参见：《少奇朱德同志在东北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9月18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571/1/35/1/33-34,45-46、571/1/36/3/62

63 “1946年，晋绥边区开始注意「阶级路线」。据此路线审查，许多干部发现，市场中的较大商户，大都由地主富农「转化」而来，如兴县十户大商中即有六户是地主。而且，根据调查，这些大商可恶透顶，他们买办敌货、偷卖法币与黄金、破坏金融、囤积取巧等等，可谓无恶不作。因此，在干部间产生「城市变成地主奸商的解放区」的观念。”

“根据此一概念，兼之「一切为贫苦群众服务」的总方针，1947年2月召开的生产供给会议，在营业税方面即提出工商业负担应向农业看齐的主张，还提高营业税率至夸张的程度（小商20%、中商40%、大商60%），并把按纯利润为标准改为按总收入（即包括成本在内）计算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发动小商人由下而上地斗争。以崞县为例，崞县在1947年4月接到征收二千万元的营业税任务后，许多干部一开始接受不了，经过说服才接受。5月时，上面又重新规定应征收一亿五千万的夸张数目。办法是召开小商会议，完全从小商中选举评议员，后再召开商人大会，宣布各家负担数目。过程中还斗争了一户，最后任务顺利完成。20户大商负担总数的80%，26户中商负担10%，20户小商只负担1%。大商遭到严重打击，但却不敢停业，因为当时崞县规定一停业即征收财产的70%，等于全部交公，逼得商户只得硬撑着不关门。”

“在兴县，1947年9月间土改工作团一到城，群众就开始扣商人。工作团不敢问扣的是什么人，怕影响群众情绪。后来经过调查，被扣的77户中，只有2户是大商，42户是中商，另有小商与其他各29与4户。接下来还发动「惩治奸商运动」。那些未被扣捕与清算者，都不敢再营业了，每天坐着等被扣。”

赵立德：《晋绥工商业情况报告》(1948/10/17)，收入《工商税收史料7》，页442-454，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0-181页

64 《陕甘宁边区税务局长联席会议纪要》(1948/03/02)，收入《工商税收史料7》，页221，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1页

65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历年来税务工作的概况〉(1948/03/05)，收入

《工商税收史料7》，页235；赵立德，《晋绥工商业情况报告》(1948/10/17)，收入《工商税收史料7》，页457。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1-182页

66 贾拓夫，《战争前后的西北财经状况》(1948/03)，收入《工商税收史料7》，第379、390页，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3页

67 黄亚光，〈一九四七年陕甘宁金融贸易工作报告〉(1948/04/05)，收入《工商税收史料7》，页403-404、409-410，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3页

68 《晋绥行政公署令》(1948/08/30)，《工商税收史料7》，第360页，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3-184页

69 刘卓甫，〈晋绥金融贸易工作报告〉(1948/04/20)，《工商税收史料7》，第420页，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4页

70 《黄亚光给中央财办处的金融工作报告》(1947/07/2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等编，《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下文引用自《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下），第31页，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4页

71 《1947年三边贸易分公司书面总结报告》(1948/02/23)，收入《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下），第116-117页，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4页

[72](#) 《目前金融贸易问题》，《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下），第227页，转引自程耀煌：《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民国100年6月，第184页

[73](#) 《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7日

[74](#) 《罗瑞卿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19日

[75](#) 毛泽东：《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1951年3月30日

[76](#) 《上海工人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总结报告》（1951年7月），上海档案馆藏档，C1/1/28/12

[77](#) “上海的资本家虽然狡猾，但因损人利己的天性，往往矛盾重重，同行之间、股东之间、帮派之间、当权与不当权之间，甚至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均有不少矛盾。尤其在五反检查威势之前，更易暴露。只要我们善于分析情况，追踪行迹，发现弱点，抓紧矛盾，高度运用灵活机动的策略，实行分化，则往往易于攻破.....互相检举，反复进行，终于全胜。同时，争取最脆弱的资本家及早投降起义，又是扩大战果，打得透彻的有利条件.....我们计划在第二战役争取一百个资本家及其家属投入战斗。”参见：《上海市委关于五反第一战役经验总结报告》，1952年4月2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2481/20-26

[78](#) “用政府压力加资本家劝咬，解决一千户。现已组织了一百个愿意包打同行的资本家（由第一战役七十四重点户中挑选出来的），再过一个礼拜，又可从上层资本家中挑选一百五十人到二百人扩大这一队伍.....在工厂商店中发动工人店员检举，不这样做就会失掉工人的积极性，对我不利。”参见：薄一波：《上海五反第二战役部署和策略补报》，1952年3月3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2481/28-31

[79](#)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218-219

[80](#) 中共苏南区一级机关党委会关于“三反”结束后在机关中进行系统的政

治教育的情况简报，见：江苏省档案馆档案，档号:3006一短期一345

81 “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经济建设的投资，要规定这样一条原则：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除此之外，应加以削减。”《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第112、116页

8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363页

83 1950年1月8日，莫斯科通知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林彪曾致电毛泽东称，在人民解放军中有16000名朝鲜族军人……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南后，朝鲜人出现情绪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由于战争即将结束，林彪表示希望把朝鲜人合并为一个师或四到五个团，派至朝鲜。”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22页

1950年1月11日，什特科夫回电说：“金日成的意见是，把中国人民军中上述数量的朝鲜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和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27页

1950年10月31日，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报告：“我们的朝鲜朋友按照已有的建议以及同中国人的协议，已将9个步兵师送往东北进行整编和训练。”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05-106页

84 “上海空中设防短短两个月时间，苏联巴基思基部队在上海警备部队的配合下，四战四捷，先后连续击落国民党空军各型飞机六架。”刘统：《1950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73页

1950年10月，苏联卖给北京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38架、拉-11活塞式歼击机39架、图-2轰炸机9架、伊尔-10强击机25架、教练机8架，共119架。《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第78页

[85](#) 1950年7月5日，斯大林通过苏联使馆致电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刻集中九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让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¹²⁾1950年7月6日，斯大林通知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一、武器通过满洲里、安东、新义州运送。二、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三、我们全部供给2个师、2个坦克旅和12个营使用的武器、坦克和其他军需品，然而我们认为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要补充现有的师并使其兵员达到12000人。”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430页

1950年10月30日，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报告：“根据政府决议，最先发送的8个歼击航空团必须于11月28日前在中国境内集结，3个强击航空团和10个坦克团将于今年11月30日前集结。根据既定计划，针对拥有两个团（每团有飞机30架）编制的空军师中的歼击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的改组工作已于10月24日结束，并于当天经铁路开始发运。截止今年10月30日，运送这些部队的总共55个专列中已有35列装载完毕且已发出。整个运输工作均按计划正常进行。坦克部队也已完成组建工作，并将按既定计划发往满洲里站，直接在该站换装。”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05页

1950年11月15日，毛泽东报告：“苏联飞行员在空中表现出了英勇气概和强大威力。他们在最近十二天内击落了二十三架入侵的美国飞机。”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14页

1950年11月20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航空师。“苏联军事部允许这些部队在运输过程中穿苏联军服，可一旦进入中国，必须立刻改穿中国军服。”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25-126页

[86](#) 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504页

[87](#) 1950年11月7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其具体品种和

数量如下：苏式步枪十四万支；步枪子弹五千八百万发；苏式自动枪26000支；自动枪子弹八千万发；苏式轻机枪7000挺；轻机枪子弹三千七百万发；苏式重机枪2000挺；重机枪子弹两千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飞行员用手枪子弹十万发；TNT炸药1000吨。”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09页

[88](#) 1950年11月30日，什捷缅科报告斯大林：“截止今年12月15日前总共应发往中国的汽车4500辆中，已有1098辆运抵满洲里车站，3089辆仍在苏联境内，经铁路发送途中；其余313辆将于12月1日装运……计划转交给中国的弹药1275车皮中已经交付了650车皮。已彻底完成预定转交计划的武器装备包括：75毫米火炮、152毫米榴弹炮、107毫米山地迫击炮以及所配备的相应弹药；37毫米和85毫米高射炮，76毫米、122毫米和152毫米火炮，以及手榴弹和防步兵地雷。其余武器和弹药正经后贝加尔铁路运往中国，目前已快达到目的地。”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40页

[89](#)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三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323页

[90](#) 1943年1月，英美首脑聚会北非摩洛哥，举行“卡萨布兰卡会议”，通过了“1943年作战方针”的报告。两国商定，在东线苏军开展战略反攻的形势下，准备在西欧大规模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两国空军的联合行动将给未来的大规模登陆作战创造条件。会上产生了著名的“卡萨布兰卡”训令——《对德战略轰炸谅解协议书》，规定了英美战略航空兵联合作战计划的基本方针：“逐步摧毁和打乱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削弱德国平民的抵抗意志，最终摧毁德国武装力量的抵抗能力。”按照这个指导思想，训令提出了6个主要的目标系统，按优先次序依次为：1制造和修理潜艇的基地，包括制造部件的工厂；2飞机工厂；3轴承工厂；4炼油厂；5合成橡胶工厂；6机车工厂等。

[91](#) “阿芙乐尔舰和中山舰”代指早期共产党通过渗透敌方的军队发展自己的武力。

[92](#) Michael Schoenhals, “Note:On the Existence of the CCP’s Centr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CCPResearch Newsletter, No.2, Spring

1989,pp.17-20; John Pik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实（1918-197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105页；王仲方：《公安部是怎样成立的》

[93](#) 沈迈克：《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94](#) 李力：《从秘密战线上走出来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2008，第257页

[95](#) 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 The Mitrokhin Archive: KGB in Europe and The Wes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0, pp.189-191

[96](#)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483页；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431页

[9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第446页；Richard Deacon,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p.410.; 《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四卷，第569页

[98](#)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30页

[99](#) 同前注，第108页

[100](#) 同前注，第457-249页

[101](#) 同前注，第69页

[102](#) “我们（周恩来和陈云率领的代表团将《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其他文件、附件）送给斯大林后，9月3日斯大林第二次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周、陈、李、张、栗会谈。这次因重点谈五年建设计划，在座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外贸部部长库米金。斯大林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的印象很好。但是，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速度为百分之二十，应下降为百分之十五。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

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或事变。斯大林总的意思是：留有余地，超额完成，这是一种鼓舞，可增强信心，增加干劲！并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520页

[103](#) “军事工业企业44项，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疗工业3个。”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第157-159页

[104](#) 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0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98页

[106](#)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四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168页

[107](#) 同前注，第201页

[108](#) 同前注，第364页

[109](#) 同前注，第186-195页

[110](#) 同前注，第276-287页

[111](#) 《顾大使与杜勒斯谈话纪录案（1950年10月1日—1952年1月31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档案，档号012/6.0158

[11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四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90-291页

[113](#) 1951年9月4日，美国拒绝了葛洛米柯要求北京参加对日谈判的要

求。《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第247-266页。
1951年9月18日，周恩来宣布《旧金山和约》非法无效。《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第87-89页

[114](#) 拉巴洛会议使德国绕过协约国限制军备的禁令，在苏联境内训练军官和发展军事工业。德国技术的输入，也使得苏联军队和工业不致于越来越落伍。东德和捷克在赤化以前，是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互助体系中，扮演了德国在拉巴洛体系当中的角色。莫斯科和北京都是原料、人力的输出者和技术的输入者，在失去最好的技术来源（西欧和美国）以后，只能满足于差强人意的东欧替代者，但东欧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以后，距离国际先进水平的落差也变得越来越来，替代的效果相应地越来越差。

[1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218-219页

[116](#) 周恩来早在1951年就有这样的计划，他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说：“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的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金尧如：《保持香港现状和地位，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战略思想----漫谈许家屯回忆录之三十八》，《香港经济日报》，1993年7月2日第10版

[117](#) 张耀武：《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新华出版社，2004，第65页

[118](#) 细谷千博：《旧金山媾和之路》，中央公论社，1984，第245页

[119](#) 袁克勤：《美国与日台媾和》，柏书房，2001，第154-155页；
FRUS, 1951, Asis and the Pacific, Vol.6, part1, pp.1437-1438

[120](#)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1，第998页

[121](#)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两国在波茨坦重申了开罗宣言的立场。此后苏联表示恪守波茨坦公告，相应地也就赞同了开罗宣言。但是，美国及其他任何大国都一直没有正式承认中国吞并台湾，并认为台湾的法律地位应留待对日和约作出最后的决定。台湾仍然是一块被占地区，美国及其他对日战争的参战国对此区域仍享有专有权益。”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四）》，东方出版中心，第303页

[122](#) 戴超武：《敌对和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18页

[123](#)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5页

[124](#)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五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377页

[125](#)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五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9-52页

[126](#) FRUS, 1955-1957, Vol.2, p.393

[127](#) 饶伯森（Walter S. Robertson）1945年4月来华任美国大使馆经济事务参赞，后又任代办，曾参与马歇尔的调处国共矛盾的工作。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组阁，在周以德议员的建议下被国务卿杜勒斯任命为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128](#) FRUS, 1955-1957, Vol.2, p.499

[129](#)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参加周恩来接见英国代办欧念儒谈话纪要，1955年7月13日，外交部档案：207-00011-11

[130](#) Everett F. Drumright to Dean Rusk, June 21, 1961, No. 793.00/6-21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4; Drumright to Rusk, June 13, 1961, No. 793.00/6-13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131](#)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四）》，东方出版中心，第353、446页

[13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七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397-398页

[133](#)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33-239页

[134](#) 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和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35](#) 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7-98页

[136](#) 米丘诺维奇（1916-1982），时任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

[137](#) 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第453-454页

[138](#) 卡德尔（1910-1979），时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

[139](#) 《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第175页

[140](#) 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1956-1970）波兰工人党（后改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和第一书记。一度因反对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被免去总书记职位，被排除出政局并遭到迫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终于被恢复名誉，重新成为波兰党和国家的领袖，反对苏联利用波兹南事件干涉波兰内政，维护了波兰的独立，后因经济改革不利于1970年下台。

[141](#)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谈话纪录》，1957年11月6日

[142](#) 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386-392页

[143](#) Memorandum of Meeting, August 29, 1958,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73-75、96-99、100-102

[144](#) 同前注，pp.115-122

[145](#) 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第143页

[146](#) 《陈毅接见安东诺夫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9日，外档，109-00838-03，第89-96页

[147](#) 1958年9月，莫斯科信誓旦旦：“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没有任何怀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战争。我们自己可以说，对中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八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48页

[148](#) 1959年9月的戴维营会议后，赫鲁晓夫明确告诫毛泽东及其同僚：“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在我们内部以信任的方式讲，我们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他援引远东共和国的先例，建议北京承认台湾暂时独立。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和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16页

[14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601页

[150](#) 土豆烧牛肉是赫鲁晓夫的名言，说明苏联共产党要对国内消费者采取让步政策。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赫鲁晓夫软弱的证明。软弱，是资产阶级的特征。苏联领导人表现出资产阶级的特征，就是修正主义。无产阶级的资源不一定超过资产阶级，但列宁党人心狠手辣和当机立断的素质一定要超过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人。蒋介石心慈手软，没有无情地榨取上海的资源。毛泽东对延安农民的榨取，反而更加有效。结果，上海和延安都落到了毛泽东手里。现在赫鲁晓夫表现出蒋介石式的软弱，说明毛泽东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取而代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万一苏联换了一个足够狠的领导人，毛泽东依靠东亚的资源，就永远做不了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了。抗战结束时，毛泽东如果心慈手软犹豫不决，错过了冷战开始前的短暂机会，就永远进不了上海。这样的切身经验，决定了他的决策模式。

[151](#)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06页

[15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十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55页

[153](#) 1935年的赣南根据地和1943年的华北根据地都已经接近油尽灯枯的境地。长征—抗战和反蒋—冷战的成败未可知，但内部的枯竭注定了查田运动和土改运动必然如火如荼。

[154](#)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六）》，东方出版中心，第187页

[155](#)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五）》，东方出版中心，第151-153页

[156](#) 同前注，第165页

[157](#) 张耀武：《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新华出版社，2004，第167页

[158](#)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776页

[159](#) 沈志华、梁志主编：《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1，第233-234页

[160](#)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98页

[161](#) Drum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General Discussion with Dr. Hu Shih", November 15, 1960,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2.

[162](#) FRUS, 1961-1963, V Xxii, doc. 106-108

[16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23, 1962, in HFKOF, 1961-1963,

REEL 5:4. FRUS1961-1963, V Xxii, doc. 127

[164](#) FRUS1961-1963, V Xxii, doc.197

[165](#) 孙立祥：《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

[166](#) 翟新：《中日复交前日本外务省的“台独”政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林晓光：《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与中日关系（1950-1952）》，《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李伯军：《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台关系的演变与中日关系》，《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67](#) 《总理访美‘中共问题’文件》（1961年6月20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68](#) 《朝日新闻（夕刊）》，1961年7月7日

[169](#) 唐向宇：《南越第一共和国兴亡史：越南战争序曲》，第11页

[170](#)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03-204页

[171](#)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237页

[17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271页

[173](#)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356-357页、第589-590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256-257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762-769页

[174](#)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16-17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64-67页、第96页

[175](#)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186-187页、第249-253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157-158页、第362-363页、第380-381页

[17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50年3月17日

[177](#)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第402页

[178](#) 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179](#) 唐向宇：《南越第一共和国兴亡史：越南战争序曲》，第55页

[180](#) 同前注

[181](#) “北越从中苏集团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集团援助项目的最初阶段包括了在1955年之后对北越经济的大规模援助。食品和其他消费品与经济重建所需要的装备和物资一样，都被送到北越。在1956年重建的努力涌现出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项目，这要求1956-1960年间得到额外的经济援助。在1960-1961年间，对北越的第三轮经济援助主要用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的经济发展目标……共产党中国一直是给北越发展计划提供援助的最大贡献者。在早期北越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恢复以及水利系统的重建和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发挥了主要作用。在最近几年内，中国承建了数项重要的轻工业项目，其中包括10个碾米厂、2个蔗糖加工厂、1个卷烟厂、1个火柴厂、1个橡胶厂、1个肥皂厂和1个纺织厂。中国的一笔延期到1959年2月的7500万美元贷款被用于资助几座重工业工厂的建设，包括两座发电厂和一座钢铁厂。1961年1月，中国又提供了另一笔总数为1.57亿美元的贷款，用于1961-1967年期间28项工业和交通业项目的建设或扩建……在北越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的援助也主要用于钢铁厂建设。其他援助则分别用于化学和水泥工业，以及铁路和桥梁建设。在轻工业领域，中国将援建三座加工厂，分别为糖厂、造纸厂和纺织厂。苏联对北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作用主要是1960年12月提供的1.08亿美元贷款，用于43个工业项目建设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苏联的援助集中在燃料和动力工业、现代机器制造业基础工程，以及加强北越的研究机构。”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五）》，东方出版中心，第473-474页

[182](#) “中共控制了泰国小规模의 共产党组织，其党员几乎都是华人。华人分支机构在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共产党中都很强大……最近一次北平对胡志明讲话的认可暗示两国党组织的关系更紧密了。尽管中共给予其军事

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胡志明的运动继续显示它对苏联的向心力与对中国一样强……当然，中国开创一个亚洲共产主义体系或将亚洲国家吸引到自己圈子中来的能力都还有限。其中一个限制性因素来自这样一个有悖论意味的事实，中共领导内战的独创性‘本土’方针是由毛泽东从斯大林早期的理论中发展出来的。”“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北平的政策可以描述成：在马来亚谋求建立一个华人与马来人对抗英‘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这种合作大概会持续到英国人（及其他西方支持者）的利益遭到成功挑战为止。马来亚共产党恐怖分子企图走出丛林并‘合法地’地参与马来亚政治，因此他们会支持这一政策。中共进一步的目标是败坏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并引发其马来亚同情者的背叛。”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六）》，东方出版中心，第320页

[183](#) 唐向宇：《南越第一共和国兴亡史：越南战争序曲》，第65页

[184](#) 同前注

[185](#)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七）》，东方出版中心，第335页

[186](#) 同前注，第337页

[187](#) 同前注，第349页

[188](#) 同前注，第389页

[189](#) William J. Duiker,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 (Second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295

[1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21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276-283页

[191](#) 赵学功：《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出兵印度支那的评估和预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92](#)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十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368页

[193](#) 唐向宇：《南越第一共和国兴亡史：越南战争序曲》第467页

[194](#) 国民政府抗日，延安“三三制”政权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战友，但三三制政权由开明士绅和毛泽东势力组成，毛泽东实际上以开明士绅为掩护，乘机机会从背后削弱国民政府；苏联抗击资本主义，北京共产党政权名义上是抗击资本主义的战友，但共产党政权由老列宁主义者和毛泽东势力组织，毛泽东实际上以老列宁主义者掩护，乘机机会从背后削弱苏联。

[195](#) 中国外交部档案109-02732-03，引自陈弢：《中苏破裂背景下的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1964～1966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

[1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第345-348页

[197](#) 1969年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全军。毛非常不满。此事加剧了毛林之间的矛盾，为林彪“九一三”出逃埋下了伏笔。

[198](#) FRUS, 1969-1976, Vol.V, pp.735-741

[199](#) 沈鐫：《我的一生》，第三卷，台北经联出版公司，2000，第422页

[200](#) 吕迅：《尼克松政府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之失》，《国际论坛》2006年第6期；温强：《尼克松政府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评估和政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201](#) Henry A.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p.705

[202](#) 同前注，pp.784-785

[203](#)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2066页

[204](#) 钟放：《国际法视角下的中日联合声明》，《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4期；刘建平：《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其国际政治学意义》，《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205](#) 《竹入义胜与周恩来第三次会谈（1972年7月29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档案，5部内3号

[206](#) 《香港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人民日报》1984年9月27日第4版

[207](#)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并投降。国民政府认为，根据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的决定，台湾应“回归”中国，西沙和南沙群岛也应“回归”中国版图。1947至1948年间，国民政府出兵“接收”西沙、南沙群岛，出版了南海地图，后来，中共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所谓的南海“九段线”。

第六章 世界革命的失败

一、列宁主义的复辟与冷战末期的机会主义联盟

本节引言：

毛泽东死后，毛派无力支撑局面。老列宁主义者发动政变，恢复了延安时代以前的统治格局，但他们无法改变1972年外交革命的路径，更无法减少依赖国际资本主义输血的既成事实。华盛顿—北京联盟导致莫斯科两线作战，加速了苏联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台湾在美国的保护下，社会重建渐次展开，在冷战结束时，已经具备了恢复正常国家地位的条件。

1. 列宁党在中国的复辟

毛泽东的绑架策略暂时保护了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却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和追随者。尼克松冲击波夺走了他在阿尔巴尼亚和第三世界的最后几个支持者，江青和波尔布特的垮台结束了毛主义对列宁主义的挑战。列宁主义复辟政权在邓小平身上找到了第二个刘少奇，在陈云身上找到了第二个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苏联模式的干部党领袖和意识形态政策制定者，周恩来和陈云是行政事务和经济政策的负责人。“拨乱反正”意味着列宁党试图恢复干部党的严格管理和计划经济的劳动纪律，但毛泽东已经提前堵死了重返苏联乳房的道路。苏联输出革命的主战场已经移到印度支那和阿富汗，没有余力资助其他地方。印度支那和阿富汗占据了曾经属于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生态位，容不下回头的浪子。复辟政权除了迎合美国的保护和资助以外，已经无路可走。

1972年外交革命产生了高度现实政治的内亚防疫计划，将安卡拉、德黑兰和北京连成一线，阻止莫斯科重演列宁的侧翼包围战略。东亚土耳其的任务只能是保护美日大后方，相应地赢得替代苏联的乳汁¹。

“拨乱反正”最终演变为改革开放，事后的追认掩蔽了事先的设计。邓小平不在乎经济，所以允许民间自行试验；在乎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因此绝不允许违背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八十年代的政治僵化源于他的蓄意收割，经济发展源于他的无所作为。他主持的治理整顿没有什么成

就，为边缘地带的冒险家提供了各显神通的机会，反而产生了他“设计改革开放”的神话。实际上，他最初的方针是治理整顿，也就是说恢复计划经济的劳动纪律，肃清毛派造成的涣散和混乱。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成效却小得可怜。民间力量像野草一样生长，在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都产生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成就。他只能区别对待，准许或禁绝。农民的擅自行动提高了全民的生活水准，他予以追认。知识分子的擅自行动引进了危险的西方思想，他坚决清理精神污染。学生的擅自行动挑战了列宁党的政治垄断地位，他决心斩尽杀绝。这三方面的活动，在八十年代初期都是引人注目的实验。实验的结果如何，在开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邓小平的历史作用与其说是改革的总设计师，不如说是改革的总把关员。

2. 台湾战略地位的下降

华盛顿—东京—北京非正式联盟牵制莫斯科—河内联盟，发挥了旧金山体系编外保安的作用，降低了世界警察维持远东秩序的成本。莫斯科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围堵，北京只得到了登堂入室的幻觉。复辟政权暂时得到安全，却始终没有得到合法性。从板门店到金门的冷战边界只能淡化，无法抹去。北京鉴于自身地位的脆弱性，决定满足于自己能够得到的东西，维护共同抵抗苏联扩张的大局。

国会坚持美国法律高于外交政策的原则，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目的在于防范未来的尼克松，在罗马义务面前保护美国的宪法自由。远东的合纵连横在国会政治的百年大计当中，只能构成微不足道的外围因子。1979年3月3日，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对美国国务卿万斯说：“美国政府与国会制定什么法律是美国的内政，中国不予干涉。”²3月中旬以后，北京才发现《与台湾关系法》继承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核心内容：安全和军售³。此后的谈判重复了1972年交易的格局，停留在“坦率交换意见”层面，搁置没有共识的项目，经营利害一致的项目。只要苏联的威胁尚未解除，求同存异的原则就能解决问题。南越和台湾是1972年交易的主要受害者——美国过去以台湾和南越为亚洲反苏的前线国家，1972年后以中国为亚洲反苏的前线国家。台湾和越南的战略地位自然相应地下降，体现为美台断交和美军撤出南越。北京从西贡的陷落得到安慰，以为台湾早晚会重复南越的命运。

1982年，廖承志致蒋经国书宣称：“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

方有利。”“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⁴蒋经国作为资深的联共（布）党员和情报工作者，完全懂得怎样翻译统战语言。北京实际上在说：“无论你们如何伪装，国民党都不是美国秩序的合格成员。大中华主义并不比泛亚主义更符合威尔逊主义，新三民主义跟列宁主义都不符合美国宪制。美国人可以出于权宜之计保护你们，但早晚会培植更加接近这两种标准的本土派取代你们。你们为什么不在为时太晚以前，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呢？半列宁主义的政党离不开列宁主义的保护，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中华主义是你们的优势和我们的白手套，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失去利用价值。”

3. 台北流亡政权的本土化

国民党习惯将特务工作交给党内左派，以及真实或伪装的前共产党人。蒋经国深厚的苏联背景使他特别适合驾驭这些人。他麾下的前共产党人对五十年代的所谓白色恐怖负有最大的责任，老派军人或体面的资产阶级人士远不如他们擅长斩草除根。他们一方面消灭了本土士绅，实质上完成了对岸同党的阶级斗争工作；另一方面又消灭了自己在岛内的同志和晚辈，实质上完成了对岸同党的自相残杀工作。他们在前一方面的彻底性不及对岸，结果导致台湾新生代土豪提前以民主名义复辟；在后一方面的彻底性大于对岸，结果导致台湾技术官僚提前以建设名义抢班夺权。

蒋经国本人从特务首脑转型为内阁首脑，本身就反映了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发展趋势。他主持的保密局和国防安全会议在五十年代初期取代了郑介民和毛人凤的旧班底，在五十年代中晚期模仿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转型为正规的技术官僚组织，中层干部的培训和技术装备的补给完全依赖美国的对口机构。国防部情报局对应美国中央情报局，司法部调查局对应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会议模仿美国的类似做法，不设实际管理机构，协调所有情报治安机构，包括驻外武官处和岛内宪兵司令部，论实权仅次于总统和行政院长。

台湾情报机构的现代化先于军队和政府，现代化的节奏恰好跟蒋经国从保密局到国防部和行政院的节奏同步。现代化的成功就是中原流亡领导人武断权力的结束，或者说是美国世界秩序的内化。工作人员对无论民

选还是任命的领导都没有多少依赖性，但美国导师和同侪的交流共享只要中断六个月就会让他们混不下去。从此以后，周恩来和李克农的匪运工作模式实际上已经过时了⁵。

江南案的政治意义在于，美国情报机构一般能够先于台湾政治领导人了解台湾情报部门的真实做法。正式的联盟条约和外交协议是必须执行的，日常的技术培训和后勤支援不是必须执行的。前者是刚性约束，后者是柔性约束，但柔性约束产生的影响和依赖性，并不一定低于刚性约束。美台关系在刚性约束解除以后，柔性约束反而更加强大。这种基于沟通习惯的柔性规训和基于天花板约束的刚性规训构成了台湾不成文宪法的核心部分。

台湾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不在内部，而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如果盟主不是强调民主价值的美国，台湾内部的力量不一定能产生民主。同样，大清和民国的立宪政体是欧洲自由主义体系的延伸。远东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驱动力和规范力量也不在内部，而是来自世界共产主义的战略布局。成文宪法必须通过重新解释契合世界宪制的基本框架，重新解释的主要规范性力量不在台湾内部，正如十九世纪条约体系和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核心动力不在远东。

远东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知道他们是世界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也知道东亚不是世界的中心。毛泽东封闭培训出的新一代人更缺乏国际视野，被前一代人发明的历史神话欺骗。华国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在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穷途末路时仍然宣称，我们共产党人在哪里斗争，就会在哪里胜利。⁶邓小平集团在台湾问题上至少犯了三个致命的格局性错误，这是李大钊和毛泽东非常不可能犯的。他们以为北京和台湾的斗争是东亚大陆常见的南北朝斗争，时间对北朝有利，忘记了自己作为失去内亚太上皇支持的石敬瑭政权，并不是时间的朋友。他们以为国民党流亡者同时面临共产党和本土势力的威胁，最终会选择投靠共产党，没有料到国民党首鼠两端，使自己丧失了统战价值。他们以为美国像以前的国民党保护人和苏联保护人，可以在自己羽翼丰满以后反戈一击，没有想到自己的统战价值是依靠出卖苏联得到的，吞并台湾的可能性在苏联垮台以后必然迅速减少。北京的复辟政权在世界边缘停留过久，已经丧失了前辈掌握世界秩序的良好感觉。蒋经国理解他们所说的一切，但做出了恰好相反的选择。

蒋经国似乎没有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不希望出现吸引众望的明确继承

人。他不断提拔技术专家和政治外行担任副手，然后在他们积累到足够的经验和声望以后，重新换上新一代没有经验和声望的技术专家和政治外行。如果他像自己以为的那样，还可以多活十几年，李登辉是没有多少机会在1990年代继续担任副总统的，很可能在后来的继承人面前扮演类似林洋港的角色。不过，李登辉的仕途和本土化的政策是两回事。后者是蒋经国在继位以前就已经开始的布局，非常不可能因为具体人选的更动而改变。蒋经国自己主持的本土化不一定导向民主化，但肯定包括了封锁统派路径的意图。他是国民党内最了解苏联政治语言的人，而廖承志的游说已经暴露了特洛伊木马的未来安置方式。有限、可控的本土化恰好能让对方吃哑巴亏，而自己仍然处在可进可退的有利地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启动的游戏在自己身后完全失控。这主要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台湾宪制必须适应世界宪制演化的问题。

苏联在八十年代末叶的突然溃败，超出了所有各方的预料，然而就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宪制模式而言，只能认为极其自然：列宁主义以社会的敌人自居，企图以最快速度砸烂坛坛罐罐，将所有资源投入世界革命，导致下一步革命的难度大大增加。斯大林主义为了克服更加强大的免疫机制，必须将颠覆和突袭升级为长期的战争，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军事相关产业。列宁主义继承者在看得见的国家层面必然比看不见的社会层面强大得多，引起的对抗自然会超出境内社会能够支持的限度，差额只能靠不断扩大捕食对象来解决，扩大的边界一旦停滞，就是灭亡的开始。

北京复辟政权的存在价值取决于莫斯科对美国秩序的威胁能力，台北流亡政权的存在价值取决于北京对美国秩序的收买价值。柏林墙倒塌以后，两者都要面对不再需要自己的世界。华盛顿只有在自己无力单独封锁苏联的情况下，才会担心中国过于软弱，苏联解体以后，中国的强大反而有害。美国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因为中国的软弱或瓦解不是对日本有利，就是对俄罗斯有利。日本的战败取消了前一个理由，苏联的解体取消了后一个理由。美国不再需要维持中国的强大和统一，首先就体现在不再需要维持国民党流亡者在台湾的统治。

印度支那的革命政权在八十年代重演了莫斯科的二十年代和北京的五十年代，然而世界对他们的宽容度已经急剧下降⁷。免疫反应总是比病毒入侵慢一步，在人类的历史上就相当于数十年时间。他们勉强赶上了最后一扇机会窗口，他们的后辈就只能以毒品贩子和丛林盗匪的身份了此一生了。

二、全球化的重临：冷战真空和远东了遗

本节引言：

冷战结束以后，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国家失去了统战价值。国际社会不再需要南斯拉夫填补哈布斯堡帝国留下的真空，也不再需要中国填补大清帝国留下的真空。冷战自由主义衰落，认同政治上升。东欧各国民主化以后，顺利加入了威尔逊主义的国际秩序。俄罗斯无法从帝国转型为民族国家，陷入孤立。北京在政治上继续依托远东冷战结构，在经济上日益依附国际资本主义。两者的内在冲突，愈演愈烈。

1. 中国劫后社会的重建

“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美国秩序对列宁主义大家庭的统战和分化，因此只有苏联以外的次级政权才能从改革开放当中获利。如果说不结盟运动其实是投机者对美国反共斗争的消费，改革开放其实就是投机者对苏联革命斗争的消费。改革并不重要，开放才是关键，开放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放出的输液管，犒赏反戈一击的共产主义小兄弟。如果没有背叛的对象，改革就是毫无意义的喃喃自语。

苏联不仅认可、而且加入改革开放的行列，只能证明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苏联的资源已经无以为继，而且看不到扩大捕食范围的希望。其二是苏联领导人已经丧失了理解世界格局的能力，忘记了自己outlaw的身份和使命。第二种可能性如果存在，也只能在第一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以后，因为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紧紧抓住幻想，将失去用武之地的聪明才智投入抗拒现实入侵的斗争。苏联背叛自己，一劳永逸地堵死了次级政权背叛自己的可能性，以最有效的方式报复了背叛者对自己的伤害⁸。南斯拉夫作为改革开放（背叛红利）最初和最成功的消费者，为过去的投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预示了类似投机者在未来的命运。

世界秩序的外围已丧失大部分被颠覆、收买的价值，产生了一系列遭到遗弃的国家。美国的罗马性日益凸显，独自屹立在万国与毁灭之间。威尔逊主义以北约的形式，向苏联留下的真空地带输出秩序，将集体安全的边界推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欧洲边界。集体安全意味着中世纪秩序以后民族国家形式复辟，将民族国家分割开来的国内宪制和国际体系重新

结合起来。威尔逊主义要求其成员国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民主制度和决策透明度，非如此不足以保证集体安全体系必需的高信任度。北约成员国的宪制因此不能视为纯粹的国内事务，中欧各国加入北约的路线图和宪制重建的路线图在技术上没有区别。这些成员国的宪法地位与其说接近十九世纪的主权国家，不如说更接近南北战争前的北美各邦，介于主权国家和半主权邦国（quasi-sovereignty）之间，不能完全脱离没有主权概念的各邦联盟制约。

人类很容易有秩序而无自由，却很难有自由而无秩序。列宁主义残酷而彻底地收割了革命对象的秩序生产力，割草机瓦解后，劫后社会的生态多样性并不能自动恢复。波兰依靠天主教会保护，将损害降低到邻邦称羡的地步，但即使波兰复国以后的最初几次选举，列宁主义政党的残余组织仍然居于中心地位。前共产党的组织相对稳定，非共产党的反对派联盟由无数转瞬即逝的泡沫型小团体组成，直到法统重光二十年后，稳定的天主教保守政党和稳定的自由主义政党才最终取代前朝余孽。东欧其他各邦的社会生态通常不及波兰，巴尔干尤甚。他们的加盟与其说是对北约力量的加强，不如说是对美国秩序输出的消耗。鉴于党国集中了所在社会的近乎全部组织资源，诸如此类的现象并不令人惊讶。

孤立无援的个人谈不上立场和主张，正如圆形和三角形谈不上红色和蓝色。只有在丰富繁茂的组织网络和关系网络存在的前提下，个人的判断和选择才有意义。组织资源的生长和积累当然需要充分的时间，收割和破坏却是迅速而容易的。割草机蹂躏后的荒地即使重新长满青草，生态多样性通常都恢复不到收割以前和没有经过收割的外邦水准。某些草地经过收割以后，就会永远沦为沙漠，或是退化为生态多样性较低的另一社会。

掠夺性的专制主义自古以来就是造成文明衰亡、退化或受限于低天花板的主要原因，罗马以后的西亚和秦政以后的东亚就再也没有恢复希腊和诸夏的璀璨。列宁主义的收割能力为历代专制主义所未有，它是否能成功入侵就是对目标社会的考验和甄别。如果列宁主义确实承载了某种历史使命，最合理的答案就是淘汰和筛选。

第一和第二南斯拉夫堪称欧洲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于铁幕背后的东欧各邦，值得予以特殊的重视。东欧的民族发明是1848年原则的最初和最经典实践，不仅解构了大德意志、大俄罗斯和奥斯曼主义，而且将历史上的大波兰和大匈牙利重新解释为高度同质化的小共同

体，预先扫清了从族群到民族、从民族到国族的道路。苏联的征服仅仅带来了共产主义的楚门世界，对民族国家的建构没有明显的妨碍。波兰和爱沙尼亚只需要摆脱苏联，就会比较廉价地返回欧洲各民族国家的行列。贝尔格莱德的民族发明在欧洲属于特例，走上了大德意志、大俄罗斯和奥斯曼主义的路径，企图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建立超民族的帝国结构，却又不具备圣彼得堡、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秩序输出能力，结果结合了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弱点。这样的政治实体得以产生和存在，主要不是因为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敌人的站队错误和自己的投机正确。

列强允许东正教的塞尔维亚统治欧化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主要是为了惩罚哈布斯堡家族投靠德国，正如盟国允许蒋介石统治满洲和台湾，主要是为了惩罚日本背叛英美。否则东方化的落后者企图统治欧化的先进者，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激起剧烈的冲突。西方资助和保护红色南斯拉夫，主要是为了奖励铁托对斯大林的背叛，正如美国禁止莫斯科核平北京，并不是认为毛主义比斯大林主义更优越。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帝国烟消云散以后，第一南斯拉夫很快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苏联解体以后，第二南斯拉夫不可能长期维持。米洛舍维奇的站队错误加速了瓦解的过程，破坏了捷克式和平过渡的机会。结果大大延长了塞尔维亚人融入欧洲的时间表，进一步扩大了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之间的文明落差。

2. 最大的秩序真空俄罗斯

北约容纳波兰和爱沙尼亚，主要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演化；容纳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主要是为了避免留下危险的秩序真空。然而，最大的真空位于俄罗斯本身。布尔什维克入侵俄罗斯最久，手段最残酷，秩序资源损害最重。体制之外，唯有散沙。波兰天主教会既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一部分，又是波兰民族的避难所和种子库。而俄罗斯东正教会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沦为远东共和国式的代理人机构。海外东正教会在统战、诱捕白俄侨民和渗透、颠覆东道国的事业当中，没有辜负克格勃的苦心经营。安利烈·巴甫洛维奇·虞（虞洽卿）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为五卅事件和上海暴动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国共斗争的关键时刻为康生和陈赓的地下工作提供了保护⁹。即使体制内部，大多数外围党员和普通官吏也没有非体制的组织资源、经济来源和信息渠道。克格勃是唯一的例外，得以豁免计划经济和洗脑教育的约束。他们为了完成特殊任务，有权深入海内外社会的方方面面，经营各种黑社会和地下

经济，接触普通党员（更不用说平民）不可能接触的三教九流和各种信息。真空期的权力由没有组织能力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手中落入他们手中，并不令人意外。

普京政权大体是强力部门核心和国企经济、技术官僚外围合作建立的寡头政权，继承了斯大林主义核心党和外围技术官僚的大部分构架，只是丧失了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和认同政治。普京政权在东正教保守主义和欧亚主义之间犹豫不决，无法解决自己的身份和使命问题。复活的资本主义和东正教会仍然非常脆弱，只能依附体制，远远没有恢复到斯托雷平时代的水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并不依赖他们的努力，而是依赖原材料出口和组织原材料出口的寡头。社会由于家庭瓦解、人口老化和农村空虚，既无力支持、又无力约束或反抗过于庞大的体制负担，大体上延续了后斯大林时代的萎缩趋势。只有高加索和中亚的部族和穆斯林社会保存了充分的组织资源，几乎可以肯定会在不远的未来输出他们的秩序。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社会、政治结构本来接近俄罗斯模式，主要因为地缘上接近北约边界，自身体量和秩序输入需求较小，可以奢望搭便车选择另一种命运，结果由路径分歧发展为地缘政治分裂。俄罗斯为了干涉欧洲边界事务，不得不公开毁弃条约义务，进一步减少了融入世界体系的机会。

3. 远东的秩序孑遗

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后，欧洲冷战结构已经片瓦无存。威尔逊主义经过近百年的反复和斗争，大体上实现了1919年的期望。远东的安全结构仍然延续了旧金山诸条约的框架，只是冷战边界的对面突然沦为孤儿：北京丧失了出卖莫斯科的红利，重要性急剧下降；平壤失去了操纵莫斯科和北京的红利，迅速沦为饿殍；河内丧失了向莫斯科出卖北京的红利，转而依靠向西方出卖北京的红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亚大陆各自寻找自己的角色，北京与河内的代理人战争随之丧失了投名状价值¹⁰。北京的处境比河内更加困难而复杂，恰好就是因为它廉价地继承了共产国际和新三民主义的双重遗产——如果河内的共产主义崩溃，法国人发明的国语和天主教会足以保障一个、或南北两个民族国家的建构。而如果北京面临同样的处境，就会发现自己没有一个可供回归的波兰共和国法统和波兰民族共同体。

除了残余的列宁主义结构以外，东亚、内亚别无秩序可恃。如果西方遗弃了这片广大的土地，列宁主义团体和流民散沙就会濒临相互残杀和吞噬的命运。非洲在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十年，就切实体会了遗弃比干预更加可怕的残酷事实。外来的秩序无论多么恶劣，至少还能防止无政府状态。如果社会内部缺乏产生自发秩序的能力，又没有可以依托的政治框架，那么外力的撤出非但不会带来自由，反而会导致社会的瓦解和长期的动乱。只有对于有能力产生和输出秩序的共同体，外来干预才是负面因素。若非如此，秩序赤字就比秩序输入危险得多。

4. 中国走向市场列宁主义

八十年代中共的整党大致恢复了苏联的干部党模式，前毛泽东时代的苏联班底肃清和屏蔽了梁山好汉。情治单位一直是他们的保留领域，即使毛泽东的风暴都只能扰动表面。邓小平提拔数理化干部，刻意绕过老列宁主义者的禁脔，插入地方、经济和科教文卫部门。后者更加引人注目和有利可图，但在信息和组织方面仍然处于劣势。计划生育制度完善后，计划经济体系终于补上了最后一个缺环。劳动力供应、生产规划、消费规划三者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¹⁴。

然而，巅峰就是毁灭的开始。不完善的计划经济能够勉强维持，是因为体制边缘的灰色地带还有残余的自留地和黑市。体制一旦完善，就会立刻停止运转。列宁主义者必须选择，首先牺牲哪一部分。邓小平决定抓紧政治和文化，放松经济，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对他的团体最不重要。如果失败，体制遭到的冲击最轻。邓小平别无选择，走上了市场列宁主义的道路。

苏联解体恢复了一战以前的全球化格局，只是美国的自由民主主义—威尔逊主义体系取代了英国的自由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列宁复辟政权可以扮演经纪人的角色，将散沙劳动力出售给世界市场。九十年代的改革反映了权力结构的发展趋势，继续以避重就轻为主要原则，巩固接近中央和核心的组织，遗弃基层和外围的组织，部分引进了桑弘羊和王安石的技术，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托勒密社会主义”，将国家机器变成了盈利活动的主体，尽取地方膏脂充羨余，应验了聚敛之能臣、财聚则民散的古训。地方民政机构涣散，中小城镇社会解体。《东京梦华录》和《金瓶梅》时代的消费性第三产业取代了斯大林主义的废旧工业，重现了蔡京承诺的丰亨豫大之盛。

市场列宁主义意味着东亚、内亚居民分为两个社会：有组织的列宁主义者和无组织的劳动力。无组织劳动力属于世界市场外围，得以避免张献忠社会应有的命运；有组织的列宁主义者向散沙劳动力征收组织红利，得以避免张献忠社会应有的命运。无组织劳动力包含了廉价的意义，但不限于廉价：待遇是权利的外围，而权利则是组织资源的外围。自由主义者认为列宁主义团体应该为苦力的命运负责，社会主义者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应该为苦力的命运负责。显然，双方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只要莫斯科的原材料仍然能够出口，俄罗斯就能在威尔逊体系之外继续存在；只要北京的无组织劳动力仍然能够出口，中国就能在威尔逊体系之外继续存在。

二十一世纪初，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达到最高峰。世界贸易组织为东亚人力资源的出口提供了方便，经济融合的发展遮蔽了安全困境。前者源于无组织劳动力，后者源于列宁主义残余。时间放大了冬虫夏草共和国的形态分裂，东食西宿变得越来越困难。邓小平时代的内外分割产生了类似明治宪制的效果，“摸着石头过河”解决不了十字路口的抉择。

列宁党核心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性，必须证明全世界的错误，否则他们入侵东亚、内亚的历史进程就足以给自己定罪。韬光养晦和改革开放本身都只是工具，最终目标仍然不能超越列宁主义原则允许的范围。外围党¹²为了长期享受全球化经纪人的利益，渴望将冬虫夏草改造或伪装成正常的昆虫。他们像昭和帝国的国际协调派一样，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因素，注定居于劣势。他们无法提出体制可以接受的国家目的，除了其他集团无法分享的自私利益以外。他们只是体制和国际社会的中介，在内外双方都没有足以形成力量的组织资源。他们唯一的优势在于，他们理解当代世界体系和列宁主义残余的结构性冲突，然而除非否定后者的正当性，就无法将真正的理由解释清楚。历史犹如投入水中的石块，波澜从中心向边缘不断扩展。中华民国继续生活在漫长的十九世纪，直到短暂的二十世纪以共产国际的形式破门而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继续坐在旧金山体系的旁枝上，而且还要竭尽全力砍伐身后的树枝。

三、罗马世界的挑战者和投机者

本节引言：

北约东扩以后，威尔逊期望的世界秩序进一步发展。美国变成独一无二的大国，对世界其余部分行使罗马式的权力。远东残余的冷战结构，构成世界体系完成的障碍。台湾国家认同的形成，也体现了新旧体系的转型危机。北京一方面掩饰两者的结构性冲突，以投机的方式在国际体系中牟取实利；一方面将经济利益转化为军事实力，向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挑战。远东局势紧张，导致美日联盟强化和军备竞赛升级。

1. 罗马秩序的形成

1989年结束了短暂的二十世纪，正如1914年结束了漫长的十九世纪。在国际体系存在（近代欧洲的历史范式往往使人误以为它是永恒的）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外交、联盟和对抗产生于实力相近的大国或政治联盟之间。实力不在同一数量级的弱小国家只能作为联盟的一部分实施有效干预，或者根本不能实施有效干预。只有在迦太基灭亡到埃及灭亡、以及柏林墙倒塌至今这两段时间内，国际体系呈现极为独特的现象：第一，国际体系仍然存在，并未或尚未被帝国结构取代。第二，罗马之外的旧日列强完全解体，任何其他实体或新兴实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达到实力相近的数量级。罗马有能力仅仅依据国内和盟国的需要实施单边行动。加强国内力量或缔结反罗马联盟的努力会增加、而非减少失败的危险，远不如游说和争取罗马政治家和选民政治集团更现实而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民的朋友”资格变成了最大的国家利益。获得元老院的安全承诺，跟已经获胜没有实质区别；争取罗马人民的不干涉承诺失败，跟已经失败没有实质区别。如果元老院宣布帕加马为罗马的敌人；该国就会被邻国和国内敌对政治势力瓜分，因为这是唯一能增加权力而又不冒毁灭性风险的途径。于是，罗马世界的国际纠纷逐渐从属于罗马各党派的斗争。政治习惯长期化，形成路径依赖。最后，这个利益攸关者组成的多国共同体被公认为“罗马帝国”（尽管从法律上讲，“罗马人民的朋友”有自己的元老院和民众会议，还有其他某些部分甚至连罗马的行省臣民都不是）。

罗马世界并非产生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扩张意志，而是产生于罗马宪法与世界秩序的自然交融。希腊和东方各邦逐渐丧失了产生和维持国内外秩序的能力，越来越频繁地求助于罗马的干涉。罗马一旦撤回它的干涉，造成的局势不是独立而是混乱。最后，罗马的仲裁权构成了文明世界各邦不成文宪法的核心。

外邦人反对单边主义的呼声和冲突实际上不断强化罗马秩序，因为这些反对只有两种来源：其一，罗马盟友或利益攸关者有不同意见。无论这种意见是否能改变罗马政策，都会开启或强化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对罗马政治结构的依赖程度。如果诉求针对罗马，主要就会增加罗马的权威，其次才会增加诉求胜利者的权威，最不可能增加诉求失败者的权威。中国的科索沃外交、利比亚外交属于这种模式。其二，不对称政治集团发动的非常规战争。这种战争不可避免会损害罗马秩序，从而损害盟友或利益攸关者。后两者的自卫和反击能力远不及罗马，因此势必形成维持秩序的国际协调行动。这种协调主要有利于罗马，在较小的程度上有利于后两者；但后两者不能采取其他行动，因为它们无法承受即使是较小的损失。中国的反恐外交属于这种模式。当代世界体系没有或尚未彻底罗马化，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自身。

2. 威尔逊主义的约束与挑战

威尔逊主义根植于清教徒的古老传统，本能地厌恶帝国的负担，然而即使在冷战胜利以后，现实政治仍然只能满足威尔逊主义的最低标准，仅仅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实现法律对权力的征服。威尔逊主义的最高标准要求政治德性相近的各成员共同维护集体安全，结束势力均衡定期破裂造成的战争。由于各行为主体的政治德性和政治制度相去甚远，威尔逊主义从来没有实现其最高纲领。事实上，美国推动集体安全的努力将世界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威尔逊世界构成世界秩序的核心区，建立在价值观同盟的基础上，实现了北约和其他主要盟国的整合。霍布斯世界由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的中间层国家组成，延续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外交模式，不断引起争夺势力范围的局部战争。达尔文世界由名存实亡或名实具亡的外圈国家或地区组成，不能有效地保护或管理其居民。这里的居民依靠亚国家层次的小团体维护自己的安全，暴力通常是小团体相互交流的主要语言。

美国对待中间层和外围并无善策，只能摇摆于输出价值观的帝国主义和养痍遗患的绥靖主义之间。今天的霍布斯式国家虽然为数众多，只有俄罗斯、中国、伊朗三者有能力、欲望和机会攻击威尔逊世界及其集体安全主义。其他霍布斯式国家，例如印度或印尼，如果能够得到机会，更加乐于加入威尔逊世界，即使做不到，也没有推翻世界秩序的能力或动机。冷战结束以后的二十多年来，中国对世界体系的挑战性日益上升。俄罗斯虽然在军事上比中国更强大，但其认知结构和历史路径融入国际体系的广泛和深刻程度非中国所能比拟。俄罗斯虽然坚持一战前的霍布斯式博弈模式，不肯完全接受威尔逊主义的约束，但其觊觎范围和冲突风险局限于本国周边地带，没有在全世界范围扩展势力的迹象，更没有颠覆国际主流价值观的能力和期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虽然遍及全世界，但其挑战仍然很难达到主权国家的层次，除非被更有力的挑战者利用，不大可能造成危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局面。

第二次金门危机以后，旧金山条约体系长期没有遭遇挑战。1996年台湾危机重新启动了沉睡已久的军备竞赛，预先断送了市场列宁主义自发演化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机会。北京由此体会到没有苏联可以背叛的灾难性后果，看清了美国秩序当中没有自己希望和需要的位置。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释放了更加明确的信号，威尔逊体系的扩张必须以牺牲错误的建构为代价。核心党必须建立足以抵抗美国秩序的强大力量，全球化贸易的红利必须用于长时段的军备竞赛，保证2016年面临同样的对抗时，不致于遭到同样的羞辱。这项计划大体上获得成功，证明市场列宁主义仍然是列宁主义。韩国或智利的威权政府如果面临同样的挑战，根本不具备自力更生重振旗鼓的能力，然而正是因为国家汲取能力的不足，幼弱的市民社会才有长大的机会。

东亚资本主义的成功转型主要是美国秩序保护和约束的结果，旧金山条约边界对面的流产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明。太平洋边界的封闭导致了内亚边界的开放，上海合作组织恢复了蒋介石1935年和毛泽东1954年的致命布局：背靠俄罗斯和内亚，以太平洋海权为假想敌。如果世界上存在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战略，二十世纪的三次内亚战略就是最经典的例证。1972年外交革命提供的保护一旦解除，北京的幸运就到头了。挑战性的安全政策和附庸性的经济政策总有一方会吃掉另一方，否则就会引起内部的撕裂。如果前者吃掉后者，北京就会在一场小型冷战中扮演前苏联的角色。如果后者吃掉前者，实际上等于以更高的成本返回比1989年更恶劣的地位。旧金山体系在解除了苏联的主要威胁以后，应付这样的次要威胁并不费力。

3. 日本地位上升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第五部分解释说：“周边事态是指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态。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性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¹³1997年11月，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代理会长安倍晋三进一步解释说：“谈到周边地区范围时，必须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所以，这一地区就是指菲律宾以北，理所当然也包括台湾海峡在内。这是常识。因为没有必要特意去刺激中国，所以就不对包括哪些地区作限定……把台湾海峡从适用范围中排除出去，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中国没有承诺不使用武力。如果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排除台湾，就有发生武装入侵的危险。”¹⁴2004年11月，日本防卫厅提交的研究报告断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为钓鱼岛和东海边界问题付诸武力或武力威胁。2012年，美国发布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二十一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2013年，北京的进攻性行动从东海到南海全线展开。2014年，日本在美国的鼓励下重新武装。安全政策明显压倒了经济政策，TPP和“一带一路”的分裂预示着不详的未来：东亚、内亚体系即将像冷战时代的经互会一样退出资本主义主流，另立平行体系。与此同时，台湾的共同体塑造也发展到了瓜熟蒂落的季候。

1995年3月，冈崎久彦的《台湾问题》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中国率先支持台湾独立……作为同一民族的亲近感便会极为强烈，也可能建立起像19世纪后半叶德奥同盟那样的关系。”中策是：“在维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大陆率先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若将这种想法付诸实施，那么在国民党执政期间便是最后一个机会。如果失去这个机会，由民进党掌权，那么纵然国民党在其后的选举中卷土重来，在承认‘一个中国’这一原则问题上，似乎也很难得到台湾人的一致同意。”下策是：“以武力征服台湾的话，那就不仅会给台湾人的心理留下希特勒鲸吞奥地利那样的不信任感，而且还会像希特勒那样使日本、俄罗斯、印度和东南亚所有的国家都感受到中国的威胁，中国则会日益孤立。”¹⁵此后的二十年，北京分毫不差地执行了他预见的下策。

4. 台湾认同转移¹⁶

马基雅维利总结僭主的艺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树敌而不能剥夺敌

人报复的能力，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愚蠢的策略了。北京的威胁有足够的恶意而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台湾命运共同体送来了恰到好处的死亡恐惧，大大加速了划清边界和巩固认同的进程。2015-2016之间，台湾的政治生态面临重大调整的可能。如何利用或引导暗流和伏脉，足以影响主要政治势力、乃至台湾本身在今后几十年的路径。2014的地方选举是国民党的失败，但并不一定是民进党的胜利，只是制造了一个有利于民进党胜利的机会。国民党丧失人心的迹象极为明显，而民进党对民情和国际形势的反应也相当迟钝，只是比更加僵化的国民党略胜一筹而已。2014年的胜利毋宁说是台湾民族的护国战争，缺少领袖的台湾人民强迫民进党事后充当领袖，拖着他们的领袖拯救了他们的命运方舟。与此同时，缺少传统政党形态的第三势力小团体开始积蓄政治资本。流俗的意见认为，蔡英文躺着也能赢得2016。其实，民进党的前途面临重大挑战。

如果你的胜利主要依靠敌人的弱点，就说明最大的困难还在以后。失败的国民党人扬言：民进党一旦上台，就会像他们一样暧昧。如果民进党应验了他们的预言，使选民觉得他们只是一个褪色版的国民党，就会发生对民进党和台湾都是最危险的前景。第三势力反对民进党，分割起选票，使国民党卷土重来。民进党在自我定位上达不成共识，试图用暧昧的语言游戏敷衍人民，失去了引导第三势力和民间团体的道德威望，导致台湾政治生态香港化，众多相互争执的泛民小党比两大党更加脆弱，更难抵抗渗透和颠覆，在潜在的同盟者眼中丧失了大部分利用价值。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民进党重视同盟者超过基本教义支持者，特别容易促使这种危险实现，反而特别可能因此同时失去同盟者和支持者。

因此，如果有人建议民进党效法成熟民主国家的共识政治，压制基本教义支持者，争取中间道路骑墙派选民，依据北京华盛顿共管的原则处理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换言之，实现一个没有马英九的马英九政府，那么他实际上是在毁灭民进党和台湾的未来。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台湾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躺在粗心大意的护士和处心积虑的恶狼之间。适用于成熟共同体的政治法则，对台湾异常有害。这些共同体早已度过了生死未卜的危险窗口期，而台湾尚未完全度过这段时间。台湾的政党政治仍然属于塑造共同体的生死斗争，不是共同体内部的俱乐部斗争。在成熟共同体的共识政治中，根本问题是政策。在塑造共同体的斗争时期，根本问题是认同。台湾不是今天的欧盟，而是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二十世纪的波兰和今天的乌克兰。

怎样的政策调整能够让北美的保王党人满意呢？除非美国不复存在。怎样的政策调整能让顿巴斯的哥萨克人满意呢？除非乌克兰重新变成小俄罗斯。美国的国本之所以能够稳固，就在于占精英人口三分之一的保王党逃亡加拿大。波兰民族之所以没有从世界历史上抹去，就在于号称自由联盟的亲俄派大贵族逃亡圣彼得堡。这些大贵族反对波兰独立的理由酷似马英九支持服贸的理由，梦想获得沙皇的特殊政策和欧亚内陆的广大市场，把独立的波兰视为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反动。乌克兰原本是东欧比较富裕的国家，因为认同和路线的分歧而摇摆不定，结果在邻国已经接近欧洲水准的十几年后仍然跟前苏联时代一样贫困，最终导致了今天的战争。如果台湾在太平洋路线和亚洲大陆路线之间长期摇摆不定，并非不可能落到某种类似乌克兰的下场。大党的义务就是将路线和方向放在具体利益之上，否则很快就会丧失引导国民的资格，沦为仰人鼻息的分赃小团体。绝大多数民族共同体都诞生于认同和路线的边界分割，因为共同体的定义就是边界。划定边界的过程通常是残酷的，以致于大多数成熟民族都宁愿忘记这段历史。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即使美国这样得天独厚的共同体，都必须迫使保王党人在归化和流亡之间做出选择。

5. 国民党的未来就是没有未来

民主国家的简单常识是：拒绝认同的政党长期占据国会四分之一以上议席，不可能不干扰民主的正常运作。国本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对国民的幸福和前途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台湾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民主斗争同构，认同斗争也就伪装成了政党政治。作为过渡时期的策略，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过渡时期的特点就是不进则退。人民总是厌恶随波逐流，缺乏方向感的领导人。暧昧者失去未来，这是一定的。今天的形势已经给了民进党巨大的机会，可以结束不健康的伪两党制，开辟没有认同错乱的真正民主政党政治。这种政治有两种最为有利的形式：其一，民进党转型为审慎型绿色大党。台联或其他小党吸收第三势力和民间团体，形成理想型绿色大党。国民党亲民党化。两大政党分别吸收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元素，逐渐发展为波兰式的两党政治——保守民族主义党和自由民族主义党轮流执政。其二，民进党扮演以色列建国初期的工党角色，周围环绕大批没有能力单独执政的小党。小党由第三势力、民间组织和泡沫化的国民党组成。在这两种情况下，台湾的国本将会坚如磐石。国家安全和民主权利和太平洋愿景结成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发挥相互支持的作用。这样的未来需要民进党的远见和审慎、台湾

人民的勇气和德性、国民党和北京的自我毁灭性。在这三者当中，最后一项几乎肯定会成为现实。前两项则有赖于当事者的决断。

国民党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认同错乱，它选择的路线本身就是绝路。它在南京执政的短期内，迅速将自己引向毁灭，一点都不是偶然的。数千年来，亚洲内地一直是血腥杀戮的现场。任何深陷其中的政权都将面临选择：或者用最野蛮的手段维持统治，或者灭亡。即使没有共产党存在，这一基本格局仍然无法改变。即使没有美国日本和自由世界，朝鲜越南这样外邦至少也得以逃避改朝换代的大屠杀，保存了在中原早已灭绝的明朝以前居民后裔。国民党的特洛伊木马工作也许能破坏台湾，但怎么也挽救不了自己。路线的失败就是最根本的失败，国民党的未来就是没有未来。它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不定，而两条路线共同的特点都是越走越窄。第一条路线就是依靠北京的支持，用战争恐吓自己本应效忠和保护的人民，越来越像香港地下党。第二条路线就是赶末班车，依靠地方派系向浅绿发展，多半会导致国民党的分裂。

6. 北京追求霸权

北京政治核心的认知图景包括两种关键元素，中国革命史叙事和大国复兴叙事，两者相互构成对方的合法性基础。前者是弱者（中国共产党）依靠高明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征服其前任盟友和保护人的故事。弱者首先要取得强者的保护，但不能诚实地忠于强者，而要在表面忠诚的掩饰下，寻找强者的弱点和敌人，利用保护人的敌人攻击保护人的弱点，再利用双方两败俱伤的机会，推翻或取代原先的保护人。从北京的角度看，国民党、苏联和美国相继扮演了愚蠢的保护人角色。他们首先以国民党附属势力的身份，争取到生存的权利；然后利用国民党的弱点和日本对国民党的进攻，在苏联的保护下取代了国民党。他们仍然以苏联附属势力的身份，依靠在朝鲜战场和其他地方为苏联服务，争取了独立政治实体的身份；然后利用苏联的弱点和苏美斗争，在尼克松和里根的保护下推翻了苏联的霸权，尽力将苏联势力从第三世界驱逐出去，直到苏联解体。他们最后以美国合作者的身份，以免费搭车方式分享反恐战争和世界贸易的利益，用韬光养晦掩护了大国崛起的战略；同时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联络美国敌人，即使这些势力同时也是中国的敌人，例如2001的石原慎太郎和塔利班，当然还有失败的俄罗斯，希望这些势力的反美活动能够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机会，修改近代以来一直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从北京的角度看，九一一事件、克里米亚战争和伊斯兰国都有效

地发挥了牵制美国的作用。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将中国共产党由没有寸地尺天的小团体变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再变成东亚大陆的统治者，如今又要变成平行世界体系的创造者。

只有至高无上的目标才能为这些马基雅维利的手段辩护，大国复兴叙事构成了这种目标。这种神话宣称：西方势力在十九世纪深入东亚以前，远东的文明或天下体系曾经是世界中心。西方中心的近代世界夺走了中国应有的地位，其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国的侮辱和伤害。远东文明即使没有引进西方的因素，同样有能力自己实现近代化。天下体系体现了家长制的温情主义，比利益本位的西方国际体系优越。中国负有改造国际体系的天然使命，只是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韬光养晦。实力一旦充足，大国崛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大国崛起的目标是恢复天下体系，其标志就是周边小国的臣服和丝绸之路的复兴。因此复兴的中国必然会在内亚和太平洋推行扩张性政策，即使一切形势都对它不利。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马基雅维利能力才能实现天下体系的复活，其他势力或原则都不可能做到，因此中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统治。因此大国崛起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正当性和统治合法性的最终验证，放弃无异于承认自己不仅无权统治中国，而且为篡位犯下了各种大逆不道的罪行。如果这种认知图景是无法改变的，未来的悲剧就是无法避免的，不到资源枯竭迫使它修改认知图景，斗争就不可能结束。在此期间，任何低于彻底投降的任何局部妥协都不可能诱使北京放弃颠覆和渗透。所以对于台湾而言，最能强化共同体认同的政策反倒是最明智的。

7. 台湾面向海洋

小渊惠三时代，自民党曾经策划冷战后的政党格局演变，希望结束保守党和社会党对抗的局面，代之以两大保守政党对抗的局面。经过小泉和安倍，这种设想基本实现。目前民进党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战略。以下几项政策是值得考虑的。国民党长期掌握基层政权，与其并不正当的灰色资金流关系密切。2016以后的民进党政府如果错过了清算黑金的大好机会，就是对未来不负责任。党产和腐败问题不仅仅是转型正义的问题，关键在于非清算不足以重建基层政治结构，非重建不足以稳定国本。台湾军队的现状不大适合它的长远安全需要，高级将领太多而中级军官不够多。好的军队应该有优秀和大量的中级军官和士官生，足以为一支比正常情况大十倍的军队提供指挥官。高级将领人数多而在职久，对良好的指挥系统并不有利。未来十年几乎肯定是美日联盟军事部署调

整的时代，有必要及时加入军事单位之间的磨合。共同体团结需要将以色列使命（出埃及）、命运方舟和太平洋愿景结合起来，给人民提供认同和方向。

台湾的地缘和经济形势都最适合两个世界的枢纽。一方是美日和技术来源，一方是印度南洋和劳动力来源。随着北京的人口老化和挑战政策，高速增长区肯定会移向印度和南洋。TPP完善后，世贸组织将会边缘化。台湾把握这两大调整，就能奠定数十年的基本路径。芬兰过度依赖容易到手的苏联市场，结果在1990年代损失惨重，有必要未雨绸缪，防范类似的损失。日本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了解东亚，台湾附近水道的安全尤其是日本命运所系。就亚洲大陆霸权国家造成的潜在不稳定局势而言，日本和台湾有最多的共同利益。美国维护亚洲太平洋的平衡，不允许大陆强权改变均势，是它的利益所在和长期政策，台湾做什么或什么都不做都不会改变。因此台湾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共同体塑造的关键问题上，完全可以先发制人，制造既成事实。如果必要，甚至可以诉诸美国选民的宗教和道德直觉，抵制少数专家和官员的现实政治。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看，台湾在这些手段上不是失之过度大胆，而是失之过度谨慎，错过了许多维护国际地位的机会。韩国和以色列在类似的情况下，比台湾更善于利用美国的基本布局。所以无论从台湾国内还是国际因素考虑，未来五到十年都是决定长期走向的关键时刻。民进党如果仅仅以寻常政党轮替的观念考虑问题，就会辜负难得的历史机遇。

四、远东冷战体制的最后崩溃

本节引言：

2012年以后，北京放弃了长期的韬光养晦政策。融入世界，此路不通。苏联的经验证明，共产主义的结束意味着帝国的解体。北京结束暧昧，做出相反的选择。只有共产主义统治才能维持帝国，只有帝国才能延续共产主义统治。斗争沿着帝国边缘展开，从钓鱼岛、台湾海峡到南中国海。东亚大陆的结构重组，已经无法避免。

1. 中国告别韬光养晦

从1947年到1953年，共产党方面的人事部署有连续性。朝鲜停战后，大部分负责人员才以鸟尽弓藏的方式重新安置。这些现象说明在他们心目中，远东战场是连续的整体，辽沈战役和朝鲜战争属于同一战役不同阶段，撇开这一点是不可能理解朝鲜战争的。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的外交政策并不以中国为独立的行为主体，而是以社会主义阵营为统一的行为主体。金门危机开启了中苏分裂，关键不在于中国本身的外交政策，而在于中国企图以自己的单方面行动，将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拖入对美国的斗争。这是卢沟桥策略的重演，首先绑架“老大哥”党，发动针对共同敌人的大战。“老大哥”党在统一战线的初期仍然是自己的上级，在结束时就变成了自己的同僚。赫鲁晓夫采取了跟蒋介石相反的策略：对共同敌人缓和，压制好战的“小兄弟”党。这种策略锁定了毛泽东的博弈空间。他为了证明苏联路线的错误，不得不在国内外同时向左转，从而产生了文化大革命和亚非拉输出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肃清苏联-共产国际在党内和国内的班底，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列宁主义在组织、人事和政策上的体现。输出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共同抗战渗透、颠覆和取代苏联在全世界敌后战场的班底，使其沦为第三世界革命群众当中的孤家寡人。在1965-1971年之间，两方面的企图都惨遭失败。印尼和越南代表亲华共产党的失败和亲苏共产党的成功，林彪事件证明列宁主义者在组织上比毛派更强大。

1972年外交革命将毛泽东从极度孤立和危险的国内外局势中解放出来，体现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最高成就。他不仅挽回了挑战苏联造成的外交困局，而且锁定了党内列宁主义者的选择余地。如果中国沿着1972年以

前的路线前进，党内列宁主义者很可能在他身后回归苏联。这样一来，否认文革和回归苏联正确路线就是同一件事。五十年代的历史叙事将不得不恢复，苏联的英明和慷慨又将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原因。为了维护这种叙事，他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会沦为某种反苏错误路线的主要责任人。

1972年外交革命以后，美国实质上接替了苏联-共产国际维护中国共产党地位的任务。毛泽东的任何继承人都必须既是共产党人，又亲美反苏。这样一来，他们根本不敢冒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党内列宁主义者甚至并非注定复辟成功。他们拨乱反正的最初目标是恢复刘少奇路线，而非改革开放。如果邓小平在不涉及统治权的一切问题上没有表现出足够灵活的态度，或是毛派能够足够残酷、狡诈、果决地将“反对特权阶级”和“群众自发致富”解释成同一件事，则鹿死谁手，犹在未定之中。这种博弈能力对首先臣服、然后企图取代国民党和苏联的鸿门宴政治家而言，要求并不过高。欧洲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虽然并不缺乏聪明才智，却不大可能胜任这样的博弈，因为他完全不具备必要的认知图景。美国传统的新教徒和威尔逊主义者只能看到现象，无法解释原因，除了无神论者的卑鄙残暴以外，很难得出其他的结论。

在美国决策者的认知图景中，冷战的胜利一劳永逸地奠定了威尔逊主义和集体安全的基本原则。它不考虑，更不允许世界回到霸权主义和势力范围的旧轨道上。从它的角度看，这种返祖现象正是战争和动乱根源。在中国决策者的认知图景中，苏联（虽然迟了二十年）的瓦解是中国英明和胜利的证明。它是国民党遗产和苏联遗产的当然继承人，无需忌惮美国以外的任何行为主体。它无意直接挑战新的“老大哥”，但肯定会要求在新的统一战线中索取越来越大的份额。从它的角度看，它当初并不打算推翻国民党，只要国民党承认它在抗战中日益提高的地位，最终的决裂不是它的错；它也并不打算取代苏联的领袖地位，只要苏联承认它在朝鲜战争后日益提高的地位，最后的决裂也不是它的错。它始终不想决裂，但前提是老大哥要识时务。如果老大哥拒绝它的要求，它自然会解释成霸道和自私。老大哥提出的意识形态理由，在它看来只能是遁词。它自己经常运用类似的手法，不可能上当受骗。

它在具体问题上能够忍耐和妥协，因为它根本的目标不是钓鱼岛、南海诸岛或台湾。如果当前的博弈对它不利，它当然可以等待更长时间，既然它已经等待了如此之久。然而，钓鱼岛并不比1960年代的珍宝岛、

1940年代的淮安和延安更重要。韬光养晦的根本目标是付出最小代价，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地位。任何错误都是具体的、技术性的，因为目标本身没有、也不可能有限度和边界。如果具体的举措成功，就证明过去的决策犯了过于保守的错误，今后需要更加大胆。如果具体的举措失败，就证明过去的决策犯了过于冒进的错误，今后需要更加谨慎。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基辛格的定理都仍然具有荒谬的真实性。美国的强硬会带来友好和稳定，美国的友好会带来敌视和动荡。如果决裂的危险确实存在，那就最有可能出现在以下的博弈路径中。美国的妥协态度造成了危险的误判，促使中国在错误的时机提出了重新分配势力范围的要求。

中国统治核心决定结束韬光养晦，首先体现为侧翼包围的战略构想。中国自身就是苏联在欧洲失败后，在远东侧翼包围帝国主义的战略产物。中国通过地方军阀、分裂势力和知识界的统一战线，实现了侧翼包围国民党的布局。中苏决裂后，中国经营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就是故伎重演，企图侧翼包围苏联。今天，中国领导人涉及了“一路一带”方案。一路是中国到西亚的中亚陆路，一带是中国到西亚的印度洋海路。从经济角度讲，这项计划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一路一带”涉及的所有地区都具备不宜投资的特征：政局极不稳定，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盛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缺乏熟练劳动力。几乎所有的投资项目都会血本无归，很难视为愚昧的产物，因为中国在东南亚和非洲投资，有长期和丰富的经验。这些项目本质上是战略性的，因此经济上的损失并没有超出决策者的预期。计划的成功能够造就小型的朝贡贸易体系，使中国能够通过亏本生意-变相资助，培养一个稳定的卫星国群体，打破它最为恐惧的地缘封锁，将威尔逊体系降格为地方性霸权同盟，然后展开逐鹿中原的游戏。在这场游戏的终点，中国将恢复它想象的“天朝”地位。中国人习惯的术语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精英阶级普遍将这种愿景视为政权合法性的试金石和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因此中国领导人很难在没有遭到明显失败的情况下选择放弃。

2. 中国扭曲的认知结构

问题在于：威尔逊体系的力量就在于普遍性，万国不能片刻丧失罗马-美国的护法者职权。如果美国失去其罗马性，无论原因在于外交问题还是国内的孤立主义，维持远东秩序的一系列俾斯麦式承诺就会丧失可信度。在新的势力均衡体系建立（如果能够建立的话）以前，太平洋战争以前的远东格局势必重现。尽管如此，中国精英阶级仍然非常有可能支

持、至少表面上支持这种冒险行动。他们出于政治低能和历史认知的缺陷，已经在类似的不利情况下，为了追求性质类似的目标，支持了蒋介石政府的冒险行径，为自己的毁灭准备了必要条件。中国统治核心由于认知结构和信息传导渠道的缘故，从来不曾正确解读美国的信号。他们与其说维护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不如说维护原有解释体系的完整性。他们拒绝集体安全的基本原则，偏爱势力范围的逻辑，不是因为理解力的缺陷，而是因为不能承受修改认知结构的后果。威尔逊主义要求各主体具备高度的互信，实际上就是要求后者的宪制向合众国看齐。中国统治核心对罗马-美国的宪法仲裁权怀有极度的恐惧，才会将拒绝这种仲裁的特权列为首要的核心利益。

依据传统的国家利益概念，中国的理性决策者肯定会发现：依附美国的利益明显大于建立平行体系的利益。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发生。中国决策者如果口头强调理性，实际上就是希望一面发展经济合作，一面建立平行的安全体系。后者肯定会带来更大的不安全，破坏和平和发展必需的背景条件，就像一个人坐在树枝上砍树。黄岩岛事件暴露了中国的诡诈，使得美国完全丧失了诚实公正地调解中国-菲律宾纠纷的兴趣。双方分别向美国承诺撤出黄岩岛，然而中国人却在菲律宾撤离后开了进去。这种做法其实在抗战时期和抗战以后发生过多，绥德和苏皖的根据地就是当时的黄岩岛。黄岩岛在军事和经济上毫无重要性，事件真正的意义在于暴露了北京的心态变化。他们已经丧失了1996年的敬畏，开始把美国看做另一个可以推翻的国民政府了。扭曲的历史认知使他们无法看清大部分蠢人都能看到的格局，陷入国民政府抗战前夜处境的角色恰好就是他们自己。蒋介石在上海扩大战争的决策肯定不是理性的，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国族构建蓝图。中国现在的外交路线同样不是理性的，原因在于原因在于联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虚构。扭曲的认知结构导致他们在原因、结果和现象之间建立错误的联系，因此一再错误地解读美国发出的善意和公正信号，造成了一种只能依靠暴力有效沟通的局面。

所以，中美两国的利益冲突是一个伪问题。这种冲突如果当真存在，其实不难以类似英法协约的方式解决。真正存在的冲突属于另一种性质：两种无法相容的解释体系都在伸张自己的正义。太平洋也许足够辽阔，足以包容中美两国的现实主义利益。然而地球显得过于狭窄，不能允许两种解释同时存在。200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警惕日益增加。它将中国的扩张主义迹象解释为恃强凌弱，然而这种理解并不符合中国的认知结构。中国与其说针对具体的目标，不如说针对异质的国际秩序。恃强

凌弱意味着承认国际秩序，但自己要追求霸权地位。韬光养晦的意思是：帝国主义的国际秩序并不比国民党的宪法秩序、苏联的社会主义秩序更神圣，我方仅仅因为实力不足的缘故予以违心的承认。承认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成功以后自然没有必然继续承认。进攻如果失败，不能解释为目标错误，只能解释为斗争形势和实力对比的误判。例如：没有估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漫长和复杂。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错误。中国只会宣布：某些统战对象（包括国内外的社会和政治势力）应该到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再打倒，因此现在打错了，我们必须改正，继续争取他们的友谊。在这种解释体系中，如果中国改变现状的手段越来越露骨，那就说明它认为韬光养晦已经完成了任务，某些统战对象已经丧失了继续统战的价值。它修改这种判断，总是在遭到具体和物质的失败以后。

3. 中国的车臣化或朝鲜化

威尔逊体系不可能尊重中国自己划定的核心利益，这样等于承认威尔逊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虽然美国外交界和知识界存在大批现实主义和势力范围的支持者，但他们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一方面，美国群众政治对外交的影响太大。另一方面，势力范围的成功会使中国后悔索取太少。同样的游戏将会一再重演，直到决策责任从精英手中落入民众手中。这时，类似麦卡锡主义和里根主义的情绪势必卷土重来。斗争一旦演变成具有十字军色彩的善恶之争，就只能通过中国的瓦解而结束。九一一事件前夜，中国一度濒临这种处境。目前的中国由于自己的举措，正在迅速陷入同样的处境。美国支持日本重新武装的措施，已经放出了足够严厉的信号，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机会窗口正在关闭，模糊空间不大可能维持到2016年大选以后。规训的失败一旦明朗化，outlaw就会丧失世界体系的保护。蒋介石政权在革命外交以后，普京政权在克里米亚危机后，都陷入了这种不值得羡慕的处境，沦为境内外众多冒险家的竞技场。一个失控的世界无疑是黑暗的世界，但同样无疑会孕育大量的潜在可能性。美国影响或任何影响的细微差异都会导致重大的路径差异，造成的后果最有可能位于两个极端之间。在一个极端，中国可能不复存在，甚至长期无法形成有效管制的政治组织，沦为车臣或顿巴斯的放大版。在另一个极端，中国可能强化列宁主义的传统，牺牲人口中不够重要的部分，沦为朝鲜的放大版。两极端之间形成某种意义的连续统，将机会交给擅长把握机会的幸运儿。美国的举措同样最有可能位于两个极端之间。在一个极端，它在混乱中寻找库尔德式的潜在盟友。在

另一个极端，它在混乱中打击伊斯兰国式的潜在敌人。

4. 日本的角色

在这场游戏中，日本的角色比中国更值得注意。中国在1996年和2004年之间，已经将自己的路径基本锁定，造成了对日本最为有利的局面。太平洋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取消日本对亚洲大陆的天然优势，旧金山诸条约和美日同盟的实质作用是延长日本恢复其自然地位的时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大陆才有可能存在统一的大国。任何现实主义外交家都会毫不犹豫地断言：旧金山条约是中国的最大利益，美国的仲裁权是它唯一的安全保障。1972年的中国对此非常清楚，甚至心怀感激。2008年的中国已经丧失了判断形势的能力，致力于毁灭自己存在的根基。因为前者是虚构历史的发明者，能够随时修改自己的发明。后者却是虚构历史造就的产物，根本没有认知世界的其他解释体系。他们的处境非常接近于拿破仑和蒋介石，不可能具备俾斯麦和斯大林的冷酷和审慎。如果法兰西像路易·拿破仑渲染的那么强大，日耳曼邦联就是它的耻辱。如果法兰西只是徒有虚名，日耳曼邦联就是它的保护。小拿破仑为了证明前者的正确性，只能破坏日耳曼邦联，从而解放了普鲁士人。如果革命外交是错误的，那么国民政府就不应该北伐。如果革命外交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就应该能够战胜日本和苏联。蒋介石之所以做出马基雅维利绝不会赞美的事情，根本原因在于他必须笃信后者。如果中国革命史不是虚构的，美国就是阻止中国称霸东亚的唯一力量。如果中国革命史是虚构的，美国就是阻止日本卷土重来的唯一保障。中国仅仅为了证明前者为真，就不能不做出它目前正在做的所有事情，而且还不得不做得更多，直到遭遇比1996年更强硬的抵抗。

2014年的日本已经处在注定胜利的地位，因为各方已经在自己既定路线上走得太远，难以承担改弦易辙的成本。中国的胜利将会复活1975年的苏联威胁，使得日本的军事化不可避免。中国的瓦解将会恢复1920年代的远东秩序，使得日本享有奥兰治亲王对欧洲大陆的特权。美国为了维持仲裁权，不得不赋予日本远东代理人的更大职权。美国如果倾向孤立主义，约束之手解除的最大受益者肯定是日本。中国军费经过数十年的增长，已经没有什么上升空间，大多数小国尚不具备政治国家的实力和意志。日本只要把军费增加到美国在冷战后的比例，就足以造成无可撼动的优势。日本-南洋联盟极其自然而有利，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消极态度，才浪费了马来人和印尼人的热忱。日本-印度联盟和日本-东北亚体

系的发展余地非常之大，足以对中国造成致命的伤害。只有美国对挑战者施加迅速和明确的惩罚，不容任何中国革命史式的重新解释，才能阻止以上的前景出现。美国的孤立主义、绥靖主义或是长期维持平衡的政策肯定会助长以上前景的发展。因此，2015的中国处在一种极其荒谬的陷阱内。它的胜利对自己最为不利，但它仍然不得不极力争取胜利。

#第六章 完#

跋：决断时刻

东亚各族群和居民没有为冷战的突然结束做好准备，正如他们以前没有为一战和二战的突然结束做好准备。他们仍然远离世界秩序的中心和冲击波的发源地，被动和勉强地陷入了梁启超青年时代的同样处境，在三种不同的共同体路径之间无所适从。一百多年来，泛华夏主义和大中华主义的想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破坏了凯末尔式小民族主义的生长机会，延长和加重了大清内亚秩序和列强条约体系瓦解的混乱，加速和方便了列宁主义的入侵。三十年代的国民党企图纳赛尔诸夏，正如六十年代的纳赛尔和萨达姆企图蒋介石阿拉伯。前者的失败为黄雀在后的共产国际扫清道路，播种和滋养了不育的冬虫夏草人民共和国。后者的失败为黄雀在后的伊斯兰主义扫清道路，将世界文明的摇篮留给德黑兰和拉卡的圣战士。

中国的挑战性最强，危险性最大。她身为共产国际的嫡系继承者，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建立在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非法性之上。她在自身有效统治范围内，没有或不愿找到替代列宁主义的行为模式。在她的认知图景和历史经验中，成功源于弱者-挑战者的巧妙策略：弱者-挑战者依靠欺骗性合作，利用强者-统治者的资源，建立强者不能控制的平行体系，最后制造反戈一击的机会，实现弱者和强者的角色互换。这种行为模式非但不是背叛，反倒是弱者伸张正义的不二法门和政治成熟的主要标志。弱者如果没有充分理解任何规则和承诺都是某一方或各方压迫和欺骗其他各方的阶段性工具，就不可能不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背叛其历史使命：运用一切必要手段，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在她的认知图景中，历史包括公开和秘传两种。公开的历史只是宣传材料，无需认真对待和尊重，用于操纵外围群众，包括有待改造的国内和国外各种势力。自我和他者的认知边界不在中国和外国之间，而在列宁主义者团体和国内外异己势力之间。西方在宗教战争时代曾经相当熟悉这种模式，在主权国家时代却失去理解和判断这种模式的良好感觉。秘传的历史是一种汉尼拔教育，用于训练核心干部和假定接班人，包括以下内容：

现有国际体系与其说是各主权国家实体的平等博弈，不如说是长期历史演化形成的几种政治体系的不对等博弈。由于历史演化路径的差异，不同体系形成了不同的宪制结构和认知结构。因此，这些体系对同样的局势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模式和反应模式。由此形成的结构性冲突不同于共同演化体系内部各行为主体的利益性冲突，增加了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

冲突的危险性。在共同的演化体系内部，不同行为主体的关系能够大致化约为利益交换和利益冲突。纯粹利益冲突的协调不需要改变当事各方的宪制结构和认知结构，因此危机管的难度较低。结构性冲突的行为主体如果修改宪制结构和认知结构，就可能逾越自身演化路径形成的约束条件，从而导致自身的崩溃和自身所在政治生态位的重组。结构性冲突的行为主体如果不能足够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宪制结构和认知结构，协调失败而导致国际体系破裂的可能性就会大大超过单纯的利益性冲突。目前中国发展给世界体系带来的挑战以结构性冲突为主，而双方的危机管控手段以利益协调机制为主。因此基于利益分析的现实主义外交在不断解决众多具体问题的同时，未能阻止中国-世界结构性冲突的升级。

我们现在所知的国际体系，是西欧封建体系长期演化的结果，源于没有主权国家概念和国内国际区别的多层次政治网络，在多层次主体的博弈驱动下，演化形成了威斯特法利亚式主权国家体系，经过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霍布斯式斗争，产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威尔逊主义集体安全体系，威尔逊主义经过二战和冷战的考验，深刻地塑造了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结构。现存大多数行为主体之间的纠纷局限于利益冲突范畴，不致妨碍威尔逊式集体安全机制的运作和扩展。只有俄罗斯、中国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能够引发危险的结构性冲突，现有的各种协调机制都难以有效地管控危机，原因都牵涉到以上三种行为主体的历史演化和认知结构。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中国对世界体系的冲击最具挑战性。俄罗斯虽然在军事上比中国更强大，但其认知结构和历史路径融入国际体系的广泛和深刻程度非中国所能比拟。俄罗斯虽然坚持一战前的霍布斯式博弈模式，不肯完全接受威尔逊主义的约束，但其觊觎范围和冲突风险局限于本国周边地带，没有在全世界范围扩展势力的迹象，更没有颠覆国际主流价值观的能力和期望。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虽然遍及全世界，但其挑战仍然很难达到主权国家的层次，除非被更有力的挑战者利用，不大可能造成危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局面。

列宁主义团体和全世界异己势力的关系，相当于科学家和实验原材料的关系。前者的高尚动机和伟大计划，不是后者所能理解的，只能通过欺骗和劫持才能实现。团体首先伪装成国民党的忠诚支持者，在国民党的许可和资助下，在国民党不甚珍惜的边缘地带建立平行体系，最后诱使国民党和日本开战，利用苏联的力量取代了国民党；第二步伪装成苏联的忠诚支持者，在苏联不太重视的边缘地带（例如坦桑尼亚或高棉）建立（北京中心取代莫斯科中心的）平行体系，最后诱使苏联和美国冲突，利用美国的力量消灭了苏联，升级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力

量；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在冷战结束后伪装成美国的忠实合作者，利用美国的默许在更多边缘地区扩展势力，用重建明清朝贡体系的希望引诱团体外的国内势力，最后诱使俄罗斯和伊斯兰势力和美国冲突，在最近几年公开了冷战后国际体系的愿景。最后的角色互换一旦成功，不仅意味着资产阶级世界的结束，而且意味着国内外所有统战对象的鸟尽弓藏和渐次消灭，一如失去国民党和开明士绅和失去苏联老大哥的革命老干部。在团体的认知图景中，美国的让步和默许无异于国民党和苏联的类似举措。如果历史规律注定你失败，你就会像以前的失败者一样愚蠢。这种愚蠢的反复重演，最有力地证明了团体信奉的历史规律确实是宇宙真理。因此团体在下一阶段更有必要遵循历史规律的要求，重演反戈一击的举措。历史经验和认知结构不同的其他行为主体面临类似的形势，就不会表现出这种行为模式。类似拥抱熊猫的政策用于其他对象，成功的先例甚多。国民党怀柔地方军阀和中国共产党，对前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苏联培养亚非拉小国的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对前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国援助全世界不发达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对前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拥抱熊猫政策的失败原因在于：认知图景的形成锁定于特定的历史路径，因此具有相当顽固的不可逆性。普通的老虎可以驯化，部分原因在于她的记忆库没有存储食人的经验策略。同样的技术用在吃过人的老虎身上，就很可能增加自己被吃的机会。

这种解释体系存在根本性的因果错置，足以导致团体面临自我毁灭的风险。然而团体如果没有获得其他可行的替代路径，就很难放弃经过历史验证的有效成功策略。团体如果贸然接受其他解释体系，就会将自己降格为改过自新的犯罪集团。这种前景比自我毁灭还要糟糕，相反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团体最终重塑世界体系，就有希望修改全人类的认知图景。这种实验已经在中国国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未必不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团体即使因此失败和毁灭，至少还能将自己的命运解释为帝国主义的邪恶和历史的暂时曲折，无需留在资产阶级世界扮演反面角色。北京不能摆脱这种认知图景的可能性甚大，因此有极大的机会在今后五到十年转向以下政策：利用过去三十年赢得的红利，试探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底线，尽可能在亚太地区取代美国，至少争取事实上的中美共治局面。这种策略如果成功，远东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可能性就会消失。一战前的霍布斯式博弈如果重现，所有各方都会损失惨重。北京很可能是损失最大的一方，然而认知结构的缺陷很可能妨碍她充分评估这种可能性。若非如此，她在2012年以后的举措就会难以解释。美国如果释放可以解释为默许的错误信号，亚太各小国就会面临选择的压力。部分小国可能变成北京的附庸，从而增加后者进一步挑战的可能性。拒绝

臣服的各国势必结成类似奥格斯堡同盟的体系，其中肯定会包括日本。日本在解除美国保护和约束的假定条件下，就会轻易恢复东亚英格兰的自然地位，相对于大陆强国享有巨大的优势。这种极其危险的可能性是否成为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有关各方认识和探讨其他可能性的努力。

1999年以后的世界就其时空坐标而言，已经不具备另起炉灶的机会窗口。任何潜在的挑战者都必须面临比德国、日本、苏联更加不利的条件，甚至事与愿违地扫清世界秩序的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缺乏承受刚性冲突和恶性军备竞赛的能力和意志，又不能忍受既成事实或接受某种实质上等同于体面失败的斡旋。她只能重演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的策略，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割处理，一面整军经武、一面发展经济，采取默许但不让步、拖延但不放弃的外交路线，将残酷的决断留给未来。她只能希望：依靠国内的励精图治和国际形势的自然演变，有朝一日会出现比今日更为有利的局势。如果未来并非如此，她其实无计可施。她能够反对美国的地区仲裁权，却无法反对美国的世界体系。世界体系限制了她的路径和层次；但若没有世界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她的处境就不会比1930年代的中华民国更安全。政治外交的失败和经济外交的成功能够为她争取最长久的缓冲时间，但不一定能达到她需要或希望的程度。无论经济外交是否成功，政治外交的成功都会引起重铸东亚体系和中国自身结构的大风暴；但单独改造世界体系本身的可能性甚微，对她自身也并不有利。从长期历史的角度看，列宁主义无非就是帝国解体和民族建构中间过渡期的插曲。通俗口号意义上的民主只是国民共同体建构过程的一个侧面。国民共同体不存在，国民主权者自然不可能存在。主权者缺位，自然会吸引入侵者。近代化意味着民族-民主建构的最终完成，等价于列宁主义从长征到灭亡的宿命。两大列宁主义党派合流，预示1848年原则即将浮出水面。民进党吃掉国民党，第三势力吃掉民进党，实际上就是浅绿和深绿的对立取代蓝绿对立，台湾共同体的国族认同功德圆满。随着香港政治改革的纠纷日益升级，类似的进程正在香港展开。任何熟悉台湾解严初期社会气氛的人都能看出，今天的香港和二十年前的台湾多么相似。

2016年以后的东亚格局酷似1972年以后的世界，只是层次和数量级相应地降低了。北京接替了莫斯科的角色，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陷入日益狭窄的境地。铤而走险意味着迅速的毁灭，避重就轻意味着缓慢的衰竭。河内继承了北京在1972年的生态位，反戈一击的报酬足以保障一段类似北京八十年代的蜜月，但她自身的列宁主义团体早晚会构成最后转

型的障碍，背叛只能保障将决断推迟到北方巨人的威胁解除以后。平壤已经关闭了所有的回头路，无法逃避残酷和血腥的结局，除了收拾残局的困难以外，不会留下太多的悬念。只有北京统治的东亚 / 内亚广大土地，仍然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背后没有波兰或韩国，只有一片完全不符合近代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模型的内亚丛林。战国—秦汉延续了诸夏的有机共同体，尚可称为邦国（state）。后来的列朝和列国非但不具备邦国的性质，甚至不具备共同体的性质，也就是说她们不是所在社会的自发秩序，而是漂浮在社会之上的冒险家集团。即使郡县制都失去了绝对主义的涵义，变成冒险家集团针对资源的外在开发。北朝隋唐体系和辽金元清体系都是内亚秩序的延伸，秩序生产力来自中原郡县编户齐民区域以外，在内亚组织资源的输入渠道衰弱或中断后，就越来越无法继续维持中原的秩序。编户齐民在内亚体系中不占重要地位，接近于罗马帝国的埃及和大英帝国的印度。印度知识分子对德里副王朝的看法，仅代表大英帝国极不重要的侧面。儒生对天下的道德统治 / 和平主义理念，实际上反映了降虏社会处在组织资源输入区或依附地位。内亚部族共同体或部落联盟的宪法结构才是天下体系的核心，相当于大英帝国的日耳曼习惯法。

吏治国家的宪法结构比部落联盟、千篇一律的原子顺民比参差不齐的武士团体更容易统治。所谓汉化其实就是组织资源的衰竭，跟王朝大一统切断或损害了多国体系时代畅通的内亚组织 / 科技输液管关系甚大，无一例外地构成王朝退化和灭亡的先声。大清天下体系早在西方殖民主义来临以前，已经走上了同样的道路。穆斯林的火炮和坚船正在马六甲和棉兰老攻城略地，进犯广州只是时间问题。日本武士在明末来得太早，中亚部落在清初又来得太早。大清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规训和保护，恐怕早已亡在这些秩序输出者手中。二十世纪初叶的内亚 / 东亚社会开始效法欧洲和日本，试图建立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她们最初的成就并不比拉美各国更差，只是缺少美国这样善意和强大的保护人。列宁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二十世纪初叶开始的共同体构建，当时草创的几种模式无一足以胜任如此复杂的使命。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利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阴差阳错，击败了日本泛亚主义体系和国民党大中华主义体系，向大清遗留的内亚 / 东亚输出自己的秩序。毛泽东利用冷战和反殖的阴差阳错，切断了苏联的输液管，导致了六十年代的秩序崩溃。北京输出革命的失败，本身就反映了解放军和特工组织的退化。梁山化其实是“去苏联化”的必然结果，相当于大唐大清的汉化（去内亚化）和衰落。二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地下组织就人力和金钱而言都不及六七十年代，然而渗透颠覆能力比后者强大得多，不是因为伍豪和赵容老了，而

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组织资源。六七十年代的苏联特工机构在亚非拉全线征服了梁山的输出，从另一个角度映证了前述的组织资源落差。随着苏联体系的崩溃，内亚 / 东亚的列宁主义庶子沦为孤儿。美国主导的威尔逊主义秩序如日中天，伊斯兰极端主义构成主要挑战者。孤儿陷入陌生的新世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内亚帝国体系和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矛盾 / 列宁主义收割机和市民社会的矛盾 / 陆权和海权的矛盾都处在延迟释放的状态。瓶塞一旦打开就会相互牵动，将一百多年积累的历史运动压缩到短暂的时间窗口内。未来不得不从当初中断的地方重新起步，秩序真空可能引起新的入侵和溃败，然而开放的路径本身就具备无穷的魅力，因为决断时刻的毫厘之差都会留下长久和深刻的印记。

#全书完#

[1](#) 毛泽东和基辛格策划围堵苏联，以土耳其、伊朗和中国为前线国家。中国是东亚的反苏前线，正如土耳其是西亚的反苏前线。中国作为反苏的前线国家，可以获得美日大后方的援助，正如它原先作为反美的前线国家，获得了苏联大后方的援助。随着安全保障的增加，军队和计划经济的重要性相应地降低。参见基辛格回忆录。

[2](#) 孙德刚：《论1979年、1980年美台“准联盟”关系的形成》

[3](#)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478-479页

[4](#) 1945年12月29日，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正如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耍手腕一样，蒋经国作为昔日的联共（布）党员，也想在蒋介石和我国之间耍手腕，他会把自己装扮成苏联的无私朋友……蒋介石的亲信并不喜欢蒋经国，不仅因为后者以前是左派，而且因为他是蒋介石政治遗产的觊觎者。事实上蒋经国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丝毫不能和宋子文那样的生意人和政客相比。”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第98页

[5](#) 周恩来负责的特务工作处下辖四股：保卫股 / 情报股 / 特务股 / 匪运股，办公地点在汉口余积里12号。刘育钢：《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第二章第二部分；李春远：《革

命根据地时期中共的秘密社会工作》，《二十一世纪》，总第58期

[6](#) 1960年代“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中共对外政策日趋激进，196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又称《二十五条》），重新树立了“世界革命”的旗帜，提出要坚决支持亚非拉反帝革命斗争。文革结束后，华国锋仍然继续这一立场。比如，《人民日报》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发表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说：“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根据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科学分析，做好对外工作，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7](#) 越南共产党吞并南越以后，刚刚完成类似苏联和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公私合营，苏联就解体了，不得不改革开放。西方舆论对共产主义的宽容在三十年代以后不断下降，到越南共产党胜利的七十年代已经所剩无几。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也不像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样激进，因此越南社会的破坏比苏联和中国时间段程度轻。

[8](#) 中国和南斯拉夫背叛苏联，牟取西方的支援，前提是苏联仍然是共产主义国家。一旦苏联共产党瓦解，即使威权主义的俄罗斯，也不失为西方的表兄弟，比共产主义的中国和南斯拉夫更值得西方支援，同样的背叛策略就不再有统战价值了。

[9](#) 参见张在虎：《苏联苏共二战后初期中苏关于中国俄侨问题的交涉与斗争》，《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1期；汪之成《上海俄侨史》/费成康《中国租界史》和《米特罗欣档案》

[10](#) 邓小平打越南，包含向美国交投名状的意义。越南打高棉，包含向苏联交投名状的意义。冷战一结束，北京和河内都停手了。

[11](#) 市场经济是多中心的调节体系，企业家分散决策。他要负责预测需要多少工人，生产多少产品，能够向消费者卖出多少。预测错误的企业家破产，让位给预测正确的企业家。计划经济只有国家计委一个决策中心，企业经理只是执行人员。国家计委必须算准全国需要多少工人，生产多少产品，消费者消费多少产品。人民公社必须实行，因为非如此不能控制农产品的销售和工农产品的交换。如果生育决策权继续分散在各家庭，计划当局就无法保证全国劳动力供应符合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就是说自由生育和资本主义是配套的，计划生育和社会主义也是配套的。毛泽东虽然打击他，但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其实比毛泽东高。

[12](#) 外围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培养的干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干部。匪谍派和毛派的罪行和错误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所得利益跟经济发展成就挂钩。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接近于李鸿章对清兵入关的态度，为了给经济发展营造稳定的环境，他们需要和平与秩序。他们为了避免“折腾”，希望把共产党改造或伪装成正常国家，但这样可能弄假成真，使核心党丧失权力。

[13](#) 日本外务省编：《外交青书》，1998年，第320页

[14](#) 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第156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1978.12-1996.12》，红旗出版社，1997，第1277-1278页

[16](#) 本节的4~7小节的发表时间约为2015年4月。